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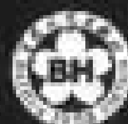
·新世纪人文译丛·

# 结构语义学

[法] A. J. 格雷马斯 著

蒋梓骅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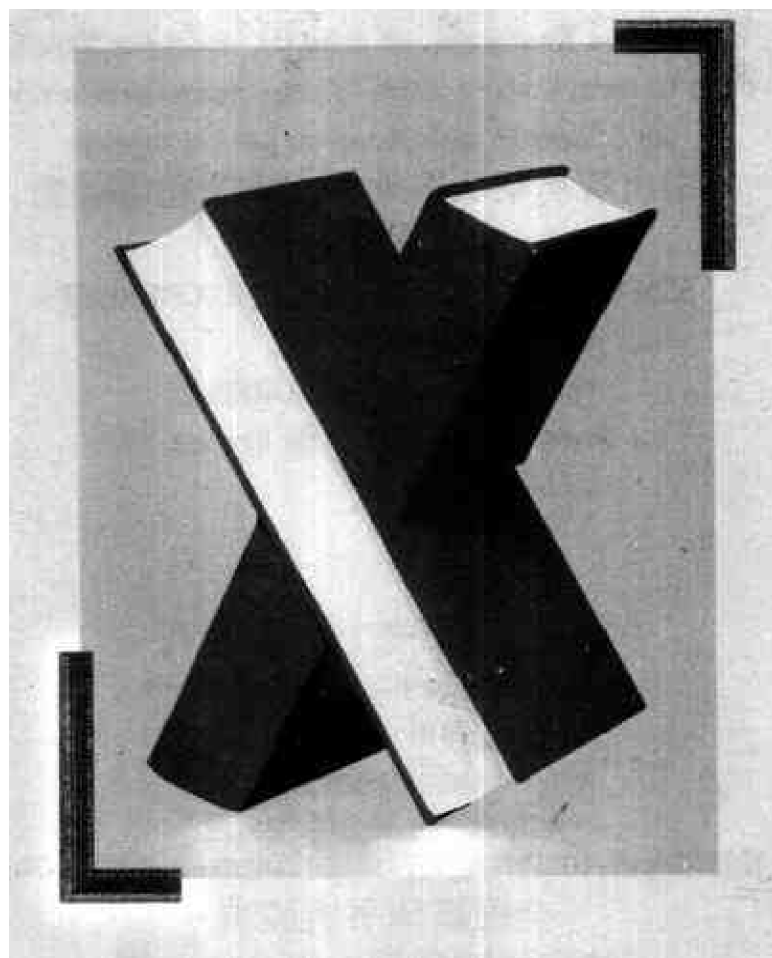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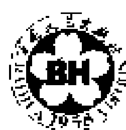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结构语义学

[法] A．J．格雷马斯　著
蒋梓骅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构语义学/(法)格雷马斯著;蒋梓骅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ISBN 7-5306-3213-2

Ⅰ.结… Ⅱ.①格… ②蒋… Ⅲ.结构主义(语言学)-语义学-研究 Ⅳ.H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9922 号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t celui du Ministeère français
de la Culture, lesquels méritent dêtre vivement remerciés
par éditeur et traducteurs du présent ouvrage

本书出版承蒙法国外交部和文化部赞助,
特此致谢!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RECHERCHE
DE MÉTHODE
ALGIRDAS JULIEN GREMAS

© **Pres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5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85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0.00 元

# 内容提要

A.J.格雷马斯(1917–1992),法国语言学家,祖籍立陶宛。符号学法国学派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结构语义学》、《论意义》、《论意义 II》、《符号学与社会学》、《神与人——立陶宛神话学研究》等。

《结构语义学》系作者在法国亨利·普安卡雷学院讲授"结构语义学"的讲稿,1966年初版,成为法国百年来第一部语义学专著。此书提出了一系列符号学方法论新概念,建立了文本的叙事和话语研究,被视为符号学法国学派奠基之作,也一直是语义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著作。

# 前　言

特里萨·基恩·格雷马斯[1]　著

史忠义　译

当这部1966年的文本的中文版出版之际，终于有幸面对中国读者，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对此感到极大的满足。该文本被正确地视为语言符号学法国"学派"创始人阿尔吉尔达斯·朱利安·格雷马斯的第一部语言符号学论著。如何探讨学科的这部"经典"之作呢？是从20世纪下半叶西方认识史着手，也就是对这部著作进行一种追溯解读，承认其当初的创新，它所体现的认识论决裂，即对有关符号之不可判定的经验概念的拒绝和另辟蹊径从事符号研究的志向？抑或采取一种前瞻性态度，视其为一种许诺，一种激励，激励人们根据语言符号学原理亦即作为实践的符号学，逐步掌握该学科的方法论？我以为上述两种方法南辕北辙，互不相容。

完成国家博士论文(1948)及早期发表文字阶段[2]，年轻的词汇学家和文献学家A.J.格雷马斯视词汇学是一门能够向人

---

① T.K.格雷马斯是A.J.格雷马斯的夫人。——译注

② 参阅《1830年的时装》，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0。该著作包括A.J.格雷马斯的著作目录。

文科学提供强大理论工具和方法论工具的学科，因为它是语言学中惟一关注意义的学科。而以分类为基本方法的词汇学局限于传统词汇单位词的研究，近两个世纪的语言学也未能赋予词以科学解释。还有，格雷马斯自认为师出其门的索绪尔传统并不把词作为语言单位。当时的探索必须放弃词及其神秘性而有所前进：词之下，把义联类型（catégories articulées）分解为最小的表达单位和内容单位（叶姆斯列夫的遗产）；词之上，建构言语的同位关系和叙事句法。1966年，语义学终于取代了词汇学[①]。格雷马斯与某种词汇语言学和符号学（sémiologie du signe）拉开距离，这种学术活动要比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彻底得多，后者仅表现为意识内涵的修辞学批评[②]。《结构语义学》的作者力求建构言语表现之前关联意义类型及其发展的独立层面，旨在从语义学方面证实风格学的脆弱性以及辞格的纷杂和多余。

以彻底为特色的《结构语义学》在建构方面、首先是理论发凡阐述阶段的命名、术语定义及定义间意义[③]的确定不失严谨。同样，各种类型范式的建立也不失严谨：从普罗普关于俄罗斯童话的范式的有限的经典序列出发，建立（叙事的）施动者以“获得新思路和新的思想内容”；词语描述：词素“头”的描述已成为

---

① 然而，奇怪的是，格雷马斯仍然忠实于词典学，并在稍弱的程度上忠实于词汇学，他所编撰的下述辞典足以为证，如《截至14世纪中叶的古法语词典》，巴黎，拉鲁斯出版社，1968；《一般法语词典》（与特里萨·基恩合编），拉鲁斯出版社，1992，以及下面我们将要谈到的定义间界定方面的理论词典《符号学，语言理论的推论词典》（与J. 库尔泰斯合编），巴黎，阿歇特出版社，1979。

② 《神话学》，巴黎，瑟伊出版社，1957。

③ 术语的定义间界定是符号学词典的基础。

"经典";或文本的描述:如贝尔纳诺作品的描述(有人发现,这篇分析中有加斯东·巴歇拉尔的强烈影响);尤其是那些振聋发聩的假设,突出发现程序("做"之行为渐次展开),并始终从词汇轴线(布拉格学派之遗产)和意群轴线(丹麦学派之遗产)两个层面予以分析。未来的学术研究从此获得了语义分析的先例和叙述性(narrativité)的概念,格雷马斯把后者定义为深层句法(和抽象语义)层面与表层句法(和形态)层面两个不同层面的有序转换。

自 1970 年起①,符号学代替了语义学而占据了格雷马斯的思考空间。下面这句话开创了这个新阶段:"谈论意义并谈得颇有见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从词汇学到语义学再从语义学到符号学的三段式旅程颇能说明问题。无疑,三个学科都关注意义,但是,每个阶段的理论架构不同,适用场也不同。这样,符号学理论就要在包容前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这种建构程序是双重的,因为它力求——虽然并非每次都达到初衷,但却值得特别关注;这自然是题外话——保持认识论层面与应用层面的关联。而这正是自《结构语义学》以来符号学实践的突出特征。

《符号学词典 I》使理论表述达到了综合表述的最高程度。所有的观念和概念互相交错互相补充互相定义,每个开端每个声音都体现了研究成果。该词典面世(1979)后,成了所有概念调整的新的立足点。

符号学继续前进。如今,当我们从哲学方面和认识论方面与这部奠基之作有了足够的距离之后,清楚地看出,对它的所谓

① 《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70;《论意义卷二》,巴黎,瑟伊出版社,1983。

“理想主义”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格雷马斯始终把表意手段和语义的物质层面视为关键。在叶姆斯列夫关于（表达形式和内容的）材料与实质的关系中，《结构语义学》强调实质机制的多样性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仅举一例以窥一般：文本展示同一声音材料是如何成为音位学或音乐的感知对象的。一切都取决于对不同材料进行符号学的文本分析时所选择的有效层面。

这种以科学探索为天职的言语实践以反映若干物质群体为己任，建构从简单（深层）到复杂（文本表面）、从抽象到具体的一条科学之旅。换言之，把以和谐的方式思考事物作为小径，作为旅程。这正是 A. J. 格雷马斯的作品的追求，也是他的一生的缩影。我谨想把这种精神传达给中国读者，他们将通过这部勇敢的、无疑也一定很杰出的译作的文字，了解格雷马斯其人和他的作品。

巴黎，2001 年 6 月 13 日

# 目　　录

## 一门科学语义学的条件


1°　语义学的处境 …… 1

a）意义与人文科学 …… 1

b）一门穷亲戚：语义学 …… 3

2°　意义与感知 …… 5

a）基本的认识论选择 …… 5

b）品质描写 …… 7

c）基本的操作概念 …… 8

3°　表意集与自然语言 …… 8

a）能指的分类 …… 8

b）能指与所指的关联 …… 9

c）“自然”意义与“人造”意义 …… 10

d）自然语言的优势 …… 11

4°　语言的等级层次 …… 12

a）语言集的封闭性 …… 12

b) 意义的逻辑层次 …… 13
c) 作为语言的语义学 …… 15
d) 认识论层次 …… 16
e) 符号标记 …… 18

## 意义的基本结构

1° 连续性与断续性 …… 20
2° 结构的第一个定义 …… 21
3° 并合与分离 …… 22
4° 基本结构 …… 23
5° 语义轴 …… 24
6° 关系 …… 25
7° 义素接合 …… 26
8° 义素接合方式 …… 28
9° 形式与实体 …… 33
10° 义素与词位 …… 34
11° 结构的第二个定义 …… 36
12° 总体与部分 …… 37

## 语言与话语

1° 意义与交际 …… 39
2° 义素系统 …… 41
3° 义素与词位 …… 46
4° 话语层面 …… 48
5° 关系的显现 …… 52

## 显现意义

1° 义位 …… 57
a) 交际单位与意义单位 …… 57
b) 词位：一个风格学意义丛 …… 58
c) 义位的定义 …… 61
2° 核心形象 …… 63
a) “头”的第一个义素核心：端部 …… 63
b) “头”的第二个义素核心：球状 …… 66
c) 共同的义素核心 …… 67
d) 简单形象与复合形象 …… 68
e) 转向内容的符号学层面 …… 69
3° 类义素 …… 70
a) 语境义素 …… 70
b) 词位与义位 …… 72
c) 类义素的定义 …… 74
d) 转向语义学层面 …… 75
4° 工具概念 …… 76

## 符号学层面

1° 方法与近似性 …… 77
a) 符号学层面的自主性 …… 77
b) 以人类为中心的词位说 …… 79
c) 一个保留的领地：象征表示 …… 81
d) 语言学与想象领域 …… 82
2° 符号学的地位 …… 84

a） 象征层面与符号学层面 …… 84
b） P. 吉罗的“原初语义特征” …… 86
c） 符号学层面与生理学释义 …… 90
3° 符号学描写的各种可能性 …… 92
a） 应用语言学领域的语言构成 …… 92
b） 概括层次 …… 95
c） 描写步骤 …… 97

## 话语的同位意义集

1° 话语的异质性 …… 99
a） 信息同位意义集 …… 99
b） 同位意义集的变化 …… 100
c） 同位意义语境的范围 …… 102
2° 话语的元语言运作 …… 104
a） 扩展与定义 …… 104
b） 压缩与命名 …… 107
c） 转义命名 …… 111
d） 类义素的双重功能 …… 114
e） 形象名称分析 …… 115
f） 转义名称分析 …… 118
g） 定义分析 …… 119
h） 义位的构成 …… 124
i） 形象的同构性 …… 126
3° 同位意义集的确立条件 …… 127
a） 间接定义 …… 127
b） 关于世界的评述 …… 133

c) 文体的封闭性 …… 134
d) 从个体文本到集体语料集 …… 137
e) 同位意义集与变化 …… 140
4° 话语的多义性 …… 142
a) 复合同位意义集的显现 …… 142
b) 文学领域的双重象征 …… 144
c) 同位意义集及其解读 …… 146

## 语义域的组织

1° 意义的内在域 …… 151
a) 双重认识论方法 …… 151
b) 归纳与演绎 …… 152
c) 内在域探索的经验论方法 …… 154
d) 系统与词素 …… 155
2° 意义的显现域 …… 156
a) 内容 …… 156
b) 组合体 …… 159
c) 策略性选择 …… 160
d) 义位语料集的开放性 …… 161
e) 抽象义位与具体义位 …… 162
f) 不相容性 …… 164
3° 话语 …… 165
a) 词化与语法化 …… 165
b) 表达的差异与内容的同一 …… 166
c) 交际 …… 169
d) 信息的组织 …… 171

## 意义与话语

1° 显现与话语 ········· 174
a) 显现域的二分 ········· 174
b) 基本同位意义集 ········· 176
c) 句法组合体 ········· 177
d) 虚构与“赘述” ········· 180
2° 话语显现 ········· 181
a) 意义组织的语用基础 ········· 181
b) 话语显示方式 ········· 182
c) 语义微观域 ········· 184
d) 微观域分类 ········· 186
e) 谓项与施动者 ········· 187
f) 施动者的范畴化 ········· 189
g) 逻辑句法与语义句法 ········· 191
h) 施动者范畴的语式特性 ········· 193
i) 一种语言认识论 ········· 194
3° 形象显现与非形象显现 ········· 196
a) 一个例子：诗歌交际 ········· 196
b) 隐含与明示 ········· 199
c) 非形象性 ········· 200
d) 转向科学元语言 ········· 202
e) 描写模型的检验 ········· 203

## 描写程序

1° 语料集的组成 ········· 205

a) 目的与程序 …… 205
b) 语料集 …… 207
c) 文本 …… 210
d) 是清除还是提取？ …… 212
e) 清单 …… 213
f) 个体清单与集体清单 …… 214
g) 层级与时段 …… 216
2° 规范化 …… 221
a) 描写的同质性 …… 221
b) 文本客观化 …… 222
c) 基本的描写句法 …… 223
d) 描写词位系 …… 227
3° 构建 …… 230
a) 模型构建：缩简与结构化 …… 230
b) 简单缩简 …… 231
c) 复合缩简 …… 235
d) 语义学步骤与风格学步骤 …… 242
e) 结构化 …… 243
f) 对应与生成 …… 245
g) 内容的建立与组织 …… 248

## 关于施动者模型的思考

1° 两个描写层次 …… 251
2° 语言学领域的施动者 …… 253
3° 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施动者 …… 254
4° 戏剧中的施动者 …… 256

5° 施动者范畴："主体" / "客体" …………………… 257
6° 施动者范畴："发出者" / "接收者" ……………… 259
7° 施动者范畴："辅助者" / "反对者" ……………… 261
8° 神话型施动者模型 ………………………………… 264
9° "主题"投入 ……………………………………… 264
10° 经济领域的投入 ………………………………… 268
11° 施动者与角色 …………………………………… 270
12° 施动者动能学 …………………………………… 273
13° 施动者模型与精神分析批评 …………………… 275
14° 精神分析的施动者模型 ………………………… 278

## 转换模型探索

1° 缩简与结构化 ………………………………………… 283
a) 功能的组织 ………………………………… 283
b) 功能清单 …………………………………… 284
c) 功能配对 …………………………………… 286
d) 契约 ………………………………………… 288
e) 考验 ………………………………………… 290
f) 主人公的缺席 ……………………………… 293
g) 异化与再整合 ……………………………… 295
h) 考验及其结果 ……………………………… 298
i) 缩简的结果 ………………………………… 299
2° 解释与定义 ………………………………………… 300
a) 叙事的非时间性与历时性成分 …………… 300
b) 考验的历时性地位 ………………………… 302
c) 叙事的戏剧张力 …………………………… 305

d) 叙事的两种解释 …… 306
e) 叙事的非时间性意义 …… 307
f) 转换模型 …… 312
g) 作为调解者的叙事 …… 314
3° 转换模型与心理剧 …… 315
a) 从集体到个体 …… 315
b) 起始补偿结构 …… 317
c) 斗争的出现 …… 318
d) 考验的展开 …… 319
e) 考验的完成 …… 322
f) 辨认与奖赏问题 …… 323
g) 模型的形象显现 …… 325
h) 转换模型的意义 …… 326

## 一个描写样本

1° 总则 …… 328
a) 选例：贝尔纳诺的语义域 …… 328
b) 提取法与文本组成 …… 329
c) 同位意义集的选择 …… 332
2° 作为“包含方式”的生存 …… 334
a) 显现的形式与分析的类型 …… 334
b) 生与死 …… 337
c) 火 …… 339
d) 水 …… 341
e) 构成模型 …… 344
3° 作为赌注的生存 …… 345

a) 疾病 …… 345
b) 动物寓意录 …… 347
c) 谎言 …… 349
d) 及物谎言 …… 351
e) 经济缩简 …… 353
f) 不及物谎言 …… 355
g) 真理 …… 357
4° 模型的比较与选择 …… 358
a) 同质性的缺乏 …… 358
b) 结果比较 …… 361
c) 模型与内容 …… 363
d) 功能模型的语式特性 …… 365
5° 辩证的生存观 …… 368
a) 语式 …… 368
b) 贝尔纳诺的否定 …… 370
c) 贝尔纳诺的肯定 …… 371
d) 辩证算式 …… 373
e) 历史与恒定 …… 375

# 一门科学语义学的条件

## 1° 语义学的处境

### a) 意义与人文科学

意义问题是现今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为了把各种人类行为转变为人类学,把各系列事件转变为历史,我们不得不去探寻人类活动的含义和历史的含义。

在我们看来,人类世界本质上可定义为意义的世界。世界只有意谓什么才称得上是"人"的世界。

因此,只有在探寻意义的活动中,诸人文科学才能找到它们的共同点。因为,如果说各门自然科学在探知什么是人和世界的话,那么诸人文科学就是以多少有点明晰的方式给自己提出了人和世界意谓着什么的问题。

就意义问题的界定这一共同愿望看,语言学最有资格当此重任,因为这门学科得到了更为详尽的阐述,更形式化,可以向其它学科提供它的经验和方法。故此,在50年代的法国,语言学压倒其它学科,获得了主导学科这一令人羡慕的称号。

语言学所获得的优越地位只会造成一种带有悖论色彩的局面：从一个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所在辐射出一种双重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荣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早在语言学之前，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知道，这一效应名谓“通俗化”，其特征是扭曲一门学科的方法论结构，取消该学科诸概念之间往往是最基本的对立。结果，被贫化和扭曲的语言学术语在一些前卫刊物上大行其道，以致语言学家极难从中辨认出自己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语言学也产生了一种可靠的方法论效应。但这种方法论效应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方法借用，而是指认识论态度，某些模型和发现程序的移植。这种移植丰富了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拉康（Lacan）、巴尔特（Barthes）一类学者的思考。而在这些认识论模型和它们所适用的领域之间不无差距，该差距只会促使这些模型趋向个性化。如果说由此产生的大量研究成果使行家们现在得以谈论“人类学法国学派”的话，那么缺少一种方法论催化剂就更加令人感到遗憾了。

该催化剂作用自然是语言学所起的作用。奇怪的是，语言学应承各方所求，但对任何语义研究往往犹疑不决，甚至抱有敌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b) 一门穷亲戚:语义学

必须承认,语义学向来就是语言学的穷亲戚。在诸语言学科中,语义学是最新形成的门类,连其名称也是19世纪末才造就的。从历史语言学发展过程看,在语义学出现之前,先有得到详尽阐述的语音学,继而是语法学。即使有了名字并立足于世,语义学也只是致力于借用传统修辞学和内省心理学的方法。

结构语言学的发展遵循同样的先后次序。布拉格学派首创音位学,哥本哈根学派紧随其后,关注语言学理论的制作,并致力于用这一理论革新语法研究。语义学被忽略了,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也是一种有意的行为,因为在语言学界,人们至今还在考虑语义学是否有一个同质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是否有权利把语义学视为一个语言学门类。

要确立语义学所特有的方法及其研究对象的构成成分确非易事。音位的数目有限,并具有区别性特征——人类第一次科学革命即最早的字母表制定所隐含的发现——,先后推动了语音学和音位学的进步。语义学的遭遇则大相径庭。人们不无羞怯地视语义学对象为"心理实体",而这一传统定义有碍语义学同心理学、社会学之间的界限划定。至于其构成成分,相关的术语纷然杂陈——义素(sémème)、义分(sémième)、专属义素(sémantème)——,这种现象只能表明其处境的尴尬和概念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最怀善意的语言学家也只能把语义学看做一门还在寻找自己身份的学科。

后来,某种依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语言学观念占据了上风,这对语义学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人们知道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给语言符号下的著名定义(《语义论》):语言符号是“一个有意义的语音形式”(第 138 页),但“该意义是不可知的”(第 162 页)。考虑到这类行为主义观点,人们已习以为常地把语义学本身看做一门没有意义的学科。然而,正如雅各布森(Jakobson)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人说“意义问题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当他们说‘没有意义’时,下面两种解释必居其一:或者他们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而该事实本身就使意义问题有了意义,或者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那他们的表述当然没有意义”(《论文集》,第 38 – 39 页)。

上述三个原因,即语义学研究在历史上起步较晚、其对象的确定所特有的困难和形式主义思潮兴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解释了语言学家在意义研究上所表现出来的犹疑不决。

所有这一切表明,对于一个意识到意义问题的紧迫性、愿对意义的科学研究所需条件进行思考的人来说,其处境不会顺畅无阻。他必须面对两类困难,即理论困难和实践困难。

理论困难来自于工程之浩大:语义学如果要在语言学总体结构中找到它的位置,并带着它的各种公设和主要工具概念融入该结构的话,那它同时必须具备足够的概括性,以便它之尚待构建的方法与任何其它的意义研究相容。换言之,语义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自然语言,但对自然语言的描写属于一门更广泛

的意义科学，亦即索绪尔意义上的符号学。

实践困难与他之思考成果的可能的受收人有关。在此研究阶段，形式化需要、对所用概念的单义性的强调，只能用新的名称和过多的、在严密性方面精益求精的定义来表达。这类前科学探索在其文化参考系是文学或历史的受收人看来，既充满了学究气，又是多余的。相反，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则有理由认为，这类探索尚嫌不够，且过于"定性"。这些逻辑学家和数学家是一个支持和施压的群体，语言学家不得不予以考虑。作者就这样被夹在一些互相矛盾的实际需求之间，只得冒着得罪天下人的风险，选择一条中间道路，以便让双方解其用意：如果说他觉得少了数学逻辑和逻辑学的帮助，语义学显然只能守着自己的一般概念顾影自怜，那么他同样明白，一种语义学启蒙倘若无所作为，不去面对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的人文科学，它仍将长期遭受同唱诗班练习曲一样的命运。

## 2° 意义与感知

### a) 基本的认识论选择

关于意义，第一个看法所针对的，只能是它所兼有的遍在性和多样性。若对人的处境做一思考，人们不无天真地惊叹：从早到晚，从身处母腹直至死亡，人始终为来自四面八方的意义所包围，无时无刻不为各种各样的信息所纠缠。而某些文学运动却想建立一种非意义美学，它们的愿望是多么天真——这次是非科学意义上的天真。在一间房间里，有两张并置的椅子，这在

阿兰·罗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看来充满了危险，原因是这一在场能引起联想，具有神话作用，但人们忘了，即使只有一把椅子，这一在场也具有一个语言纵替换关系（paradigme）功能，它预设了不在场，故照样有所意谓。

但是，一门以意义的遍在性为出发点的语义学，只会混同于认识论，故它不得不设法取代认识论，或者归顺于某种认识论。这一窘境，叶姆斯列夫（Hjelmslev）看得很清楚，他指出这是各门科学的共同命运，并非语言学一家的遭遇，故建议顺受天命，同时尽量控制可能的损失。因此，认识论预设应该尽可能少一些，概括一些。

在深知底细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把感知当做把握意义的非语言所在。这样做，我们能直接受益，但也立即生出弊端，因为我们无法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建立一个独特的语言意义类别，语义学也就不再有别于索绪尔的符号学。我们承认自己主观上偏向梅洛－庞蒂不久前在法国阐述的感知理论，但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认识论态度看来也为20世纪诸人文科学所共有：我们已经看到——仅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完形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取代了“官能”心理学和内省心理学。人们还发现，对审美事实的理解如今更多地处在对作品的感知层面，而不再放在对天分或想像力的探索上。因此，这样一种认知态度，即使只是暂时的，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时期却颇为有效，因为很难设想另一些能被所有人接受的适当标准。

b) **品质描写**

认定人类世界的意义处在感知层面，是指把意义探索规定在共同感觉世界，即人们所说的感性世界范围内。这样一来，语义学就公开承认自己试图描写的是感性世界。

对这样一种立场感到意外的只是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接受计量法在当今语言学诸领域的支配地位，却不了解这种方法收效不大——其错不在所使用的计量程序，而在性质的概念化程度不高，以致计量程序无法操作。另一方面，一种越来越精确的定性分析只会有助于填补现今存在于被视为量化科学的自然科学和虽有迷惑人的外表却依然是质化的人文科学之间的空隙。因为，在诸自然科学内部，似乎正在出现一个平行逆向运动。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思维》（第 20 页）中所说，“现代化学将各种滋味和香味归结为氧、碳、氢、硫、氮这五种元素的不同组合结果。通过制订元素加减表以及计算剂量和阈值，现代化学成功地解释了某些性质之间的差异和类同，而这些性质过去因其次要性而被它拒之门外。”故此，品质描写有可能在感觉世界和“意义效应”这片雾蒙蒙的地带上架起一座桥梁，或许有朝一日能使量与质、人与自然达成和解。

**说明**：人们注意到，在列维－斯特劳斯所举例子中，与符号学系统最终成分相对应的，是化学过程中的横组合段（*syntagmes*），而不是化学系统。

### c) 基本的操作概念

为了建立一套操作术语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将用能指(signifiant)表示能使意义出现在感知层面并同时被确认为是外在于人的成分或成分组。我们将用所指(signifié)来表示意义或能指所覆盖的、并因能指的存在而得以表现的各种意义。

惟有当某物确实表达什么时，我们才能认其为能指，并赋予其能指这个名称。所以能指的存在是以所指的存在为前提的。

而所指成为"所指"，只是因为它被表达，也就是说有一个能指在表示它。换言之，所指的存在必须以能指的存在为前提。

这种互为前提是惟一没有被定义的逻辑概念；所以继叶姆斯列夫之后，我们用它来互相定义能指和所指。

对于这一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我们暂时称其为表意集(ensemble signifiant)，但同时指出，该定义所包含的、表示总体概念的集这个名称，暂时不予定义。

## 3° 表意集与自然语言

### a) 能指的分类

根据上述第一个定义，能指在感知层面被把握，它们不属于

人类世界，因此它们被自动移向在感性层面上显现的自然世界。按照能指所属的感觉种类，我们可以考虑对能指进行第一次分类。因此，能指，以及表意集，可分为：

视觉类　（面部表情、手势、文字、浪漫主义写生画、造型艺术、交通信号等）；
听觉类　（自然语言、音乐等）；
触觉类　（盲文、抚摸等）；
等等。

这样的分类颇为常用，一般被视为非语言分类。不过，我们现在就可以记住，我们将其确定为外在于人的能指性质不应该混同于所指性质，因为不同感觉类的组成成分转过来也能被感知为所指，并建立起作为意义的感性世界。

**b）　能指与所指的关联**

我们没有权利接受这样一种看法：与这种能指分类相对应的是所指的平行划分。在这一问题上，可考虑如下几种关联：

1.　同属一个感觉类的能指可用来构建独立的表意集，比如自然语言和音乐。但必须看到，语言病理学的研究表明，各种声音（作为一个声音表意集）、乐声和语音在它们获得所指之前就已经被区分。因此，一些感觉次类会包含一些总体意义："声音"、"音乐"、"语言"；

2. 不同感觉类的能指可覆盖同一个或至少是对等的所指，比如口语和书面语；

3. 几个能指可以在同一个总体表意过程中互相影响，比如言语和手势。

无论能指的地位是什么，任何所指分类都不可能以能指为依据。因此，意义通过能指表现，但它与所指的性质无关。人们常说，绘画包含某种绘画意义，音乐具有某种音乐意义，其实此话并没有什么意义。绘画或音乐的定义属于能指范畴，而不是属于所指范畴。它们之可能的含义其实是人为的。至多可以说，能指从整体上讲，包含了“绘画”或“音乐”这样的总体意义。

c) **“自然”意义与“人造”意义**

另一个区分是把自然表意集，即我们的“切分”语言同人造表意集分开。

但这一区分的标准并不显而易见。人们似乎应在能指组成成分的离散性(nature discrète)中寻找这一标准。在人造表意集情况下，离散成分是先验地确定的，而自然表意集只能经验地显示它们的离散单位。

但是，按照我们的观点，即从感知这一角度看，该标准并不合适：能指的成分在感知阶段之前是不是离散的，这个问题属于意义的传递条件，而我们不便冒昧加以分析。从我们特定的观

点看，问题——如果被提出来——应该在一个研究能指类型学的学科范围内，在感知层面上解决。我们将只采用属于所指，或属于所指与能指的关系的标准。

### d) 自然语言的优势

与其它表意集相比，自然语言看来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因为它们有可能被转移和翻译。转移有两种：

1. 一种自然语言，如果仅仅作为所指，它能借助两个或多个属于不同感觉类的能指被表现。比如法语，可以同时用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来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以把能指之一视为基本能指，而把另一个看做派生能指或转移能指；这一观点是雅各布森的观点，但叶姆斯列夫和罗素（Russell）均未予以赞同。

2. 一种自然语言，若被当做表意集，可以在一个不同感觉类的范围内转移和现实化，因此，梦的语言不过是自然语言在一个特殊视觉类（它还可以分成彩色或黑白两个次类）中的转移（这在弗洛伊德著作中可找到令人信服的例子）。电影语言也不例外。

尽管如此，合乎情理的做法看来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这类转移可以拥有——或逐步获得——一种相对的或完全的独立地位。20 年代电影艺术为创建自己的语言所做的努力最具代表

性，如果人们想一想有声电影问世之后出现的倒退。

翻译与这种转移的区别仅仅是方向的不同：所有与自然语言性质不同的表意集都能被多少翻译成任何一种自然语言，只是确切程度不等而已。画作和绘画批评对其所做的译解就是如此。

在基本表意集及其翻译之间的差距不但涉及语义学，而且与任何意义学科有关。两者的差距可解释为异化和增值之源。

人们看到，诸自然语言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这是因为它们既是转移之起点，又是翻译之终点。

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作为一种自然语言的表意集是多么复杂。

## 4° 语言的等级层次

### a) 语言集的封闭性

语义学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汇集必要而又足够的概念手段，以描写任何一种被视为表意集的自然语言，比如法语。

这一描写所遇到的主要困难，人们已经看到，来自于诸自然语言的特殊性。一般说来，对画作的描写可以理解为把绘画语言翻译成法语。但是，从同一个角度看，对法语的描写只能是把

法语翻译成法语。如此，研究的对象就混同于该研究的工具，就像被告同时是预审法官一样。

对此，词典编纂学提供了一个或许不尽合适，但极具代表性的例子：任何一部单语词典都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而在其内部，名称寻找定义，永无休止。

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任何针对自然语言固有意义的研究不超出该语言的框架，结果只能是用一种自然语言来表达习语、程式或定义。

承认语义世界的限界意味着放弃把意义定义为符号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语言观，尤其是拒绝接受参照对象（référent）这个附加维度。参照对象是作为一种折衷由“现实主义”语义学家（于尔曼，Ullmann）引入索绪尔符号理论的，其本身也不可靠，因为它只是对索绪尔结构主义的一种可能的解释。因为参照现实事物以解释符号，此举无异于尝试把自然语言所含的意义转换成非语言表意集，这种转换难以实施，而我们已经看到它具有梦的特征。

说明：交际的非语言环境还产生一个附带的疑难。我们认为该疑难所涉及的只是交际过程中多个表意集的互相干扰。交际有时可以是异质的，但这决不是预先评判有关表意集的独立地位。

### b) 意义的逻辑层次

借助现代逻辑学，我们可以建立一种语言等级理论，从而部

分地克服由于无法越出封闭的语言域而遇到的困难。

如此引入的等级概念应理解为逻辑预设关系，而且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只能用我们所掌握的手段来定义。预设关系是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两个内容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内容可以是两个表意集（“画评”集预设了“画作”集），或是任何两个表意切分段。比如，对于下面三个不同等级的表意切分段，人们可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预设关系：

我知道（Je me rends compte）

我说了（que je dis）

天气很冷（qu'il fait froid）

**说明**：举这个例子仅仅是为了说明层次的存在这一事实，而不是引入现实层次或意识层次这类非语言问题。

在表意集内有意义层次存在，承认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区分两个不同的层次，借以给语义研究定位。层次之一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按照现有的术语，我们可以继续称其为*目的语*（langue-objet）；另一个层次是语义研究的语言工具，就第一个层次而言，应被视为*元语言*层次。

**说明**：我们仍按习惯使用语言（langage）一词。但该词意义含混，它或同表意集一致，或同表意子集相符。我们将尽量只用它表示“自然”表意集或表意子集，而不管它们处在什么层次。

### c) 作为语言的语义学

有了层次这个新概念，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阐述翻译这一概念了。一位评论家谈论绘画或音乐，鉴于他的谈论本身，可以说他预设了“绘画”、“音乐”表意集的存在。就其看到或听到的东西而言，他的言谈就是一种元语言（métalanque）。故此，不管能指的性质或有关表意集的等级是什么，对其意义的研究，就被研究的表意集而言，总是处在一个元语言层次上。这一层次差别在研究自然语言时更为明显，比如可以把法语用做元语言来研究德语或英语，反之亦然。

由此可以提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一转述性或描述性元语言不仅可用于研究任何表意集，而且它本身可以使用一种自然语言。

甚至可以进一步思考，对意义的元语言解释是否离不开具体的自然语言，对意义的描写难道不能依赖某种多少有点脱离自然语言的元语言。

在这个问题上，按照叶姆斯列夫的看法，必须对科学元语言和非科学元语言做出区分。非科学元语言，如同它所阐述的目的语，是“自然的”：比如绘画评论语言，作为几代艺术批评家的集体成果，是一个业已存在的、融入法语表意集的子集。科学元语言是构成的语言，也就是说组成该元语言的全部术语构成了一种严密的定义汇编。

但是定义汇编的存在仅意味着一件事,即元语言本身被事先确定为目的语,并在一个较高层次上被研究。为了使语义学元语言亦即惟一与我们相关的元语言被视为“科学”元语言,那就必须事先对构成该元语言的术语进行定义和核对。故此,一种科学元语言的定义设定了一个条件,即它预设一种元元语言(méta－métalangue),或者说第三语言之存在;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如果该第三语言不是用来分析既定元语言的话,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现在我们知道了一门科学语义学的条件:它只能被设想为两种元语言通过相互预设达成的结合。这两种元语言,一种是描写的或转译的语言,它能表现目的语所包含的各种意义;另一种是方法论语言,其作用是定义各描写概念,并检验它们的内在一致性。

d) **认识论层次**

一种方法论语言的存在,虽然使我们能在特定自然语言内进行语义研究,但看来还不足以将语义学置于各自然语言之上。这一使语义学成为科学元语言的第三层次本身必须通过演绎而不是依靠归纳来构成。

我们赞同这个叶姆斯列夫公设,而且可以将公设应用于语法描写,对它们做出阐述。因此,一个形态学概念,比如法语里的“未完成过去时”,可以通过分析它的分布情况归纳出它的定

义。“未完成过去时”概念本身将在描写语言层次上被赋名；一旦被转入方法论语言层次，它的有效性就能在法语的时态、体和语式范畴内得到检验。然而，出于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它不能用来分析其它自然语言，比如德语里的未完成过去时。只有在全体语法概念构成一个演绎公理系统的情况下，这些概念才能用做比较形态学或普通形态学的依据。

人们看到，对演绎和归纳的方法论价值所做的检验已经位于一个较高的等级层面，即第四语言层面。因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两种真理观：一种真理观把内在一致性视为真理，另一种则把与实在事物相符看做真理。

因为，如果描写是用一种描写语言翻译一种目的语，那么该翻译必须是充分的。它必须符合现实，对我们来说该现实就是目的语。从这一观点看，归纳方法是有效的。

但同样可以说，一种归纳描写决不会超出某特定表意集的范围，决不会达及一般方法论层面。逻辑学——其公设处于第四层次的语言——则完全依靠演绎，这一事实决非偶然。

这样，在语义学领域，人们又遇到了这些被称做“自然法则”的语言模型和实在事物之间的相符性问题。在理论上，有时在实践中，模型和实际表达之间始终存在着差距。科学要得以构成，就必须考虑到方法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但又必须以演绎为主，并辅之以归纳。

人们看到，只同意讨论两个先决条件即演绎和归纳之存在和有效性，这一事实已经把我们置于第四层面，同时提出了一门普通语义学的产生条件，这门普通语义学应能描写任何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的表意集，并独立于因方便起见而用于描写的自然语言。在这些条件中，首先是第四层面，亦即认识论语言层面的存在，其次是对处于该层面的语义学描写的有效性之条件进行的分析。

科学语义学，以及语义描写——其实就是概念等级系统即语义学的实际应用——，只有当它们为分析一种目的语而同时考虑到三种语言时才有可能。这三种语言处于不同的逻辑要求层次：描写语言、方法论语言和认识论语言。

e）　**符号标记**

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符号使用。的确，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从其应用结果看，却相当重要。

数学、符号逻辑学以及较后的语言学提供的例子表明：如果有了一套单义的概念，人们不是用“自然”语言而是借助于符号和数字来标示这些概念，那么推理就会更加精确，操作也将更为方便。

然而，为了能把这种标记法引入某个领域，需要用这种“符号”语言翻译的概念的数量就有所限制。到后面我们才会知道这类概念清单是否可能压缩，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语义学要实

现的目标之一。

所以,符号表示法本身不是一个发现程序(procédure de découverte)。但符号标示法若能在某个领域中使用,这能间接地证明,经选定的研究道路已经扫清[赖兴巴赫(Reichenbach):《科学哲学的到来》,第187-195页]。

# 意义的基本结构

## 1° 连续性与断续性

传统语言学遵循它所处时代的总趋势，往往强调语言现象的连续性。因此，拉丁词 mar 中的 a 演变成法语词 mer 中的[ε]这一过程被认为是无意识的，无法把握的和不间断的。同样，如果步行或骑自行车穿越高卢－罗曼语区域，虽然从一种土语转到另一种土语，从一种方言过渡到另一种方言，但人们的“语感”始终稳定不变。历史学家的任务便是追溯到尽可能久远的过去，将各种差异归并为同一。

索绪尔关于语言由对立组成这一断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我们必须承认该断言的革命性。

但这一断言并非不言而喻，且人们会问，如果停留在“现实”层面，亦即停留在语音实体和个人的、具体的发音层面，是否就能——举例来说——不把一个音位设想为一个类似于炮兵射击场的离散场(champ de dispersion)；或者是否能察知语言事实的断续性，是否能认为语言不是人们常说的“一切都互相依

存”或“一切都在一切之中”，而是其它什么东西。

就目前而言，探讨意义问题的惟一方法是肯定在感知层面上存在着断续性，肯定存在着产生意义的差别（列维－斯特劳斯的做法），而不考虑被感知的差别的性质。

说明：断续性概念无法定义，它不是语义学所特有的；比如它还决定数学的基础。故它是一个预设，应纳入认识论未经分析的公设之清单。

## 2° 结构的第一个定义

我们感知差别，借助这种感知，世界在我们面前和为我们“形成”。

但是，在语言学层面上，“感知差别”这一表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感知差别，这意味着至少感知两个同时显示的目的项；

2. 感知差别，这意味着感知两个目的项之间的关系，并以这种和那种方式将它们联系起来。

由此得出关于结构概念的第一个、也是普遍使用的定义：两个项及两个项之间的关系显示。

从中直接得出两个结果：

1. 单一的目的项没有意义；

2. 意义预设关系的存在，亦即项间关系的出现是意义的必要条件。

任何对结构概念的深入研究，都必须分析其定义的成分。故必须相继研究关系概念和目的项概念。至于“显示”(présence)这一表述，在这一层次上是无法分析的，因为它把目的项的存在方式牵连进了感知；它还可能导致人们探究感知的性质本身。根据认识论极小值原则对它的分析已不再属于语言学。同时性概念也是如此：即使摆脱了时间性，它还留下一种不可分析的、近似于认识论连续性和同一性概念的残余。

## 3° 并合与分离

关于关系这个概念，必须在一开始就指出两点：

1. 两个目的项若要被一起感知，那它们必须具有共同点(此为相似性及其延伸，亦即同一性问题)；

2. 两个目的项若要被区分，那它们必须相异，而不管相异的方式是什么(此为差异和非同一性问题)。

我们看到，连续性和断续性问题重新出现了，虽然重新出现的方式不尽相同。因为关系现在显示出它的两重性，即既是并合(conjonction)，又是分离(disjontion)。

## 4° 基本结构

关系的这种两重性会在所有的语言层次上表现出来。

例：α) route nationale vs route départementale

(国道) (省道)

pas vs bas

(不) (低)

β) (b) voisé vs (p) non voisé

(浊化) (非浊化)

grand vs petit

(大) (小)

前两组例子不会引起异议：每一关系项均有两个成分，其中第一个成分(route，a)使结构并合，而第二个成分(nationale/départementale；p/b)则使结构分离。

后两组例子看来比较棘手，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比较简单。两项之间的关系虽不容怀疑，但关系的两个方面——并合和分离——并非一目了然。

我们用基本结构这个名称表示这种关系。因为单独的目的项并不含意义，所以必须在结构层次而非成分层次上探寻基本的意义单位。成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符号、组成单位或符素（monème），在意义研究方面处于次要地位。语言不是一个符号系统，而是诸意义结构的组合——其布局有待阐明。

## 5° 语义轴

因此，基本结构的研究层面不是

pas vs bas

而是

p vs b

可以认为，该对立是两个音位特征即浊化与非浊化的对立，即：

voisé vs non voisé。

然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对 p 和 b 进行比较，而后予以区分，是因为这两个音位是可比的，换言之，是因为两者的对立位于同一个轴上，亦即位于浊化（voisement）轴上。浊化一词可能不合适，因为它仅强调两对立项之一的“浊音”这一属性，而置另一项于不顾。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元语言的描写性术语，必要时可代之以字母或数字标记。重要的是，要有同一个观察点，一个维度，而在此维度中，对立表

现为一个轴的两极。

语义层面也是如此。在这一层面上，对立

blanc （白） vs noir （黑）
grand （大） vs petit （小）

能使我们设定一个为两个关系项所共有的观察点：前一组对立的共同观察点是缺乏彩色，后一组的共同观察点则是连续度量。

我们建议用语义轴称呼这两个关系项的共同点，意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上展示其接合的。由此可见，语义轴的功能是收纳、总合其固有的意义接合成分。

## 6° 关系

只要每次都能找到或构想出合适的语义轴名称，人们便能构想一种关系型结构描写，即一方面标示出两个关系项，另一方面显示出关系的语义内容。这样，用 A 和 B 表示目的项，用 S 表示语义内容，我们就能把结构表达为：

A / 与 B / 有(S)关系

A 与 B 之间的关系可分解为：

1. 一个“与……有关系”序列，此序列“抽象”肯定两项

之间有关系(r)存在；

2. 关系的语义内容(S)，此前我们已把它称做关系轴。

公式可简写为：

A / r (S) / B。

现在让我们详细说明公式中每个符号的语言身分。

目的项A与B显然属于目的语，属于话语展开过程本身，在感知行为中被把握。语义轴S是对A，B两项的异同点进行综合描写的结果，故S属于描写性语义元语言。至于关系(r)，则在该解释一开始就被预设；故(r)属于方法论语言，只能在认识论层次上予以分析。

## 7° 义素接合

从同意将关系的内容——我们用字母S表示——视为元语言起，我们就没有了方法论上的顾虑，即可考虑从可操作角度来表达语义轴，即按照关系所牵涉的不同目的项，将语义轴表达为相应数目的意义成分，并把这些成分看做这些关系项的属性。

就拿已经举过的例子来说，浊化轴(S)可解释为浊化成分($s_1$)和非浊化成分($s_2$)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目的项A(音位b)就具有属性$s_1$(浊化)，而目的项B(音位p)的属性则

是成分 $s_2$（非浊化）：

b（浊化） r p（非浊化），

但这只是一个具体例子，一般公式为：

A （$s_1$） r B （$s_2$）。

此一般公式可用子分析任何一种关系。例如，

fille r（sexe） garçon

这两个目的项之间的关系转译为：

女孩（女） r 男孩（男）

这样得出的意义成分（$s_1$、$s_2$）被雅各布森叫做区别性特征，而且在他看来，意义成分这个名称其实是索绪尔的"区别成分"（élément différentiel）译成英语后又译回法语的。为了简化术语，我们建议把意义成分叫做义素（sème）。

由此可见，一个基本结构可以在语义轴或义素接合（articulation）形式下被感知和描写。

现在就需要指出，从实用效率讲，义素描写远高于语义轴清单（inventaire），而且，从叶姆斯列夫提出的简便性原则看，也更

为可取。如此,借用雅各布森本人所举的例子:对阿拉伯语 26 个音位的描写,按照康蒂诺(Contineau)的计算,一共给出 325 种对立(这是指一些虽以轴的形式出现但未经描写的对立关系)。然而,对有 31 个音位的巴勒斯坦北部的阿拉伯方言所做的描写显示,该方言总共只有 9 个二分对立。(雅各布森:《Mufaxxama》。《阿拉伯语中的强调音位》,收入《献给乔舒亚德·沃特莫恩的论文集》,海牙,第 105 - 115 页)。

## 8° 义素接合方式

义素接合的存在方式(或描写方式)是当今语言学领域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

对于二分法(逻辑的或操作的二分法)的赞同者,如雅各布森及其弟子,一个语义轴可接合为两个义素,而且不无歧义地表达为:

有标记 vs 无标记。

但是,在这一层次上,已经出现了接合上的差别。比如下列情况:

浊化 vs 非浊化,

我们遇到了一个有标记(marqué)义素(即存在于两极之一的义素)。该义素与无标记(non marqué)义素(不存在于另一极的义

素)发生关系：

s vs －s；

但这一图式不再适用于二分对立

男孩(男性) vs 女孩(女性)，

因为仅注意到目的项女孩中没有义素“男性”是不够的：女孩这一目的项本身就具有义素“女性”。此时的接合应表达为：

s vs 非 s

雅各布森主要考虑的正是这两种类型的义素接合。

然而，在对立

大 vs 小

这一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发现还存在着第三个目的项，亦即“中”。

在布隆达尔(Brφndal)建立的基本结构公理中，该现象可做如下解释：两个极义素

s vs 非 s，

被布隆达尔表示为

正 vs 负，

它们能接纳第三个义素，这第三个被定义为既不是 s，也不是非 s，而被称做中性义素。故此，接合的方式为：

正 vs 中性 vs 负
（大） （中） （小）。

在其它情况下，插入的义素显示出既是 s，也是非 s，故被命名为复合义素。因此下列接合式

on vs il vs cela
（人们...） （他、它...） （那个...）

可解释为：

正 vs 复合 vs 负
（人称） （人称与非人称） （非人称）

然后，布隆达尔考虑另两种可能的义素接合，特别是正复合和负复合，其特征是其中之一在义素复合项中占支配地位。

这两种理论态度，即雅各布森和布隆达尔的理论态度，初看

起来是不可调和的。然而，它们的矛盾仅仅是表面的，因为事实上，在布隆达尔的公理系统中，只有接合才是复合的；该公理系统所牵涉的义素数目是恒定的。布隆达尔结构同雅各布森结构一样，都是二分制的。

为了消除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的混淆，在此我们必须提前对可能存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意义感知和概念化方式进行区分：一种是作为内在（immanence）的意义，另一种是作为显现（manifestation）的意义。基本结构由于被当做自在之物加以研究和描写，也就是说在脱离任何表意语境的情况下被研究和描写，故它只能是二分的，这主要不是出于未经阐明的、而必须从语言认识论层次上予以解释的理论原因，而是出于当今语言学家的共识。基本结构接合为两个义素：

s vs 非 s，

故我们建议确定其定义，把它叫做义素范畴（catégorie sémique）。至此，该名称同语义轴（axe sémantique）相重复，但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名称显得更为确切。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在这一层次上显然没有理由引入和假设布隆达尔的中性项或雅各布森的 -s 项的存在，因为一个义素的非存在（non-existence）不是一个义素，而只能在显现意义层次上被记录；在显现意义这一层次，两个同一而又有区分的义素环境之存在可做这样的理解：在第一个义素环境中，有义素 s 显示，而在第二个义素环境中，同一个义素 s 则不显示，该"不

显示"习惯上可用 - s 表示。因此，此处所存在的义素不是从关系结构出发构成的意义单位，而是从义素项的显现出发构成的意义单位，义素项不应与义素混淆。这一区分在下列对应表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 义素项 | | 义素项的义素内容 |
|---|---|---|
| 正 | s | （义素显示） |
| 负 | 非 s | （义素非 s 显示） |
| 中性 | - s | （s 和非 s 不显示） |
| 复合 | s + 非 s | （义素范畴 S 显示） |

说明：在复合义素项显现情况下，显示的两个义素，依布隆达尔之见，或保持均衡，或其中一个占支配地位。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谈到。

还可以尝试在描写程序而不是在认识论层面上对义素范畴和义素接合做出明确的区分。对义素接合的描写类似于力图将义素项纳入可比义素环境的分布分析。但是，如同分布分析，这种对义素项的探寻预设了人们所要寻找的东西，因为，若要确认义素（ - s）的非存在，那就必须先行设定义素（s）的存在；同样，若要确认一个项为复合项，就必须先知道已经被分析为分离义素的义素范畴，否则，复合项同任何一个简单义素就毫无区别了。这等于是说，义素范畴先于义素接合；而且，只要描写始于对义素接合的分析，该描写只能是证实或否定被预设的义素范畴的存在。我们已经说过，语义描写就是构成一种元语言。

## 9° 形式与实体

关系有时被视为语义轴，有时被看做义素接合。而对这一关系的分析所产生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如何定义结构这一考虑。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就向叶姆斯列夫（《语言理论结论》，第 33 页）借用一下关于色谱的经典例子。该语义轴——因为所涉及的正是语义轴——极具普遍性：可以断言，它存在于所有的自然语言中，没有色差的文化实难想象。这个轴的两种——英语的和威尔士语的——义素接合比较见下表：

| | |
|---|---|
| | gwyrdd |
| green | |
| blue | glas |
| gray | |
| brown | llwyd |

这些不同的义素接合无疑构成了色谱的特征，同时也构成了许多语义轴的特征，但它们不过是对世界所做的不同归类，定义了一些文化和文明的特殊性。无怪乎叶姆斯列夫把这类语言接合方式称做*内容形式*（forme du contenu），而把包含这些语言接合的语义轴叫做*内容实体*（substance du contenu）了。

内容实体这一概念需要做一些说明。在谈到语义轴时，我们做过强调：实体显然只有借助一个必然处在表意域中的词化

过程才能被达及和感知。所以,内容实体不应被视为一种语言外的心理或物理实在,而应被看做在一个非形式层面上的语言显现。

形式和实体的对立就完全处在内容分析之中;它不是19世纪漫长的传统要我们接受的那种对立,即能指(形式)和所指(内容)的对立。形式同实体一样能表达意义,但奇怪的是叶姆斯列夫的这一见解至今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因此可以说,一种语言的义素接合是该语言的形式,而全部语义轴则体现了它的实体。从此,对在分析之初假定的任何表意集的描写,可以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即义素或形式层面和语义或实体层面上进行,并导致不同的结果。

毋庸赘言,形式和实体只是两个操作性概念,它们取决于所选择的分析层面,因为在某一层面被称为实体的东西,在另一个层面上将作为形式加以分析。

说明:义素范畴这一术语的引入在此得到了解释。它适用于一种特殊的语义轴,即作为最小意义单位的结构。但我们将继续使用语义轴这个术语,取其可操作含义:"接合为结构的内容实体单位"。

## 10° 义素与词位

在考察了能与结构概念同一的关系之后,现在当尽力确定

目的项在结构概念之组织中所能起的作用。我们已经假设目的项与关系同时存在于感知层面。

我们已经看到，关系能被分析成义素，而且我们还建议把义素看做目的项的属性。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知道下列表达式的含义是什么：

| A | （的属性是） | s |
|---|---|---|
| （女孩） | | （女性） |

罗素在分析专名时不无道理地指出，“按人之常识，事物具有性质，而不是由性质来定义的”（《意义与真理》，第 113 页）。按照这一观点，事物独立于它之属性；这是自在之物，而作为自在之物，它是不可认识的，因为任何分析都无法穷尽其本质。

对实体（非语言意义上的实体）进行描写之意图只能使认识变得不可能。因为，正如罗素所言（同上，第 112 页），“如果‘这个是红色的’是一个赋予一个实体以某种性质的命题，而且，如果一个实体并不是由它之谓词的总和来规定，那么‘这个’和‘那个’可能恰恰具有相同的谓词，却又不同一”。故此，同一性原理就会重新受到质疑。

所有这一切只会使我们更加远离意在描写“心理实体”的语言学。因此我们必须留在现象学亦即语言学层面，并像罗素那样设定事物由性质来规定，也就是说义素 s 是构成目的项 A 的成分之一，而该目的项在经过透彻分析之后，将被定义为 $s_1$、

$s_2$、$s_3$等义素的集合。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词位(lexème)这个名称还给目的项。词位属于目的语,在话语中得以具体化。因此,它是不同性质的语言单位,不应归入基本结构的定义。

## 11° 结构的第二个定义

要把目的项(词位)排除在结构的定义之外,就需要对结构做一次调整。考虑到此前所做的分析,可以说结构是意义的存在方式,其特征是两个义素之间的接合关系的显示。我们也已看到,诸义素范畴虽内在于目的语,但只能在目的语之外被表述。

这一规定一开始会令人感到意外;但它仍然符合我们的思维方式,至少符合我们的操作方式。例如,当我们说法语有三个语式,即命令式、直陈式和虚拟式时,我们只是看到法语的语式轴用 s 和非 s 两个义素表达,分节为:

$$\frac{\text{命令式}}{\text{s}} \quad \text{vs} \quad \frac{\text{直陈式}}{\text{s 和非 s 均不显示}} \quad \text{vs} \quad \frac{\text{虚拟式}}{\text{非 s}}$$

这样的义素范畴内在于法语,因为每个义素是在许多词位之中得以具体化。

**说明**:必须指出,对法语语式范畴的解释不属于本书范围。

## 12° 总体与部分

这样的结构观看来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此前我们已经强调，语义轴可说包括了通过对它的分析得出的诸义素成分。也就是说，就义素范畴这个总体(totalité)而言，诸义素可以被看做是它的各个部分(parties)。看来，我们必须把这种关系，即总体结构与它之构成单位的关系纳入结构之定义本身。

对于这种关系，当代语言学家们的态度可谓相当矛盾。以叶姆斯列夫为例，他把总体与部分的关系纳入他对结构下的定义(《语言理论结论》，第20-21页)，但人们并不因此就能在他的语言理论体系中找到为这种关系保留的位置。一个语法学家若像因波斯(P. Imbs)那样将总体概念引入他的分析，就有可能——不管是否有道理——被怀疑抱有有机论(organicisme)意图：的确，某些人文科学滥用总体一词，把它视为具有普遍价值的解释性概念，结果它的欺骗性变得十分明显。

为了避免此类误解，同时也为了精简概念性工具，我们建议尽可能限制该定义，仅仅从逻辑学预设的观点来思考义素和义素所属的义素范畴之间的关系。我们说，除了同一范畴诸义素之间的反义关系(分离和并合)，意义的基本结构还由各个单独义素和整个义素范畴之间的下义关系(hyponymique)来规定。

**说明**：该关系的实际使用可能需要引入方向概念：从义素出发，关系可称做下义关系；若从义素范畴出发，则有必要把关系称为上

义关系(hyperonymique)。

现在就需要指出,下义关系一词仅用于指称处在基本结构内部的关系。这一关系,从其本身看,也就是说作为把不属于同一义素范畴的义素成分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将称做下联(hypotaxique)关系[或上联(hyperotaxique)关系]。

我们认为,有了这种最低限度的概念化,便可避免使用换喻概念,后者很难简化为单义。

# 语 言 与 话 语

## 1° 意义与交际

诸意义结构，就像我们刚才所定义的那样，在交际中得以显现（也就是说，在感知过程中呈现给我们）。的确，交际汇集了意义结构显现的条件，因为正是在交际行为中，在交际事件中，所指与能指相遇。

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或者用丹麦语言学家的术语说，内容层面的结合，显示出话语（discours）的最小单位，即音位（phonème）和词位。bas 的显现是未显现的 pas 的存在基础，也使能指和所指的双重预设得以实现：b 若要被确认为能指和所指的离散单位，它与 p 在 bas/p 这一环境中的对立就必须被确认为能产生意义差别的对立；但是，bas 若要被认为具有意义，那就必须先有 b/p 的对立。

然而，此观察结果——不参照所指就不可能分析能指，反之亦然——不应该成为两者结合的最终理由。在此还必须提出和考虑另外的两个看法。

1. 首先应该看到，能指层面和所指层面之间不存在同构(isomorphie)；两个层面上的交际单位不是等维的。与一个词位对应的，不是一个音位，而是数个音位的组合。所以，对两个层面的分析虽使用同样的方法，但必须分开进行，而且该分析的目的应该是确定语言两个层面的最小单位，即能指的音素(phème)和所指的义素(sème)；

2. 在更大的单位内，构成性音位对立所显示的意义总的说来只是一个负的意义，一种意义可能性。让我们解释一下：在将要显现的意义和始终是暗含的意义之间所做的任何选择都在交际中进行。因此，即使 bas 与 pas 的对立算是给了 bas 一种意义，但仍不可以说，在交际时，说话人选定 bas(低)[le ciel est bas(天低)，le plafond est bas(天花板低).]，是迫于——不管以何种方式——词位 pas(不)的存在，或是与它相关。恰恰相反，bas 的显现之背后是 haut(高)，而不是 pas。这已能说明，对于从语言学的平行学科那里借来的概念，使用时必须慎之又慎。比如信息论，它虽同语言学平行，但它所处理的材料属于一种由自然语言出发经代码转换而成的能指，故它可以暂不考虑意义的基本问题。(不妨想一想，有人就尝试在词语长度和信息量之间建立起某种意义关联。)

所指和能指的汇合，一俟在交际中得以实现，就准备再次解体，如果人们希望对语言能指或所指层面的分析有所进展的话。需要记住的是，我们可以，也必须借助所指来研究能指，借助能指来研究所指。再说这也是我们分配给目的项的角色。

## 2° 义素系统

因此可以说定，词位 bas(低)的意义并不来自于它与 pas 在交际中实现的那种对立，而且，bas 与 pas 的对立是一个区分结构，而不是意义结构。

这样我们还需要考虑：

1. 前面研究的各种意义基本结构如何接合成更大的集合体；

2. 在义素显现中，义素表现为词位和词位组合，从而构成人们通常所说的话语。那么，就义素显现层面而言，意义基本结构的地位是什么。

我们首先看到，bas(低)并不与 pas 对立，而是与 haut(高)对立：bas 和 haut 的区分性差别确实存在于能指层面，但这一差别不能归结为 bas/pas 这样的音位对立。

而且情况总是如此：在表达层面上记录的区分性差别，不管多么确定和全面，永远只是一个排它系统，也永远不可能就意义提供任何指示。换言之，意义差别不是由能指差别推断而出，语义描写属于一种元语言活动，后者处于另一个层面，并遵循意义的结构接合法则，而这些法则构成了一种内在语言逻辑。与任何其它可能存在的逻辑相比，该逻辑的优越性在于有可能得到

验证，也就是说，由描写者构建的实有意义系统能与由记录下的能指差别组成的排它系统形成关联。

说了这一点之后，为了具体说明我们的思考而引入的所有例子，显然由于缺少验证程序而失之随意。所以，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异议都在我们预料之中，也往往是正当的。然而，在思考了语义描写的各种可能性之后，我们面临着一种选择：或者专注于意义的描写程序，即使忽略验证程序，或者致力于把音位对立的记录、分布分析等方法移用到语义领域，不惜把主要的东西丢弃一旁，也就是说，忽视最低限度的概念化和公理体系的一般认识论条件，即语义描写本身的基础和理由。

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所选择的例子是用来具体说明我们的思考，而不是要证明任何东西的：它们不但不适用于推论，而且就在它们之有限的适用范围内，也不一定"真"。

下面从 bas(低)与 haut(高)的意义对立出发所做的演示就属于这种情况。为了简化这一演示，我们一开始就不考虑本来意义上的指示性(déictique)接合，如下列名词化对立中显现的接合：

le haut vs le bas.

从其形容词外表看，haut 与 bas 的对立看来可用"相对量"范畴来解释。该范畴分节成"大量"与"少量"两个义素，从而构成说话人根据某种理想标准对不同义素内容进行判断的二分制环境。这样，同一义素范畴和同一些义素项就在各对词位中得

到显现，比如：

长 (long) vs 短 (court)
宽 (large) vs 窄 (étroit)，等等。

在此我们无意进行“相对量”范畴的义素分析，所以我们可以把该义素对立悬置起来，仅使用包含“大量”这一义素的词位来表示两个对立的词位。

义素对立被悬置(suspension)后，我们就能较为容易地探讨下面这个极具普遍性的对立轴的意义：

高 vs 长 vs 宽 vs 广 vs 厚。

我们把此轴称做“空间性”轴，第一次二分使我们看到它的两个方面，即在法语里显现为空间(espace)与广延(étendue)的词化对立，可表达为：

$$\frac{\text{维度}}{(\text{高}\ /\text{长}\ /\text{宽})}\ \text{vs}\ \frac{\text{非维度}}{(\text{广}\ /\ \text{厚})}\ 。$$

为了再次简化例子，对“非维度”的分析就此打住。义素“维度”也可被看做一个义素轴，再度分节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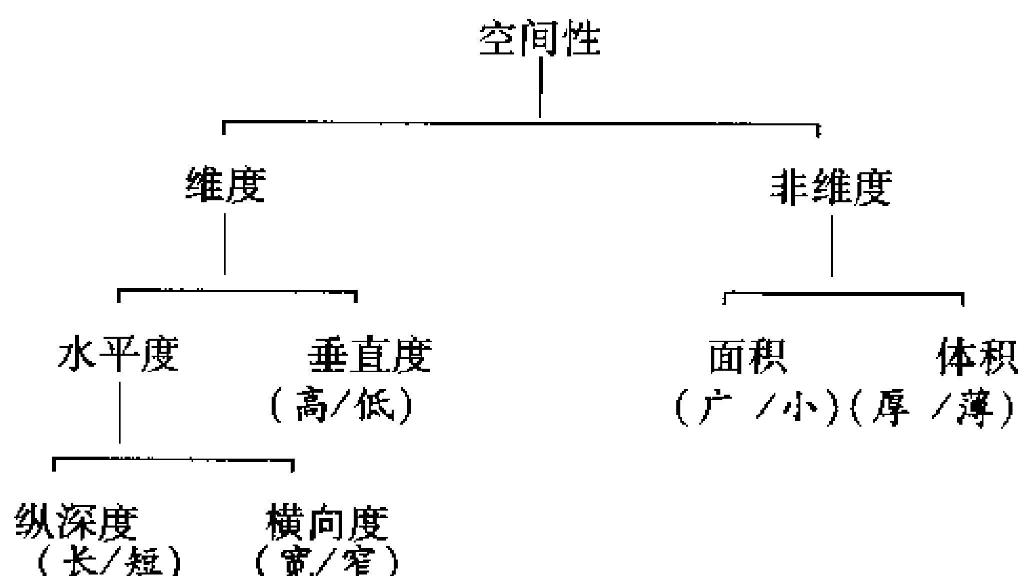
$$\frac{\text{垂直度}}{(\text{高})}\ \text{vs}\ \frac{\text{水平度}}{(\text{长}\ /\ \text{宽})}\ 。$$

义素"水平度"也被看做一个轴，分节为新的义素，可表达为：

$$\frac{\text{纵深}}{(\text{长})} \text{ vs } \frac{\text{横向}}{(\text{宽})} 。$$

说明：在此我们不可能离开主题（其它场合同样省去许多可能的、甚至必要的题外话），花大量笔墨论证——我们认为能够证明——，至少在法语里，长度作为维度处在以说话人为出发点的"纵深"方向上。

所有这些接合项可汇总于下图：




该示意图（非常不完整，因为对"非维度"的分析甚至尚未开始）所表示的内容可称空间性的义素系统。

那么，这一系统是如何得到的呢？

1. 如果探究一下用于制作该图的思维方法，应该发现该思维方法有个预设，即人们多少意识到空间概念在法语这个表意集中的"存在方式"。直觉假设之先验存在是任何科学探索的特征，所以从原则上讲，指责该预设把主观成分引入描写是站不住脚的。

2. 第二个方法论步骤是按照能指的区分性差别进行范畴接合。在此我们还不打算完全阐明诸验证程序，但必须强调一个明显的却容易忽略的事实，即词位对立：

高 vs 广 vs 厚

是在能指层面上显现的对立，能指差别的存在使人们得以首先假设义素对立的存在：

维度 vs 面积 vs 体积。

说明：克努兹·托格比(Knud Togeby)(载《词汇学手册》，第6期)就此处的空间词位在话语中的特殊表现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提示，并指出了验证程序的构建应遵循的精神。不言而喻，我们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3. 还必须强调，所获得的结果是一种语义描写，亦即元语言描写：任何义素或义素范畴，即使其名称借自法语，原则上均不与在话语中显现的词位同一。

说明：一开始我们就考虑到"相对量"这个义素范畴的存在，它干扰我们所描写的义素系统，但不属于这个系统。后面我们还要回到这个干扰问题上来。

## 3° 义素与词位

为了进一步阐明义素系统和它之成分的词位显现的关系，人们可以把相关内容整理成图，例如下表：

| 词位＼义素 | 空间性 | 维度 | 垂直度 | 水平度 | 纵深度 | 横向性 |
|---|---|---|---|---|---|---|
| 高 | + | + | + | − | − | − |
| 低 | + | + | + | − | − | − |
| 长 | + | + | − | + | + | − |
| 短 | + | + | − | + | + | − |
| 宽 | + | + | − | + | − | + |
| 窄 | + | + | − | + | − | + |
| 广 | + | − | | | | |
| 厚 | + | − | | | | |

由该表可引出下列评述：

1. 我们看到，表内各词位的特征表现为一定数目义素的显示和其它义素的不显示。该不显示应解释为义素对立之显现，义素对立从一个共有的义素基出发，把不含此义素的词位同具有此义素的其它词位分离开来。例如，词位高/低的特征是义

素“垂直度”的显示，与之对立的词位长/短、宽/窄之中该义素的不显示，而词位长/短、宽/窄的特征则是义素“水平度”。因此，义素的对立致使词位分离；

2. 另一方面，前六个词位的特征是都有维度这一义素的显示。因此，该义素的共同显示在词位之间建立起一种并合关系，转过来这又使以后的分离成为可能。

这些看法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话语运作中常见的义素悬置(suspension sémique)现象。因此，并合义素的存在：

少量 + 空间性 + 维度

能使

腿短(court sur pattes) ≠ 身材高(haut de taille)

中的“垂直度”与“水平度”的义素对立被悬置；

3. 如果不是通过纵向比较来分析图表，而是从水平方向上比较诸义素间存在的关系，我们就能发现任何一个词位都表现为一种义素集合——这一事实前面已经提到。

不过，如果从左向右看，人们会发现，词位这个义素集合体可解释为一系列上义关系，也就是说从总体到部分的关系；如果从右向左阅读义素，人们可以说义素之间的关系是下义关系，亦即从部分到总体的关系。

从这一发现中可得出两个结果：

a）一方面，词位不再表现为一种简单的义素集合，而是由等级关系联结成的义素集合；

b）另一方面在词位内部记录到的同一种义素间关系，在更大话语单位内诸词位之间也可能存在。故此，在一个像垂直维度这样的话语序列内，词位维度和词位垂直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上义关系。

## 4° 话语层面

上面的思考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搞清楚意义结构的存在方式（mode d'existence）。现在我们刚开始提出这些结构在交际行为中的显示方式（mode de présence）。

因为交际是一种行为，而且，基于该事实本身，交际更是选择。交际行为始于表意域，且在表意域中，它每次都要选择某些意义，同时排除其它一些意义。因此，交际是在行使某种自由，但这是一种有限的自由。

对话语的约束有两类。如果看一下可视其为完成的、自足的交际行为的话语，人们会发现话语的表达受制于一个先验的约束网络。正如叶姆斯列夫所言，它只能在时间、体、语式范畴的强制性框架内构思。人们只能在这类形态－语义范畴之内行

使自由，亦即最终赋予话语以明确语义的全部义素选择。

另一方面，说话人周围的人和“自然的”世界，作为产生信息——事件的总体环境，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交际自由受制于习惯，而在语言层面上，习惯表现为重复。在一定的和重复的情景下，会相应产生相同的或可比的信息。如果对拉康的思想加以阐述，人们可以说，人类受着两种疯狂的威胁：一种是精神分裂症，推崇交际的彻底自由，最终导致无交际；另一种是完全社会化的、重复的言语，即格诺（Queneau）说的“聊吧，聊吧，你就只知道聊”，而这也是对交际的否定，因为交际没有了信息。

这类思考虽说很平常，但有助于我们界定话语中的意义显现问题，而首先是词位的内部结构。

前面所举的例子实际上并没有全面反映词位的义素构成，因为高/低、长/短等词位是一些很特殊的例子；可以说它们太接近一些意义结构，太能反映义素系统的结构。然而，就是如此简单的例子，也已经使人感到为难，因为人们遇到了异质的成分，例如除“空间”接合之外，还要加上量化评价。两个义素系统，空间系统和计量系统互相干扰，且并存于同一些词位内。

这种情况远非例外；相反，它是词位的正常存在方式。

有两个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词位义素结构的某些方面。第一个例子借自 B. 波蒂埃（Pottier）（《语言学与机器翻译语义分析研究》）。波蒂埃试图确定语义描写问题，建议对词位进行义

素分析，这与我们的研究方向一致。依他之见，词位“扶手椅”(fauteil)可以下列方式描写：

扶手椅 = “有靠背” (/凳子)
“有扶手” (/椅子)
“供人坐” (/餐台)，等等。

我们不尽同意他的分析(尤其不同意把“有靠背”、“有扶手”、“供人坐”当做义素；亦即当做最小单位)，尽管如此，我们仍觉得他的例子颇为典型，哪怕只是因为它汇合了两个异质的义素系统：一个空间视觉系统和一个未经确定的意义场——应该是“功能”意义场。这两个系统的义素成分共同产生了一个词位，即“扶手椅”。

第二个例子取自法语形态学。冠词 la 这个形态词位一般被视为多个形态范畴的混合，因此可以分解为下列形态义素：

单数 + 阴性 + 定指 。

这些义素本身是一些属于义素范畴的项，而相关义素范畴的传统称呼是：

数 + 性 + 限定性 。

对形态词位 les 的分析迫使语法学家注意到，该复数定冠词仅包含义素“数”和“限定性”，而义素“性”则没有显示。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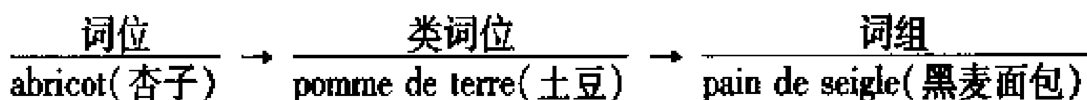
果对这一表述稍做变动，也可以说，在这一确切的和限定的情况下，“性”的显示预设了“数”和“限定性”的显示，反之则不然。由此可以推断，在一个词位内部，在属于异质义素系统的义素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

借助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对前面的思考做一些补充，并尝试重新对词位进行更确切的定义：词位是义素的显现和会合地，这些义素往往来自不同的义素范畴和义素系统，但彼此保持一些等级关系，亦即下联关系。

但是，词位也是历史的会合地。因为，词位虽有其固定性，但它仍属于事件范畴，故必须顺应历史。这意味着，在历史进程中，词位会增添新的义素，而且同是这个历史，极而言之，亦即一个交际过程与另一个交际过程之间的差距（因为语言发展的历时性既包括5秒钟，也包括5个世纪），能使词位失去某些义素。因此，诗歌话语，比如把“顶楼的舒适”与“地窖的焦虑”对比，按照巴歇拉尔（Bachelard）的看法，可以看做是一种义素贫化，这种贫化虽说是暂时的，却相当可观，结果丰富了某些冗余性义素范畴。

因此，在我们看来，词位是一个相对稳定、但并非一成不变的交际单位。稳定性虽说是相对的，但它能使我们在考察一个词位内各义素之间关系时，把这类关系与更大交际单位内的义素间关系看做属于同一性质，并假设两者都能以同样的方式加以描写。

于是，人们所能记录到的大小不同的交际单位可排列成：




这些单位由于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历史条件的不同，故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混合，但它们，尤其是它们内部诸义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从我们惟一感兴趣的语义角度看都属于同一性质，可按照同样的程序加以处理。

但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一个词位内部诸义素之间的各种关系，除了通过独一的词位形式之存在来显现外，别无其它途径。这时人们把这些关系的显现叫做混合(syncrétique)显现。相反，在类词位(paralexème)或词组情况下，就拿上述最后一个例子(pain de seigle)来讲，人们看到，关系是通过介词 de 来显现的。在这类场合，关系在显现时已被词化了。

## 5° 关系的显现

关系显现形式的多样性提出了两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我们先是认为关系是意义结构所固有的，然后我们又发现在词位内部，关系是诸异质义素的连接成分，而现在看来，在话语展开过程中，话语能以独立的方式显现。

第一个问题是显现形式的多样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系

独立于意义基本结构问题。

1. 话语被认为是语言的显现,我们已经看到,它是提供关于语言内在意义情况的惟一来源。而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一开始我们就说话语等同于目的语。尽管如此,我们所建立的,或者在我们之前的语言实践中"找到"的所有元语言概念-术语还是自动地返回话语。对于其它被认为是"非语言"的构成语言,不管其外表如何,情况也是如此。当逻辑学家想建立逻辑语言概念时,他们照样求助于话语以造出大致上完整的"词语"清单,并用它来建立——比如说——连词类,而这个连词类将不再属于目的语。

在这一方面,语言学家远比逻辑学家谨慎,因为经验告诉他们,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更确切说,是能指的区分性差别和这些差别在所指中造成的差异之间的相关性)极其灵活,形式也多种多样。形态词位 et(和)确实表达连接关系,但是,在 Jean, Pierre et Paul(让、皮埃尔和保尔)中,词位的连贯性也完全能够表达这种关系。这样,任何一个关系义素都可能源自于能指差别:从独立的构形成分(formant)到不同形式的混合(syncrétisme),其中包括连贯、位置、融合,等等。我们看到,比如对语法意义上的连词所做的描写,如果仅以连词清单为依据,那就有可能很不完整。

在确定关系之意义时,同样需要谨慎从事。因为有一些形态词位类别,如从属连词,包含了一些义素投入(investissement)相对丰富的词位,但人们也发现一些"贫脊"的关系成分,比如

介词 de 或 à，它们局限于在两个词位之间确定一种简单的等级关系。人们不难承认，义素集亦即词位内部的关系也是如此：某些关系只是简单的等级划分（冠词中的“数”和“性”，而其它关系可能是复杂的（如“扶手椅”中的义素“供人坐”）。

2.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即关系独立于被认为是由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诸结构项问题。在我们对意义的基本结构进行思考时，我们看到，若要同时感知至少两个项，那就离不开关系概念。我们已经知道，该同时性或显现为并合和分离的互逆预设，或显现为一种单向预设：如果预设指向总体，那就是下义关系；如果总体产生一种分离可能性，那就是上义关系。我们还看到，任何同质的内容或分都可能遭受这种畸变。但我们同样发现，关系本身在等级上高于它所接合的内容。因此，人们不难理解，话语中意义会同时显现于两个层面：确定内容和编织异质义素项之间的关系网，而这与这类关系的显现方式无关。

上述评注说明，根据人们所选择的视点，话语层面可能呈现为同质的，也可能表现为异质的。

a）说话语层面是同质的，是因为义素之间或义素集之间的关系独立于相关的交际单位——词位、词组或语句，其结构变化不多，或者说可以规则化。

说话语层面是同质的，还因为互相联系的义素，无论是在单一词位内，还是在一个扩展词组内，都可能或事实上属于一些往往相去甚远的义素系统。换言之，义素的异质性以同质的方式

分布在话语之中。

但我们已经看到，从这一角度出发，在人们想对话语进行分析的情况下，把话语切分为“词语”(mots)，与把话语切分为词组或语句相比，并不更加合乎情理，甚至更不合乎情理。

b)关系，至少是我们在话语中能够感知的、并以词的形式出现的关系，可能多少有点复杂。对这类关系的分析虽然刚刚开始(B.波蒂埃语)，但对语义学来说，确有某种重要性。不过，关键是不要把它们看做是一些纯粹的*关系成分*(élément de relation)。如果它们各别地表现出含有一个关系成分，也就是说元语言成分，那它们往往像任何词位一样，还具有一个描写性的、可以分析为义素的内容。泰尼埃(Tesnière)看得很清楚，他把纯转移成分[比如 parce que，alors que，avant que(因为、而、在……之前)等连词短语中的 que]与从属连词可能包含的副词性次要内容区别开来。

这样的分析可能有助于区分两种关系：一种是并合和分离[我们很想称之为*句法关系*(syntaxique)，要不是这个术语已被使用的话]，另一种是等级关系，而我们已经建议根据首先被考虑的项，把这类关系称做*下联关系*，或*上联关系*(以区别于下义和上义这类组成基本结构的范畴关系)。

如果同意这样划分话语中显现的关系，即把这种关系划分成与基本结构中公认的基本关系对应的两类，那就应该看到，话语层面的特征大体上表现为一种固有的异质性：一方面，会合于

话语中的义素、词位和语句彼此保持并合或分离关系；另一方面，同是这些成分，还通过下联关系相联系。结果，前一种关系在话语中显现出一些位于纵替换(paradigmatique)维上的单位，而后一种关系则在同一话语中形成横组合(syntagmatique)维；换言之，话语层面根据所使用的关系类别，或显现出纵替换存在方式，或显现出横组合存在方式。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极为重要，必须予以强调，即使只是因为语言学家，还有使用语言学方法的非语言学家常常混淆了话语层面和横组合层面，甚至有时还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

# 显 现 意 义

## 1° 义位

### a) 交际单位与意义单位

承认说话人(homo loquens)条件之有限性,也就是承认任何内容描写必然导致一种语言的构成,而这种语言能够阐明诸意义结构的存在方式和显现方式。此构成转过来又必须以话语为依靠;话语既是能指和所指的会合地,又是意义发生畸变的所在。意义的畸变源自于自由和约束这种矛盾的交际要求,以及惰性和历史这两种分离力量的对立。从这一角度看,话语呈现为一个混杂体,而从话语分析中得到的诸交际单位看来不宜用做意义描写的框架:仅以词位、类词位和词组为例,它们无疑是一些大小和结构各异的交际单位;虽说如此,从意义角度看,它们往往是可比的,有时候还是等同的。

这等于是说,除了借助形态－句法范畴来定义的交际单位,我们还有权构建一些与它们不同的语义单位。的确,我们已经建立了少量概念,可用于解释非从意义显现角度来考虑的意义存在方式。我们也考察了语义单位在话语内,确切说是在词位这类传统上被认为载有意义的交际单位内的显示方式。然而,

话语的混杂性却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有关问题，尽力对意义的话语交际和真正意义上的意义显现做出区分。

在此我们将尝试一种逆向研究方法，即不再像前面那样，从义素出发去定义词位，而是把词位当做起始层面，看看旨在揭示其义素组织的词位分析是否能使我们汇集到更确切的义素接合情况。被选为试验场的例子是词位 tête（头），更确切说是《理特雷词典》（Littré）中包含词位 tête 的全部句子或词组。为了得到若干组实例以说明单一词位场（champ lexématique）内的不同义位接合，我们擅自按自己的意愿对词典提供的语料集（corpus）加以划分。

### b) 词位：一个风格学意义丛

《理特雷词典》对“头”下的定义，也是基本的定义——由此产生所有其它的定义和所有其它的“词义”——，是对它的描述：“（身体的）一部分……通过颈项与身体相连……”。人们看到，该定义是“写实主义”的，它所参照的是身体的非语言形象（请顺便注意：作为传统词典学的一大特征，《理特雷词典》所引用的例子没有一个能说明作为身体之一部分的“头”）。

从这个基本“形象”出发，人们可以对《理特雷词典》确定的“意义”稍做调整，做些风格学练习，使该“形象”呈现为一个多少有点“转化”的“意义”之辐射源。我们已经知道的两种结构关系使我们能够对素材进行重新组合。

1. 上联关系

根据《理特雷词典》,“头”可以被看做被皮肤和头发所覆盖的头,或仅被视为它的骨头部分。

a) 在前一种情况下,该词表示

——被头发覆盖的部分:

tête nue (光着头)、
laver la tête (洗头)、
tête de fou ne blanchit pas(直译:疯子的头白不了);

——被头发覆盖的部分(脸,面容):

faire une tête de circonstance (做出与场合相宜的表情)、
tu en fais une tête (看你哭丧着脸);

b) 在后一种情况下,该词表示骨头部分:

fendre la tête à quelqu´un (使某人头痛欲裂)、
se casser la tête (自己撞破头)、
tête de mort (骷髅头);

2. 下联关系

但是,"头"一词,由于表示身体的一部分,故也能指称被当做一个离散性整体的有机体,或者指称带有某些"形象"修饰成分的生物或人。由于我们暂时无意更深入地进行真正的义素分析,故只做以下简单的罗列:

a)作为离散单位的有机体:

Ce troupeau est composé de cent têtes
(这群牲口有一百头)、
Vous aurez à payer tant par tête
(你们必须按人头支付若干);

b)生物或生命:

mettre la tête de quelqu'un à prix
(悬赏通缉某人)、
il paya de sa tête (他付出了生命);

c)人:

une tête couronnée
(戴王冠的头,指"国王"、"女王")、
se payer la tête de quelqu'un (嘲笑某人)。

c) **义位的定义**

风格学分析就此打住：我们已经有了一份有限的清单，可据之发表一些看法。

我们刚才使用的例子介绍了一个处在一定数量语境中的词位“头”。我们的出发点是该词位意谓“身体的一部分”这一假设。从该假设出发，我们以某种方式分组的语境展示出一个意义“丛”。而这一“意义”丛围绕“头＝身体的一部分”这个假设组成一个下联或上联关系网络。因此，在诸语境变化和被考察的词位的内容变化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而各种内容变化，在此具体情况下，显示为一些可在意义基本结构框架内予以定义的关系。

但这里自然要提出一个问题：在目前这一思考阶段，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显然，因为该词位可与 thème、terre、thèse 等词位替换，故它首先具有一个*负内容*(contenu négatif)。接下来我们有权利假设它还有一个*正内容*(contenu positif)，后者必然是义素的下联配列。按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我们把这个正性内容视为义素核心，并用 Ns 来表示，同时假设它是一个恒定的最小义素量，是一个不变量。

但是，如果 Ns 是一个不变量，那么前面我们观察到的“意义”变化就只能源自于语境；换句话说，语境势必包括了义素变量，且只有这些义素变量才能解释人们记录到的*意义效应*(effets de sens)变化。暂且我们把这类义素变量看做语境义素，并

用 Cs 来表示。

显然,全部可能的出现语境能穷尽所有的义素变量。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语境义素的数量远远少于出现语境的数量。比如:

使头痛欲裂、
自己撞破头、
骷髅头,

与这类语境对应的只是一种意义效应,我们可以用"头骨部分"来表达。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把语境分类,每类语境由总是产生同一种意义效应的语境组成。我们可以认为,语境义素是整个语境类的共同特征。

由于眼下对如此规定的语境义素的内容尚一无所知,故我们无法肯定语境义素一定与简单的亦即最小意义单位同一。在某些情况下,一个语境类的共同特征极有可能包含不止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义素:若要说清这一点,就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对这类或那类语境进行具体的分析。暂且我们认为,为了建立意义单位分析所必需的最少量操作概念,更适宜的做法是只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即一个语境类由一个语境义素来定义。因为,我们刚才给义素核心 Ns 和语境义素 Cs 下了定义,现在可以把意义效应看做义位(semème),并把它定义为 Ns 和 Cs 的组合:

$$义位\ Sm = Ns + Cs。$$

## 2° 核心形象

### a)“头”的第一个义素核心:端部

我们已经说过,义素核心(noyau sémique)与语境义素的组合,在话语层面产生我们称之为义位的意义效应。对义位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后,现在可以回到暂时被悬置的义素核心分析上来了。为此,我们必须从一组新的出现语境开始分析,并不做任何保证地把它们列入以下义素栏目:

α) 端部 + 上 + 垂直

la tête d´un arbre (树顶)

être à la tête des affaires(领导企业)

avoir des dettes par – dessus la tête(债台高筑)

β) 端部 + 前 + 水平 + 连续

tête de nef (船头)

tête d´un canal (一条运河的起点)

tête de ligne (车辆路线的起点站)

γ) 端部 + 前 + 水平 + 间断

fourgon de tête(头一节货车)

tête de cortège(队伍的前头)

prendre la tête(领头)

我们一眼就能发现这一清单呈现出一定数量的并合特征，和一定数量的分离特征。

1. 首先从总体上，在该清单的任何一个出现语境中，“头”一词均不表示“身体的一部分”。

2. 人们看到，第一个共同特征是所有的出现语境中都有义素“端部”。

还可以补充一点，即义素“端部”明显出现在一些惯用语中，或与“垂直”组合，或同“水平”组合，有时产生一些似人形象，有时生成一些似动物的（或似鱼的）形象，如：

a) de la tête aux pieds
(从头到脚；比较： de la tête en cap)

b) un tête -à-queue (掉头)
ni queue ni tête (没头没尾)

3. 清单的第二个义素有时被称做“上”，有时被称做“前”。“头”作为两端之一，与代表另一端的“脚”或“尾”形成对立，因此可以认为“上”和“前”这两个名称在此是指同一个义素，即“最前端”，其意义因“垂直”与“水平”对立这一义素接合而改变。在别的场合（《拓扑关系》，载《词汇学手册》，1964），我们已经证明“上”和“前”这两项被一起思考时，其实只是空间非并存现象的一个特殊例子，其对立面是“下”或“后”。如果仅用“首部”这个名称代替“上”和“前”，那就可以说，在此义素清单中，

所假设的义素核心就有了第二个义素；而在此分析阶段，该义素核心可表达为：

$$N_s = s_1(\text{端部}) + s_2(\text{首部})$$

4. 清单的第三个成分不再呈现为一个简单义素，而是一个义素轴，包含两个义素："垂直"($s_3$)和"水平"($s_4$)。这两个义素的分离在话语层面上组成两个语境类。如果深入分析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些语境义素实际上是同一词组所含其它义素核心的构成成分("树项"所含义素"垂直"、"运河的起点"所含义素"水平")。

5. 对于本义素清单中的第四个成分，人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语境类 β)包含义素"连续"($s_5$)，语境类 γ)包含"间断"($s_6$)；而语境类 α)可说并不在乎这一分离。在此我们同样能发现，义素轴接合为"实线" /"虚线"，其义素是在与"头"相邻的义素核心内实现的(车辆路线的起点站/头一节货车)，仅语境类 α)代表了义素接合的中性项(既非"连续"亦非"间断")。

初看起来，这一提取核心义素常量的试验所获得的结果尚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我们能够说明该核心的特征是前两个义素的不变性，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对所谓语境义素的分析迫使我们侵犯与被研究的核心有着紧密依存关系的相邻义素核心的领域。如果用斜杠/表示义素的分离，第一次分析的结果便可以用公式表达如下：

$$N_1(s_1+s_2)+C[N_2(s_3/s_4)+(s_5/s_6)]+\ldots$$

在这一公式中，一个给出的义素既具有核心义素的功能，又具有语境义素的功能。有关语境义素定义的歧义性稍后将得到消除。

### b) “头”的第二个义素核心：球状

由同样的语料集可得出另一种与前者平行的义素清单，该清单被近似分类，仅展示最明显的义素特征：

α)球状体：

la tête d'une comète（彗星的头）、

la tête d'épingle, de clou, etc（大头针、钉子的头，等等）

［可对照法语里表示“头”的俗称：boul（球）、citron（柠檬）、ciboulot（葱头）等词］；

β)球状体＋坚固性：

se casser la tête（撞破头）、

avoir la tête dure（头脑顽固）、

tête fêlée（脑子不正常，直译：有裂缝的头）；

γ)球状体 ＋ 坚固性 ＋ 容纳性：

se mettre dans la tête （料想）

une tête bien pleine （满脑子事情）

se creuser la tête （绞尽脑汁）

上述义素分解的结果，初看起来与第一个义素核心的分析大不一样，以致人们不无理由地会想，“头”这个词位是只含一个义素核心，还是含有两个彼此独立的义素核心。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来自对两个义素核心的认真比较。而在比较之前，我们仅限于把该义素清单中的义素核心同其它义素区分开来：义素核心“球状体”可在所有的语境类里找到，而其它义素“坚固性”和“容纳性”只是一些语境变量。

c) **共同的义素核心**

如果更加仔细地阅读一下第二个义素清单，我们就能发现清单中的所有语境都以多少有点含蓄的方式包含了前面已经描写的义素核心，因为在 β)类和 γ)类语境里，“头”一词无疑是指“身体的一部分”；但是，若要做到这一点，“头”必须首先被理解为“首端”，并且要有“脚”做保。至于 α)类语境，人们知道彗星除了有一个“头”，也有一条“尾巴”，而“大头针的头”则与另一端“针尖”相对应。所以，第一个语境清单得出的义素核心，即

端部　＋　首部，

是两个语境清单的共同部分。

我们还需要整合新的核心义素“球状体”，而在这一方面，比较方法能给我们提供帮助。的确，义素“球状体”的出现可以说使前面的义素分析重新成为问题，因为该义素标记在第一次

描写时并没有出现。这样,人们就发现,第一阶段的分析并没有考虑空间的维度特性,但这一特性始终暗含于空间之中,这要归因于义素"球状体"的出现,该义素的出现预设了这样一种空间观念,即空间是装满或可以装满东西的区域。根据我们要与之打交道的是空洞的、由纯维度组成的空间,还是由各种面积和体积组成的区域,"端部"本身将被理解为某维度的极限,或区域内的一个凸起;换言之,或是相对于(连续或断续的)线的一点,或是诸体积世界中的一个球体。

从此,"点"与"球状体"这一对立可以表达为一个复合结构,该结构有时显现出它的正项,有时则显现出它的负项。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这样的结构在义素核心中较为常见,而我们不要忘记,义素核心是属于语言系统层面的范畴在话语层面上的接合。这类接合是初次提到,作为例子,我们可以引用"总体"范畴的定义来说明:受布隆达尔的启发(《如何定义泛指词》,载《应用语言学研究》,I),我们证明了"总体"范畴有时起到整合(intégral)作用,有时具有离散(discret)功能,体现了两个不同系列的不定量。

### d) 简单形象与复合形象

如果这一对"头"的义素所做的前期分析是正确的,那它就能多少阐明被我们称为——也许不太适当——词位之核心的构成。如同在我们所举的具体例子中呈现的那样,核心既不是一个孤立的义素,也不是一种简单的义素集合,而是一个从基本结构的各种可能的显现到更为复杂的结构组合这样的义素配列,它把属于一些相对独立的系统的义素联系起来。

因此,“端部”和“首部”是一些独立义素,也就是说它们属于两个不一定互相交迭的义素范畴。它们在核心内的关系也“独立”于两个义素,这就是我们仅根据逻辑预设来定义的下联关系。如果我们同意用一个由左到右,即由主义素到从义素的箭头来表示这类关系,那么“端部”(s1)和“首部”(s2)之间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Ns = s1 \rightarrow s2。$$

这样一个义素核心,其特征表现为各构成义素之间的等级关系,而且没有超出一个词位的范围,我们将称之为简单核心形象(figure)。相反,如果义素之间的等级关系延伸到一个词组的两个或几个词位,尤其像“树顶”(tête d'un arbre)这类序列:

$$Ns = (s1 \rightarrow s2) \rightarrow s3,$$

我们就称其为复合核心形象。

**e) 转向内容的符号学层面**

需要指出,构成我们刚才所研究的形象的义素都要参照一般的空间观念,故属于一个更广泛的义素系统。换句话说,把内容解析为最小构成单位进行的内容分析能展示深层的义素系统,同时也涵盖大量的词位显现,这一假设在这里再次得到了证实。所以我们引入一个新的操作概念,并认为在显现中能组成

核心形象(figure nucléaire)的义素均参照一些具有特殊性质的义素系统,这些义素系统总体上构成了表意域的符号学层面。

## 3° 类义素

### a) 语境义素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暂时把义位(semème)定义为义素核心和语境义素的组合。在进一步压缩这一定义的同时,我们力求更好地理解义素核心,刚才我们又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核心形象。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参与义位构成的语境成分的地位。

仅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让我们看一看下面这个非常简单的话语序列:

Le chien aboie(狗叫)。

按照已经使用的程序,对"叫"的语境分析能使我们得到义素核心,用 $Ns_1$ 表示(我们不再对其进行分析,因为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在此仅指出其内容所参照的是"一种叫声"),同时向我们揭示了两类"主语"语境的存在,这两类主语均能与"叫"组合。一类是动物:

le chien(狗),
le renard(狐狸),
le chacal(豺)……

另一类是人：

l'homme(人)、

Diogene(第欧根尼)、

cet ambitieux(这位野心家)……

我们认为这两类语境的特征是每一类都有一个共同的义素：在前一种情况下是义素“动物”($Cs_1$)；在后一种情况下是义素“人”($Cs_2$)。这两个义素中的任何一个借助其出现语境之一，在话语中显现；据此，它们与核心 $Ns_1$的组合构成两个不同的义位：

$Sm_1 = Ns_1 + Cs_1$ (动物的叫声)，

$Sm_2 = Ns_2 + Cs_2$ (人的叫声)。

再来看看词位“狗”(我们大大简化了过程)，可以说该词同样出现在两类不同的语境内。第一类出现语境与核心 $Ns_2$组合，构成义位 $Sm_3$：

le chien aboie(狗叫)、

gronde(低嚎)、

mord(咬)……，

并得出共同义素“动物”($Cs_1$)。第二类语境显现出一些词位“意义效应”，因为“狗”(chien)能表示“爪斗”、“夹钳”、“小矿车”，从而需要设定一个共同义素“物”($Cs_3$)。

### b) 词位与义位

这类分析的结果可以用两种稍有不同的方式表达。人们可以提取每个词位的所有形象，并把这些形象看做不变量，从而给它们加上它们能与之组合的全部语境义素(sème contextuel)。这样，对于词位"叫"和"狗"来说，人们可以得到两个不同的表达方式：

$$L_1 = N_1 + C(s_1 / s_2)、$$
$$L_2 = N_2 + C(s_1 / s_3)。$$

照此处理的语境义素通过分离关系结合成下列义素范畴：

动物 vs 人、
动物 vs 物，

并以此方式穷尽被分析词位的全部可能的用法，甚至在它们于话语中显现之前就做到这一点。

人们看到，该初步的表述巩固了我们对词位下的定义：词位呈现为包含一个意义形象之全部功能的潜在模型，该形象则具有一个确定的构形成分(formant)，但这个构形成分在只能产生具体义位的任何话语显现之前就已存在。

波蒂埃的研究与我们的研究并行不悖。而上述词位概念很可能就是他在研究中所阐明的，这样说恐怕并没有违背他的思

想。一部用潜在模型术语表述的词位词典可能会对解决由机器翻译提出的语义学问题做出不可忽略的贡献。但是，在我们看来，一门词位语义学与表达层面的接合方式联系过密，所以它难以解决至关重要的同义问题，故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内容分析。

相反，如果不是分别列出每个词位的表达式，而把"狗叫"这一话语序列看做是两个义位的相遇，我们立即就处在了显现意义层面；需要体现的义素在此层面上已经选定。如此，"叫"要构成义位，就在话语显现的同时选择了语境"狗"所含的义素 $s_1$；反过来，语境"叫"的存在意味着对义素 $s_1$ 的必然选择，使义位"狗－动物"得以出现。所以有关的序列（Sq）排除义素 $s_2$ 和 $s_3$，只显现语境义素 $s_1$，其惟一可能的义位组合是：

$$Sq = [N_2 + C_{s1}] + [N_1 + C_{s1}],$$

其中每个核心在理论上与属于相邻词位的语境义素组合。我们确实说了"在理论上"，这是因为两个语境义素实为同一，在其邻居那里寻找自己拥有的一定义素至少是一种抽象的观点。的确，如果替换序列的一个词位：

Le commissaire aboie（警官叫嚷），

人们就发现，"叫"的新语境这一回显现出义素 $s_2$，新核心 $N_3$（警官）的语境义素必然是义素 $s_2$：

$$Sq_1 = [N_3 + C_{s2}] + [N_1 + C_{s2}]。$$

借助这类最基本的练习，我们暂时提出了几点一般性看法，后面我们再来验证。

c) **类义素的定义**

从现在起，人们就能看到语境这一大于词位的话语单位的作用：它是内容层面上的独特层次，具有新的结合方式。因为，语境在话语中得以实现之时，就在诸义素形象之间起着相容或不相容作用，即同意或不同意把诸义素形象联合在一起。两个义素核心均能与同一个语境义素组合就是相容性。

从略微不同的角度考察同一种现象，我们还发现，如果一个以上的义素核心在话语中显现，就会自动引起一个或几个语境义素重复显现。因此，此前被描述为两个义位之组合的话语序列“狗叫”也完全可以表达如下：

$$Sq = (N_2 + N_1)C_{S1}。$$

这一新的表达使我们更加看清楚，一定的语境序列，如果包含两个义素形象，那它就只有一个语境义素；换言之，与语境义素对应的是比词位更大的交际单位，即词组或句子，而义素核心则大体上在这些交际单位内显现。仅这一事实就足以假定：对语境义素的研究应与义素形象分开而独立进行。

然而，如我们所见，语境义素这个术语在使用中会产生歧

义。例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做的语境分析展示了一些义素，就相关的核心而言，这些义素是“语境义素”，但它们却属于相邻的核心，而不属于我们力求予以定义的重复语境。因此，与核心义素对比，我们建议把严格意义上的语境义素看做类义素(classème)。

说明：继义素(sème)之后，我们再向 B. 波蒂埃借用类义素这个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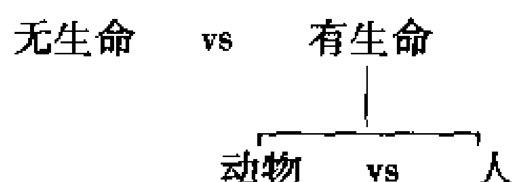
d) 转向语义学层面

为引出独立的、在话语组织中具有独特功能的义素类所做的尝试符合一种双重需要。因为我们需要证明这种以重复为特征的类义素具有可靠的解释作用，哪怕只限于阐明为一个信息或一个叶姆斯列夫理论意义上的词位层(lexie)设定的“全部意义”(totalité de signification)这个很有必要但十分模糊的概念。但从现在起，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信息或话语序列只要共有一个或几个类义素，就能被视为同位意义(isotope)。而且更进一步：越出狭小的信息框架，依靠这一同位意义概念，我们还将力图证明完整的文本是如何会处在一些同质语义层面的，证明一个表意集的全部所指并不是(如叶姆斯列夫建议的那样)被先验地设定，而是可以被解释为语言显现的一个结构性现实。

另一方面，类义素独立于核心义素这一观点，在本阶段只是一个旨在激发思考的假设；但是，如果看一下所举例子中不期发现的类义素，这一观点已开始得到证实。我们看到类义素：

物　vs　动物　vs　人

看来可以接合成一个义素系统。该系统可能更为明晰，如果将它表达为：




现在我们就想做如下归纳：如果说义素形象，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合的，均属于总的符号学层面，只是该层面上随时准备投入话语的具体接合项，那么类义素则自成为不同的系统，属于总的语义学层面，而其显现保证了信息和文本的同位意义集（isotopie）。

## 4° 工具概念

在概念化方面所做的初步努力旨在建立任何意义描写必不可少的构成单位。在做进一步探讨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概括一下这一努力所获得的结果。下表所列是在前面的阐述中大体上得到精确定义的有用术语（符号学术语：参见原著第 56 页）

| 内　在 ⟶ | 显　现 ⟶ |
| --- | --- |
| 符号学层面 }<br>语义学层面 } 义素系统 ↗ 符号学范畴<br>↘ 类义素范畴　义素 | 义素项 { 核心形象<br>类义素基 } 义位 |

# 符号学层面

## 1° 方法与近似性

### a) 符号学层面的自主性

在上一章里，我们得出了两个独立的语言层面，即符号学层面和语义学层面。这是两个内容结构，它们的成分在话语中相遇，构成了大小不同的显现单位，同时也显现出意义本身。现在应该分别对这两个语言层次加以考察，其目的不是对它们进行描写，而是尽可能说明它们的存在方式，尤其是力求勾勒出它们的轮廓和构形，就语义学研究现状而言，这样做或许更为现实。

在对表意域的划分中引进两个意义层面，目的在于强调它们彼此的自主性。当然，这两个层面合起来构成了内在意义域，该内在意义域之存在自然先于两个层面的构成成分在话语中的显现。系统与言语过程的这一对立，在许多语言学家看来似乎不成问题，但远未得到所有人的承认。此外，由于符号学领域如今成了多门人文学科的会合地，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同时强调逻辑先前性和符号学结构的自主性，以进一步明确一门结构语义学的立场，将其同借鉴现象学心理学或发生学心理学的研究区别开来，这类研究常常同我们的研究平行。我们想到的是各

种论及象征体系及其性质和起源的著述，尤其是吉尔贝·迪朗(Gilbert Durand)的著作《想象世界的人类学结构》所做的综合努力；此书所探讨的大量问题与我们研究的相同，但它使用的方法和提出的解决办法恰与我们的相反。比如作者最为关注的象征体系之分类就建立在发生学标准之上。它的依据是别赫捷列夫的反射学和三个反射特征即体位、消化和连接特征的根本区分。该反射学层面，被认为在个体发生学上是原初的，是它导致身体姿势的所谓系统化；依吉尔贝·迪朗之见，身体姿势与象征表达"紧密相伴"。反射学层面不是象征的，但它却是象征表达及其分类的依据，从这一层面出发，想象领域才可能发展成模式(schème)和范型(archétype)。惟有姿势——因为它们能够也必须被看做是原初的——才称得上"模式"，模式转过来生成范型：这样，以体位特征为依据的直立姿势生成形容语范型"高"与"低"的对立；同样，吞咽动作、下落动作，与消化特征相符，稍做延伸，便产生范型"容器"与"容物"的对立。同一些模式还能生成一些名词范型：一方面是"光明"或"黑暗"，另一方面是"颜色"、"器皿"、"形式"或"内容"。

一部兼收几门学科知识的著作自有其长处和缺陷。对于这样一部著作，要说的话很多。而我们之所以谈论它，是因为在方法使用上它代表了一种与语言学方法格格不入的精神状态。

1. 在我们看来，如果以实在事物的超语言层次上所做的区分为描写标准，那就不可能描写象征，即使这些标准并不是纯粹的假设。符号如同一般的语言，可以在感知中加以把握；外部实在作为表达形式在感知中显现，而符号所受之于外部实在的，仅

仅是负意义的区别性接合。

2. 无论是对象征表示的递增复杂性所做的发生学解释，还是虚假的因果推理（≃吞咽由于“延伸”而产生“容物”），都不可能等同于从义素系统出发的话语核心形象的生成。比如，出于某些非语言原因，对“上升”与“下降”这一对立进行分离，把象征表示划定为两大构形，这种分类称不上是结构主义，尽管结构主义一词已被滥用。而只有假定义素结构先于它们在话语中的多种义位表现，才能使内容的结构分析成为可能。这样一种观念尽管看似简单，但仍不合我们的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

b) **以人类为中心的词位说**

因此，悠久的词典学传统不仅使我们接受词典的词位描述，而且把词语的“意义”等级强加给我们；与人、与人的环境，与共同感觉世界相关的“意义”始终被看做是第一位的，故被默认为是原初的。可以说，“身体的一部分”是词语“头”的“自然”意义；同样，“prendre”（拿）的意义首先是“占有某物”。“prendre”的义素核心，就像它以义素“扩展”（expansion）见诸语境

Cet arbre prend bien（这棵树长得很好），

Le bois prend（枝条长活了），

或者以义素“收缩”（contraction）出现于语境

La riviere a pris（河上冻了），

Le lait prend　（牛奶凝结了），

都不过是语词之许许多多风格学可能性的一种显现而已；“本来”意义显然是人们“用手”拿某物时所遵循的意义。同样，人们只有“用牙”才能真正地“咬”，而吉贝尔·迪朗在谈及模式“针扎感”(mordicant)时也没有背离既定的习惯；可见模式完全不同于义素。

这种倾向，亦即潜在地接受在人的范围内加以切分的意义层次为基本的和优先的层次，也是梦、神话、诗歌、象征表达这类语言“异常”领域的研究所具有的特征。故此，对各种不同象征形式的早期描写，起先是像“详梦秘诀”那样罗列诸象征物，而后对诸宇宙学真义加以区分并做简单归类(米哈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亦即天上人间各种象征之不甚严密的组合；这类描写总是把象征——有时可以是词位，有时可以是物体——看成一些密实的描写单位。巴歇拉尔在对物质的象征表示方面所做的描写尝试，众所周知，是建立在性质物理学对土、风、水、火这四大元素所做的几乎是普遍的区分之上的。这一描写看起来像是一种创新。然而，巴歇拉尔自己也发现，该物质的分类成分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单义的；而且，在地物质内部，“田地的松软”与“岩石的坚硬”对立；而在水物质内，宁静的水的象征表示与狂暴的水的象征表示对立。

这一发现将巴歇拉尔带到了我们所设计的义素分析的门口，在这一分析中，下面的对立：

软　vs　硬、
静　vs　动，

得到预设，先于象征－词位“土”和“水”。但必须等到《空间诗学》出版，我们才能找到所需义素描写的基本内容和一种使用语言符号学层次的诗歌传递观念。

c)　一个保留的领地：象征表示

语言问题被颠倒这种情况，在针对诗歌、梦和潜意识之象征性质的思辨中变得更为严重：象征的歧义所引起的赞叹、这种被视为解释性概念的歧义的实际存在，以及对诗歌语言的“不可言喻性”和神话象征体系这一取之不尽的财富的肯定，促使一些像拉康或吉尔贝·迪朗这样的行家把价值判断引入意义描写，并对“真实话语”和“社会话语”、“真实语义性”和“庸俗符号学”做出区分。语义学若要成为一门人文科学，就应力求对价值做出描写，而不是假设它们。

问题甚至不能这样提，如果人们不是探求为什么某个词语有几种意义，一个语词为什么能同时表示一事物及其对立物（阿拉伯语法学家和哲学家长期探究词语 addad 的存在，因为这类词既表示“相似”，又表示“相异”），而是从符号学描写出发，研究意义的各种显现。那人们就会看到，较之任何一种自然语言的任何一个词位，比如我们的“头”，一个极富诗意的象征并非真有什么不同，其功能也没有什么差别。换言之，人们会承认这个常识性真理：凡是属于语言领域的东西都是语言的，也就是

说具有一个相同或相似的语言结构,并借助可确定的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确定的语言联系来显现。这样,人们或许能够"认清"这种现代奥秘解说,即所谓在语言中有一些神秘地带和一些明晰地带。如其所是的语言现象可能是神秘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再是语言学问题——,但语言中并无神秘可言。

笛卡尔的"蜡块"的神秘性并不亚于月亮的象征意义。这并不妨碍化学阐明蜡块的基本成分。结构语义学所要做的正是这样一类分析。的确,这两种情况都有意义效应存在,但实在事物的新分析层面——无论是涉及化学还是符号学——依然是合法的。

### d) 语言学与想象领域

需要消除的最后一个异议,在于象征体系和通常所说的想象领域(imaginaire)的单一描写层面的策略选择。语言学层面是惟一可能的描写层面吗?从有效性角度看,它是最佳选择吗?与语言层面平行的其它描写层面难道都不适用,都不能给出类似结果吗?

关于诗歌象征体系,事情看来不言自明,因为诗歌是一种语言,更确切地说,它处在语言之中。对诗歌的任何非语言描写必然是一种无用的、乃至不可能的翻译。神话象征则不然,因为在这一象征体系中,物体和"自然"行为似乎具有与词位或话语序列一样的象征功能,彼此可以互换。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些混乱,当人们不考虑描写层面的同质性时——这种情况经常发

生——,混乱更甚。

我们来看一个很普通的例子,即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表示。人们知道,自弗洛伊德以来,在精神分析和神话学中,几乎什么都可以是男根象征:人体各部分、整个人体、植物、树、鱼、人造制品,等等。男根隐喻看来是一个开放的类别,其中满是杂物,而只有第三比较项(tertium comparationis)是稳定的。然而,组成这一类别的显现成分无论是语言的、视觉的,还是"自然的",实际都无关紧要;关系,亦即整个类别所共有的、使类别成其为类别的成分,则不再是一个能指客体,而是一个义素接合,或者至多是一个属于所指范畴的核心形象。这样,我们就从提供研究对象的物的世界自动转入了意义世界,而意义则适合于由语言学阐述的描写程序。

我们无意就此断言——尽管情况可能往往如此——,诸男根象征物的象征性始终来自于谈论这些象征物的话语,因为后者为它们提供象征意义之显现所不可或缺的语境。有一些礼仪性或象征性行为都能成为自然语境。不过,所选用的例子具体说明了一开始我们就表达的看法,即意义不受所用能指的影响:能指是"自然"物,还是音位或字位(graphème)组合,都丝毫改变不了意义分析程序。

内容分析以构成共同感觉世界并被当做能指的物体为基础,这在理论上是合理的,或许还是可能的。语言层面的一大优势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其它语言,故包括象征物语言,都可以译成任何一种自然语言,反之则不一定成立:人们无法想象

马拉美(Mallarmé)的一首诗怎么可能译成一种物的语言。[这在语言教学视听法制作过程中尤为明显,因为视听法必须建立一个与自然语言的口头能指相符的直观能指:虽说屏幕比较适用于表现施动者(actant),但谓语和关系的直观表达问题则刚刚提出来,还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自然语言的能指相对简单,而且已被部分地分析,有助于我们制备越来越可靠和越来越多的意义差异验证技术,哪怕意义结构首先被设定为逻辑程序的假设结果。在把这类技术应用于内容分析的实践中,我们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即便如此,对于人文科学来说,它们的价值可与自然科学中的几何形式化相比,而且在我们看来,这正是结构语言学的方法论优势所在,而其它人文主义研究的直觉虽然有时候也不同凡响,但并不具备验证程序。

## 2° 符号学的地位

### a) 象征层面与符号学层面

至此,我们力求证明,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从本质上讲,象征表示同其它的意义显现并无什么不同,对象征体系的描写属于同一种方法论。现在有必要指出,如果把象征表示直接等同于符号学结构的存在方式,那就错了,尽管两者在某些方面颇为接近。象征表示若要如其所是地发挥作用,就必须依靠符号学层面,但它总是参照其它东西,参照一个不同于符号学层面的语言层次。

可以说,符号学层面是一种能指,它依靠任何一个释义平台

把象征所指接合起来，使其构成区别性意义网。内容层面需要有一个被接合的表达层面，才不至于变成索绪尔所说的“模糊一团”；同样，内容形式的接合能对内容实体加以区别，从而赋予其活力。

从另一方面讲，符号学结构化领域比任何特定的象征体系都要宽广；换言之，在某个符号空间和某个象征表示之间并不存在相符性；符号学层面独立于承载它的象征表示；同一个符号学层面可用于接合不同的象征表示。仍以诸男性生殖器形象为例，显而易见，无数风格学变体能够简化为一个象征不变量，其原因在于惟一的意义层次，亦即性别特征，在符号学层面上被假设，该层面的一个相对简单的核心形象用于把所有的出现语境联系在一起。对这一所指的选择，就像对其它所指的选择，都是合法的。如叶姆斯列夫所证明(《语言学论文集》)，“性”这一语法范畴所依据的是义素对立：

expansion(扩展) vs condensation(压缩)。

故此，雌与雄的对立(femelle/mâle)不过是该符号学对立的一个特殊显现，通过义素核心和类义素“有生命”(animé)的组合获得。

所以，对符号学层面的描写是一项独立的任务，描写时不应顾及这个或那个具体的象征表示。

### b) P. 吉罗的“原初语义特征”

象征层面和符号学层面之间的比较使我们隐约看到符号学层面的定义所包含的基本内容。符号学层面是内容的形式，该形式通过假设任何一个释义平面，使这个或那个象征得以显现。然面，符号学层面和内容的形式这两个概念并没有共同的外延；如果说凡属符号学层面的东西必然属于内容的形式，那么反之则不然，因为类义素和由类义素组成的语义层面（释义的同位意义集之源）同样具有内容的形式之特性。

叶姆斯列夫提出的“内容的形式”这个概念意味着形式主义的消亡，从这一意义上讲，这是一个革命性概念，但它不能用来实际区分诸语言层次，面当人们打算坚持——这正是我们的立场——索绪尔的语言观时情况更是如此，因为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形式，惟有该形式得以显现，才会导致与内容实体相当的意义效应的出现。所以，需要划定的应是使符号学层面与语义学层面分离，面不是使形式和实体分离的界限。

看来我们应该再次回到一些实例上来。一个时期以来，P. 吉罗（Guiraud）研究了他所说的形态语义场，以我们的观点看，这一研究极富教益。在近期的一篇研究文章中（载《语言学学会简报》，第 LVII 卷，第 7 册），吉罗阐述了词位音位学变化矩阵的存在，与这些矩阵对应的是一些平行的、非同构的义素接合模型。该研究所依据的是一份近 400 个义位的清单，包括了一个为辅音基词根[t－k]所覆盖的语义场，该词根的特征是核心意

义 frapper(击打)。这一研究在诸多方面值得关注,我们先概述一下它的成果。

该词根所涵盖的各种"意义"变体可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型:

1. 第一类与构形成分的变化相关。因此,与矩阵中的元音变化

[t－i－k] vs [t－o－k] vs [t－a －k]

对应的是 coup(击、敲)的义素变化:

Petit(轻) vs gros(重) vs plat(平)。

音位矩阵可以包含其它辅音变化,与之对应的则是内容层面上新的义素接合。因此,加入中缀[－r－]:

[t－r－i－k] vs [t－r－o－k] vs [t－r－a－k],

就使模型增加义素"重复";同样,变体[ʃ]取代[k],便产生义素对立:

(coup)amorti(缓冲的) vs (coup)net(直接的);

2. 另一方面,语义模型包含一些独立于音位矩阵变化的义

素接合。P. 吉罗所说的原初语义特征（proto - sémantisme）也覆盖动词和名词，既产生 frapper 这类义位，也产生 coup 这类义位。故此，同一个构形成分既能用于指称击打物（铲、拨火棍、木槌）也能用于指称被击打物（板、小板）。最后，它还有助于以初看起来不合常理的方式构成意谓斑点、斑疹、痂盖以及其它各种皮肤病的义位。

人们首先看到，汇集于同一模型的诸义素接合明显分成两类，分类的标准属于表达层面，而不是内容层面。

1. 某些变化与音位矩阵的变化相关，它们构成两个不同等级的层面。

a）触觉类义素核心 attouchement（触摸）与辅音基[t - k]对应，但 P. 吉罗未予分析；

b）诸感觉类义素变化与构形成分的可替换成分对应。因此，“轻”与“重”的对立：

| | | |
|---|---|---|
| petit（coup）<br>轻（击） | vs | gros（coup）<br>重（击） |

可解释为强度轴的极化，而 P. 吉罗所记录的第三项与前两项在接触面积上形成对立：

superficie（面） vs point（点）

至于中缀[ -r- ]和变体[ʃ],它们则引入一些补充性语体限定。

这样,符号学模型包含与各个感知类别——触觉、空间、语体——相对应的义素范畴。

说明:在此我们从语用学角度出发,亦即按照语言外标准把符号学层面分成一些感觉类别。这样一种分类旨在实用,故只有在对构成该语言层面的义素系统进行描写后才能被证实,也才能得以成立。

2. 相反,其它义素变化则是独立的,与构形成分的变化没有共变关系。比如对立:

substantif(名词) vs verbe(动词)

与核心义素接合相比是次要的。下面的对立也是如此:

destinateur(发出者) vs destinataire(接收者)
(击打物名称) (被击打物名称)

说明:我们只是把最后一组对立记录于此,但需要说明一点,这一对立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继勒鲁瓦-古尔汉(Leroi-Gourhan)的分类之后,G.迪朗详尽探讨的、能使动作"延伸"的工具之名称问题。

在我们看来，P. 吉罗的研究很重要，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研究者本人作为统计学方法的倡导人，却习惯于运用词汇单位，而他的研究又导致他进行相当严密的义素分析。其次因为这些研究清楚地表明，词源学研究与这类义素分析完全适配，义素分析甚至还能使词源学研究更为方便。最后——这也正是例子的作用所在——，我们观察到，一方面，音位矩阵和符号学成分之间存在着共变关系，另一方面，类义素变化和该矩阵之间则不存在这种关系；这一事实使我们看到了将核心义素和类义素，将符号学层而和语义层面分离开来的界线。

说明：在此提出语言起源问题是不合适的。但应看到，确认音位模型和符号学模型的共变关系，为至今还被认为是不现实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

c) 符号学层面与生理学释义

所有这些变化并不妨碍两个核心的存在：一个是以辅音图示[t－k]形式出现的音位核心，另一个是以 frapper（击打）这一"原初语义"为特征的符号学核心。该义素核心在《理特雷词典》tic 词条中被定义为"抽搐"，相当明显地表现为复合项的一种接合，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法语方言而显现为下列对立中的两个义素之一：

attouchement agressif　vs　réaction convulsive。
（挑逗性触摸）　（抽搐性反应）

如果不考虑以后的义素组合，人们不难断定这一图式代表了意义的接合，这种意义包涵了几乎未被区分的处于生理学层面的行为，即外部刺激和活细胞的反应，而这类行为并不像 G. 迪朗所希望的那样处在人的个体发生学层面。（在此层面上，义位斑点、斑疹、痂盖，以及伴随它们的头癣、疥癣、疥疮、麻疯病等多半可解释为受感染表面的反应。）为了阐明人格的符号学接合和把人格理解为一个有机的“吸引和排斥系统”，我们认为，较之按照假定性反射特征把象征归类，在此层面上设定一个总体所指的做法无疑更为合理，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就建议这样做，在他看来，个人风格只是“肉体的装饰音”。

不过，根据反射特征做出的解释，如果说从象征角度看，亦即在生理学层面被假定为深层所指的情况下是有效的，那么从符号学上讲则不然，因为“plaquette”（小板）一类义位的存在说明：义素形象为了能与适当的类义素组合而产生义位 plaquette，就不应包含义素“有机物”，而且“有机”与“无机”的对立（对照：“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对立）处于义素核心之外，甚至可能处于符号学层面之外。因此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把核心形象从其有机环境中抽象出来，把它视为一个纯感知对象，一个义素范畴，该范畴属于非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可触觉性”的系统性接合，这就像我们将“头”（tête）的义素核心移至“空间性”的义素接合一样。

因此，符号学层面的存在方式在我们看来已略显明确：它是一组处在感知层面并在此层面被把握的义素范畴和系统。总之，这些义素范畴和系统类似于雷蒙·吕耶（Raymond Ruyer）所

展示的鸟类图式化视觉感知，而正是这类视觉感知能使鸟类根据下列对立识别敌友：

| | | | | |
|---|---|---|---|---|
| Cou long/queue | courte | vs | cou court/queue | longue |
| （长脖） | （短尾） | | （短脖） | （长尾） |

诸符号学范畴处在感知过程之内，可以说代表了感知的外部表现，代表了外部世界对意义生成的贡献。从这一角度看，它们与感性世界的各种性质（qualité）同构，类同于组成手势语的形态音位（morpho－phonème）。而且这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如果大家记得，我们所努力构建的是一门独立于意义第二次分节[①]的语义学。总之，在我们看来，这足以证明我们把这一语言层面称做符号学层面是正确的。

## 3° 符号学描写的各种可能性

### a） 应用语言学领域的语言构成

语言符号学层面的义素分析看来是结构语义学的第一个任务。该义素分析一旦实现，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任何自然语言固有的不同象征功能，还能大大有助于应用语言学的不同

① 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A. Martinet）提出的双重分节理论，借以把自然语言同其它交际手段区分开来。自然语言话语段第一次可节分为一系列最小意义单位，马丁内称为符集（monème）。这些意义单位又可第二次节分为一系列区别性语音单位，即音位（phonème）。双重分节说明人类语言只要有少量音位就可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译注

方法，有助于解决以高准确度为目的的自动翻译遇到的困难，还有助于构建文件自动分析语言（langage documentaire），与此同时，语言构成单位的界定将变得更为容易，我们也能更好地把握这些构成单位的交迭方式。

因为这些领域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遥远；在对这些领域的描写中——遗憾的是这类描写仍是各自为政——，先后缓急次序几乎都一样。如果说我们对语言符号学层面的思考初看上去像是集中在象征问题上，那么只要留心一下现今机器翻译所遇到的紧迫问题，就能发现机器翻译因为一开始选择了话语的词位层面而进退两难，如今为使其走出死胡同而做的努力往往导致同样的结论。在这一方面，像波蒂埃这样一位富有经验的研究者打算给机器翻译指出的新方向就是个征兆。罗斯·奎廉（Ross Quillian）的意图也是如此，他所提出的语义域描写，是通过将语义域翻译成一种纯粹的构成语言来进行，而这一语言的成分构成了各种级阶，与我们的义素颇为相似。他的理论被摘要收入《语言意义问题》这部集子，阅读一下这篇摘要，便可对他的理论有个大概的了解。《语言意义问题》是1996年剑桥大学语义学研讨会纪要，反映了当时关注机器翻译的语言学家们的精神状态特点。这部集于里有一张表（第150页），以探索的名义列出了该人造语之各个可能的方面，其中有本体感觉（proprioceptif）和内感觉（intéroceptif），但对于这两类感觉，奎廉未敢表态，而只是替它们保留了约25个有待构成的义素；边上有一份外感觉级阶（échelle extéroceptive）清单，我们照录如下：

a) The Five Abstract Scales:《Number》(the real number

continuum),《Correlation》(in the statistical sense),《Make - up》(notion of whole - to - part or whole - to - aspect),《Similarity》,《Derivative》(in the mathematical sense);

b) Visual Scales; hue, brightness, saturation;

c) Temporal Scales: time, length (with subscripts);

d) Degree of Existence, degree of awareness;

e) Auditory Scales: pitch, loudness;

f) Gustatory Scales: sweetness, souriness, saltiness and bitterness;

g) Olfactory Scales: not yet determined<br>
h) Cutaneous Scales: not yet determined } say, 25 max.

**说明**:对于这一分类,我们甚至无意将它译成法文,因为其中每一项离开了语境均会产生歧义,可以有多种解释。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其接合方式,而是提出这一分类的原委。在我们看来,此例具有征兆作用,揭示了一种暗中支配语义学研究的精神状态。

这一罗列已经使我们看到了奎廉设想之轮廓:除了 a)和 d)——前者杂乱无序,几乎包含了所有涉及语言分析的公设;至于后者,我们自认看不太懂——,罗斯·奎廉所设想的语义描写的第一个步骤看来是先验地把全部词位置于一个感觉栏里;然后为第一次记录补充一些属于"本体感觉"和"内感觉"的语境限制,整个描写所使用的语言成分数量,据奎廉说肯定不超过 100 个。

玛格丽特·马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建造国际辅助语（interlingua）所使用的语义类属成分也是100个（同上，第6－14页），这可能是暗示对有限的化学元素数目的留恋。不过，他的语义类属成分不是最小意义单位（在此随便选录几个：air，cold，give，laugh，one，sign，went，body，eat，how，more，re－，yes，you，等等）；再者，我们之所以在此提及马斯特曼的企图，一方面是为了录下许多语言学家内心的信念，即语义描写单位的数量是或应该是非常有限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一旦人们稍过刻板地承认描写性语言先验构建之合法性，就有随心所欲的危险。

b） **概括层次**

对我们来说，承认任何描写都是构成，这自然意味着首先承认某种必然性；但是描写也包含某种科学伦理学上的要求。自由不能滥用，先验构成也不应该是任意的：人类生活的语言维度是一个社会事实，对它的描写只有一个目的，即构成一门与需要描写的自然语言相称的语言。换言之，语言构建之自由因存在着能指的区别性差异而受到限制，而任何描写都必须考虑这类差异，因此在系统性构成之前，或在继逻辑描写之后必不可少的验证阶段，都必须使用一些归纳程序，如替换测检、分布分析。

有一个例子能进一步阐明我们的思想。设有两个词位：donner（给）和prendre（拿），我们已经为它们提出的义素核心似乎可以表达为对立：

expansion vs expansion + contraction
（扩展） （扩展） （收缩）。

在此分析阶段，只要清单有两个词位，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expansion”和“contraction”不是义素，亦即不是最小意义单位。相反，如果想扩大该清单，加进词位 tenir（持），我们就会发现：

1. 义素“contraction”似乎是 prendre 和 tenir 的义素核心的共同特征，故应增加一组义素对立：

$$\frac{\text{prendre}}{\text{tenir}} \simeq \frac{\text{contraction} + \text{inchoativité（始动性）}}{\text{contraction} + \text{durativité（持续性）}};$$

2. 义素“contraction”在第一种情况下似乎是动态（dynamique）显现，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静态（statique）显现。因此，该义素还能分解成两个义素：“solidité”（牢固性）+（“dynamique”/“statique”），结果 prendre 和 tenir 的义素的对立显示为：

$$\frac{\text{prendre}}{\text{tenir}} \simeq \frac{\text{(expansion)} + \text{solidité} + \text{dynamique} + \text{inchoativité}}{\text{solidité} + \text{statique} + \text{durativité}}。$$

即使到了这一阶段，我们还丝毫不能肯定我们的分析已达及最小意义单位，也丝毫不能肯定分析已正确无误（“动态”和“始动”在此就没有冗余之嫌?），因为该清单倘若再扩大，我们

不是还需要做新的调整吗?

这一分析暂时搁下,但它似乎已经阐明了在语义描写中应赋予逻辑构建的地位:只要语义描写始于一门特定的自然语言,描写的是一些有限的清单,那么逻辑构建的作用是通过概括来使分析深化。这样,在清单扩大的情况下,或者在同一种语言内比较若干清单时有效的东西,在平行描写几种自然语言以构建一种中介语言时——比如涉及机器翻译或文件自动分析——就会变得更加有效。

所以描写所遵循的是两个同时出现而又互相矛盾的原则:描写是归纳的,因为它意在如实分析所描写的事实;它也是演绎的,因为它必须保持构建中的模型的严密性,并且具有能覆盖被描写的语言材料的概括性。这样一种以寻求折衷为本的描写程序观念,如果不能为所有的科学描写所共享,那就不会令人鼓舞。

### c) 描写步骤

从整体上描写符号学层面这一愿望尽管初看起来显得有些过分,但还是没有超出人力所及的范围。不管人们为此选择的语料是什么——《法语词汇宝库》,或者《理特雷词典》——,原则上最后都表现为数量有限的义素。人们应该记住,如果扩大需要描写的语料集,深入分析并揭示越来越小的意义单位,那么,基于所达到的最大概括程度,任何语言构建就会同时减少意义单位的数量。

描写程序将在专门章节里讨论。在此我们只指出一点：描写要从义素形象过渡到义素系统，再从义素系统转入诸符号学范畴，就必须采取适用于任何分析的程序，而该程序依次分为三个阶段：制作清单（inventaire）、缩简（réduction）和结构化（structurtion）。

# 话语的同位意义集

## 1° 话语的异质性

### a) 信息同位意义集

为了更好地确定与内容的语义层面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意义的显现上来，并从中探寻话语运行的结构性条件。的确，当人们力图理解话语时，就会发现话语包含了一些看似矛盾的成分。

有这样一种关于信息结构的解释：话语由一连串信息构成，而这是出于人之精神的陈述能力，换一种或许更为现代的表达，乃是说话人的意向性所致。但这一解释难以接受，这主要不是担心有心灵主义(mentalisme)之嫌，而仅仅是因为该解释处在信息发送面，而不是处在信息接收或传递层面。从信息接收或传递层面看，话语虽说是线性的，但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一系列限定关系，并由此产生一种句法等级。

那么，一个分等级的意义组合会产生一个同位意义信息，这又当如何解释呢？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话语分析始于上层(en haut)，亦即始于被定义为意义单位的词位层(lexie)，还是

把最小构成单位组织成较大句法单位，人们都无法避免信息的统一性问题，即信息不可避免地作为意义整体被感知。

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看到了这一问题，建议在诸形态范畴冗余性基础上建立信息的同位意义集（isotopie）概念。的确，诸句法单位是等级单位，同时用做诸形态结构重复出现的场所：同成分的形态结构通过重复来确立传统意义上的一致关系（accord）；同范畴的形态结构则反映支配关系（rection）。

这种语法冗余性已经能够充当信息同位意义集的理解模式。但不应忘记，从内容层面看，形态范畴只能构成一组有限的类义素；另一方面，即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受句法限定的信息同位意义集，也不足以解释话语中较大风格学单位的同位意义集和各种同位意义集变化，也不足以阐明整个话语。所以，我们不一定要依靠形态范畴，而应该求助于类义素范畴——不管是何种类义素范畴——，而且一开始就要考虑那些未受句法限定的同位意义集的变化，这样才能更好地估价遇到的困难和可以考虑采用的办法，以阐明超出句法限定的同位意义集的存在。

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有关同位意义集变与不变的例子，我们觉得应该来自诙谐语（mots d'esprit）领域。这一文学类别所使用的语言技巧往往显而易见。

b) **同位意义集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

那是一场非常出色的社交晚会，太棒了，宾客都是挑了又挑的人物。其间，两位客人来到阳台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其中一位用满意的口吻说：

“啊！晚会非常成功，是不？晚餐真是精美……toilettes（服饰、洗手间）也漂亮，是不？”

“那我就不知道了，”另一位答道。

“这怎么会呢？”

“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过！”

（摘自《观点》，1962年2月23日）

这个故事，与无数同类故事一样，在形式上具有一定数量的不变特征：

1. 它必然包括两个部分：介绍－叙事和对话；

2. 介绍是为故事做安排：这是一段简短的叙事，它建立一个同质的意义平面，一个同位意义集；

3. 对话这一手法突然引出第二个同位意义集，与第一个同位意义集对立，致使故事戏剧化，从而破坏故事的统一性；

4. 两个同位意义集由共同的连接项联系起来。若遇到最简单的情况（双关语、“诙谐语”，等等），同一性，甚至只是构形成分的相似性就足以连接两个同位意义集（人们无需知道涵盖两个不同义位的构形成分 toilettes 是否具有一个共同形象）；

5."精神"愉悦来自于在一个原以为是同质的叙事中发现了两个不同的同位意义集。

由此可以看到,被视为文学类别的"诙谐语",把话语的同位意义集变化——人们同时假装用连接项来掩饰的变化——,提升到意识层面。

另一个标准是对参与这类微型喜剧的施动者(actant)的选择,它是强调要加以对照的诸同位意义集之异质性的辅助方法。因为初步的粗略分类表明,诙谐语偏爱下列类型的对立:

| | | |
|---|---|---|
| 成年人 | vs | 孩子 |
| 多数派 | vs | 少数派 |
| 正常人 | vs | 疯子 |
| 人 | vs | 动物或东西,等等。 |

在这类场合,两个同位意义集的对照也不只是使两个各具同位意义的序列形成对立,因为从内容角度看,这些话语段被认为代表了异质的"心理状态"(mentalité)。可见这类"故事"的内容描写可能成为一门关于各社会阶层集体表现的分类学。但这已经是另一回事了。

c) **同位意义语境的范围**

介绍-叙事是诙谐语惯常使用的技巧,这一现象足以表明

讲故事的人需要让听众放心，为此采用的方法是牢固确立话语的同位意义平面，首先假定一个较大的语境，然后在此语境内引入一个新的同位意义集。应该承认，持重的人总是知道或以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相反，风趣的谈话则有其自身的特征，即同时平行地和连续地使用几个同位意义集。由此可见，同位意义集的区分和同位意义集语境范围的确认极为重要；这一问题甚至是机器翻译领域尚未解决的难题之一。因为，如果说

Le chien aboie （狗叫）、
Le commssaire aboie （警长咆哮），

这两个语境的同位意义在一个基本话语的范围内得以确定，那么语境

Le chien du commissaire aboie

就不是如此，因为话语序列既可以显现类义素"动物"，也可以显现类义素"人"；只有一个更大的语境才能确定出现话语所指称的是"狗"，还是"秘书"①。

语义分析在寻找区分标准以确立诸同位意义集的过程中，会使用交迭语境之等级概念。因此，至少由两个义素形象组成的词组，可以被看做能建立一个同位意义集的最小语境；连续话语能用于检测构成该连续话语的诸词组的同位意义集；该同位

① 法语词"chien"指"狗"，也可贬称警长的"秘书"。——译注

意义集转过来又被纳入句子。至此，描写并无阻力，因为这些句法单位的大小是已知的、可比的和可替换的。相反，一旦超出句子范围，难度就会增加。当然，我们可以尝试对大于句子的非句法话语单位——段落、"过渡"（叙事、图表、对话，等等）、章节——做出规定。但是，在这类非句法单位中，替换程序的使用就不可能那么严谨，能发现的形式标准也远远不够。鉴于这些非句法单位依然是内容单位，人们有权利知道：语义研究是否就提供不了其它评价因素来辨认同位意义集的连续性。

## 2° 话语的元语言运作

### a) 扩展与定义

现代语言学确认了自然语言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扩展（expansion），并把它归入其工具概念库；从此，现代语言学取得了新的发展。扩展可归纳为这样一个事实：话语作为一连串分等级的、彼此嵌合的交际单位，本身包含了对这一等级的否定，因为大小不等的交际单位能同时被确认为互相对等。

不等单位的对等原则，一旦应用于诸自然语言比较［尤见于机器翻译，如 potato 与 pomme de terre（土豆）对等］，就会凸现每种自然语言的民族语特性；当它应用于某种语言的内部事实时，就能说明话语功能的元语言特征，而这一特征的重要性看来并不亚于话语运作专有的语言特征。换一种朴素的表述，该原则不过是说：一个事物可用简单的方式描述，也可用复杂的方式描述；一个单词可用一个更大的序列来解释，反过来，人们常常

可以找到一个词来表示起初以展开的形式构思的东西。所以，扩展并不是话语的句法属性，即给话语加上由于语项的先后显现而产生的连续限定，而是话语正常运作固有的特点。只有当一个扩展序列被确认等同于一个在句法上比它更简单的交际单位时，扩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含义。正是这种对等——从理论上讲它始终是可能的，尽管不一定以词汇形式出现——构成了能用来定义话语元语言运作的结构差异。

这样，如果不再从一般语言学角度出发，而仅从语义学观点看，只要被限制在不超出句子限界的句法单位范围内，扩展这一概念就能在广义的定义中，在人们为了避免任何歧义而称之为话语定义的东西中得到体现。因为词典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力图根据一个词目所包含的义位数，用一个或几个等值的、但在句法上大于需要定义的词目的序列来代替该词目。这样，任何一部词典都要提供无数例子，以说明该对等系统的运作：

mordre ≃ entamer avec les dents;
(咬)　(用牙损及)

entamer ≃ toucher (à une chose intacte) en lui portant la première atteinte;
(损及)　碰坏(一样完好的东西)

toucher ≃ entrer en contact avec quelqu'un ou quelque chose; etc.
(碰)　(开始与某人或某事接触)

(摘自《常用词典》)

由此可见，定义性序列是：

1. 一些扩展词组（在此是可预见的谓语性词组），它们的句法功能同于需要定义的语项；

2. 一些话语序列，它们一般由两个语项组成：第一个语项确立等同关系，第二个语项限定第一个语项。

可见话语定义不等于但近似于逻辑定义，而人们知道，逻辑定义所采用的是*递近类和种差*（per genus proximum et defferentiam specificam）释义法。不过，话语定义并不像逻辑定义那样是强制的和单义的，它是不受拘束的和近似的。它并不在处于两个语言平面上的切分成分（segment）之间建立同一关系，而是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临时的、有时甚至是短暂的对等关系，而这种对等关系的依据是两个并列的切分成分所共有的一个或几个义素。

说明：语言学上通常——而且多少有点含蓄地——使用的对等概念几乎从未得到定义。此定义属于认识论元语言层次，故在此我们只打算提供有关该定义的基本内容。

如果说词典学定义常常模仿逻辑定义的表述方式，看起来比较接近逻辑定义的话，那么填字游戏的定义却能更正确地展示自然语言的"正常"运作。我们从《法兰西晚报》上选择了一个极普通的填字游戏题，该题随便给出下列释义：

compétition(竞赛) ≃ épreure sportive(体育比赛)
tanière(兽穴) ≃ habitation misérable(简陋肮脏的住所)
ballet(芭蕾) ≃ danse figurée (形象舞蹈)
désir(意愿) ≃ envie pas toujours satisfaite
(未必得到满足的欲望)
mer(海) ≃ étendue d´eau (水域)

我们看到,扩展序列虽被认为与其定义的义位对等,却不可能穷尽该义位的义素清单,它只是包含了一定的数目的、与该义位共有的义素。

b) **压缩与命名**

在谈论填字游戏时,我们故意颠倒了语项的次序。如果说词典编纂者和填字游戏设计者从一个既定的义位出发,给它寻找一个定义,那么呈现给读者(亦即接受层面)的问题则是由一组定义构成的,读者根据这组定义去寻找被定义的语项。换言之,如果我们在扩展成分中识别话语的元语言运作方式,那就能知道扩展必然导致压缩(condensation),后者应理解为对扩展信息的压缩性解码。"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的意思是……":对话人常常是这样对一篇有点长的谈话进行简缩的。因此,如同扩展拥有一种受到句法限制的表达方式即定义,压缩往往导致命名(dénomination)。只要听一听五金制品店这类专门商店里发生的对话,我们就能当场领悟命名的程序;顾客要买:

一个派 ......用场的东西，
一种类似 ......的东西
一个用做 ......的东西，
一样用于 ......玩意儿
一个 ......的家伙，等等；

这是一些不拘形式的定义，与它们相对应的是售货员说的商品名称，而这些名称有时候与定义相符，有时候只是探索性的。

话语自转不息，接连从一个层面转到另一个层面，而这样一种话语的元语言运作方式令人想到它如同来回于扩展和压缩、定义和命名之间的摆动。在一个完全封闭的语言系统中（在此系统中，词位与义位同一，猫总是叫做猫），这种元语言游戏会是不规则的、不平衡的：如果该系统由构成系统的 N 数目的项来定义，那么，只要项数 N 较大，定义的组合可能性就会很多，而反向运作，亦即命名，总是把定义归结为同一些项。而且，人们常常根据某种虚假的索绪尔传统，像这样设想言语（parole）的自由，并拿这种自由同语言（langue）的封闭性做对照。可是，语言并不是一个封闭系统，人们借助各种不同的程序，在语言中随时进行命名和定义。

在此没有必要尝试描写这类程序，也没有必要摘要介绍“论词汇的形成（或变化）”这类书籍，何况这类书籍需要在新的基础上重写。因为对命名的分析，并不像人们常认为的那样仅属于历时语言学范畴——或许这就是有关该领域的研究被放弃的原因，它同样而且尤其属于共时语言功能范围。要说明此现

象的广度，我们只需指出其主要的形式。

1. 这些程序中有一些极易辨认，因为它们是形式程序和功能程序，换言之，因为它们主要用于命名。

a) 派生法就是如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分类系统，简单命名的框架。18 世纪有一整套法语技术词汇就是这样产生的：或从工具出发，或从工料名称出发，命名系统提供了适合于表示生产者、生产活动、生产过程和生产地点的空框架。J. 杜布瓦(J. Dubois)最近发表的一部著作详细考察了这一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b) 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偶然采用的借词法，特别是这样一种普遍适用、且万无一失的程序，即使用属于希腊－拉丁语遗产的词位成分，而这份遗产是同属西方文明的各语言集团所共有的。希腊－拉丁语的词位成分提供了相对简单的义素可能性，此可能性又因科技语言的单一释义而保持稳定，故被充分用来复合现代科学术语的命名义位。从复合到派生的过渡较难把握和确定， J. 杜布瓦对其中的困难做了研究。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是复合词根的义素内容较为简单，致使复合词根和派生词缀难以区分。

2. 在使用刚才指出的非连续构形成分的命名和不求助于这类构形成分的命名之间，还有一种特殊的程序，它使名称与定义同一，更确切地说，是语言的命名层面承担其定义职能。

相关的例子为数众多：plafond（天花板）、fer à cheval（马

蹄铁)、acide acétique(醋酸)的横组合程度虽然不同,但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它们进行解释。的确,无论是扩展将两个或几个义素核归并为一个义素核的核心形象,还是通过框定单一类义素并同时悬置一定数目的义素(与定义相比,命名始终是义素贫化的结果),话语定义都能转化为命名, 转过来又需要新的定义。

3. 但是,我们尤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类程序,这类程序利用现有的、但不是像派生词缀那样在语法层面上系统化的词位素材,产生新的命名性质的交际单位。

a) 这类程序之一可称做*形象命名法*(dénomination figurative)。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像义素核心 tête(头)这样的核心形象,在法语中起的作用如同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名义素模型;而且,作为原型,它涵盖一个开放的派生类:tête d'un clou(钉子的头),d'un épingle(大头针的头),d'un mât(桅杆的头),d'un compas(圆规的头),d'un marteau(锤子的头);tête de pavot(罂粟头)、d'artichaut(蓟头),d'oignon(葱头),等等。人们从中看到核心形象所起的作用如同一个真正的派生词缀,初看起来它只是在构形成分的句法行为上不同于派生词缀。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人们还是能发现它的义素结构也有别于派生词缀:如果说语法派生词缀原则上由类义素组成,那么形象性派生词缀则是一个属于内容之符号学层面的义素模型。

P. 吉罗研究了*形态语义场*(champ morpho - sémantique),为建立这类形象模型的清单做了准备。他给出大量实例,以支持

该派生符号学类别观点，故对这一问题我们不再多费笔墨。

b)如果说形象命名可以比做派生的话，那么另有一种程序则使我们联想到借用法。该程序在于将一个承载其全部核心义素和类义素特征的话语序列从一个同位意义集转移到另一个同位意义集。

c) **转义命名**

在前面关于填字游戏的定义实例中，我们有意少列了一个例子，即与定义“grain de chapelet”（念珠）相对应的命名答案是“ave”①。这种命名显然不符合用以确定名称和定义之对等关系的条件，因为在 tanière（兽穴）与 habitation（住所）之间有一种对等性，而在 grain（谷粒，外部世界的一个物体）与 ave（一种经文）之间则没有对等性。这样一种命名，从形式程序看，不属于我们刚才考察的任何一个命名类。因此我们必须把这种命名视为一种内部借用，视为话语切分成分（词位或词组）从一个语义域向另一个离它较远的语义域的转移。

转义名称——我们建议这样称呼——可谓不胜枚举。只需再看一下《理特雷词典》的词条“tête”（头）就能找到：

| | | |
|---|---|---|
| tête de loup | ≃ | espèce de plumeau |
| （狼头） | | （一种羽毛掸子） |

① 念珠的小珠子，原意为圣母经。——译注

tête de Turc ≃ sorte d'enclume
(土耳其人的头) (一种铁砧)
tête de nègre ≃ couleur...
(黑人的头) (……颜色)
tête à tête ≃ service à thé,
(头对头) (茶具)

还可以加上50来个关于植物、贝类、鱼类、鸟类的名称,如:

植物名:tête d'âne (驴头→ 大埃雷)
tête de coq (鸡头→驴食草)

贝类名:tête d'araignée (蜘蛛头→骨螺)
tête de serpent (蛇头→凤螺)

鱼类名:tête d'âne (驴头→大头鱼)
tête de lièvre (兔头→刺鲭鱼)

蛇类名:tête de chien (狗头→一种蟒蛇)
tête noire (黑头→一种游蛇),等等。

转义命名这个称呼看来适合于这一程序,只要逻辑预设成为其释义的第一个成分:tête de nègre(黑人的头),作为"人体的一部分"确实先于作为"颜色"的"黑人的头"。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与形象命名相对的义位命名这一名称或许照样适用:"黑人的头"是"人体的一部分",即是由两个义素核(或由单一扩展

形象)和从早先的语境分析中得到的全部类义素构成的词组;正是作为这样一个词组,"黑人的头"被用来命名某种棕色或灰色,这与 tête de canal(运河头)截然不同。虽然我们还需要阐明"黑人的头"在什么条件下能起到元语言作用,亦即被确定为某种颜色的对等物,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在这类情况下,转移程序始于义位,而不是形象。

说明:形象命名和转义命名之间的区分有助于阐明一个虽说次要但仍使词源学家不安的问题:如果说形象命名是从具体到抽象,那么转义命名也可以由抽象到具体(请比较:ave,"经文" > ave,"念珠")

如果不是从传递层面考虑话语的元语言运作,而是从信息接收和被传递的文本的分析这一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

1. 新的语境接收了被转移的义位,就会向该义位提供新的类义素($C_{1s}$);

2. 原初义位,亦即要用于命名的义位,用其核心义素和类义素构成新的命名义位的新形象:

$$(N_s + C_s) = N_{1s}。$$

从此,被转移的命名义位可用下式表达:

$$Sm(t) = (N_s + C_s)C_{1s}。$$

**说明**：有必要指出，将被转移的义位所包含的原初义素置入括号会严重干扰该组合，因为只有某些义素可用来行使这种元语言职能；而其它义素将被"悬置"。但悬置不等于消失，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它们的重现，话语的多线性运作将无法理解。

刚才我们使用了转移(transfert)这个概念。最后一个问题便是语义域的存在问题。语义域必须充分独立，以能证明转移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对此，我们只有对类义素的性质和作用做更深入的思考才能找到一些线索。

### d) 类义素的双重功能

前面有一章节从重复性和横组合延伸这两个方面对类义素做了定义。类义素的横组合扩展超过词位的扩展，从语义角度阐明了话语之相对同质的线性展开。我们现在的思考力图阐明话语的另一个特征，即"伸缩性"。此特征因扩展和压缩这两个职能的共同显现而得以确认，它逐渐展示另一种可以赋予类义素的新的功能，即构成语义域的组织框架。我们已经看到，只要两个长度不等的话语段可以被分别看做同一内容单位的定义和名称，这一事实就只有一个解释，即它们共同拥有几个相同的义素。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某种义素所具有的新功能，即分类功能。

为说明该新功能，我们选用了 A. 马丹(Martin)提供的例

子。在最近一次讨论会上，马丹阐述了南锡研究中心在同义词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为此他使用了 fatiqué（劳累）一词的同义场。在现代法语中，该词位的同义词，确切说是类同义词（para-synonyme），有 50 个之多。我们要使用的正是这个材料。

e） **形象名称分析**

清单的第一个子类是同时对上下文和构成该子类的词位的形象所做分析的结果：

brisé（断裂的）
rompu（折断的）
éreinté（伤腰的）
échiné（断脊梁的）
roué（受车轮刑的）
esquinté（毁坏的）
} "rompre"（折断）

vanné（簸扬的） "secouer"（摇动）
lessivé（洗涤的） "frotter"（磨擦）
moulu（磨碎的）
broyé（研碎的）
} "broyer"（研碎）
} fréquentatif（反复）

vidé (掏空的)
crevé (裂开的)
pompé (抽空的)
(比较:coup de pompe,
突然力乏)
épuisé (枯竭的)
époumoné(气短的)
claqué (耗光的)①
(拟爆裂声)

} "vider" (掏空)

这样一个清单,以及我们从中提取的子类,显然只能是近似的。出于一些在实践上明显的、但在理论上不能证明的理由,加之该研究的局限性,我们不能每次都能举出建立在透彻分析基础上的例证。清单若要完整,那它必须是透彻的双重分析程序的产物:

1. 一方面,清单预设了分布分析,后者使我们能将其看做一类可以兑换的、处于一个不变语境(或几个互补语境)内的词位。该分布分析旨在获取一定数量的、使义位得以构成的类义素,而我们知道,义位是词位包含的义素和从词位语境提取的义素之组合结果。这样,就 fatigué(劳累)这个具体词位来说,一个像下面这样的语境:

---

① 以上括号内译义为本义,在法语里均可引伸为不同程度的"劳累"。——译注

Après une journée de travail, je me sens…

（工作了一天之后，我觉得……）

能使我们提取为整个子类所共有的、同时又与语境意义同位的类义素："有生命"（/"无生命"）和"受动"（/"施动"）。"有生命"同位意义集由于该义素在主语 je（我）和 travail（工作）中重复存在而被证实；"受动"同位意义集则为过去分词的词尾变化和介词 après（在……之后）所确认。

说明：某些出现项可能需要做更深入的类义素分析，比如词位 crevé 就需要提取类义素对立"动物/人类"。

2. 另一方面，要从清单中提取一个子类，就需要预先分别对每个词位的义素核进行符号学分析。这就意味着要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分布分析，即把每个词位的所有可能的语境视为可变语境，为各个词位提取一个不变义素核。而后再对如此获得的义素核进行比较，而只有这种比较才能使我们发现核心形象具有一个或几个共同义素。我们刚才置于清单一侧的正是这些可说是假设的共同义素："折断"和"掏空"看来属于形象数目较多的一组；其它义素核则相反，它们的特征是共有一个在核心形象体系中相对次要的义素，即"反复"。

然而，不管怎样，一个为整个子类所共有的义素还是被提取出来了，即便是我们不自觉地用了动词形式来表示我们想要强调的义素：的确，所有列入清单的形象都呈现为动态，而不是静

态。为慎重起见——因为我们不太清楚能说明一个动词之特征的义素究竟是什么——，我们就用动作过程(procès)这个传统名称来称呼形象的动态特性。

f) **转义名称分析**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定数目的类义素：

| | | | | |
|---|---|---|---|---|
| peocès | + | animé | + | causé |
| （动作过程） | | （有生命） | | （受动）。 |

在出现相反证明之前，我们就把这些类义素视为清单上全部出现项(occurrence)所共有的类义素基。

该类义素基使我们能够引入一些新的清单子类并加以考察。它尤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转义命名的程序。因此，一组新的出现项：

| | | | |
|---|---|---|---|
| à plat | （平放的 | → | 累趴） |
| sur le flanc | （侧卧的 | → | 累瘫） |
| sur les genoux | （屈膝的 | → | 累倒） |
| sur les rotules | （弯膝的 | → | 累垮） |

可构成一个转义名称子类，但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承认类义素在命名程序开始之前已经框定。

人们立即发现类义素“受动”在该子类的构成中起着特殊作用。在上一个清单中，类义素“受动”是以过去分词词尾形式出现的，这是其最佳的类义素显现方式；相反，在本例中，它表现为子类中所有次要核心形象的共同特点。由此可引出两个更为一般性的看法：

1. 类义素“受动”所承担的特殊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了解到刚才确立的类义素基的内部结构。类义素“受动”是该类义素基的预设项，而类义素“动作过程”，作为“施动”，则是被预设项：于是，用于命名的、由类义素“受动”汇集在一起的诸核心形象实际上预设了义素“动作过程”，与后者对应的是核心义素层的一个形象，即义素“affaisser”(倒下)[“累趴下”(à plat)或“累倒”(sur les genoux)只发生在被预设的动作过程“倒下”之后；

2. 类义素 “受动” 在最后这个子类中起的作用与类义素 “动作过程” 在第一个子类里起的作用并无多大不同，因为两者都用于给核心形象分类，把一种分类学的成分引入符号学领域。

g） 定义分析

A. 马丹提出的“同义词”清单所包括的一些词位很难用我们提出的程序予以分析。如果说语境分析能使我们获取类义素，看起来比较容易实施，且总能证实已经得到的结果，那么符号学分析和对义素核心的阐述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当然，必

要时可以勿略历时性维度，从拉丁语中寻找能够揭示 fatigare 之原初义素核的词源。但这仍然是在无根无据的情况下肯定核心形象的恒定性，而在我们看来，核心形象是历史的，而不是像荣格(Jung)及其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是非时间的。

在这类情况下，可以考虑相继采用两种程序：

1. 如果描写的目的仅仅在于确立话语的同位意义集以对话语进行义位分析，那我们可以接受用同义词表述来代替定义这一词典编纂法来缩简清单。因此，当《常用词典》玩捉迷藏游戏，提出

rendu ≃ "fatigué, harassé" （劳累，精疲力竭）
fourbu ≃ "harassé" （精疲力竭）
recru ≃ "harassé de fatigue", etc. （累得精疲力竭），等等

这样的定义时，在上面限定的分析范围内，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清单已从 5 个词位缩简到 2 个：

fatigué （劳累）
harassé （精疲力竭）；

2. 为了描写一个经如此缩简的子类，人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程序，即从名称的定义着手分析名称。由此可达到两种结果：

a) 鉴于命名与定义对等，即两个纵替换关系项均有一定

数目的共同义素，人们可以认为定义分析将使我们了解名称所暗含的义素(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某些义素)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两种出现项的类义素基的组成原则上已为我们所知，所以对定义成分的分析有可能揭示无理据的、被视为抽象的，亦即没有符号学内容的名称所含之核心形象；

b) 这一对定义成分的探索所产生的结果是使我们能够扩大清单，并根据对等原则将清单所含出现词位之全部可能的定义引入其中。

被定义成分与定义成分对等这一原则的应用，只要不产生无法克服的困难，就有可能解决文件自动分析领域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就拿 J. C. 加尔丹(Gardin)提供的例子来说：通过预先对名称进行义素编码而得以确认的所有定义序列[如：arrêt provoqué par(由……引起的终止)]，均可记在命名项“inhibition”(抑制)之下。

我们还是来看看最后这个经缩简的子类。下表以更为简略的方式阐明该程序的各个步骤：

名称 “fatiguer”(使劳累)

| 程序 | 应用 | | |
|---|---|---|---|
| 第一个定义 | abattre<br>(使倒下) | par<br>(由) | la dépense de force<br>(耗费气力) |

| | | | |
|---|---|---|---|
| 第一个定义诸切分项的定义 | faire tomber (en donnant un ou plusieurs coups) quelqu´un qui est debout<br>(通过一击或数击)使站立者倒下 | | " activité causante "<br>(施动活动) |
| 对等义素 | "affaisser"<br>(使倒下) | "cause"<br>(受动) | ("procès" + "animé") + "causant"<br>(动作过程 + 有生命) + 施动 |

名称"harasser"(使精疲力竭)

| 程序 | 应用 | | | | |
|---|---|---|---|---|---|
| 第一个定义 | accabler<br>(压倒) | de<br>(由于) | fatigue(cf. schéma précédent)<br>(劳累)(参阅上表) | | |
| 第一个定义诸切分项的定义 | faire succomber sous le poids(使被压倒) | | faire tomber quelqu´un qui est debout (使站立者倒下) | par<br>(由于) | la dépense de force<br>(耗费气力) |
| 对等义素 | "affaisser"<br>(使倒下) | "causé"<br>(受动) | "affaisser"<br>(使倒下) | "causé"<br>(受动) | ("procès + animé") + " causant "<br>[("动作过程" + "有生命" + "施动"] |

说明：为能直接引用《常用词典》，我们在此分析的是动词不定式，而不是分词形式。过去分词词尾变化只是再次增添冗余义素“受动”而已。

该分析实例不仅能使我们发现定义所包含的全部类义素——这证明话语中冗余同位意义集的存在——，而且还能使我们找到核心形象的各个成分。核心形象与此前研究的一个子类都具有同一个义素“affaisser”（使倒下），这一现象或许只是偶然；但正是该现象使我们有可能发现诸核心成分，且这一发现颇令人满意。

程序一旦确定，我们便可继续分析清单上的其它出现项。分析的结果也可简单表示如下：

| 名称 | 定义 | | |
|---|---|---|---|
| halbrener | excéder<br>使超出限度 | de<br>由于 | fatigue<br>劳累，通过 |
| surmener | excéder - - - - - - - - - - - - - - -<br>trop vite ou trop longtemps<br>使超出限度 - - -<br>太快或太久 | de<br><br>由于 | fatigue (une monture), en la faisant aller - - - - - - -<br>劳累，通过<br>驱使（坐骑） |
| excéder | - - - - - - - - -<br>au - delà d'une limite<br>- - - - - - - - -<br>超出限度 | | aller - - - - - - - -<br>- - - - - - - - - -<br>做事 - - - - - - |
| 对等义素 | “dépassement(d'une norme)”<br>“过度” | “causé”<br>“受动” | “procès” + “animé”<br>“动作过程” + “有生命” |

说明:类义素“受动”若在定义中未被词化,将以过去分词形式出现。

人们看到,除了“体义素”(sème aspectuel)之外,对这组新的出现项的分析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内容。“过度”这一体义素是符号学层面参与话语接合的惟一标志。虽说如此,它在义位的一般结构中还是占据了属于核心形象的位置。

h) **义位的构成**

对该清单的分析,尽管就最初给它规定的目的而言可能显得有些冗长,但在我们看来仍不乏其用,因为它具体说明了命名程序,同时又明确了将定义归人起始词位清单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它指示了一个相对宽广的出现义位类是如何缩简为同一个义位的。为了把该义位同出现义位区别开来,我们可以将它称做构成义位(semème construit)。

在语义学概念化过程中取得的这种方法论进展,在我们看来是不可忽视的。“构成义位”这个概念使内容描写脱离内容与话语显现的最后联系,因为如此构想的义位是一个内容单位,它不受其词位外壳和语境的束缚。另外,从这样一个义位概念出发,诸类义素范畴的、同时也是语义层面的双重地位就尤为明显:一方面,诸类义素范畴奠定了意义显现的横组合同位意义集;另一方面,它们构成了用于表意域分类的纵替换一般框架。

下表将进一步阐明构成义位的内部分节:

| 在话语中的显示方式 | 构成义位 | |
| --- | --- | --- |
| 名称 | 类义素基 | 核心形象 |
| 定义 | 类属成分 | 专属成分 |
| 例:"劳累"的类同义词清单 | "动作过程"+"有生命"+"受动" | "折断"<br>"掏空"<br>"倒下"<br>"过度" |

对该简表的解释可以突出以下几点:

1. 名称的类义素基与定义的专属成分同一,构成了一些总体框架,可容纳众多在句法上大小不等的交际单位,也使我们能够较少顾忌地考虑对以话语的元语言变动为特征的文本进行分析的可能性;

2. 构成义位只是部分等同于出现义位。构成义位虽然原则上能穷尽所有的义素,但它仅满足于最少足够数量的义素,后者既显示为定义的专属成分,又表现为核心形象的构成成分。由此可见语义分析的必然取向,即它看重表意域的类义素结构,而不在乎损失符号学实体。

3. 符号学成分的作用也渐趋明确:它们的职能是标示类、子类,以及各义位出现项的专一性,以此缩小类义素框架的过高概括程度。最大程度的专一化是出于对全部核心形象的考虑。

每当这种专一化阐明了每个义位的独特性，新的范畴成分就已经显现，它们表现为若干名称或若干定义的共同义素，并如人们所见，形成几组义素核心。从此可以考虑一种新的分析形式，即风格学分析：此分析旨在确定一些符号学同位意义集和核心形象类别。眼下我们无意这样做，但我们还是想知道整个专属成分类是否具有一个共同特征。这些专属成分能用于验证被选中的义素核心，后者初看上去混杂无序，却要在构成义位中起到相同的作用。

i） **形象的同构性**

这样一个共同特征确乎存在，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义素，应视其为下列义素范畴的一个项：

| | | |
|---|---|---|
| euphorie | vs | dysphorie |
| （舒适） | | （不舒适）。 |

的确，像“折断”、“掏空”、“倒下”、“过度”［比较法语副词trop（太、过分）］这类符号学成分使定义专一化，或通过名称转移来丰富清单所列义位的对等类，其原因看来只有一个，即它们都被感知为“不舒适”。似乎在这些形象所处的感知层面，有一个主观的、本体感受的范畴前来与它们汇合，按照一种融入感知的先验推理使它们二元化。不管这类认识论思辨是什么，一个取自现代法语、而且与我们所研究的某些义素核心非常接近的例证：

gonflé vs dégonflé

(胆大) (胆怯)

就能说明在义位 fatigué(劳累)中仅义素“不舒适”得已显现的范畴之二分性。人们看到,最后一个例证中的两个义位由于类义素配置的不同而拥有一个不同于“劳累”的内容,但它们仍按照“舒适” / “不舒适”这样的范畴来接合。该本体感受范畴在备受重视的微观表意域之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事实已无需强调。

说明:此分析仅包含缩简程序,并不全面。在此,类义素基仅由义素“不舒适”规定,在不考虑狭义符号学因素情况下可转换成“某活动之令人不快的结果”。鉴于分析的不全面性,人们不能认为仅此类义素基就足以说明义位“劳累”的总体结构。

## 3° 同位意义集的确立条件

### a) 间接定义

至此,我们关注的焦点一直是在大小不等的话语序列之间寻找对等关系。前面提出的各种程序应能对付为数众多的难题:通过将各类短语、各种“转义”及迂回表达全部集中到同位意义层面,以解决与它们在话语中的存在相关的问题。不过,另一些尚未研究的扩展形式和由此而来的定义形式也是可能的,但它们使对等关系的确定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

1. 作为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博絮埃（Bossuet）的一个著名的和谐复合句：

统治天界　　　　　　而且<br>
主宰所有的帝国、<br>
独享荣耀、至尊和自在　　　　　　者，<br>
　　　　　　　　　　也是<br>
　　　　　　　　　　　　　　惟一<br>
以号令天下君王　　　　　　并<br>
随时都能给他们<br>
严厉可怕的惩罚为荣者。①

一看便知，该定义——因为此例所涉均系定义——可以综合为名称“上帝”（Dieu）。但对我们来说，这样一种综合之所以显而易见，只是因为它预先设定，在描写之前我们已经了解某种关于基督教和君主政体的文明，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个“寄存语义域”。然而，这不是内容描写的正常条件，而各种分析程序，顾名思义，就是为了避免先验知识。

---

① 译文以原例形式为尊。原例如下：<br>
celui　　qui règne dans les cieux<br>
　et　　de qui relèvent tous les empires,<br>
　　　　à qui seul appartiennent<br>
　　　　la gloire, la majesté et l'indépendance,<br>
　est aussi<br>
le seul　　qui se glorifie de faire la loi aux rois<br>
　et　　(qui se glorifie) de leur donner, quand il<br>
　　　　lui plaît, de grandes et terribles leçons.<br>
——译注

所选用的序列，从其本身看，提供了下列情况：

a）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些类属对等标志，即“者”（celui）和“惟一……者”（le seul）。它们使我们能获取类义素“施动者”和“独一性”，但我们看到，这两个类义素过于笼统，所以人们无法为该定义设定一个名称；

b）另一方面，该序列由一系列扩展型性质形容语组成，这些形容语被认为可以通过一定数量的性质限定项使类属成分专一化。

我们认为这样的定义是间接（oblique）定义，因为在类义素基不充分的情况下，它从仅有的（或几乎是仅有的）专属成分出发，预设了与名称建立对等关系的可能性。

2. 第二个例子将进一步说明困难的性质，因为该例不附带任何先定语义文化背景。设有一个填字游戏定义：

Un coup de langue lui fait clore un bavardage parfois familier.

先决问题是：人们能不能分析这样的定义，并找到能综合该定义的命名项？如果不能，该不可辨认性的原因又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尝试对此定义做一个形式分析。该分析表现为一个句子，包括：

功能 F:fait clore (使停止、关闭),
与

3 个施动者
- X:lui(他、她、它)
- Y:un bavardage parfois familier (有时太过随便的闲聊),
- Z:un coup de langue (舌头一动、一句挖苦的话)

a) 为了突出定义的结构形式,我们先做一些转换。

类属成分用于确立与名称的对等关系,它以前指替代词"lui"的形式出现在定义中,仅包含类义素"施动者"[①](actant)。鉴于功能"fait clore"含有义素"施动"(factitif),故能将 X 这个假接收者转换成主体发出者。这样便得到不完整话语:

X 停止(关闭) Y。

但是,功能 F 若要从施动转换成非施动,那就必须同时将作为主体的施动者 Z 转换成辅助者 - 境况施动者。故完整的话语应是:

X clôt Y à l'aide de Z

[X 借助 Z 停止(关闭) Y]

① 语法上指动作的主体,即发出动作的人或事物,亦称施事;在叙事分析中,指在情节中扮演的角色(人或事物)。本书作者在普洛普、苏里奥和泰尼埃的分析基础上将施动者概念引入文学话语分析,把施动者归为六大类型:主体、客体、发出者、接收者、辅助者、反对者。详见后面"关于施动者模型的思考"一章。——译注

说明：此例的价值过于有限，不允许我们列出转换规则，故而保留其简单形式。

人们看到，经如此转换的定义更加清楚地展现了一种新的间接定义变体：不够充分的类义素基的专一化不是由性质来限定的，而是由谓项评述来实现的。

b） 除了间接性，新的定义还显示了另一个特点，即定义中没有一个成分是先验地单义的。且不说有待发现的 X，无论是 Y 和 Z，还是 F，均能同时属于几个同位意义集。因此，"un coup de langue"和"un bavardage parfois familier"可以是扩展词组，也可以是转义名称，最后还可以是二次定义。就 clore 而言，它可表示"arrêter"（停止：clore le bavardage，停止闲聊），或表示"fermer"（关闭：clore le bec，封住嘴）。

因此，这样一个序列的解读困难有两种：

α）作为语境，定义并不属于同位意义集，因为，即使话语中任何一个构成成分被看做可变项，人们也不能设定其余部分为不变项。因此，我们就不可能获取通常靠冗余信息来识别的类义素；

β）任何寻找对等项的程序均无法应用。假设 Z 项的单义性得到保证，它就可以纳入定义：

X clôt Y（un bavardage parfois familier）à l'aide d'un coup

de langue.

X 借助舌头一动停止 Y(有时太过随便的闲聊)

但该定义依然是谓项评述定义,亦即间接定义。如果仅假设定义 Y 向我们揭示 bavardage parfois familier(有时太过随便的闲聊)的命名项是 lettre(信),间接定义

X clôt la lettre à l'aide d'un coup de langue

X 用舌头一舔封上了信

或许能道出其诀窍。

**说明**:人们至少会说:此类定义过于特殊,代表了一种不多见的技术,即交叉填字游戏技术,并不能说明话语正常运作的特点。然而我们之所以选用这一例子,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很正常:诗歌、神话、梦境这类微观域常常都是以间接方式显示其意义的。我们认为揭示困难比回避困难更重要。

交叉填字游戏技术考虑到了这类困难,故有意帮助读者,为其额外提供了一个办法,即让读者有可能渐次发现与要寻找的名称相对应的字素,这是因为所有的命名项是纵横交叉分布在一个无所不知、先验地构建起来的方格图里的。该方格图,因其在能指层面提供的帮助,故相当于博絮埃的复合句解读在所指层面预设的寄存语义域。然而,正是该方格图及其渐次重建形象地概括了描写步骤的要领。

b) 关于世界的评述

寻找话语同位意义集时所遇到的难题，在探求间接定义的过程中尤为明显。这些难题的解决需要一个文化解码格栅(grille culturel)。但这样一来，客观语义分析的可能性本身就成了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自动分析就需要这样一个格栅，但就我们现有知识而言，还发明不了这个工具，这表明描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分析人员的主观评估。有些专家，而且是最杰出的专家——我们想到的是巴尔－希勒尔(Bar－Hillel)——，甚至断言，如果做不到在电子存储器中存入关于世界的全部评述，自动翻译就永远产生不了高度准确的译文。

在建造资料分析语言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夸约(M. Coyaud)在其最近发表的论文《资料分析语言》中，阐明了现在造出的最好语言都无法摆脱的内在矛盾。这些语言的建造实际上遵循了两条原则，而这两条原则互相排斥，表现为两个程序的不均衡组合。其中一个是给储存器配置一门先验分类学，代表了所选领域的文化或科学解码格栅；另一个是构思一套方法，使储存器通过定义，特别是间接定义的归并而自动丰富。如此获得的资料分析元语言几乎总是不可靠的，其特征是概念重复，类义素交迭，总之是缺乏逻辑严密性。

这种状况看来是话语本身的运作方式所致：话语运作有时是直接确认对等关系，有时则使用间接逼近法。因为任何一个义位被定义为一个义素集合体，其表现形式可通过符号来改变，

但它的特性还见诸于它所能受到的全部限定成分，即能够赋予它的全部品质，或者它所接受的全部谓项评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关于世界之象征物的评述事实上不可胜数。诸如“可适用于尼禄”这样一个交叉填字游戏定义，只要愿意，便可将其同“暴君”联系起来，当然它也符合其它许许多多性质形容语，因为与尼禄相关的事物实在太多！

这种情况可以称做事件性定义（définition événementelle），但就确定间接对等关系的可能性而言，它已达到了极限。纳瓦尔（Nerval）记忆中的那个“葡萄藤与玫瑰花相连”的地方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为定义由象征层而承担了，其事件特性被实体化，成了一个其时间和地点无人知晓的事件的“独一性”。如果说纳瓦尔这个记忆可以挽回，那么谁又能猜出“今天手里拿着一个鸵鸟蛋在海德公园散步的”确是巴尔－希勒尔，而不是九百万伦敦人中的另外一位？

c）  **文体的封闭性**

从这一角度看问题，不但是自动分析，而且任何内容分析都显得不可能。幸好，各种定义几乎从不是孤立出现的（交叉填字游戏、谜语等特殊形式除外），它们总是并入一个文本，而文本内所讲述的事件虽有可能出乎意外，但决非无缘无故。弗洛伊德（Freud）的一个例子（《诙谐语》）能使我们看到问题的难度，同时告诉我们应到哪里去寻找答案：

一个贩马的向一个卖马的兜售一匹坐骑：

“如果您骑上这匹马，早上四点出发，六点半就能到普雷斯堡。”

“早上六点半我们到普雷斯堡干什么？”

在这个故事里，第二个同位意义集几乎是本义的，它显然是预设——这正是引起精神冲突的条件——第一个非本义的同位意义集的存在。因为任何“具有中等智力和受过教育”[利法泰尔(Riffaterre)语]的听众，只要他接受游戏的形式规则，都会力图并本能地理解这第一个同位意义集。不过，该同位意义集包含某些为其不知的事件成分。比如他可能不知道普雷斯堡是布拉迪斯拉发(捷克城市)的旧名，也有可能这两个地名他一个都不知道。同样，被假定的信息交换发生时，马贩子和顾客所处的地点他全然不知，两地相距有多远就更无从知道了。尽管如此，听众还是马上领悟到该距离很长，两个半小时能跑完这段路程的马一定是匹快马。所有这部分“本能的”知识与相关序列所含事实毫无牵涉，需要强调的是该知识不可能来自于事件，而只能获自于整个语境，即使该语境只提供一个简短的介绍：一个贩马的向一个卖马的兜售一匹坐骑……的确，语境通过其所含信息总量，并借助一个句法字素(:)(口头交际时称做超切分音素)，极有可能预告：

a) 一个待传达的信息；

b) 说话人将是马贩子；

c) 评述主题将是坐骑；

d) 谓项将赋予评述主题某种优点。

我们看到，期待中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于语境同位意义集，即在一匹坐骑可能具有的优点类里选择一个可变量。然而，由出发和到达这两项实际显现的信息所赋予坐骑的只是谓项“移动”。因此，该信息的真正功能已一清二楚，即借助谓项“移动”，在马的品质纵替换类里选择一个同该谓项相容的类属项并使其专一化，而整个事件序列最终便是马的间接定义：

“Le cheval est (un cheval) rapide.”

（此马是一匹快马。）

现在我们对认知思维的步骤有了更好的了解：认知思维的步骤是演绎推理（因为此马是匹快马，所以它要跑的距离一定很长），所以人们用不着真正知道所叙述的事件。故此，从方法论上讲，这一事实对语义描写极为重要。语义描写摆脱了一个最严重的障碍，它一开始就可以确立一个可靠的同位意义集，以安置那些最奇特最出人意料的形象。

因此，间接定义，即使是事件性间接定义，都可以被赋名，只要这些定义处在一个同位意义集文本内，该文本必须具有足够的密度和长度，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信息应足以建立起非同位意义序列的类义素框架。塔辛·于杰尔（Tahsin Yucel）的论著《贝尔纳诺[1]的想象世界》（Imaginaire de Bernanos）证明，在阅读

① 法国天主教小说家（1888—1948），主要作品有小说《在撒旦的阳光下》、《欢乐》、《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穆赛特新传》；评论《月光下的公墓》、《真理的丑闻》。其小说主要反映了宗教信仰和道德罪人之间的冲突。对其作品的结构语义学分析详见本书最后一章“一个描写的样本”。——译注

作品时，人们发现对词位 mort(死亡)做出限定的、故与该词位相容的性质形容语数目迅速减少，而且这类形容语的清单很快就完全截止了。此时便可开始一项新的工作：只要同一些形容语在文本的其它地方重复出现并能互相取代，那么借助这个稳定的语境，我们就能发现 mort(死亡)的新名称，比如 boue(污泥)、ennui(厌倦)或 solitude(孤独)。这样，我们就能逐步制作一些程序，以确立越来越可靠的同位意义集。

文本的同位意义特征和自我封闭倾向为语义域探索提供的种种可能性，已被让·杜布瓦对失语症患者话语展开的研究所证实。在南锡应用语言学国际研讨会(1964)上所做的学术报告中，他论述了横组合多义现象，强调了连续文本的特殊性，即文本越长，冗余现象就越来越多，引入的信息就越来越少；而且，鉴于作者所偏爱的结构重复出现，文本会同时展示一套独立的次代码(sous - code)。

文本因信息枯竭而封闭，这一封闭性使文本具有个人言语特征，因为文本所包含的名称受限于而且只受限于文本中出现的定义，以致文本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微观语义域。话语的这一语义属性在有限的文本和封闭的表意域之间设立了一个等式，从而使部分描写合法化。至于如何描写那些开放的、信息层出不穷的语义域，该属性并没有提供最终的答案。

### d) 从个体文本到集体语料集

个体文本的个人言语特征并不能使我们忘记人类交际活动

的一个特性，即其社会性。故必须扩大讨论范围，确立这样一个原则：一些个体文本，只要它们是按照能保证其同质性的非语言标准来选择的，那就能组成用于分析的语料集，且可以认为该语料集具有足够的同位意义特征。

为了对这样一个集体同位意义集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我们来看一个微型语料集例子。该语料集是普瓦提埃大学法语语文学学生就斯坦因（Stein）投射测试完形题做出的回答。完形题给出句子的开头，要求学生完整这些句子。引发序列是：

Mon destin est…
（我的命运是……），

回答是命运的定义性补语，按下列类义素分布：

bon (10) vs mauvais (11)
（好） （坏），

déterminé(9) vs ni déterminé ni indéterminé(4) vs non déterminé(9).
（确定） （既非确定又非不确定） （不确定。）

说明：其余的回答(7)或是事件性定义，如：

d'enseigner la philologie （教授语文学），
de vivre en France （生活在法国）；

或是些“独特”回答：

d'être diabolique (做个恶鬼)、
de remplir des tests idiots, etc.
(做愚蠢的测试题，等等)，

这些回答不难分类，但考虑到叙述的条理性，我们还是把它们搁在一边。

隔了15道问题，出现一个不同的引发序列，表述略有不同：

Jean pensait que son avenir…
(让觉得他的前途……)

该序列引出的回答极易分类：

bon(12) vs mauvais(25)、
(好) (坏)
déterminé(9) vs non déterminé(6)。
(确定) (不确定)

说明："déterminé"(确定)还可分析为"dépendant de lui - meme"(由自己决定)/"dépendant des autres"(由他人决定)。我们还注意到，avenir(前途)与destin(命运)的情况不同，并没有引起"独特的"回答。

e) **同位意义集与变化**

人们不难明白，在此具体例子中，语料集的非语言同质性应该是什么意思；把五十来个个别回答汇合成集体语料集，所依靠的是被测试者的一组共同特性，亦即他们同属一个语言集团，同属一个年龄段，而且具有相同的文化层次和处于相同的"测试情景"。

而在语言方面，我们之所以能将全部回答汇集起来，并把它们视做属于一个同位意义类别的定义，是因为引发序列中有类义素"future"（将来）和"jugement"（判断）存在，这些类义素可以从命名项（命运或前途）和谓项（是或觉得）提取。人们看到，类义素"将来"可以说敞开了选择性纵替换关系类"确定"/"不确定"，而类义素"判断"则包含了回答"好"/"坏"。

这里考虑的步骤与前面解决填字游戏问题的程序相反，是从命名项到定义项，但这无关紧要。而且人们看到，如果从命名项出发，填字游戏的设计者会很容易地造出同等数量的定义："可好可坏"、"常常不可捉摸"就是命运之典型的填字游戏定义。

经这样设定之后，在一个集体同位意义集内的个体变化就成了一定数量分等级的选择：

1. 在类义素基内：

a) 在以下类义素范畴之间进行选择：

确定 / 不确定 vs 好/坏;

b)在已经选定的类义素范畴内,再在接合该范畴的类义素之间进行选择:

正 vs 中性 vs 负;

2. 在一个以某个类义素或类义素组为特征的构成义位内,可以选择这个或那个具体出现义位。这样,若决定把"将来"归入"坏"类,该决定可由下列专属义位来显现:

| | |
|---|---|
| compromis | 受到损害的(19 例)、 |
| gâché | 糟糕的(1 例)、 |
| brisé | 破碎的(1 例)、 |
| sombre | 暗淡的(1 例)、 |
| sans joie | 没有欢乐的(1 例)。 |

这个例子促使我们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调和语料集的同位意义要求和信息的个体或集体变化。信息的这种变化最终处在我们所知道的两个层次,即语义学层次和符号学层次。

1. 语义学层次上的变化。像此例中出现的类义素组,如果其成分由两个不同的类义素范畴组成,即两个属于语义学层次内不同类义素系统的类义素范畴,那么该类义素依然表现为一个分等级的、且能产生一些显现单位的类义素束。的确,人们可以预先

判断“将来”是好是坏，但条件是该“将来”必须被认为是确定的或可以确定的。因此，类义素基最终显示为一个下联结构：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说清楚何为文本的同位意义集了。文本的同位意义集是一个恒定的等级性类义素基，后者通过敞开纵替换关系列亦即诸类义素范畴，允许诸显现单位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并不破坏同位意义集，而是相反，只会证实其存在。

2. 符号学层次上的变化。这个或那个义位有可能在文本内预定位置上显现，但这种可能性受制于被选择的是这个还是那个义素形象。我们已经知道，符号学成分的专属性在什么情况下（提取某形象类的共同义素、以及这些形象为本体感受范畴所承担）能够被超越以便对内容进行同位意义分析。但是，符号学变化已经提出了另一种同位意义集的存在问题，这种同位意义集能在符号学层面上阐明一个文本内的义素形象之选择。

## 4° 话语的多义性

### a) 复合同位意义集的显现

至此，我们一直在话语的种种畸变中努力探寻话语显现的同位意义集平面。这一探寻虽属必要，但我们不应忘记：人类交际并不像有些人断言的那样是单义的或单向的。再用前面用过

的例子：

Le chien du commissaire aboie,

如果该序列所在的语境较宽，把 chien du commissaire(警长的狗或秘书)纳人可预见的两个同位意义集之一，那么，通过分离，几乎总能阐明 chien du commissaire 具有"动物"特性，还是具有"人类"特性。但第三个答案照样可能，因为人们不难想象一篇多少有点长的叙事，在这篇叙事中，狗和秘书之间的选择可以保持空缺。

这类歧义表达——人们马上会想到果戈里的《鼻子》——，尽管表现为一些刻意追求的修辞手法，但仍不失为自然语言的正常运作特征。因此，下列信息：

Cet homme est un lion(此人是头狮子)

在我们的社会背景中，始终是单义的：由于同位意义集的特征是类义素"人类"的冗余性，lion(狮子)只显现义素值"勇敢"。相反，在一个狮-人社会中，该序列只会证实人和狮子的对等关系，而且在更大的语境里，还能看到以人和狮子的存在为共同参照物的义素之重复。

如果认为此类二价现象(bivalence)不过是所谓"古代"社会中的话语属性，那就错了。我们的日常社会交际时刻都在散布大量的神话内容，对此，罗朗·巴尔特有过出色的描绘(我们

吃的不只是“牛排炸土豆”，而且还是一部分“法兰西特性”）。当然，这种神话内容不同于“原始”话语；但它之无可争辩的存在证明话语的显现往往是多向性的。

因此，从客观上讲，内容分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承认这种必然性，在某些情况下，同一个话语含有若干同位意义平面。而后是必须从结构上对这类二价现象做出解释。这类二价现象，在我们看来，主要是因为一个或几个类义素范畴的组成项在话语中显现时拒绝分离所致。如果按习惯做法只考虑最简单的情况，二价现象可定义为类义素范畴（如“人类与动物”）的复合接合项之无规律的间隔显现；在这些间隔中，类义素范畴展示一些自主平面，这些平面时而属于两个同位意义集中的一个，时而属于它们中的另一个，时而显示有关类义素范畴的正项，时而显示它的负项。任何一个文本只要满足这些条件， 我们就认为它显现一个复合同位意义集（isotopie complexe）。

b） **文学领域的双重象征**

像这样把正常情况下是分离的义素项混合起来的做法被视为一种修辞手段，往往成为某些文学类别的特征。因此，波德莱尔（Baudelaire）称自己是：

> ……一间满是枯玫瑰的旧闺房，
> 里头散落着一大堆过时的时装，
> 惟有哀怨的粉画和苍白的布歇的画，
> 散发着开启的香水瓶的气味，

他这样说无非是在类义素范畴的两个项之间建立起对等关系，从而使两者并合：

外在（内容） vs 内在（内容）。

继接受这一对等关系之后展开的话语将是一个双重同位意义集，读者将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对闺房的“有形”描写中提取出所有能够保持和展现一开始就设定的第二同位意义集亦即诗人内在世界的义素。

更长一些的诗体或散文体叙事也是如此。无论是现代文学神话创造者维尼（Vigny）的《摩西》，还是加缪（Camus）的《鼠疫》，叙事中某些特殊的地方会出现二价复合接合，从而促使读者同时在几个同位意义平面上进行解读。

由此可以引出另一个问题，尽管它已经不完全属于语言学范围。波德莱尔是闺房，兰波（Rimbaud）是醉船，此对等方式与一位辛巴武士是狮子、疗养院里的一位病人是拿破仑这种对等方式显然不同。有意识地追求的复合同位意义集结构很容易与被赋予社会或个人神话的话语之无意识运作形成对立，而且我们也不难把文学理解为一种意识游戏，这种游戏通过揭示隐藏的同位意义集为我们提供审美愉悦。的确，有些文学类别，甚至有些“写作风格”，虽经历了各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但仍然适合于这样一种解释。然而，有人会想，即使是一些极端情况，也就是说当类义素范畴的复合接合项可用公式明示，从而清楚地显

示出双重同位意义集的解读途径时，在这样构成的新的同位意义集平面上出现的意外义素是否会摆脱作者和读者双方的意识控制。诗歌交际，一旦超越有意识和无意识之区分，本质上可以说是由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来承担的交际。

### c) 同位意义集及其解读

话语中的复合同位意义集由说话人有意造成，还是在说话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位于其中，均不会改变话语显现的结构本身。相反，有意建立的重迭同位意义集平面由于使用了明显的人为方法，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语言现象。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后来的深层心理学（Tiefpsychologie），都习惯于在任何交际活动中力求区分信息传递的两个平面，即显现平面和潜在平面。在我们看来，这一区分如果涉及从运作意义上理解的话语，那它就不见得有效。一方面，只要受话者同时是信息的接收者，那么，一切都已在话语中显现；另一方面，在话语中，一切都是潜在的，也就是说都是内在的，因为话语总是代码化的，而译码则完全是接收者的事。

如果背弃百年来语言一直被看做一套完善的、为说话人和受话人所共有的代码这一明显的事实，而去探究日常口头交际，那就会发现，即使在最佳条件下，日常口头交际也是困难的和不完整的。因此，梦者解读不了自己做的梦就毫不足怪了。对这一失败的解释无需求助于潜在平面的存在：不少语言学家起码私下承认，连续阅读叶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绪论》不无困难，

而又很难责怪他在该书中有意加进了第二个意义解说维度。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解读的主要困难在于发现文本的同位意义集并能始终处于其中。

如果有必要用术语来强调两个并存的同位意义集之间的对立，我们建议用*文本*(texte)和*元文本*(métatexte)这两个术语，因为较之显现平面(plan manifeste)和潜在平面(plan latent)，它们不会引起太多的麻烦。文本和元文本的区分可能仅出于操作上的考虑，其依据——至少一开始——也只是共同的感觉和交际的"一般"判断。的确，从这一观点看，梦文本在梦者看来既是可读的，也是异常的，甚至是荒诞的，而元文本则是不可读的，但经过解读分析后会显得合乎情理。同样，下列文本：

le soleil noir de la mélancolie　（忧郁的黑太阳）

是可读的和荒诞的；相反，它的*另一个我*(alter ego)，即元文本，则是不可读的和明晰的。只要理性的读者被代之以一个想象中的读者，一个必然会颠倒诸定义项的读者——一位神秘主义者、一个炼金术士或任何一个被授予宗教奥义的人——，上述区分的有效性就会立即显示出来。由此看到，我们没有遵循弗洛伊德关于话语潜在平面和显现平面的定义，其中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一个文本的存在是语言的，故是客观的，而用来裁定这样一个文本之属性的标准却是解码者的个性(个体可变量)。

我们努力阐明话语本身的结构属性，与此同时，我们还建议通过话语展开过程中诸类义素范畴的复合项之显现来确定话语

的双重同位意义集。所以复合同位意义集是一个可能显现的话语类别的区别性形式特征。经过单独分析，每个显现话语将能阐明显示其特征的诸复合项的义素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确定话语中显示出来的两个同位意义集。在前面使用过的 le chien du commissaire 这一例子中，类义素“动物”将确立依靠文本显现的正同位意义集，而类义素“人类”将确立显现于元文本的负同位意义集。在每个具体场合，文本和元文本这两个概念能得到限定，所以它们在继续有效的同时，将失去其随意性，也就是说，将受制于读者的主观判断。

这一详细描述使我们看到了复合同位意义集在话语中的不同显示方式。大家知道，布隆达尔在表述其基本语言系统观点时，除了使用复合(complexe)一词，他还引入其它两个名称，即正复合和负复合，而其中一项在总的意义接合中占支配地位。

基本系统的互补接合项，亦即正复合和负复合项，从语义研究的现状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视其为立论有据，还很难说。不过，引入这两个项看来能够建立一个较大的框架，可用来对拉康博士在精神分析上使用的、其重要性为人皆知的自我接受①(assomption)概念进行语言学解释。因此，布隆达尔的观点允许我们从结构上区分复合同位意义集在话语中的三种运作方式：

① “自我接受”是法国精神分析家拉康(1901—1981)提出的关于幼儿自我认同，成为“主体”(sujet)之过程。据拉康称，6—18 个月的幼儿在“镜映阶段”接受同类，尤其是自己在镜中的形象，预感到自己身体的统一性。这一认同是“自我”的雏形，之后通过语言使其获得“自我”功能。——译注

1. 复合同位意义集的两个构成项保持平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说话人和受话人完全“接受”两个同位意义集。仍以辛巴武士为例：

$$\frac{\text{人}}{\text{狮子}} \simeq \frac{\text{正}}{\text{负}}。$$

这是一个平衡的复合同位意义集；

2. 复合同位意义集的正项占主导地位，因为话语的两个参与者完全“接受”正同位意义集，部分“接受”负同位意义集：

$$\frac{\text{兰波}}{\text{醉船}} \simeq \frac{\text{正}}{\text{负}}。$$

此例涉及正复合同位意义集。

3. 同位意义集的负项占支配地位，因为说话人完全“接受”负同位意义集，部分“接受”正同位意义集。以杜邦先生自认为是分枝吊灯为例：

$$\frac{\text{杜邦先生}}{\text{分枝吊灯}} \simeq \frac{\text{正}}{\text{负}}。$$

这是负复合同位意义集。

说明：“正”与“负”显然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两者完全可以颠倒使用。

布隆达尔并不像我们此刻所建议的那样在话语显现层面上感知基本结构,而是在语言系统层面上领悟该结构的。对其著作稍有了解者都知道他的见解,即基本结构体现了一种集体意识,对建立自然语言分类学起着重要作用。在他看来,那些所谓原始语言的特征就是频繁使用复合结构,面文明的进步则表现为复合结构转变为二元逻辑结构。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态度有些简单化和极端化,因为它企图只用一个标准来总的定义一些语言集团,而不是对一些能在任何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特殊上层建筑领域做出规定。无可否认,有些集体元语言的特征的确表现为偏重复合结构,喜欢使用对立重合或由列维-斯特劳斯阐明的中介结构。但是,如果从法语中随便选出少量义素形象并加以分析,结果表明,这类复合结构存在于任何一个表意域(例如现时的多价逻辑),不同之处仅表现在这个或那个语言集团对该结构的使用上。

话语同位意义集的单一性或复合性还取决于个体的变化。从说话人角度看,其话语的同位意义复杂程度因其个人的语言结构特点而异。从受话人的角度看,会出现一个感受问题,即同时对两个信息进行解码的能力问题。本人有过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不期遇上一位老朋友,当时他因局部脑溢血而失去了感知作为第二同位意义集展示的诗歌意义的能力,可他依然记得乃至敏锐地——如果不是说可悲地——意识到这个变得难以捉摸的元文本的存在。这个例子使我们明显地感觉到,神经语言学研究应能证实包含两个共生却又自主的层面的双重同位意义传递,并更加明确地规定这两个层面的并合和分离条件。

# 语义域的组织

## 1° 意义的内在域

### a) 双重认识论方法

在阐明了任何描写，特别是任何语义学理论建构的元语言特性之后，我们汇集了少量用于建立最小意义构成单位（终端成分）的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考察了这些成分在内在和显现层面上的配置，而且，只要有可能，我们还提出了能阐明这些较大单位的新定义。

现在我们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前是从终端成分着手来探索意义领域的，现在则必须从相反的角度考察意义领域，即从总体上考虑表意域，尝试建立一些能覆盖表意域之基本接合和区分的新概念。

这两个连续步骤，一个是构成，另一个是分解，应该殊途同归，构成一种以内容为对象的语言描写理论。但在目前，这样一种理论仅仅是我们的需求和希望之投射，因为所提出的命题往往是假定性的，而目前还缺少能证明这些命题有效或无效的部分分析（analyse partielle）。

b) 归纳与演绎

在这一新的认识论方向上，还须重复我们提出的第一个二分法，即语言的两个基本层面划分。我们区分了两种义素，核心义素和类义素，它们分属于两个自主的语言层面，即符号学层面和语义学层面。尽管探索过程中我们尝试了某些理论方法，但这一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仍以归纳推论为基础，因为核心义素和类义素是根据它们在话语中的显现方式来定义的。核心义素用于在话语中构成义素形象，见诸于被称做词位的句法单位；相反，类义素则在更大的句法单位中显现，这类句法单位至少由两个词位合成。为了提取这两种义素，必须考虑两个程序，这两个程序应适用于大小不等故等级不同的话语序列。

这样一个定义虽然有效，但还不完整。首先，它是通过显现方式来定义显现之前的被定义项的。其次，只要该定义保留其归纳性，它就要受制于可能证明它无效的部分描写之随机性。也就是说，为了能够把义位定义为核心义素和类义素的显现组合，而把显现定义为语言的两个层面即符号学层面和语义学层面的结合，我们必须通盘接受前面的定义，在语言认识论上明确设定这些定义的构成范畴，从面用它们的先验性来确保相关的构成有据可依。

这样提出问题之后，我们发现，在对语言的

符号学　vs　语义学

这两个层面做出裁定之前，必须确证——哪怕是原则上确证——语言概念、语言中被保持下来的内在与显现的对立以及层面概念的构成依据。

在前面诸章节中，我们始终将语言分成被理解为内在系统的语言和被感知为显现过程的语言。这一区分事实上已成为一种经典区分，故比较方便。现在需要明确的是：在专门的语义学理论之一般结构中，能在什么意义上继续使用该对立。

我们的全部理论思考的中心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假设：从最小意义单位出发，就能成功地描写和组织越来越大的意义集合。然而，这个被我们称做义素的最小单位并没有特定的所在，它只是在同其它东西的关系中，只有当它属于一个意义结构时才能被想象和描写。

因此，将义素置于感知之中，置于一个构成意义的所在，我们便发现义素因同时参与两个表意集而获得了某种存在：在义素范畴内，义素通过分离显示自己；而在被我们称做义素形象（figure sémique）和义素基（base sémique）的义素组内，通过与其它义素并合，它又得到了确证。

故此，义素同时属于两个表意域，从操作上考虑，这两个表意域可称做内在域（univers de l'immanence）和显现域（univers de la manifestation），而实际上它们只是意义的两种不同存在方式。意义只有被接合为分离结构才能显现，而只有当意义显现时人们才能谈论它，因此内在域和显现域的关系是互为前提。

这两个域互相约束，构成了我们现在能称之为语义域(univers sémantique)的东西。语义域这个名称或许能取代语言(langage)一词，后者因被滥用于哲学和文学领域而含义不清。

我们做了以上这些预备性说明，现在可以更深入地探索语义域，寻找新的定义成分。

c) **内在域探索的经验论方法**

我们说过，义素只有成为义素范畴的一部分，配列成意义的基本结构时才能被视为意义成分。此时我们可以说这些义素范畴构成一个集(ensemble)，而我们所使用的层面概念只是确认这个集被二分为两个子集，而这两个子集分别称做符号学层面和语义学层面。

集这个术语对我们没有任何约束，可以说它不过是实录我们的无知。的确，我们不知道诸义素范畴是否被全部组织成义素系统，不知道这些义素系统是否覆盖诸范畴(比如符号学层面的嗅觉、触觉等范畴)，也不知道此类范畴是否构成诸系统的系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义素范畴是一个系统集，并借助范畴和层面这两个术语显示等级平台。而惟有以后的义素分析才能决定范畴和层面的结构性接合方式。

这可能就是暂时用来解决内在域诸层面内部组织问题的简便方法。不过，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提醒语义学家们谨慎对待"集"这个概念，它似乎受到当今某些语言学派别的偏爱。我们

不否认这一概念的可操作价值，但有必要指出，在总的分析程序中，它只具有暂时的表述作用。比如“清单”(inventaire)这个概念，如果它有利于界定一个有待分析的类别的范围，以便随后将其简化为系统(或数个系统)，那它不过是“集”的一个术语变体；但是，如果视清单的构建为描写的最后理据(ultima ratio)，那它有可能变得有害无益。具体结构(structure concrète)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社会学领域，人们往往乐于拿具体结构与抽象结构(structure abstraite)，也就是系统结构对立。

d) 系统与词素

人们也可以尝试重新引入被丢弃的古典逻辑术语类分(division)和划分(partition)，从认识论角度出发，在产生结构概念的层次上考察问题。结构是一个总体被视为可分成义素的轴；对其内部组织做出规定的各种关系或是反义关系(并合与分离)，或是下义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关系能够独立地显现：我们甚至把用于连接异质范畴成分的下义关系称做“下联关系”。

根据上述回顾，我们认为，关系可用于构成两类结构，即系统结构和词素(morphème)结构。系统结构由一些接合项构成，这些接合项是一个共同综合轴的一些部分，使用的只是同质意义成分。在这些同质意义成分中，一个义素范畴与其自身的义素保持上义关系，而与更高等级的义素范畴保持下义关系，成为它的一个义素。词素结构则相反，它们由一些意义成分构成，这些意义成分惟它们的共同综合轴和下联组织是确定的，而它们自己或属于一些系统，或属于一些异质范畴。第一种情况所涉及的是被视

为轴的总体之类分，第二种情况则是同一总体的划分。

再来思考内在和显现，可以说，任何义素都同时参与两个不同的结构：系统结构和词素结构。

说明：人们不能由此推断：系统的特性是内在性——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而显现总是词素结构的。人们将看到，话语中的施动者结构是系统在词素上的投射；反之，比如分类学上经常使用的词素 corps（体、身体）就用于分类（列维－斯特劳斯），这迫使我们将其视为一个内在模型。

上述考虑允许我们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对内在域的各个构成层面做出规定：在进一步了解它们的结构组织以前，它们应被视为由义素范畴和义素系统组成的词素结构。因此，内在域被分成两个层面，即符号学层面和语义学层面，而这两个层面的构成轴从总体上规定了每个层面，故分别等同于下列元义素范畴的两个对立项之一：

extéroceptivité（外感受性） vs intéroceptivité（内感受性）

## 2° 意义的显现域

### a） 内容

一个颇为诱人的做法（我们已经做过尝试），是把叶姆斯列夫对内容的形式和实体的区分应用于我们刚才确定的符号学层

面和语义学层面的对立,同时不应忘记叶氏区分的相对性及由之带来的操作性。如果从认识论方面看问题,我们就可以说内容的实体构成一个背景,该背景接合为数量有限的人类思想范畴,而后加上一些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成分,使意义得以显现。但是,对于描写性语言的构成,这样一种"世界观念"并非绝对必要。我们只需说,两个内在层面即符号学层面和语义学层面的结合就能显现这样的内容。不过,这样一种显现要得以充分实施,就必须越过两个阶段,满足两个条件:

1. 在显现中,两个层面必须结合,也就是说在分属不同层面的最少量义素之间必须建立某种关系,使诸异质成分组合。我们称这种组合为显现(manifestation),从而限制了此术语的含义;

2. 这样获取的诸内容组合还必须返回表达(expression)层面,找到表达之平行的、但不同构的组合,从面以互为前提的方式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显现。我们认为这是以话语形式完成的意义显现,它使内容表现为一连串意义效应(effet de sens)。

说明:对表达平面的平行描写将该平面设想为表达之形式和实体的结合,故它不要求任何音素的生理体现,也不产生任何听觉"意义效应"。我们认为这一描写能令人满意地阐明所谓的内在语言。

现在,我们就来分别考察一下意义显现的两个必要条件。

1. 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的同时接合构成话语，且被视为最终成果，这在理论上不成问题。所以，对于应该从中得出的全部语义学结论，我们将在以后予以讨论。

2. 显现被定义为异质义素的组合，这就引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即义素间关系问题。

a） 关系通过符号学层面和语义学层面的结合奠定了内容的显现，此关系是这两个层面互为前提，这一见解看来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由于词化关系的存在，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例如在法语里，词化关系表现为连接词，如"et"（和）、"ou"（或），或者表现为关系副词，如"plus"（更多）、"moins"（更少）；此外还要加上所有可能的或已经实现的词化类义素（连接词、名词等）或类义素组。换言之，元义素或类义素的显现不一定有符号学成分的介入。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有两种显现单位存在：由异质层面的结合产生的义位（sémème）和仅显现类义素组合的元义位（métasémème）。

承认有两种结构类型的义位存在仅仅证实——而不是推翻——显现过程中核心义素和类义素互为前提这一假设。的确，义位构成了显现之基本层面，人们可将其等同于逻辑学家的目的语（langue - objet）。元义位并不处于该层面， 因为元义位在预设该层面的同时，预设了符号学层面。

因此我们说，显现之时在语义学层面和符号学层面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是互为前提关系，而这是构成意义基本层面的必要条件。至于次要层面，由于它们预设了基本层面的存在，故能

包含一些仅显现类义素组合的单位。

b) 属于同一个内在层面的义素间关系之性质引出另一个问题。在我们承认的三种基本关系中,看来只有下联关系才能用来解释义位的内部组织,这一点已被一定数量的部分分析所证实。我们已经知道,并合关系的显现是在义位和义位类之间建立整体或部分对等,它阐明了话语的元语言功能。分离关系也应被排除在义位的描写工具之外,因为惟有义素分离才能用于说明其义素组织可能相同的两个义位之间的意义差异。如果承认义位内存在分离关系,那我们只好放弃文本的义位分析,采用已被我们拒绝的词位程序。的确,词位是一个运作模型,而不是内容的一个描写单位。

**b) 组合体**

我们看到,内在和显现的简单对立还不足以对语义域的两个互补方面做出规定。一旦我们不再把显现等同于话语,而是视其为语音或文字序列的"具体表现",内在域和显现域就呈现为两个相似的模型,并以不同的方式说明同一现象。这两个模型确有不同的内部组织,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一些类似于连通管的东西:内在域可根据显现来重建;显现应能由内在域演绎而出。与内在域构成规则相对应的,应是显现域的生成规则。

的确,如果我们视内在域为一个义素范畴集,那么显现就形同这些义素范畴之接合项的组合体(combinatoire)。如果说义素范畴的配列是系统的,那么它们之接合项的义位组合将属于

词素性质。

通过逐步引入了一系列限制，我们实际上已经确立了此组合体的构成规则。这些规则可概述如下：

1. 义素范畴集被分成两个子集：由核心义素组成的子集E，和由类义素组成的子集I；

2. 任何显现单位应至少包括两个义素；

3. 两类显现单位可以组合，它们是义位和元义位；

a) 仅从子集I演绎出来的组合体构成一组元义位语料集；

b) 使用两个子集I和E的组合体构成义位语料集。语料集中义位的组合应该使每个子集至少有一个项出现在每个义位之中。

4. 各子集由二元义素范畴组成。不过，显现之时，每个二元范畴因其可能的接合方式而展示6个不同项。所以，与内在域的一个二元范畴对应的，是显现域的6个可能的不同义位。

c) **策略性选择**

这样一种语义域观点，若要应用于内容分析实践，就需要预先对内在的符号学和语义学层面进行哪怕只是部分的描写。而

在实施这一预先描写之前,也需要考虑如何从策略上为描写选择一个最佳深度平台。

在前面的思考过程中,我们发现,所选择的义素构成平台因需要描写的语料集之大小而异。与人们一开始可能想到的相反,当语料集扩大时,义素就更具概括性,其数量就会因之而减少。所以,如果只考虑描写一种自然语言或这种语言的一个共时状况,那么义素范畴的数量就会增多。相反,如果人们决定公设一个内在域,以剖析多种自然语言或同一种语言的多种历时状况,那么义素范畴的数量就会减少,虽说减少的幅度相当有限。

因此,倘若需要在一个高度概括的层面上进行义素描写,并同时解决——至少在理论上——对所有应用语言学门类至关重要的语言可比性问题,那也必须考虑到义位显现层面上可能出现的困难。内在域越简单,显现域就越复杂,因为可组合的义素越少,每个义位的词素结构就会越复杂,越乏味。

d) **义位语料集的开放性**

显现域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特点,即在这种或那种自然语言中,在可显现的内容和实际显现的内容之间隔着一条鸿沟。甚至是近似的计算告诉我们,一个相对有限的义素集能产生以百万、十亿计的巨数义位。显然,无论哪一种语言都不可能穷尽其理论组合体,且都给以后的历史显现留有绰绰有余的自由度。列维-斯特劳斯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语义域观点能消除数量

有限的社会结构之封闭性和这些结构所属历史之开放性之间的明显矛盾。所以,一般地说,一个语义域的义素模型是封闭的,但它的义位素材则是高度开放的。

说明:不过,我们注意到,虽然任何显现义位语料集都是不完整的,但这对该语料集的描写所必需的义素集之规模毫无影响。在理论组合体范围内,显现义位四散分布,义素范畴的数目应该不可能有任何减少;相反,清单的不完整性倒有可能增加这些范畴的数量。

e) **抽象义位与具体义位**

构成义位的义素组合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它们的密度不均等。因为,组合体能产生一些仅由两个义素接合的义位,但也能生成另一些义位,这些义位在它们自己内部产生一些义素项,这些义素项代表各个义素范畴的任何一种接合。故此,义位的义素密度就按级介于两个极之间,第一个极所含义素最少,仅两个义素,而第二个极所含义素数目与描写所使用的二元义素范畴总数相符。这样,作为一个数量范畴,密度就能用做一种评估标准,借以判断义位多少具有的抽象性或具体性。这样,不考虑义素的符号学或语义学性质,义位"关系"(relation)或"速度"(vitesse)就是抽象的,而像"雨"(pluie)或"结构"(structure)这样的义位看来就是具体的了。

我们对义位抽象度的评估可能性感兴趣,是因为密度的变化说明了任何话语的展开特征,且能直接从中得出一些实用的

结论。或许有人会说这只是关于话语运作的理论看法，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信息接收者能同时解码和领悟——仅就一个义位而言——一个有20多个义素的词素结构。抽象，亦即信息接收者为筛选传递的信息并只取其必需者而做出的努力，在我们看来，是所有层次上的话语运作特征：在《语言基本原理》一书的开头几页，雅各布森正是用“抽象”（不管人们怎样称呼它）解释了代码的经济运作方式和音位的简略性。

抽象无疑会使内容贫化，但它同时是交际活动为确保意义传递的确切性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不像某些“具体”哲学那样为其感到遗憾，而是必须像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那样接受它；在对抽象做出确认后，我们只感到高兴，因为它使哲学，乃至“具体”哲学得以构成。

义位因其抽象的内容而已经被词化，还是悬置某些义素，亦即剥夺义位之密度过大的限定成分而使它们抽象化，这都无关紧要。交际的这一本质特征使义素简单化程序合法化。此程序在组建构成义位时已予研究：构成义位的组建表现为交际过程中对语言活动的模拟。

与简单化程序相对立的，应该是同样必要的复杂化程序。我们发现，非常抽象的语义微观域，比如数学语言，在显现中并没有词化足够数量的义位，而且数学话语的隐含意义不允许直接转入语言自动操作。这样就必须制作一些机器语言，比如算法语言（Algol），以充实和从内部“催化”话语。俄国承担设计文件自动分析语言的数学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复杂化程序应

用于抽象话语，就能制作一种元语言，这种元语言近似于任何数理逻辑学意义上的“语义学”的形式化。

故此，形式化需要简单化程序，也同样需要复杂化程序。它不完全等于前者，也不完全与后者同一。

f) **不相容性**

如果说由于我们提到的原因，在这种或那种自然语言中实现的组合体无法穷尽它所包含的理论可能性，那么它的显现还要受限于一系列不相容性，后者排除了数量可观的义位组合。不相容性可以有两类，即形式不相容性和实体不相容性。

1. *形式不相容性*。大家一定记得，布隆达尔对他的基本语言系统实施6项一组的组合，看看不同的结构会有多少。结论是：在大约144个理论上可组合的系统中，实际只有64种组合是相容的(compatible)。这项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指示，但这些指示只涉及由于不相容性而被排除的系统之数量。当然，我们的立足点与布隆达尔的不一样，在我们看来，这些结构不再是内在的，而是显现的。因此我们认为暂时还难以根据不相容性提出一些构成规则。但作为一种提示，我们还是可以指出，比如包含某个义素范畴之中性项的义位，只有当它已经包含该范畴之作为义素的构成轴时，才可能显现。同样，一个复合项的显现需要满足一个前提，即要有包含经分离的“正”项和“负”项的不同义位存在，等等。这些例证已经表明，这类形式不相容性彼此关联，它们并不涉及这个或那个具体义位。

2. 实体不相容性。对实体不相容性的限定会提出一些经验性而不是理论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在进行哪怕是部分的义位分析时才能找到，因为义位分析不仅使我们能对义位组合的不合语法性或不合词汇性，特别是对它们的不合语义性做出评价。

## 3° 话语

### a) 词化与语法化

前面我们已对显现(manifestation)和话语(discours)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而与这两个概念对应的是内在域现实化(réalisation)过程中两个可加辨认的阶段：义素的义位显现必然伴随着义位的"话语化"，义位在"话语化"过程中与表达层面的可比接合项适配。

这个过程可以称做词化(lexicalisation)，如果人们像不少语言学家还主张的那样，认为语言两个层面的正常合并，就是构形成分即音素组合与义位即构成词位(语言符号)的义素组合的结合。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语言代码的现代描写程序必须将分析分解成许许多多越来越复杂的子程序系列，而这已经使我们对话语代码化的复杂程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1. 在最好的情况下，构形成分不覆盖义位，而仅覆盖义位的义素核心，通过与其它类似构形成分的对立确保义素核心的负

意义(sens négatif),并间接地确保它的形象特征。如同元义位或属于分类体系的义位所遇到的情况一样,单义词位贴近它所覆盖的惟一义位: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该词位所包含的分类成分必然会超出词位范围。

2. 人们看到,与类义素基适配的句法成分比词位大,类义素也就只能通过邻近的、其本身能简化为构形成分类的词位构形成分的差异来辨认了。因此不应该把词化理解为义位变换成词位,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义位变换成人们有时候所说的语境词(mot en contexte)。

3. 最后,义位在实现过程中能同时与几个词位适配,这或是因为其核心形象的扩展,或是因为它以不同的名称或定义形式显现。鉴于此,词化过程混同于语法化过程,所以词化和语法化只是看起来容易使用的两个操作性概念,其实两者虽在理论上彼此不同,但在产生话语的交际过程中,会因程序互相交错而混淆。

**b) 表达的差异与内容的同一**

显现单位和交际单位之间缺少同构性(isomorphisme),这就重新提出了古老的同义关系问题。只要人们能够视语言为符号系统,并把这些符号——用我们的术语说是词位——看做构形成分与义位的结合,问题就显得比较简单:构形成分的任何语音差异都会造成不可避免的意义差异,所以,顾名思义,同义关系已被排除。

正是在形态学领域，这一过于绝对、或许只是表述不当的原则发生了动摇。在分析诸形态范畴时，人们不得不承认，不同的标记（例如法语的复数标记 -s 和 -x），只需拥有不同的语境分布，就能涵盖相同的内容成分。

因此，一个标记只要在两个不同结构层面上被实现两次——第一次是表现为音位对立，第二次是表现为音位段对立——，第一个标记的区别性作用就会被第二个差异的出现所取消。因此，在某些条件下，两个标记会在组合中互相抵消：

$$x + (-x) = 0,$$

表达层面的冗余性变化并没有造成意义差异。因此，同义关系是可能的。

我们看到，能指的区别性差异概念的这种扩大，为内容分析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操作自由。只需把能指的区别性接合确定在语言和元语言这两个不同层面上，人们便能认为逻辑定义项能与被定义项同一，且又不背离结构语言学之根本。断言同义关系不可能存在，这是必需借助能指的区别性接合来阐明意义显现的必然结果。因此，这一断言不再与元语言活动相斥，因为元语言活动超越各种形式的接合，旨在发现诸同一性，亦即发现语义域有序化之必要条件。

困难的事情做了，简单的事就不在话下了。如果我们有权

设定义位同一性是可能的，那么义位对等的出现条件，也就是在不同义位中显现的一定数量义素的同一性条件就更容易说清楚了。我们就从这一角度出发，考察一下从词位环境提取的类义素的验证程序。付之于分析的交际单位，一方面包含有待从中提取义素核心的词位，另一方面包含一个与该词位相容的语境类。当我们断言这些语境的一个子类拥有一个共同类义素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不考虑表达变化的情况下假定内容的某种不变性，一种透过意义差异的义素同一性。为了使这样一个断言合法化，就必须在另一层面上记录下一个新的差异来取消观察到的变化所产生的效应。这另一层面恰是整个交际单位，而不只是由诸语境变项构成的子类。整个交际单位由两种离散性构形成分组成：一是词位的语音外壳，二是封闭的语境构形成分子类。鉴于这两种构形成分的离散性和限定性，我们可以认为它们的组合会产生能指差异；用任何一个词位取代被研究的词位（除非此处也涉及一个可替换类），都将造成意义差异。

这样我们就遇到了两个能指差异，亦即两个标记，而这两个标记彼此抵消，故我们能说，我们为所选语境子类先验地假设了义素同一性，该同一性是可能的。的确，表达层面的分析不可能告诉我们所设类义素的内容是什么，也不允许我们说 -s 或 -x 是法语的复数标记，而语言学领域的形式主义者做的正是语义学研究，但他们同儒尔丹先生①一样，自己却不知道。

---

①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的喜剧《贵人迷》中的主人公：巴黎大富商，一心想当贵族，却被人耍弄，自己却蒙在鼓里。——译注

内容层面上有同一性存在，这一断言在表达层面产生了初看起来难以预见的影响。刚才我们对这类影响做了强调，这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没有必要。但对我们来说，此举的重要性在于把同一性原则引入语言学思考，该思考基于索绪尔的最著名公设而只涉及差异，但任何内容分析少了同一性原则就不可能实现。在我们看来，关键问题是证明，表达层面上没有什么东西能阻碍以不同方式表达的相同内容的存在。这样，对等概念就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对等概念被定义为义素的部分同一，它说明了话语的元语言功能，并使语义分析本身成为可能。

c） 交际

我们已经看到，与词化现象紧密相关的是语法化现象。的确，话语不仅是意义显现的所在，而且也是意义的传递手段。通过对显现的研究，我们看到了使交际成为可能的各种配列。这些配列本质上是反复性的。我们因之观察到一种类义素的展开如何导致话语同位意义序列的组成；还看到了建立起间隔联系的义素冗余现象所起的作用。

从这一角度看问题，人们就能完全理解为什么有一定数量的内容成分仅用来维持交际，用来担负雅各布森所阐明的、总体上等同于语法功能的寒暄功能（fonction phatique）。

要使话语中的显现意义摆脱，至少是部分摆脱维持交际这份工作，只需在构成一种自然语言的诸义素范畴中做一个其标

准不甚明确的选择，组成一个具有特殊运作方式和过量冗余信息的第二系统。

认为语法结构是一个相对于内容显现的第二系统，这并不意味着该结构是一个独立的内在域或内在层面，因为组成该结构的诸义素范畴毫无独特之处，且体现在各类义位中。相反，在显现层面上它倒是相对独立的，因为在此层面上，一定数量的义位具有较小的义素密度和特殊的构形成分，构成了一些承担着转移职能的语法词素。转移（translation）这个概念借自泰尼埃，它正确解释了语法词素的作用：承载词位，待其为一种子语言的目的项，并像足球运动员将球传给同伴那样借助语法冗余转移词位，直到达及受话人这一最终目标。如果表意功能和交际功能截然分开，显现被语法化就是一件上好的事情。遗憾的是，不管有的人怎么说，交际结构总是表意的，而我们已经看到，表意结构也在设法行使交际职能。话语的不断畸变由此而来。

照此理解的语法结构是双重冗余的。这归因于其形态范畴的重复，归因于在话语中成扇形运作的语法类别的反复性所产生的同位意义集。再者，反复使用同一些信息表达图式也是造成此冗余现象的原因。

然而，由于语法结构也是表意结构，所以，在运作中，它会产生另一种类型的冗余现象。语法结构是冗余的，因为在词位和转移单位中存在相同的义素（例如存在于词根和屈折词缀中的词干化语体或语式范畴），因为出现了一些再次限定语法类别的标志，还因为它的派生系统重新使用对已经就位的语法类别

(例如表示动词过程的名词后缀)做出限定的类义素。此类冗余现象是人类为能时刻听到世界的消息而预先付出的较高代价。清除这些过滥的冗余是内容分析的首要任务之一。但这项任务变得十分棘手,何况描写性语言的制作还需要避免两个极端,即过于简单和过于复杂。在这一问题上,如同在其它方面,我们必须在策略上选择一个最佳描写层面,以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

### d) 信息的组织

若想用几行字来概述语法结构的存在和运作方式,这将是不严肃的。因此,我们不打算客观地理解复杂的语法现实,而是向它投去一个语义学家的困惑目光。这位语义学家正在寻找最简便的方法来拆除语法这个巴洛克建筑,以便更好地观察该建筑中的代码化意义的展开方式。

从这一观点看,句法大厦看来是一座没有明确规划和目标的建筑,如同一个不分楼层和平台的堆砌物:派生词携带着词根类,并承担起句法"功能",通过让语法类别扮演不相宜的角色来改变它们;完整的句子被缩减并被用做简单的副词。分析者的任务就是从这类繁多的转移中找出话语研究的方法,把这些等级层次简化为交际的一个同位意义层面。

因为,句法虽说看起来像个旧货铺,却担负着一种必不可少的职能:它是用构成成分——这一次是义位——造就一个新的组合体,该组合体将生产用于评述世界的信息,而这类评述实际

上无法计数。组合体的成分已经给出，句法的贡献便是提出少量能使义位归入若干基本句法图式的构成规则。句法规则在于每次复制无数个同样的短剧，该短剧包括一个过程、若干演员和一个多少有点详细的情景。这一句法游戏或许有虚假之处，不符合"真实"世界中事物的存在方式。尽管如此，依靠语言象征体系，我们这样运用句法规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是也只能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我们组织世界的方式。

分析者面临的问题是要知道如何建立其自己的语义句法，该句法应能以不变项的形式反映作为可变项在不同等级层次上起作用的全部句法规则。因为该句法始终是语义的，尽管数理逻辑学家们幻想可以用一些无意义的形式进行运算。我们永远走不出语义域，所以我们所能做的最合适的事情，依然是感知一下同时作为意义和意义的条件被牵连进该语义域的世界。

可见语义句法内在于语言活动，所以只要内容是信息，也就是对世界的评说，或是对内在或外在世界的事件的叙述，我们就只有一步步阐明语义句法才能建立起内容描写的模型。现在我们就可以尝试给语义句法勾画一个轮廓：

1. 语言活动构建信息，看来它首先是在少量义位间建立下联关系，这少量义位是功能(fonction)、施动者(actant)和境况施动者(circonstant)。故此，语言活动主要是词素活动，将信息系列展示为算式(algorithme)。然而，一个系统性结构——施动者的角色分配——与这种下联关系(hypotaxie)相重迭并构成信息，该信息如同是对一个排除了交际双方即信息发出者和接收

者的世界之客观化模拟投射。

2. 元语言活动则表现为寻找和确立对等关系，故呈现为并合关系的显现。借助对等关系即义素同一性，该活动构建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如同是关于世界的补充情况，因此这些补充情况不再是简单的冗余信息；相反，它们可用来建立——借助新的限定和新的定义——语言对象。元语言活动由于其方法是系统的，所以必然导致对象的产生，而这些对象，归根结蒂，是一些词素结构。

从这一角度看，我们的句法活动所遵循的图式看来是一些内在模型，我们可用它们来感知和组织内容，而首先是呈现为义位的内容。

# 意义与话语

## 1° 显现与话语

### a) 显现域的二分

在上一章里，我们提出了关于语义域总体设想的框架：在我们看来，语义域可以被相继把握为潜在域、显现组合体和话语。但人们发现，话语的显现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生产信息的二级组合体。现在需要探讨的就是意义组织这个新的方面。

看来还是有必要先把语义域的二分引入显现层面，该二分与我们使用"外感受性"/"内感受性"范畴在内在域中所实施的二分相同。不过，两者的实施方式并不同一。

二分范畴被赋予了元义素地位，所以我们便能按照义素的推定源对义素进行分类，从而在内在域中区分了两个义素层面。眼下我们关心的是义位而不是义素的分类，故而不可能再视有关的范畴为元义素范畴：因为范畴的组成项把显现组织成义位，所以它们只能是类义素。

类义素范畴由于用来区分显现之两个基本维度，所以顾名思义，它可以被确认为具有普遍性：如果任何义位至少需要一个类义素才能显现，那么该类义素就是基本范畴的 I（内感受）项或 E（外感受）项。

因此，如果采用同一个义素范畴，但每次应用时都赋予它不同的地位，那我们便能获得两种既不平行又不矛盾的分类。举例来说，义素 lourd（假设它是一个简单义素）在内在域中完全是一个核心义素，也就是说它属于由 E 项限定的符号学层面；如果该核心义素显现于两个不同语境：

un sac lourd　　（沉重的袋子）

une conscience lourde　（沉重的精神负担），

那么，在第一例中，它与类义素 E 组合，而在第二例中，它则与类义素 I 组合。

如果沿用过去由安培（Ampère）确立的术语，我们可以用宇宙维度（dimension cosmologique）指称一个含有类义素 E 的同位意义集，或义位清单。同时，精神维度（dimension noologique）这个术语可用来表示含有类义素 I 的同位意义集或义位清单。

故而任何描写都应针对内容的宇宙维度或精神维度。对宇宙维度的完整描写将成为穷尽外部世界知识的宇宙学，而对精神维度的完整描写将在同样的条件下构成能完全阐明内在世界的精神学。由于语义域广无边际，所以无论是宇宙维度的显现，

还是精神维度的显现，特别是对它们的描写，都只能是部分的。因此我们说语义域可划分为微观域，与这些微观域的显现相一致的，是用于描写的有限语料集。宇宙维度的部分显现将被我们称做*实用显现*(manifestation pratique)，而精神维度的部分显现将被叫做*神话显现*(manifestation mythique)。此外，由于需要描写的语料集或预设一位个体说话人，或预设一位集体说话人，所以部分显现本身有时被视为个体显现，有时则被看做集体显现。

b）**基本同位意义集**

我们在显现层引入这一新的划分，初看起来我们只是使话语的辨读更趋复杂。由于词位的多义性，加之语法结构交错引起的层次混乱，话语已经陷入了词义之争，而且显示为一连串时而是实用的、时而是神话的无规则序列。

事实上，建立这些专属维度意味着基本同位意义集的确定，而我们将根据该基本同位意义集来选择一些次要同位意义集，借以确定微观域的显现是实用的，还是神话的。比如，整个拓扑系统，如同它在介词、副词等词汇中被词化并组构起维度的不同指示(deixis)一样，通过范畴项的简单调换就能被移入一个“象征性”空间(我们关于*层面*、*维度*和*同位意义集*的思考就是无可争辩的说明)。

c) 句法组合体

此前我们一直致力于把显现规定为一个义位组合体，而把义位的界定问题放在了一边。由于在狭义的语言活动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各种下联关系的展开，所以暂时没有任何据以确定义位间界限的标准。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核心形象能够扩展，即很容易越过词位为它们提供的“自然”界线（如：tête d'un canal，运河的起端），而后把重点放在名称和定义的对等关系上，结果不得不放弃与词位联系在一起的义素核心这一相对稳定的评价基础。

提出显现单位的界定问题，这并非只是间接地重提话语现实化（actualisation）和对象世界的构成这些已经陈旧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语言学家们总是抱有怀疑，且他们的怀疑往往是正当的。将义位定义为显现单位，这也是替一个新的句法组合体奠定基础，因为这些单位将是该组合体的可组合成分。

但是，说某个具体义位应被视为一个单位（unité），这不只是赋予它一个额外的类义素即“单一性”，用以把任何被称做“义位”的义素等级转变为拥有一个共同轴的词素结构，该共同轴将阐明对此词素结构的总体感知；而且是建立作为类别（classe）的义位，是把所有的显现义位的语料集视做单一的、被称做“义位”的类别。

所以我们说，显现域整体上构成一个可用“总体”范畴定义

的类别，而我们继布隆达尔之后，将该范畴接合为：

离散(discrétion) vs 整合(intégralité)；

此范畴在显现时实现其两个义素项之一，从而将显现域分成两个子类，第一个子类由离散单位组成，第二个子类由整合单位构成。从出现项(occurrence)的显现这一层面看，任何义位，如果受到它所内含的类义素"离散"的限定，均可被确定为一个单一对象，并在增添诸如"物"、"人"、"形象"、"象征"等新的类义素限定后，产生作为"意义效应"的"实体"概念，至于以后怎样称呼这个实体则无关紧要。人们还看到，任何包含类义素"整合"的义位都呈现为一个由诸义素限定成分组成的整合集。

以义位形式显现的语义域，如果被视为类别类(classe desclasses)，那它就显示为一个内在的、能产生更大句法显现单位的句法域。我们建议用*施动者*(actant)指称被定义为离散单位的义位的于类，而用*谓项*(prédicat)来命名被视为整合单位的义位。如此，一个谓项和至少一个施动者的组合就构成一个更大的单位，我们可以称之为*信息*(必要时可说得明确些，称其为*语义信息*)。

句法显现就这样组建成信息，表现为一个极简单的新组合体，现在需要明确的是该组合体的构成规则。初看之下，人们可能会说，信息的运作首先是设定一些离散的对象，然后借助一些多少被整合的、适用于这些对象的限定成分，来提供有关这些对象的信息。这是传统逻辑的观点，也可以是在运作过程中立即

被当场感知的句法活动之描述。然而，一旦人们不再考虑孤立的信息，而是探究一系列信息的意义时，看法就会改变，会发现事情恰恰相反，在一个语料集内进行的句法活动是根据对世界的事件或状态的评述来建立对象的。所以我们说，在总体语义域框架内，谓项先验地预设了行动项，但在一个微观语义域内，一个齐全的谓项清单则经验地构成施动者。

为了使句法显现略趋复杂，就必须对谓项类进行划分，假设一个新的类义素范畴，即实现"静态"/"动态"对立的类义素范畴。谓项义位能根据自身所含义素是"静态"还是"动态"，或提供关于状态的情况，或提供关于施动者行为过程的消息。这样，在任何语法化之前，谓项义位就像它在话语中实现时那样，或含有类义素"静态"，或含有类义素"动态"。比如在下列两个例子中：

Cette robe lui va bien （这条裙子对她很合身）、
Cet enfant va à l'ecole （这孩子去上学），

词位 aller 所覆盖的谓项义位在第一例中含有类义素"静态"，而在第二例中含有类义素"动态"。

我们仍用功能(fonction)表示"动态"谓项，而用品质(qualification)称呼"静态"谓项；我们还认为，作为义位组合体，信息一方面包含一个功能，或一个品质；另一方而还应包含数量有限的施动者，而信息的总和构成了意义的句法显现。

说明：施动者的接合问题尤为复杂，后面我们将从总体上予以讨论。

d) 虚构与“赘述”

在设立了几个有关显现组织的概念之后，我们已能察觉到一些基本的描写步骤：选择要描写的（实用或神话）同位意义集、义位界定程序和要应用的信息之构建程序。看来，继这一语义解码之后，显然应在操作上对动态信息和静态信息进行区分。这样一来，一个需要描写的文本所具有的同位意义集将呈现为一个双重信息清单。

功能谓项将动态维度引入意义组织，使微观意义域看似由几组波及施动者的变化组成。但是，如果撇开命令式和呼格——它们看起来像是语言之作用于世界的行为工具，其它谓项实际上只是一些模仿行为，只是一些对世界事件的叙述。另一方面，由于暂时我们对这些叙述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得到合乎逻辑的导引，所以我们只需要将它们视为虚构（affabulation）。这样我们说，根据一个宇宙同位意义集来对动态信息进行解码，这样的动态信息清单构成一个*实用虚构*；反之，如果用于构成信息的同位意义集是精神的，那么虚构便是*神话虚构*。

至于含有品质义位的信息清单，人们看到，如此预设的微观域显示出习惯性和恒定性。这些信息的作用不过是通过连续限定来强调它们所参照的施动者之存在。它们的清单实际上只是关于多少有点熟悉的人和事物的不连贯评述，所以我们用“赘述”（radotage）这个词称呼该静态信息清单，想必人们不会感到

奇怪。如同虚构,“赞述”可以是实用的,也可以是神话的,因所选同位意义集而异。

因此人们看到,句法显现无论被设想为虚构还是赞述,都能依靠它的各个单位即信息,构成一些不变的图式,以接纳有关“象征对象”即施动者的行为或存在的知识。

## 2° 话语显现

### a) 意义组织的语用基础

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下日常的实用虚构,便能从中辨认出话语中意义的组织所遵循的要领。如果说一系列真实行为在语言领域有一个平行的功能系列与其对应,这些功能模拟真实行为,从而内涵某种非语言的行为(faire),那么,单单一个义位,比如broder(刺绣),就能包含一整套功能规则,呈现为一种技能(savoir - faire)的名称。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例如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的神话“赞述”,它借助一个源自希腊的、故而没有内容的专名来归类,而看起来像是遵循一个顺序原则,从诸品质的总和出发,最后显示出能够产生一种“性格”。所以话语显现能从功能系列或品质清单出发,产生一些经过组织的集合体,这些集合体大大超出了句法强加的限制,而且只因能够被命名而表现为一些整体,亦即结构。看来这些结构在第一种情况下是词素结构,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系统结构。

这些结构早已被命名(broder),还是在话语序列显现之时

被命名(Iphis[①]),均无关紧要,因为它们也可能始终是不言明的,就像是命名所具有的几种可能性。暂时我们只需知道,在话语显现中存在着语义域的组织成分,并记住这些以命名为特征的成分属于意义的元语言运作范围,因而是或可能是由话语预设的成分。故此,我们称之为虚构或赘述的东西能内含一个顺序原则:对于其构成单位是信息的话语显现,原则上我们可以先替它假设一个内在域,话语显现之组织模型将位于该内在域,而对组织模型的阐述将是语义描写的任务。

b) 话语显示方式

初看起来,话语显现一般有两个特征:一是这些组织模型有多种显示方式,二是对这些模型的阐述分多个级别。

1.在顺利的情况下,"虚构"能呈现为一个实用或神话技能的完整算式,而"赘述"则表现为一个清单,即一种经过组织的实用或神话知识的结果。

2.最常见的情况是,"虚构"以省略的方式显现,只表现一些关于技术或神话的不完整的算式序列;而"赘述"往往是曲言的,表现为一些不完整的分类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描写的任务是把它们汇集起来,使它们服从一些能对所有这类部分显现做出阐述的模型。

---

① 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1645—1696)散文集《性格论》中的人物名。——译注

3. 虚构与"赘述"一样，最终都以分离的、神话性质的信息形式出现在一个实用显现之中，或者相反。我们可以说，这两种情况，一种是实用显现中的分散性神话信息，第二种是神话显现中的分散性实用信息。

这样，人们再次看到，话语显现的平衡颇为脆弱。在一个双重同位意义集中，每个信息有可能被同时解读为实用信息和神话信息，不过，这样一个双重同位意义集的运作只是一种特殊情况，虽说也见于某些类型的虚构，比如民间故事，但在多数情况下，复合显现是不平衡的，它或是正的，或是负的。因此，在日常交际中，神话以分散的形式显现，把首要位置让给实用考虑。相反，在梦或诗歌的情况下，实用则受害于神话的过分展示，而仅限于分散显现（例如弗洛伊德的二次转化[1]）。

如果把显现之不充分性诿诸于模型的缺乏，那就错了。部分显现，无论是曲言的，还是省略的，照样都需要以完整的模型为前提，后面我们还有机会提供这方面的例证。另一方面，某个显示方式可能与个体或集体说话人对这种或那种模型的偏爱有直接关系，不过现在谈论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

最后还有一点，虽说不言而喻，但恐怕还是有必要指出来，即宇宙维度和精神维度的区分非常笼统，而话语的显现，无论是实用的，还是神话的，均能分成许多微观显现域。对此我们应考

① 指梦的抽象概念转化为象征、语言或别的具体形式。——译注

虑在先，以便操作时有所防范。鉴于单单一个文本就可能同时牵扯到多种技术或多种分类法，所以描写不应该过于偏颇，比如说根据分散在实用交际中的神话信息来构建一个包含其运作方式的惟一模型。

c) 语义微观域

在进一步思考话语显现之前，有必要稍事停顿，以便对已经取得的结果做一个概括。我们对语义域所做的描写表明，语义域可以借助两个一般性模型来解释。第一个模型阐明内容的显现，第二个模型则说明显现内容的组织方式。

1. *内在域*：这是我们给一个模型起的名字，但我们只是提出了它的公理体系，其义素接合还有待描写。我们设定它能够阐明显现域。如此显现的内容，从其存在方式看，是一个义位组合体；从其显示方式看，它构成了品质的世界，犹如不透明的遮光板，上面能映出无数种意义效应。

2. *显现域*：显现域也服从于一个模型，此模型将义位组合成信息，以此组织显现域的运作方式。为此必须设定一个内在句法，以便借助一个非常简单的组合体来阐明各种类型的显现信息。

第一个模型由诸意义范畴组成，它为每个具体的义位提供义素投入（investissement）。句法模型则与之不同，它是借助诸元义素范畴来构成的，所以它不是通过出现义位（sémème - occurrence）起作用，而是通过被视为类（classe）的义位起作用，此

类义位与投入其中的严格意义上的内容无关。

因此，意义的显现分属两个不同等级层次的解释模型，故具有一种“双重分节”，需对其进行两种类型的分析。第一类分析旨在阐明义位内的义素投入，第二类分析是要说明投入内容之组织方式。可见我们眼下所关心的是思考这第二类分析的条件和寻找能使这类分析合法化的模型。

开始时我们仅拥有一个句法模型，依靠该模型，我们对应当如何构想显现域内的内容组织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首先感到吃惊的是句法模型之简单，即信息的构成成分为数不多，而且在话语展开过程中，给信息规定的量度也极为有限。因此，我们不无天真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不明白为什么在没有给话语显现规定时间维度的情况下，句子是话语的最大序列，成了内容之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组织活动的场所。再三考虑之下，我们发现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即句法活动的限度只能源自于意义的接受在客观上强加给它的条件。尽管在接受意义时，信息表现为连续不断的意义，也就是说它具有历史性地位，但是这种意义接受若要成为现实，那就必须把连续性转变为同时性，把所谓的历时性转变为共时性。共时感知，按照布隆达尔的看法，一次至多只能感知 6 个项。

如果像这样把可适用于所有显现层次的意义感知原则确定为基本条件，那么，在我们看来，不仅信息是一个非时间显现单位，而且显现之任何组织方式，也就是说从广义上理解的全部内在句法，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为描写而设置的内容配列。这样，

意义域就分裂成许多微观域，而只有这些微观域才能被感知、记忆和“体验”。的确，当我们就某事做某种思考时，我们把这个某事投射在我们面前，它如同一个简单的意义结构，仅包含少量的项。尽管接下来我们能够“深化”我们的思考，只确定一个范畴或一个项，并由此展示一些意义下联结构，但这一事实丝毫改变不了上述最初感知。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方法论思考阶段引入了*微观域*(micro - univers)概念：我们说微观域表现为一个内在模型，一方面它由可以同时感知为一个结构的少量义素范畴构成，另一方面，它能借助其下联接合项来阐明以同位意义文本形式显现的内容。

d) **微观域分类**

微观域内在结构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在此阶段，我们已能使用与现有的不同显现形式相关的材料对这些微观域进行初步分类，分类的依据是诸显现标准。我们已经看到，处于任何一个同位意义集的信息应分成两个不同的清单， 即功能信息清单和品质信息清单。我们说第一个清单构成了属于功能模型的微观域的话语显现，我们把能够阐明该组织方式的分析称做*功能分析*。第二个信息清单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微观域的话语显现，此清单可借助品质模型得到解释，为此面使用的描写程序可称做*品质分析*。

然后可以明确指出，旨在阐明功能模型的分析，如果是从实

用显现出发，那它将对技术微观域做出解释；如果它力图描写神话显现，它将揭示观念学微观域。至于品质模型，只要它们是实用显现的基础，就将阐明科学微观域；若从神话显现出发，所解释的将是价值论微观域。

如此，我们时而视语义微观域为内在域，时而视其为显现域，并对显现的两个主要类型及其可以预见的两种组织方式做了区分，故我们可以对语义微观域做初步的分类：

| 模型 / 显现 | 功能 | 品质 |
|---|---|---|
| 实用 | 技术 | 科学 |
| 神话 | 观念学 | 价值论 |

e） 谓项与施动者

至此，我们对信息和信息清单的考察都过于简单化，也不全面，我们所考虑的只是它们的谓项。因此，在我们看来，一个功能信息清单是一个功能算式，亦即产生意义的一连串功能；同样，一个品质信息清单看来构成了限定成分类，而这类限定成分虽然表面上是接续的，但实际上却遵循一个顺序原则，后者能使它们分门别类。之后我们建议承认模型的存在——我们认为惟其结构简单这一点不容怀疑，其明晰性有待以后的分析。模型的特征表现为两种不同的配列：一些模型属算法程序，故包含一连串功能；另一些则属于分类学，它们建立在并合和分离关系之上。这样一种假设构成了在一定语义微观域内进行内容描写的

框架。这个框架也许是暂时的。

问题的简单化在于我们撇开了与信息相关的施动者。因为连续的信息要被视为一个算式，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信息中显现的功能都归于同一个施动者。品质信息也一样，只有当它们包含同一个施动者的全部限定成分时才成为一个类。因此，现在必须重新研究这个问题，把施动者的多元性对信息和信息清单的影响考虑在内。

施动者和谓项的关系，在研究信息构成时已加以考虑，但在我们看来仍含混不清。

在单独予以考虑的信息层面，功能和品质看来是归属于施动者的，但在话语显现层面，情况则相反。我们看到，在话语显现层面，功能和品质一样，都能产生施动者；我们还发现，施动者被认为具有一种元语言作用，因为它们代表，甚至可以说包涵了谓项类。由此可见，我们设定的功能模型和品质模型也要受控于层次更高的组织模型，亦即施动者模型。

因此，我们应当对施动者的双重地位做如下说明：作为被投入的内容，施动者事实上是由每个特定微观域内的谓项建立的；作为句法子类，它们理应出现在谓项之先，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话语活动就是赋予诸语言实体以属性。因此有必要使施动者范畴化，亦即将"施动者"类分成几个"施动者次类"，以阐明它们的多元性；一旦被范畴化，施动者就能提供结构框架，便于我们对在显现微观域内进行谓项分析时分离出来的内容加以组织。

f) **施动者的范畴化**

无论在话语信息层面，还是在微观域之内，诸范畴能对以施动者的对立和并合形式出现的意义世界进行组构。但是，按现时的研究状况，若要就此类范畴发表任何明确的见解，恐怕只是一种奢望。在提出问题的两个领域——我们想到的是语言句法和逻辑句法构成领域，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因此，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打开案卷，汇入一些建议和预备性表述。最后几章所做的部分分析也只是探讨同一个问题的语用学方法。

法国的句法研究，从其敢于赋予施动者以语义内容（泰尼埃、马丁内）这一点看，也只是提出了一个经验解法，即一份包括3个施动者的清单：

| | | | | |
|---|---|---|---|---|
| 施动者 | vs | 受动者 | vs | 受益者 |
| (agent) | | (patient) | | (bénéficiaire)， |

而没有想到它们的范畴接合，比如，没有考虑到"受益者"并不预设"施动者"，而是预设"行善者"(bienfaiteur)。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建议是将诸施动者接合为两个不同的范畴：

主体(sujet) vs 客体(objet)

发出者(destinateur)　vs　接收者(destinataire),

必要时则用范畴混合论解释任何可能的施动者并合。比如话语:

Eve donne une pomme à Adam,

(夏娃给亚当一个苹果)

其中,主体夏娃是一个双重关系的起点。第一个关系是夏娃和苹果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夏娃和亚当之间的关系,夏娃既是主体－施动者,又是发出者－施动者。

另一个建议是必须对狭义的句法施动者和语义施动者做出区分。例如话语:

Eve donne une pomme à Adam,

(夏娃给亚当一个苹果)

Adam reçoit d'Eve une pomme,

(亚当从夏娃处得到一个苹果)

其中施动者的句法置换丝毫没有改变它们的语义分布,后者保持不变。充其量人们可以说,该句法置换游戏引发了某种风格学观相主义(即根据书写人在句法上对某些施动者的偏爱来使用叙事组织替换类),而这种观相主义正是近几十年来诸文学运动频繁使用的风格学手法之一。

有一个现象极为明显,现在就必须予以强调,那就是置换的共生性:一个接收者要转换成发出者,就必须在功能层面上同时进行置换以取消第一次置换所产生的结果。这等于说,致使施动者接合的范畴区分可以出现在信息的两个不同所在,在施动者层面和在功能层面都能做出这一区分。

### g) 逻辑句法与语义句法

看来逻辑句法所选择的是后一种解决办法,即把功能的定向问题置于功能层面。为了阐明施动者之间的关系,功能被赋予某个元义素内容,后者被概念化,称做定向(orientation)。因此:

x est au - dessus de y

(x 在 y 之上)

这类句子,其中功能(不管用什么符号标示)负责确定两个施动者的指示地位。句法一旦被如此定向,就可以不用考虑施动者(也就是"专名")的意义投人,但也会增加功能层面的困难,并将这些困难转移到命题演算层面。句法所选择的这一方法是横组合方法,而不是分类方法,它表现为一种代数操作,负责调控意义世界,如果该世界仅表现为对事实和事件的叙述。

一门语义学,倘若致力于模仿逻辑句法模型,那它很快就会走进死胡同。由于少了用于调控的功能项,它就会疲于描写无数有关世间事件的可能评述。巴尔 - 希勒尔的研究告诉我们,

任何记忆都无法储存所有关于世界的评述;任何合理构建的科学都不屑于考虑事件清单;而且,意义的接受和存储所处的客观条件也不允许这样做。因此,我们不打算赋予语义内容以句法展开形式,而是设法把句法简化为语义学,把事件化为结构。

所以,我们不得不同逻辑句法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该句法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方法论。因此,面对下列两个话语:

X est au - dessus de Y

(X 在 Y 之上)、

Y est au - dessous de X

(Y 在 X 之下),

我们所关心的,不但是如何表达转换规则,以便把这两句句子约简为仅一个语义信息,而且要在施动者层面上确定功能的义素内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同一些义素范畴既出现在施动者内,也出现在谓项中。比如这样两个施动者:

grenier(顶楼) vs cave(地窖),

它们拥有义素特性"être en haut"(在上)和"être en bas"(在下),这些特性与词化的谓项一样,说明了它们之间的拓扑关系。同一个内容的双重表达,即拓扑表达和指示表达,仅仅说明显现意义之一般存在方式。在功能分析或品质分析建立起施动者时,可以说该分析只是把语义内容从谓项类移至施动者类。因此,如果存在一些极普遍的施动者范畴,且这些范畴像我们已

经看到的那样既出现在功能层面又出现在施动者层面，那么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它们表达为施动者，而不是功能。这样，一个经过事先描写的语义微观域之内容将呈现为“演出”(spectacle)，而不是一系列事件。

h) **施动者范畴的语式特性**

在施动者范畴的运作方式中，我们认为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范畴的冗余性，因为在同一信息内部，每个范畴至少显现两次。第一次是通过它的一个项出现在每个施动者中；第二次是以它的两个项出现在连接两个施动者的功能之中。例如话语：

Pierre bat Paul　　(皮埃尔打保尔)

就是用范畴 S 的两个项即 s 和非 s 来显现该范畴的，显现方式如下：

$$A_1(s) \quad + \quad F(s + non \quad s) \quad + A_2(non \quad s)$$

[施动者 1(s) + 功能(s + 非 s) + 施动者 2(非 s)]

人们看到，这里遇到的是功能项和“主体”、“客体”施动者之间的一种形态-句法关系，是一种同范畴关系(用我们的术语说是上义关系)，因为它看起来时而是总体显现的，时而是用其一个项来显现的范畴之重复。

从这一角度看，信息最终不过是意义的基本结构在内容上

的投射，而这些内容是已经组织成施动者类和谓项类的内容，它们的结构在等级上高于义位类。这样一来，此前被我们确定为离散义位类的施动者就要受到某些补充限定，这些限定以元义素形式出现，将施动者组织成主体、客体、发出者或接收者；而被我们设想为整合义素内容的功能就由某些范畴来承担，这些范畴决定功能相对于施动者的地位，并构成作为表意事件，亦即作为事件之演出的信息。我们所说的*施动者范畴*，在我们看来，首先构成了赋予施动者的具体角色，似乎同时又是一些能赋予每个演出 - 信息（message - spectacle）以特定地位的语式范畴（catégorie modale）。在这一方法论思考层次，语义学的任务渐趋明确：它必须使用这些语式范畴，以简单的施动者结构之形式来建立有关语义微观域存在方式的类型学，而借助功能分析或品质分析（或两者兼用）程序予以描写的语义微观域的内容还只是一些变项。

### i） 一种语言认识论

在这一层次上确定意义组织模型的存在原则，这无疑超出了我们开始时的设想，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在设定认识世界的语言条件，故需要我们考虑某种语言认识的可能性。

此前，为了阐明显现义素组合如何构成意义单位，即作为离散语言对象的施动者和作为整合义素总体的谓项，我们引入了"总体"（totalité）这一范畴，有意混淆了语言学和认识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任何语言理论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元语言结构，还因为任何未经分析的元语言概念都可以归入

等级上高于语言学的认识论清单。

对信息结构的分析要求我们以稍有不同的方式提出问题。认为语式范畴承担着信息内容,并通过在诸构成语言的对象中建立一定的关系来组织该内容,这等于承认信息结构规定了某种对世界的看法。故此,“及物性”范畴可以说迫使我们设想诸施动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型的关系,设定一个施动者具有行动能力,而另一个施动者则被赋予一种惰性。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此关系看来不仅建立起交换,在两者之间设定一些对象,而一个是这些对象的原因,另一个则是它们的结果,等等。现在假定这些意义组建范畴的数目有限,而且如此构建的演出之类型学是可能的,那么这样一种建立在对信息结构透彻描写基础上的类型学就构成一个客观的框架,而在此框架内,与语义微观域同一的内容体现就是惟一的变项。认识世界的语言条件就此得以设定。

有人会说,这样一种见解对宇宙学意义的描写并无多大实际效果。但是,当涉及神话显现时情况就不同了。神话显现各种各样,诸人文学科对这类显现的分析并不可靠,哪怕只是因为分析结果不同构而不尽相似。只要语式范畴仅针对谓项,它们的作用就始终局限于表达和调控对世界的判断。但是,如果我们把语式范畴构思为谓项模型,同时又是施动者模型,语义微观域非按照它来组织不可,那么情况就不同了。

对语式范畴领域的研究极为有限,我们所掌握的只是几个所谓“情态”动词的样品——甚至还不是清单,而且它们还因语

法书而异。因此，在此问题上我们所说的一切当谨慎待之。我们从法语句法推知的两个施动者范畴表达为两组对立关系：

| | | |
|---|---|---|
| 主体 | vs | 客体 |
| 发出者 | vs | 接收者， |

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前者具目的论性质，后者具有原因论性质，因为前者是 pouvoir（能）的变体，而后者是 savoir（知）的变体。

说明：后面将出现“辅助者”（adjuvant）/“反对者”（opposant）这对境况施动者，它是对民间故事进行具体分析的产物。我们有意视其为 vouloir（意愿）的变体。

### 3° 形象显现与非形象显现

#### a） 一个例子：诗歌交际

我们重点考察了功能信息，后者使我们能够阐明施动者范畴并提出将其作为微观域组织的模型。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忽视品质信息的存在。品质信息的清单产生于话语显现，不难想象，这些清单只能用于描写由这类信息构成的施动者之义素内容，而且要确定真正意义上的施动者组织方式，还必须考虑到交织在同一显现中的功能信息。仅有品质信息组成的话语显现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话语只会原地踏步，随时都可能枯竭、终止。也许这正是许多语言学家有意无意将话语等同于语言横组合层面的一个原因。问题是究竟有没有纯品质的话语显

现，如果有的话，使其得以传递、形成交际的条件是什么。

此类显现的极端例子，除去语言活动的反常现象，看来就是人们所说的“现代诗”了。现代诗往往力求“废除句法”，亦即尽可能减少功能信息；此外，某些作品还不失为负同位意义集占优势的复合显现的实例。由于实用同位意义集被简缩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所以初看上去现代诗既是神话显现又是品质显现。

的确，在现代诗中，实用载体的不足是由神话显现的展示来补偿的。因此，把显现分割成义位的做法有利于神话平面，这样，诗歌义位——*意象*、*象征*、*隐喻性词组*和定义——便呈现为一些负形象，其界限也不再与实用平面的正义位界限相符。较之*负义位*(sémème négatif)这一表达，我们还是偏向*形象*(figure)一词，这不仅因为后者的分界标准似乎更为灵活，还因为在负显现时，发生的情况与平衡复合显现时不同：在平衡复合显现中，可以说义位先被设定，而后用于实用和神话显现；而在负显现中，义位的核心看来像是一些意外之事，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那些“修补用的器材”，它们仅因为在那里而用做其它，这个“其它”其实就是诗歌交际，也就是一定数量义素范畴的重复，这些范畴与内感受和本体感受类义素组合，构成了诗歌同位意义集。

在这类神话显现中，形象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们自身带有诗歌同位意义集的组成义素；另一方面，它们又充当义素中继站，亦即义素进行互相替换的所在。如此建立起来的对等关系把从交际一开始就负责诗歌冗余信息传递的基本义素范畴转

换成对应义素类(见下章)。的确,形象是一些义素等级,比如天(ciel)这一形象就带有“纵向”、“明亮”、“流动”等义素成分。诸义素之间使义素组成义位的关系看起来被转换成对应关系,对此现象,列维-斯特劳斯和迪朗都注意到了,并对之做了描写,迪朗还称其为同构现象(isomorphisme)。然而,在一个义位内部,这样一种转换显得不可思议,因为若要使其成立,那就只有把义素范畴的对应化视为第一事实,而把此类显现的义位结构看做是第二位的,还必须承认诗歌交际本质上是义素内容的传递,所借用的是词位,就像在另一个层次上,日常话语利用语法结构来显现内容一样。人们看到,对神话显现的描写远不是对义位所“体现”的象征的描写。

然而,承认义素的存在,承认义素由义位分离而出,并能组建成冗余义素类而构成负同位意义集,这等于把有关的义素范畴看做是对一定元文本中的形象清单进行分类的标准。这就是说,诗歌交际其实只是一种分类学的话语显现。

对如此显现的微观域的描写阐明了一种诗歌逻辑。我们看到,该描写或者是自足的,或者导致一个品质模型的构成,该模型的义位施动者之构成始于某些重复的形象,通过赋予一连串义素限定来实现的。这样,品质分析最后成为对某种等级的描写,该等级的接合(只要撇开赋予其价值论特性的本体感受“舒适/不舒适”,并实行类义素替换,将精神维度转变为宇宙维度)在结构上丝毫无异于科学分类学,如植物学或动物学分类。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思维》中对这些科学分类学做了分析,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内在于实用显现层面。

b) 隐含与明示

对这类形象显现进行分类描写之所以成为可能，显然是由于概括性义素范畴的存在，它们支撑和限定这类形象显现，自己却隐含于显现之中。所以描写首先在于阐明这些义素范畴，揭示“具体逻辑”(列维－斯特劳斯语)，后者是形象显现的基础。“逻辑”一词被理解为“实际运用的推理方式”[拉朗德(Lalande)语]，它更具概括性，所以比“诗学”一词更合适，而后者是巴歇拉尔在对用做诗歌显现分类成分的空间义素范畴进行描写时提出的。

罗兰－巴尔特和让－皮埃尔·里夏尔(Jean－Pierre Richard)的某些研究成果也可纳入这一视角，尽管缺少专门意义上的语言学考虑。这里有个颇具代表性的事实：夏尔·莫隆(Charles Mauron)指责《马拉美的想象世界》的作者J.－P.里夏尔混淆了诗歌和形而上学这两个层面。但他无意中又证明了里夏尔分析的有效性，其实这很正常，因为对神话显现的描写能使我们在这一层次提取被阐明的价值论之成分。

所以，描写的结果是，形象显现的隐含内容转换成了一个用不同语言表达的明示模型。此类转换可以是自然的，也就是说在同一个语言集团内部完成，或可在一个共时(synchronie)范围内进行，从一个显现微观域(诗歌)转入另一个显现微观域(文学批评)；或可在一个历时(diachronie)范围内进行，例如前面使用过的一个不甚确切的例子，即前苏格拉底哲学，其任务是将先

前的神话转换成"观念学"。但是,转换同样可以是人工的,亦即描写的,此类转换产生于一种意在明晰化的方法论愿望。由此可见,组织模型存在方式问题也是诸元语言层次的等级问题。从描写角度看,这些元语言层次可分为:

1. *隐含层次*:任何显现,不管是神话的还是实用的,只要展开为话语,都包含其自身的组织模型;

2. *部分明示层次*:属于该层次的有自然转换,还有思想观念和形而上学转换,后一类转换在义位显现层面常以形象方式表达,但仍隐含着话语显现所隶属的模型;

3. *明示层次*:这是对显现的语义描写所追求的目标。

很明显,不论模型在哪个层次上被感知,也不论它们如何抽象,模型的表达都将构成一些新的义位显现和话语显现,并把它们合人同一个语义域。

c) **非形象性**

在话语运作层次被感知的元语言活动,人们已经知道,就是定义和命名的往复运动。科学活动也是如此:从语言学角度看,科学活动包含了一些连续不断的命名程序。在构建一个模型时,语义描写并没有另辟途径,因为它使用可支配的语言材料,或创造新的词位来命名所发现的定义汇聚点,从而为自己构建描写性元语言的术语。问题是如何定义这些用于命名的术语,

将它们与一般的义位区别开来。

定义这类术语以及从整体上确定术语显现所遇到的困难，并非为语言学所独有。就拿所谓的抽象派艺术来说，相比之下，抽象派绘画与形象化绘画显现的差距就如同我们的描写术语与拟人显现的差距。如果仿效抽象派艺术，我们就会指出描写性义位的特征是密度较小，故应视它们为抽象义位。然而，抽象概念并不能涵盖所有相关的义位：如果说描写性元语言的功能和品质常常是抽象的，那么施动者则是具体的，因为它们是靠了许多谓项限定才得以构成的。

另一种可能性是把它们视为具体义位，这不仅因为如前所说，列维－斯特劳斯使用了“具体逻辑”这个概念，而且——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命名所依赖的义素属于感性世界范围。但这意味着除义素密度之外又要引入一个定义具体与抽象之对立的标准，亦即我们用以界定符号学层次的标准。这样就会造成新的混乱，因为我们已特地把显现本身与其隐含的模型区别开来：必要时，可以把显现看做是具体的，而用于记录分离出来的元语言成分的术语则不然。

看来还是非形象义位这一说法最为合适。因为，从显现的一个层次转入另一个层次，这不仅要减少义位内部的义素，而且需要消除核心形象。语义命名，不管是从形象义位出发，还是从定义所包含的义素组合出发，都在于从中提取相关义素以构建模型。如此，对诗歌显现的描写就要舍弃，比如舍弃顶楼和地窖的各种形象，而只保留义素“上”和“下”，借以构建价值观义位

(我们暂不予"命名"),例如 euphorie de l'altitude(高处的舒适)和 dysphorie des profondeurs(深处的不舒适)。在此人们看到了科学语言偏爱希腊 - 拉丁语词根的原因:使用希腊 - 拉丁语词根能赋予由这些词根构成的义位以无理据的(non motivé)、几乎只建立在先前定义之上的义素内容。

如果只考虑义位的内部构成,凭经验我们可以说,只要显现中出现大量非形象义位,该显现就是非形象的。

d) **转向科学元语言**

从非形象显现到该显现最终转换成科学语言,尚需跨越若干阶段:

1. 取消话语:由于任何显现都是复合显现,所以描写总要设法消除显现的一个维度,以求只保存单一的同位意义集。此项任务并不容易,这证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任何科学的陈述,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不管多么净化,总包含了信息传递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杂音,而有时则相反,包含了一些省略成分,一些多少不详、程度不等的暗示。结果是,若要知道单一同位意义集之存在,就只有取消话语:仅仅去除义位的形象核心还不够,还必须使话语转变为话语显现,亦即信息清单。由此可知,白描式写作(écriture blanche)就是以废除话语为代价的,而这一愿望虽然在某些诗歌形式中极为明晰,但它并不能导致单一同位意义集,反而会产生负复合显现,亦即非常隐涵的显现。

2. 话语序列清单：在一个文本之内，话语显现，不管是形象的还是非形象的，都同时能够包含，甚至常常包含几个内在模型。所以，描写的任务往往包括拆解线性的话语：需要描写的模型有多少，线性话语就分割成多少信息清单。这样，继描写之后，一个语义微观域的话语显现就转换成一些有等级之分的模型。话语是线性的，故初看上去可能让人想到代数表达式；但是，一旦经过描写，它更需要一种几何的和多维度的直观表达。

3. 形式化：描写还必须使其义位形式化。形式化这一概念的定义相当不明确，所以对它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在语义描写方面所做的形式化努力主要包括：

a)尽可能把谓项简化为单义素。这些单义素在以描写语言显现时将被转换成抽象义位，后者仅包含被描写的义素和最小类义素基，而在该类义素基中，惟一得到体现的是属于描写之公理系统清单的范畴；

b)把施动者构建成概念，在此"概念"应理解为一个由抽象义位来定义的、具体的非形象义位；

c)鉴于描写自己选择归纳层次以构建其义素和定义其概念，那么像这样形式化的新的语义显现之价值就只能按照系统固有的两个标准来确定：描写和使描写成为可能的公理系统必须是同外延的；描写名称在整体上必须具有内在严密性。

e) **描写模型的检验**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并不相同，该事实可见于构建

科学元语言的每个阶段，而在评价描写之检验可能性时尤为明显。诸宇宙论科学的有效性，大家知道，还包括有可能——这远非绝对——建立科学模型和技术模型之间的联系，取消定向性，用技术模型的可靠性来检验科学模型的价值，从而在我们说的原因论及目的论范畴和施动者结构之间建立起对等关系。

有一个问题，在此我们只能一带而过，即从已知的和经过描写的价值论模型回到观念学模型的可能性问题：建立使该过渡成为可能的转换规则，会使严密性原则的确立增加一个标准，即精神模型的真理性标准。但是，在考虑检验的可能性的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和个人治疗学的可能性。假定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要价值论模型已得到分析和描写，还假定我们对观念学模型的变化替换类和转换规则有相当充分的了解，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会预见到这样一种可能性：构建那些能把个人和集体引向新的价值论结构的功能模型。这样，一门有效的人文科学就能取代现今心理学和社会学治疗法所做的探索。

# 描 写 程 序

## 1° 语料集的组成

### a) 目的与程序

我们努力理解各种结构和分离各种意义成分，我们思考语义域的各种存在和显现方式。有人会想，照此看来，语义学的目的就是描写自然语言所包含的广阔的表意集。这是一种误解。首先是因为，对自然语言所包含的意义进行描写，这是诸人文科学的目的，语言学不可能取而代之。其次，语言学即使在其应用中需要考虑这样的描写，那也只能把语义域分割成微观域，从中寻找一些组建原则。语义学的抱负至多在于确立一种描写元语言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在一些共同的基础上对诸意义描写程序进行清理并将它们统一起来。语义学希望汲取其它学科的经验，同时提供自己所有。

现今诸人文科学彼此分隔，这种状态往往使人们忘记它们无一不是意义的科学；它们命定要研究的诸语义微观域互相疏远，这往往使人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在原始显现层面还是在诸具体学科为对其做出阐述而精心制作的模型层面，诸微观域都拥有大量共同的结构和功能特性。至于语义学家这方面，他

们放弃了长期以来关于词汇依靠非语言标准来建立和界定这一假象，故同时放弃了将词汇作为词汇学予以描写的可能性，从而转向表面上杂乱无序的意义领域：在肯定诸意义领域具有共同语言性质的同时，语义学家有权考虑在各个不同语义微观域内得到确认的成分、系统和算式程序之间建立起以往多少被忽视或未被察觉的相关性，进而有可能从部分的结构共生现象出发提出各种假设和构建各种描写模型。

这一事实赋予语义学以开放的特性，使其适宜于利用不同领域业已取得的成果或易于实施的描写程序。但由于缺乏最起码的共同语言，这些成果或描写往往难以达及。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下文中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像自足的学科地位所要求的那样使语义描写语言尽可能形式化，而是相反，即致力于提出最具概括性的、至少在初始阶段可在尽可能多的领域里使用的描写程序。发现和描写（这两个词实为同义）程序被认为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技能，故上述关于这类程序的构想会引发一系列简单的问题，例如：应该研究什么？从哪里着手？如何进行？我们凭经验知道，这些问题最难回答，可它们就这样摆在研究者面前。

因为，内在语言（langage intérieur）为探寻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采取的简便步骤和所获结果的最终表达往往相去甚远。所获结果的最终表达不容忽视，因其本身就是通达形式化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我们决不可轻信那些过于仓促或过于概括的阐述，此类阐述往往容易让人接受，何况其表达之最终性具有神话功效，像是一种带有“威吓”意味的手段。举个小小的例子，在象征逻辑的基础中，语言学成分极少，且极不完整，却有人公开

宣称该基础是语言学的，情之不实，叫人吃惊。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就现时的研究状况而言，诸发现程序完全是假设性的，它们可应用于描写的各个不同阶段。在操作效益上它们还得不到保证，而这一保证只能来自于大量的部分描写。

## b) 语料集

语料集(corpus)可定义为一个为描写某个语言学模型而构成的信息组。此定义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当一个模型已经隐含在一个语义微观域内时，人们才能对它进行描写。所以，构建一个语料集不单单意味着为描写做准备，因为这一预先选择最终将决定描写的有效性；反过来，语料集的价值评定只有等描写结束才能做出。总之，定义的简洁及其逻辑上的严密只是掩盖了描写者在此分析阶段所做决定的直觉性。所以该选择离不开一定数量的防范措施和实用性建议，以便尽可能减少选择过程中出现的主观成分。我们认为，一个适当构建的语料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它必须具有代表性、穷举性和同质性。

1. 代表性可定义为把部分，亦即把语料集同以语料集为基础的实际显现的或只是可能显现的全部话语联系起来的下联关系。代表性问题存在于个体语料集，也存在于集体语料集。因此，波德莱尔的所有已知作品也不过是波德莱尔实际所言或“所思”之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即便假定能够收集到所有保存

下来的关于15世纪法国社会集体感受性的文字资料,我们还是要问,这样一个语料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这一感受性的全部表现形式。

所以说,语料集从来都是部分的。如果有人一定要把语料集的代表性概念等同于信息显现的全体性概念,这无异于要放弃描写。语料集虽说是部分的,但可以具有代表性,而支持这一看法的是话语运作的两个基本特征,即冗余性和封闭性。我们已经知道,任何话语显现都是重复显现,且话语很快就趋于自我封闭,换言之,话语的存在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其代表性的条件。在代表性事后得到验证这方面,我们很难找到比罗兰·巴尔特所著《米什莱》(Michelet)一书的出版条件更好的例子。该书要比米什莱的《私人日记》完整版本早几年问世,但书中涉及私人的主题虽未用上米什莱自己吐露的隐情,却让描写者一目了然,也让那些博学家大感意外,以致"日记"的保管人吕西安·费布弗(Lucien Febvre)也出来为描写所用的部分语料集的代表性作保。

2. 语料集的穷举性(exhaustivité)则应理解为要构建的模型与该模型隐含于语料集中的所有成分完全一致。

在整个19世纪,甚至今天还常常如此,穷举性原则被视为任何人文研究的必要条件。完美的博学家之形象也与该原则联系在一起,而且仅就设立"一生的主题"这样的怪物而言,人们对该原则所产生的危害实在再清楚不过,以致不认为自己必须不加批判地接受该原则。的确,叶姆斯列夫是将此原则列入了

描写的必要条件，但他的意图迥然不同，他这样做是为了强调语言学描写必须保持演绎性和归纳性之间的平衡。

今天，难怪到处都有人在考虑是否有什么更为经济的办法能像穷举性一样保证描写忠实于语料集。我们所能提出的较为简便的程序是把描写操作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

a）第一阶段，描写仅使用被认为有代表性的语料集的一部分，并从该部分出发构建一个仅具操作价值的模型；

b）第二阶段是该临时模型的检验阶段。检验程序可分为两种，两者互不矛盾，其选择主要取决于需描写的语料集之性质。这两个检验程序是：

α）模型饱和检验（普洛普、列维－斯特劳斯）：从素材集的第二部分着手，在模型和显现中依次出现的项目之间进行系统比较，直至最终穷尽对诸结构变体的分析；

β）抽样检验（J. 杜布瓦）：按照统计学家所研究的程序（R. 莫罗），从语料集的第二部分中选择一定数量有代表性的节段，观察应用于这些显现节段的模型之表现。模型可由此得以确证、被证明无效或得以完整。若出现后两种情况，分析有必要从头再来，而且这一工作从总体上讲应进行到操作模型的依据得到确证。

3. 语料集的同质性初看上去——集体语料集尤其如此——

似乎取决于一组非语言条件，取决于一个情景参数，亦即说话人层面或交际量层面各种可感知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J. 杜布瓦颇为关注，认为语料集的不充分同质可通过加量程序(procédure de pondération)来缓和(参阅《语言学术语》，J. 杜布瓦、P. 马尔西，载《现代法语》，1965 年 1 月)。我们可以接受杜布瓦的见解，即增加交际量会使"诸结构均一化"，但我们不明白这种能引起质变的量变如何会影响"均一"语料集的同质性，因为分散的神话显现很可能抵消模型中一定数量的义素范畴——这还有待证明——，但不会因此而改变结构本身，故在我们看来，问题不在语料集层面，而是在资料提取程序的选择上。至于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带来的变化，历时性差异(不同年龄段)或显现类型差别(不同文化层次等)这些问题虽然在涉及集体语料集时是非语言问题，但在个体语料集中也照样存在，因为单个说话人的话语显现必然在历时轴上展开；该显现可表现为形象显现(诗歌)，也可以是非形象显现(美学理论)。无论微观域的显现形式是什么，只要描写的目的是构建一个非形象的和概念性的模型，内在模型本身就应该被视做不受显现方式影响的模型。历时性变化的问题，由于社会结构相对稳定，故在涉及集体语料集时可用加量方法解决，但在个体语料集层面上则更为复杂，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及。

### c) 文本

从逻辑上讲，语料集建成后，下一个程序就是把语料转换成文本(texte)了。事实上，语料集是一个得到限定的话语序列，因此它只能是不同词义的显现，而我们要考虑的只是选定的同

位意义集之一。因此，我们所说的文本（元文本也一样），是指处于所选同位意义集内的、且被圈定在语料集范围内的全部意义成分。

按此理解，语料转换成文本的程序就呈现为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

1. 肯定的一面：在于同位意义集的选择。该选择虽从逻辑上讲应在语料集构成之后进行，但事实上它却处于描写实践之中：描写确实要求把语料集转换成文本，但事实上语料集几乎总是根据人们力图描写的文本来选择的。

2. 否定的一面：在于清除属于语料集中其它同位意义集的成分。该必要性显而易见，在此本该一笔带过，如果文学教育学没有把“文本解释”提升为一种国家制度的话。要解释的“文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相当于一个有代表性的语料集，所以隐显其中的模型几乎总是不完整的，文本解释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同时对文本诸同位意义集内的意义成分进行阐述的借口。

不言而喻，单单一个语料集可包含若干经依次分析的文本。而一个文本的制备，不仅要清除显现之一个维度以有利于另一个维度，而且要清除同一维度上所有被认为与预定的描写无关的其它同位意义集。故此，在列维-斯特劳斯所作的分析中，俄狄浦斯被设想为对人类起源的解释，故它处在原因论同位意义集；如果为同一个神话设定另一个文本，也有可能从中找回对社会结构进行目的论解释的成分。

#### d) 是清除还是提取?

在制备文本时,可能有必要思考一下,把属于非相关同位意义集的语料集成分清除掉这一做法是否代价过高,而把仅与描写有关的成分提取出来是否更为经济。我们知道,清除(élimination)和提取(extraction)是两个纯操作性概念。因为,如果语料集的剩余部分量大,而要清除的部分量少,那么,为建立文本,我们将清除语料集中非相关的成分。反之,如果要清除的部分在数量上大于要保存的部分,那么我们要采用的程序是从给定的语料集中提取与描写相关的成分。

在什么条件下使用这个或那个程序是个实际应用的问题。如果遇到分散的神话显现或实用显现,那么较为经济的办法看来是提取相关成分了;相反,任何集结显现则无疑要求我们采用清除程序来清除那些非相关的序列。因此,罗兰·巴尔特在分析米什莱的"生存主题"时所采用的方法看来是提取法,而利法泰尔(Riffaterre)在其"文体效应"研究中所提倡的方法也是提取法——尽管人们可以指责他对预先选择同位意义集不感兴趣;相反,列维-斯特劳斯在描写俄狄浦斯神话时所使用的程序肯定是清除相关成分。

尽管如此,提取程序初看上去还是更容易受累于描写者的主观判断。在此情况下,理应需要在描写的不同阶段,所有的程序都能进行更有效的参预, 以减小这种主观性,而模型的构建尤其需要这种参预,因为在这一层次,在寻找对等关系和对立关

系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现缺陷和遗漏。要描写的成分虽有冗余，但此类遗漏在所难免，不过它们可以通过一些反向分析，亦即反复追溯已往来弥补。

e) **清单**

这样，经过清理的语料集就呈现为一个同位意义文本。该文本若要不再成为词义纷呈的话语，就必须表现为非词化和非语法化的话语显现，因此必须考虑该程序的重要一步，即显现之规范化。不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需要推迟，眼下我们还得做一番更为一般的思考，以便在同一章节里集中探讨有关语料集构建的全部问题。

不难想象，同位意义文本一旦被清除掉所有的交际寄生成分，就呈现为一个信息清单，亦即程式化语句清单，而以后对该清单的整理过程就是模型的构建。不过，描写模型虽说是根据信息清单来构建的，但我们仍有理由设想另一种文本，该文本本身就已经是隐性或显性模型清单，而不是由信息构成。故此，在这一分析阶段，对俄罗斯民间故事语料集的描写应从一个由童话清单，亦即隐性的出现模型清单构成的文本开始，或者从先期分析过程中已经得到描写的显性模型清单开始。不管描写是分别对每个出现童话进行分析，还是对未经描写的实例所含隐性模型进行互相比较，两者都已经属于结构化（structuration）程序。在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扩大文本这个概念，以便消除这样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即描写语料集仅由“事实”构成，而文本原则上只是些出现项的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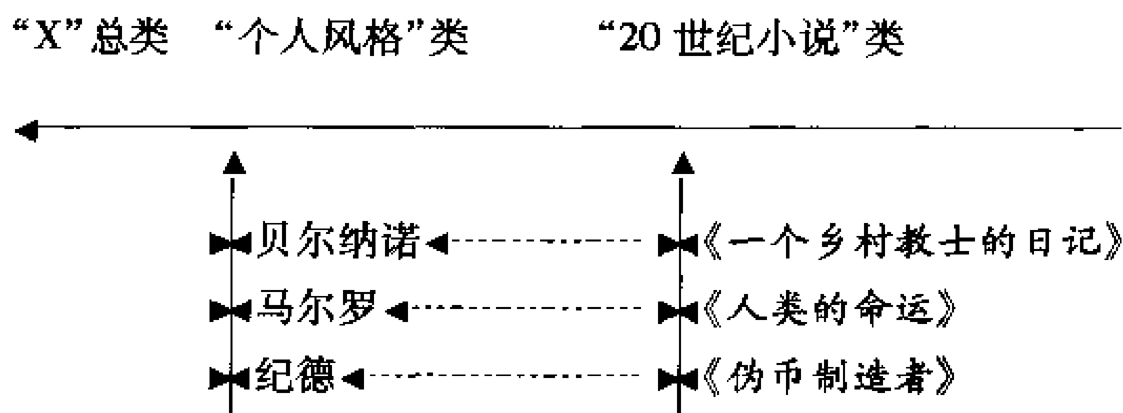
因为，如果说模型清单是通向构建某类模型的一个步骤，那么描写的目的也可以是建立类别清单这样的文本。比如说，如果能够成功地把民间故事定义为一个类，那么所有可比类的清单就使人们有可能对一个共同的总类（métagenre）进行描写，该总类就是从总体定义上予以考虑的叙事（récit），或任何一个叙事子集（sous－ensemble）。在此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描写可以在不同概括层次上进行，从而可以构建与各个不同描写目的一致的语料集；此外，由于诸模型在构建过程中彼此参与，互相联系，所以必须考虑将它们分出等级。

### f） 个体清单与集体清单

借助这样一种模型等级观，我们应能解答个体清单和集体清单的关系，以及产生于这两种显现的模型之可比性这类难题。初看上去，对所有俄罗斯民间故事的描写所采用的步骤类似于全部贝尔纳诺（Bernanos）小说的描写者要采取的步骤。但仍有一处不同：诸民间故事的语料集由一位集体说话人承担，而贝尔纳诺的全部小说只有一位个体说话人。再者，贝尔纳诺这位个体说话人可通过他的全部言语，即由其全部作品组成的语料集来感知，而且人们谈论“贝尔纳诺语义域”，措辞同谈论俄罗斯民间故事域时几无两样：“贝尔纳诺语义域”包含由其小说组成的诸语义微观域，而具体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只是俄罗斯民间故事语义域的一些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贝尔纳诺语义域同时充当了《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和20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想象世界之间的中介。这样就出现了3个可能的语料集：由一部小说构成的语料集、由全部贝尔纳诺作品构成的语料集和

由一个特定社会及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所有小说构成的语料集。由此引起的实际问题是：应当分别赋予这3个语料集以什么意义？在从这些语料集出发所能阐明的诸模型之间，人们可望发现什么样的结构关联？

或许，下面这个简图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




图中有两个纵向箭头，其中一个表示由一些实际出现的小说构成的语料集应视为用于构建"20世纪小说"类的隐性模型清单；另一个则表示由具有代表性的全部个人话语组成的诸语料集都是话语显现，可用以构建被简称为"个人风格"的类别：因为每个文化集团都赋予个人以其存在的价值"特征"和其行为的观念学算式（即使该集团常常把此类算式设想为对社会有组织的角色和行为的否定，并提倡个人不循习俗——这不过是构思"风格学"模型的另一种方法，亦即符号变换法）。而后是水平箭头，它表示有可能构建一定语言或文化集团所特有的类别之清单，用以对一个总类进行描写。

然而，简图同样展示了《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这部实际出

现的小说所处的特殊位置：它处在两条轴线相交处，能同时进入两个不同的语料集并能受到目的不同的两种分析。仅以施动者分析为例：我们看到，这部小说里的人物能被看做20世纪文学特有的小说施动者结构之变项，但是，作为特殊的体现，他们又同时具有贝尔纳诺所特有的施动者结构的属性。所以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表现为一些独特的形象；由于两种同构但不同位的结构彼此汇合，这些人物被激活，并得到显现。结构汇合被视为解释原则，可阐明*历史事实*的形成：诸*必然*模型的汇合显现就是这样产生*偶然*事实的。从这一角度看，词源学——P. 吉罗看得很清楚——就不再是一种词源记号研究，而是揭示词源学模型和计算这些模型的汇合概率。

### g) 层级与时段

选用施动者结构来说明诸异质模型的汇合，此举使我们不用再考虑任何语料集的历时性。我们已有机会强调这样一个悖论：一次话语显现在时间上与另一次话语显现相隔三秒钟还是相隔三百年，都丝毫改变不了两者之间的历时性关系。由此可见，在意义显现中，一切都是历时的，惟意义本身除外，因为意义本身受制于我们的一种能力，即我们能像感知一些整体一样非时间性地感知一些很简单的意义结构。换言之，我们能把一则民间故事或贝尔纳诺的一部小说感知为有意义的东西，这是因为叙事从头到尾都有少量恒定的意义范畴。因此，任何文本都兼有*恒定性*和*历时性*：它依靠少量冗余基本结构来表现其恒定性；它又是历时的，因为相对于基本结构而言的诸次要结构以下联方式相连接，并像这样继续下去。任何历时性语料集，不管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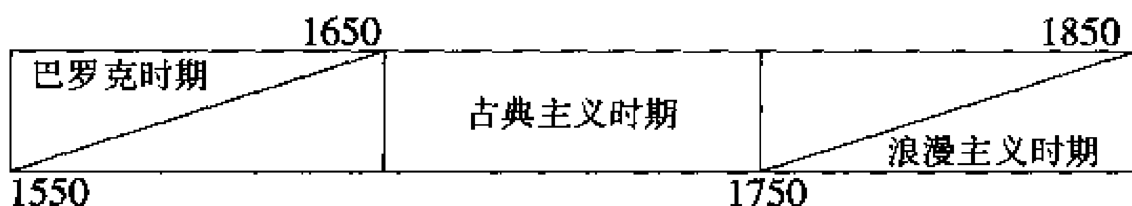
个体的还是集体的，不管它代表的是“法语史”还是“马拉美的一生”，都能被描写为一个分等级的堆积物，它由结构层组成，这些结构层按它们或多或少的恒定性从下到上重迭。任何历时性语料集都在带箭头的水平轴上展开，箭头象征无可挽回的时间，而该语料集也可分成长短不等的时段(durée)。这样，在诸结构的层级(strate)和它们的时段之间就建立起一种看似简单的关联性。

| 历时性语料集 ——→ | | | | |
|---|---|---|---|---|
| 结　构 | 时　　段 | | | |
| 风格结构 | 短 | 短 | 短 | 短 |
| 历史结构 | 中　　等 | | 中　　等 | |
| 基本结构 | 长 | | | |

按图所示，在一个历时性语料集内，可区分三个结构层级，即基本结构、历史结构和风格结构，同时还区分了三种时限，即不久前得到F. 布罗代尔(Braudel)确认的长、中、短三个时段。至于关联性的建立，就是为每一种结构设定其相对的时段，这样一来，诸结构就处在了时间之中，而由此产生的历史则是“被结构化”的历史。这一解释原则本身借自一位历史学家，所以再举一些历时性集体语料集的实例来说明该原则就显得多余了。如果将此简图移至个人历史层面，人们就可以在基本结构和构成范畴——例如传统“人性”观念的构成范畴——之间，在诸历

史结构和"一生的历史"的历时变化之间建立某些对应关系，而风格结构则能阐明具有结构效应的"张力情景"(situation de tension)引起的变化。

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像这样分成等级的结构和被认为包含这些结构的语料集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对上列简图的阐述，语料集，不管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都被理解为一串断续的意义成分，而人们能对这些意义成分进行历史学上所说的"分期"，但对我们来说，就是把话语切割为序列。然而，一旦人们试图拿任何经如此"分期"的语料集同历史结构在时间中的显现方式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分期"切割与诸结构的展开并不完全一致。举个法国文学史上的例子，这个例子很普通，但无任何"真实性"保证：在下图中，纵向切割与历史"时期"相符，而对角分割则说明中等时段结构在历时语料集中的展开。




这一事实包含了与描写程序直接相关的两个实际结果：

1. 力图阐明结构之历时演变的分析不应将文本分割成与结构"完全"对应的节段。相反，此分析应把文本分成重叠的序列，即在自由区的两侧，每次都包括两个交迭区，在交迭区内，残留的结构与新产生的置换结构共存；

2. 如果描写涉及在语料集内显现的历时演变，交迭区就成了该描写优先考虑的文本序列。三个结构层的区分引入了语义域存在的一个新维度亦即深度，尤其是它将历时性重新纳入了结构描写。这一区分虽然暂时只具有操作价值，但我们认为，有朝一日它可能借助结构和功能标准来巩固自身的地位。在此我们建议把历时演变（transformation diachronique）这一词组仅用于表达得到确认的3个结构层之一出现的变化，从而将这些变化与一个共时现象的正常但也是历时的运作区别开来，而不管该运作体现为纵替换变化，还是表现为由连续的扩展和压缩引起的对等游戏。

对某些历史结构来说，确认历时演变和分析结构的共时性一样重要。所以，不管怎么说，"历史分期"与结构展开不完全相符这一事实尤其关系到这类历史结构，而不管它们是个体的（例如：精神分析法治疗），还是集体的（例如：社会价值体系内的变化）。

但是，有些事实现在就需要加以关注，并迫使我们对位于不同层级的结构间关系的性质进行思考。我们担心对诸结构的等级阐述有点过于参照品质模型和施动者模型，其原因是这两个模型的等级性质完全适宜于分层。涉及功能模型时的情况就不是如此，因为它们具有算式特征，对不同层级模型之间的等级互扰现象的解释因之而变得更为困难。此外，尝试该解释时所能依据的事实也为数不多。故此，M. 萨菲安（Safouan）所记录的一系列心理剧故事——后面我们还要谈到——，看来完全能成为短时段语料序列，这些序列可作为观念学模型来描写，并构成

风格结构层。经过更深入的语义描写，我们能发现这些风格模型能以部分算式序列的形式合人一个更具概括性的观念学模型，而此整合过程有赖于心理治疗法的进步，经过不断的修改才能最终完成。我们知道这个例子有它的偶然性，它需要其它的同类分析来证实。但它的作用不只限于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一种治疗方法，它还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即风格学功能模型可以合人结构地位相同但层次更高的历史模型。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例子来自 J. －P. 里夏尔（Richard）的所谓*主题*分析。就目的和方法而言，此分析看起来同第一个例子相去甚远。里夏尔力图描写的是马拉美的个人史，当然他的考虑和使用的术语与我们的不同，如果撇开这一点不谈，可以说他最终把这部个人史视为一个独一的基本功能模型，其不同的诗篇，或者说各类诗，都具有一个“实际的”中等时段，按我们的理解，它们能用历史模型来描写。这些诗篇只是一些部分显现，渐渐地穷尽整个基本模型。这样我们就有了第二种分析，它与上一例的分析没有关系，却一样能阐明功能模型的整合方式，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功能模型位于历史的和基本的结构层，这自然是方便了我们。

的确，上述两个例子均属个人史范围，而人们可能想由此类推到集体历史，但仅此两例还不足以证明其合法性。人们很想作此类推，认为社会文化群体的历史会像个人史一样，具有某种意义，依靠部分历史结构而呈现为一个基本模型，而该模型的总体布局，甚至各种变化都在可预见之列，这样就会有一些时而悲惨、时而屈从的历史，就如马拉美的历史；也可能会有一些病态

的、强迫症的或恐怖症的历史，就像萨菲安录下的那些孩子讲的故事。这样的一种类推，就目前状况而言，绝对是为时过早。

## 2° 规范化

### a) 描写的同质性

历时现象对语料集的组建和以后的语料集分析至关重要，所以我们认为绕这一大圈子实属必要。现在再回到真正意义上的描写程序上来，探讨我们称之为*规范化*（normalisation）的程序。此前我们努力对需要描写的文本的同质性之条件做了规定，现在我们要在“规范化”这一项目里确切说明能保证描写本身同质性的方法。我们已经指出，这一新的程序并不是前一个程序的必然结果，而是与前一个程序平行的。该程序在于把语料集内处于原始状态的话语转换成话语显现，它包括3种不同的操作：

1. *文本客观化*：是指准备文本时，清除文本中属于话语之非语言情景的语言范畴；

2. *建立最基本的描写句法*：指引入一套基本的符号标记法，建立一些义位类（我们已经予以定义），并统一少量组合规则的表达，这些规则把诸义位类组合成由具体话语构成的信息；

3. *建立描写词位系*：其目的是对经命名的，也就是说再次被词化的、但已经属于描写语言的义位之表达加以规范。

b) **文本客观化**

我们知道,任何话语都预设一个非语言交际情景。该情景包容于一定数量的形态范畴之中,这些形态范畴以语言方式表现情景,但同时又将一个*主观性参量*引入话语显现。此参量与描写不相关,故必须将其清除出文本(除非分析把该参量选为描写的对象)。

这些需要清除的范畴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人称范畴:清除这一范畴将导致文本同质化,文本将保留一个标示"不参与"话语的形式,亦即*第三人称*。所有的人称(je,lui,on,nous,vous)将被代之以一些约定的施动者,例如:*说话者或书写者*、*受话者或读者*;同样,前指替代词(anaphorique)也将重新由它们所代表的施动者取代。此程序并非只用于话语"非语法化",所以描写者还必须注意使说话者得以暗地干预文本或驻留于文本的种种技巧;

2. 时间范畴:所有与信息发送相关的时间指示均在清除之列。但文本仍将保留按照与信息无直接关系的 alors(那时)构建的非同时性系统。这两个时间系统需要仔细区分,因为非主观时间是用于功能分析的;

3. 指示范畴:所有的空间指示词(deictiques)——限定词、代词或副词,只要它们包含了说话者的主观判断,都要清除出文

本。需要保留的只是以 ailleurs（在别处）为基础构成的客观空间指示；

4. 所有的一般性寒暄成分：在借用雅各布森的寒暄功能（fonction phatique）概念并将其推广到所有为交际服务的语言成分和语言手段时，我们应当把清除寒暄成分理解为不仅要清除“喂，你听得清吗?”一类的话语序列，而且要清除所有的语法或词汇冗余。因为，如果说这一意义上的冗余可理解为“恒定”（或“重复”），那么描写的目的就是辨认和记录被重复的信息，而不是如数统计诸重复信息。规范化程序与缩简（réduction）程序就这样汇合到一起。

c） **基本的描写句法**

该句法大体上已为我们所知，所以在此主要是设法使其代码化。构建一个独立于所用自然语言的语义句法，这一构建要符合一定数量的需要。这些需要主要是：

1. 清除形态类和句法类的重复使用和交迭；

2. 清除由同一些义位的不同词位表达造成的句法同义现象；

3. 构建一种描写语言，以便对那些根据用各种自然语言表达的显现话语来描写的模型进行比较。

至于句法本身，我们记得，它包括把义位分为两类：

施动者 （Actants） vs 谓项 （prédicats），

谓项再分成两类：

功能 （Fonctions） vs 品质 （Qualifications）。

因此可以说，任何语义信息必然属于两个可能的信息类之一：

F / A / 或 Q / A /。

在功能类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一个语式（modalité）子类，但在各自然语言中，语式类还有待做出完整的描写。作为一种不具任何约束力的初步估测，我们认为语式的特征是其与谓项的上联关系。因此，在下面两个序列中：

Jean aime jouer de la guitare （让喜欢弹吉它），
La terre semble ronde （地球看来是圆的），

aime（喜欢）和 semble（好像）是语式项，从逻辑上讲，它们先于谓项，构成了对谓项的修饰范围，而描写则应根据其自身的目的，或将其考虑在内，或置之不理。由上面两个句子出发构成的信息可表达为：

F(m)/ A/ 和 Q(m)/ A/。

在品质类中，我们也可区分出一个“体”（aspect）子类，体的特征是其与谓项的下联关系。因此，在下面两个例句中，

Pierre est parti précipitamment （皮埃尔匆匆离去），
Le chemin était très long （路很长），

précipitamment（匆匆）和 très（很）都可以被视为体项，它们构成一类可变项，以下联方式修饰谓项。

人们对体这一语法范畴不甚了解，往往将其混同于语式；它能参与谓项义位的构成，或者自己组成一个变项类，为某些与谓项相关的分析提供方便。因此，体这一子类的划分完全是操作性的。借助新的下义接合，语义句法有可能拓宽，而我们在此引人体这一范畴只是为了指出该拓宽的方向之一。上面两个自然句子便可转录为下列形式的语义信息：

F(a)/ A / 和 Q(a)/ A /[①]。

我们说语式项和体项是谓项的操作符（opérateur）。

至于施动者，我们已暂时规定了它们的角色和数量。在 4 个施动者基础上，我们还将增加 2 个境况施动者（circonstant），

① 本节字母标记含义：F = 功能，Q = 品质，A = 施动者，m = 语式项，a = 体项。——译注

后文再表。为了简化符号标记，这 6 个施动者都用大写字母 A 表示，并把它们编成 1 至 6 号：

主体　(sujet) - - - - - - - - - - - - - A1
客体　(objet) - - - - - - - - - - - - - A2
发出者　(destinateur) - - - - - - - - - - A3
接收者　(destinataire) - - - - - - - - - -A4
辅助者　(adjuvant) - - - - - - - - - - - -A5
反对者　(opposant) - - - - - - - - - - - -A6

上述语义句法极为基本，这也是我们的本意，加上下面几点说明，对该句法的浏览便告完成：

1. 大写字母仅用来标示施动者和谓项（功能和品质），而小写字母则表示其它可能被引入的下联接合项；

2. 方括号用于标示施动者，放在圆括号内的是操作符，而谓项则不用括号表示；

3. 句法单位之间的关系用以下方法表示：

a）　任何一种下联关系：不用符号；
b）　其符号标记与描写无关的关系：用（；）表示；
c）　分离关系：用（/）表示；

4. 用于记录完整信息的特定横组合顺序：

F /Q (m;a)[A1;A2;A3;A4;A5;A6;]。

**说明 I**：另外还使用了几个一般的符号。对它们的定义暂作阙如，我们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我们并非一定要——出于某些数学上的原因，出于谨慎或无知——就它们的性质发表意见。故此：

a) ≃表示关联或对等关系（或是确定此类关系的愿望）；

b) vs 表示一般的对立关系（需要加以确定）

c) →表示预设或蕴涵。

**说明 II**：对非句法单位间关系的符号表示与本研究无关。不过仍需作一说明：

a) 义素用小写字母表示，以便使它们区别于用大写字母表示的义素范畴和义位；

b) 义素之间非经确定的、往往是下联的关系用符号 + 标示。我们做到语境每次都能使设定的关系变得明确。

**说明 III**：符号标记体系为数众多，常常造成混淆，所以我们力求把使用的符号数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在此只介绍一种语义句法的基本原理，每位描写者——除非他采用自己的符号系统——都能按其需要加以扩大。因此，我们甚至没有提及量词［"un" vs "tout"（"一个"/"全部"），"petite quantité" vs "grande quantité"（少量/大量）］，而量词能被视为修饰施动者的操作符，逻辑学缺之不可。而在我们看来，在语义描写中，量词的作用大为降低。

## d) 描写词位系

为阐明任何一个义位所做的努力，我们知道，都将导致命名

并由此创造一个新词位。由于别无它途，规范化只有力求以最经济的方式完成这一命名。因此，描写语言的词汇应尽可能是单义的，也就是说应该仿效科技术语，仅包含一个义位。显然，我们不可能每每都能成功，除非借用外来构形成分，或使用新的字素组合，但这又让人难以辨读。因此，我们努力寻找一个既能避免无理据又能避免混淆的最佳命名方法，再由结构化程序来对描写词位（lexème descriptif）进行分析，并借助义素性质的定义把它们巩固下来。

说明：喜好优美语言的人将继续诋毁此类怪异不经的新词，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用于命名的词汇已不属于自然语言，而是属于次生的描写语言，它们就同代数符号一样，已不属于法语。

我们知道，自然语言一般都有两种明显的词化方法：第一种是把义位归入语法类（动词、形容词等）；第二种是派生法。因此，凡功能义位原则上都能被词化成为动词：résoudre（解决），marcher（行走），déménagement（搬家）等。同样，任何品质义位都能表现为形容词：long（长的），certain（确实的），intransitif（不及物的）等，或表现为派生名词：longueur（长度），certitude（确实性），intransitivité（不及物性）等。这种自然冗余只会使我们在实际描写中感到左右为难。而在分析过程中，且不说谓项和施动者经常难以区分，就是不同施动者的辨认也往往很棘手。试看下面这类话语成分：

la solution du probleme （问题的解法）= F / A2 /，

la solution du professeur （教师的解法）= F / A1 /，

两个不同的施动者都具有相同的语法表达。

面对这类两可性，看来更为经济的办法是排除两种命名方法之一，即把借助语法类来词化的方法排除掉，而采用一个单一程序，该程序仅依靠后缀派生构词法来保留义位类的词汇理据。其操作如下：

1. 赋予所有的义位以名词形式，这样一来，与名词对立的其它语法词类就一无所剩，名词作为类也就失去了作用；

2. 通过只加适当的名词后缀，使义位词化：如果是功能义位，可加 - ement，- age，- tion，零后缀，等等；如果涉及品质义位，则加 - ité，- itude，- ance，- eur，等等。在缺少派生手段的情况下，应使用"le fait de…"（……这件事）一类的迂回表达。我们知道，词典编纂学所使用的类属词（或定义成分），在定义层次上是一些同义词或对等词，而在命名层次上则是一些后缀。对这些类属词作一系统的描写，在此阶段可能大有裨益。此外，眼下尚无必要进入该程序的细节，重要的是阐明其原则。事实上，一段时期以来，有人经常使用这一程序，虽然还停留在经验阶段。

自然语言中，在形态类和句法类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异质性。为消除该异质性，语言学家们不自觉地做着斗争，而我们的上述主张，虽然旨在组建一个自足的描写词位系，但事实上不过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插曲。我们的斗争方式是：一方面是把句

法施动者简化为语义施动者;另一方面是在描写语言层面上取消形态类别。

**说明**:符号标记问题在此只字未提。出于一些很实际的原因,稍后,等描写词位被充分缩简后再做介绍。

## 3° 构建

### a) 模型构建:缩简与结构化

实际上,刚才我们是在规范化的名下,提出了语义学语言(langage sémantique)之句法和词位系的基本内容,亦即一些元语言框架,而在这些框架中,我们将纳入需要描写的语料集的显现内容。这个程序为文本的同质性提供了额外保证;它还有助于我们更容易地辨认文本的冗余信息和结构接合。

因为这样开始的描写阶段只能是构建涵盖文本的模型,换言之,是把信息清单转换成结构。因为任何清单都是一份列有出现项(occurrence)的单子,其长度取决于文本的特点;模型则是简单的,只包含数量有限的几项。因此,清单转换成信息所包括的程序首先是缩简。另一方面,不管清单被设计为一个系列还是一个目录,它始终是一种并列形式;相反,模型是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它揭示了意义的关系组织规则。因此,模型构建的第二个程序是结构化(structuration)。

**说明**:我们之所以没有近似地和一般地使用结构化一词,是因为我们

有意用它来指称一个特定的描写程序，该程序旨在利用经缩简的清单来构建模型。

现在我们来依次看一下缩简程序和结构化程序。

缩简分简单缩简和复合缩简两种。

### b) 简单缩简

从形式上看，最简单的缩简是清除冗余信息。我们已经看到，文本按话语的时间维度展开，若要将它感知为恒定量，亦即总体意义，那么该意义的基本成分就必须反复显现。不过，冗余不仅仅是一个量变现象，因为重复往往意味着内容形式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故冗余信息的缩简必然要以意义的贫化为代价，因为概括层次一旦选定，描写看来只能是选择一些适当的内容成分，丢弃（或暂时悬置）其它被视为个人风格的、与模型构建无关的成分。这些属于个人风格的成分，稍后我们将看到，还可以重新用于新的、具有不同目的的描写。

因此，缩简就在于确认若干义位或信息之间的对等关系，并用一个为彼此对等的诸出现项所共有的名称来记录该对等关系。一下子就确认所有的对等关系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所以几乎总要进行一系列的缩简，也就是一些借以逐次逼近目标的阶段。因此，在哪一个缩简阶段最有利于实施规范化，在什么时候为构建中的义位最终赋名，这应由描写者根据其清单来决定。

简单缩简又可分为3类。

1. 缩简相同成分：构形成分和内容相同的几个出现项可以缩简，并可将它们看做同一个内容单位。因此，在我们已经用过的斯坦因投射测试中，如果句子开头"La vie d´une personne…"（一个人的生命）引出10个相同的回答："…compte plus tout"（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即可认为，只需考虑一个出现项（比什么都重要）就足以满足分析之需（在此是规范化）。这里必须说明两点：

a）与统计语言学的惯常做法相反，仅构形成分相同还不足以成为一条允许缩简的标准，因为缩简所涉及的是内容的对等，而在缩简相同成分的情况下，内容的对等性是否得到保证，惟有对构成义位的语境进行比较后才能知道。

b）语义描写把重复，从而把内容的重复成分之相对出现频率看做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们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在一个给定的文本中，具有相同构形成分的组成部分是一个有用的标志，它能显示可能的隐性冗余信息，其实用价值不容忽视。

2. 缩简句法对等成分：此类对等成分可用下面这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明：

A detruit B（A 毁灭 B）

Destruction de A par B（A 被 B 毁灭）

Action destructrice de A sur B（A 对 B 的毁灭性行为）。

但这类对等成分并不完全是句法的，也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形式的。它们还包含一些不同程度的词汇变化。上面已经引用过的实例来源（斯坦因投射测试）提供了一些出现项来修饰“一个人的生命”。这些出现项是：

…est plus importante que tout（比什么都重要），

… importe plus que tout le reste

（比其余的一切都重要），

…est ce qu´il y a de plus important au monde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可以看出，在最高级修饰成分的表达中有一些词汇变化，而正是这些词汇变化促使我们把这些结构视为对等结构，而不是相同结构。所谓的句法相同不过是极易辨认的句法对等。

3. 义位对等成分缩简：词位被看做是有可能组成义位的义素核心，如果它们未被相同的构形成分所覆盖，那么，在对它们进行缩简前，必须先进行义素分析。在对被认为能够转换成义位的出现项进行这种分析时，我们可以使用已经描写过的程序：对它们的定义进行简单的比较，直至揭示出它们的形象。此分析旨在阐明足够数量的、为所有出现项所共有的类属成分，以便将这些出现项缩简为仅一个义位。

为评价“一个人的生命”，斯坦因的测试除提供品质“important”（重要）之外，还提供其它几组出现项：

…est ce qu'il y a de plus précieux

(是最珍贵的东西)(出现6例)

…compte plus que tout

(比什么都重要)(出现10例)

…vaut plus que tout l'or du monde

(比世上所有的金子都宝贵)(出现4例)

这20个出现项在表达上具有许多相同之处,所以首先可缩简为一份由3个例样组成的清单。之后每一个出现项可分成两部分。属于第一部分的是:

| | |
|---|---|
| ce qu'il y a de plus | (最……的东西), |
| plus que tout | (比什么都　), |
| plus que tout l'or du monde | (比世上所有金子都)。 |

它们看来是同一个意义成分(在此分析层次,无需知道这是义素还是义素组合体)的风格学变量,可翻译成"superlativité"(最高级)。

属于第二部分的是:

| | |
|---|---|
| est … précieux | (是……珍贵), |
| compte | (是重要), |
| vaut | (是宝贵)。 |

它们的定义很接近，故也是可比的，而且都包含一个义素内容"estimation"（评价）（在此缩简阶段，无需做更深入的义素分析）。

接下来，我们只需把这样分离出来的义素内容转换成品质（同时赋予它以规范化形式），并把"最高级"这一义素成分视为品质的一个体（aspect）。经过这一缩简，品质义位就可用语义学语言转录为：

Q《评价性》( a ；《最高级》)[1]。

c) **复合缩简**

上述3种简单缩简都包含一些共同的结构特征：缩简是通过比较和揭示义素的相同成分来实施的；缩简过程中，若有必要，不相同的成分可暂时予以悬置。因此，从结构上讲，缩简程序就在于利用并合（conjonction）关系，排除分离（disjonction）关系。

我们准备把复合缩简这个名称留给主要涉及下联关系或上联关系的程序。所以，缩简并非只限于确立对等成分类，它还要把所有能与文本同位意义集保持基本结构关系的内容成分都汇集成一个类。

---

① 原文：Q《estimabilité》( a ：《superlativité》)。——译注

同简单缩简一样，复合缩简也可分为若干类型。由于语义显现总是多义的，所以很难找到一些简单的实例。下面相继出现的例子就是如此：每个例子都几乎包含了我们要区分并予以个别分析的所有结构特征。所以，与被阐述的对象之价值相比，阐述本身更为重要。

1. *形象成分缩简*：借用斯坦因测试的句子，开头部分是：Lorsque Frank a vu son chef venir（*当弗兰克看见头儿走来时*）……学生的回答分两类。一类是：

…il a eu peur（*他害怕了*）（出现3例），
…il prit peur（*他慌了*）（出现3例），

经过简单缩简，产生信息表达式：

Q （害怕） ［$A_1$ （弗兰克）； $A_2$ （头儿）］①。

相反，另一类回答，例如：

…il tressaillit （*他吓得发抖*），
…il blêmit （*他吓得面无人色*），
…il a pâli （*他脸都吓白了*），

看来都是"peur"（害怕）的形象显现。由于为描写选择的同位

① 原文：Q（peur）［A1（Frank）；A2（chef）］。——译注

意义集是精神的，而信息角色所表现的却是“下级”(inférieur)和“上级”(supérieur)施动者，故我们可以认同这样一种做法：缩简始于实用行为，比如“面无人色”，而后将其缩简为“害怕”这一神话意义，而不是相反。但我们同时看到，此类实用谓项是下联的，从表现形式看，是以只叙事件的方式给“害怕”下的定义，开启了一个数目不定的风格学变体纵替换类。这样，出现的下联对等项类可扩大到下而这类回答：

…il se sauva (他溜了)，
…il s´est caché (他躲了起来)，
…il s´est dissimulé derrière le tronc d´arbre
(他藏到了树后)，
…il a tourné à l´angle de la rue(他转身拐过街角)。

而这些定义性序列，我们已经知道，可以合人名称类别。

2. 下联缩简与上联缩简：且看下列摘自伏尔泰《哲学书简》(《关于公谊会教徒的第一封信》)的话语系列：

(et lorsque après des batailles gagnées)
tout Londres brille d´illuminations,
que le Ciel est enflammé de fusées,
que l´air retentit du bruit des actions de grâces, des cloche, des orgues, des canons,
(nous gémissons en silence sur ces meurtres
qui causent la publique allégresse)

（打了几次胜仗之后）

整个伦敦灯火辉煌，

天空被烟火映得通明，

空气中回荡着各种感激的声音，钟声、管风琴声、礼炮声，

（我们默默地悲叹那些换来万众欢腾的杀戮）

我们所分离出来的节段（余者置入括号）是3个句子，人们可以把它们翻译成3个语义信息。但我们发现，这3个句子（以及“声音”限定成分的列举）其实是伏尔泰刻意使用的夸张手法，所以有必要把它们缩简为一个能包含三者的句子，例如：Londres célèbre la victoire（伦敦欢庆胜利）；这个不甚确切的陈述与任何规范化阶段前的整个节段对等，我们可给出如下表达：

F （欢乐）[A1 （非公谊会教徒）；量词 （全体）]

在修辞学范围内描述，问题看来比较简单。事实上，它牵涉到语言的词素运作，省略法或曲言法只能对其进行极不完整的阐述。任何语言功能都与一个所谓“实际”行为相对应，所以都可以被看做是上联的：它包含一系列可能的和潜在的部分功能，涵盖分得更细的行为；语言功能也可以被看做是下联的：它确实或能够归属于命名功能，代表整整一个部分功能算式。同一个问题，如果从命名角度看，而且应用于更大的话语单位，那么它也存在于资料收集领域，牵涉到如何做内容摘要（abstracts）这一复杂而又研究不够的程序，也即我们说的*压缩*（condensation）。相反的程序是*扩展*（expansion），它见诸作文这个法语教

学的话语模式，作文具有固定的格式，此系传统修辞学在失去活力之前留下的东西。这两个互补的程序需要制定一些缩简规则和生成规则，以便使它们成为用于描写和发现的技术。

这类规则的制定看来并非不可能，但需要指出，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会遇到一个困难，即缩简必须达到的最佳程度。该问题与数量无涉，我们不是要知道每个算式应包含多少功能项，也不是要知道可以命名的算式有多大规模。在整个描写过程中，我们依次对功能项进行压缩和扩展，但同时又要保持文本的同位意义集，这是一个平衡问题，会引人一些有碍描写的主观评价成分。这一因素是功能分析成功与否的关键。在部分涉及民间故事分析的章节里，我们已对普洛普（Propp）确定的功能项清单做了一些改动，以使故事的结构更趋平衡。借助此例，读者将看到，除了同位意义集这一有关描写的基本概念，缩简也必须考虑到故事的总体结构，亦即模型的内在一致性。

从这一角度看，缩简时而表现为压缩，也就是对上联功能进行命名，时而表现为扩展亦即将一个过于概括的功能划分为若干下联功能，尽管后者在话语显现时并不总是被赋名。

3. 功能缩简为品质：需要在此项目下考察的是两个不同的但在实践中又往往混淆的问题。一方面，在实施规范化程序时，我们很难有把握地确认品质义位，并把它们同功能义位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在缩简时，关键在于接受被确认的和照此记录下来的功能义位，并把它们分别或作为类别纳人品质义位清单。

a） L. 伊丽加蕾（L. Irigaray）女士设计的语义测试题具体说明并部分阐述了上述第一种情况。接受该语义测试的是圣安娜医院里的老年痴呆症患者，他们需要在3个序列中选择与docteur（医生）这个名称对等的序列：

Le docteur est – il celui qui arrange les voitures?

（医生是修理汽车的吗？）

Le docteur est – il celui qui conduit les trains?

（医生是开火车的吗？）

Le docteur est – il celui qui soigne les malades?

（医生是替人治病的吗？）

测试对象感到很为难，不知道哪个序列表示医生的品质，哪些序列赋予其一些功能。看来无需怀疑：此测试结果是一个结构界限（seuil），标明我们所确认的元语言作用在被观察的病人身上出现了衰退或中止。

但问题并不只限于此。在此例中部分起作用的东西，以及在任何分析中，当区分不是那么出乎意料时会再次出现的东西，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需要解释的话语序列均拥有一些包含反复体的功能。而在本例中，反复性体现为现在时与客体施动者复数形式的结合，现在时包含了"未完成时/完成时"这一混合型体范畴。因此，只要反复体或持续体在功能之先得到感知，功能就降低为定义之专属形象，表现为一种品质，也就是施动者的一个恒定属性。同样，如果功能包含了诸如"知"（savoir）或"能"（pouvoir）这样的语式成分，这些语式成分就把功能转变为恒定

的品质。还有别的例证:在我们所举的形象显现缩简为非形象显现的例子中,“il se sauva”(他溜了)的完成功能得以转化为“peur”(害怕),是基于诸回答的反复性,也就是说,是因为一个出现项被归入了集体语料集。

看来,品质和功能之间的关系性质还需要做进一步说明。假设描写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语料集中记录了赋予任何一个施动者的全部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清单至多能为我们提供施动者的活动范围。以后的分析只能将重点放在冗余功能上,所建模型也只能用来分析那些特有的行为结构。像这样处理功能虽然合乎情理,但有可能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功能在任何时候,亦即无论是逐一分别地对待它们,还是把它们放在部分清单层面上考虑,还是最终把它们作为被建成的模型来对待,都可能显示为品质、清单或品质模型的下联项。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么把功能转换成品质的程序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且有机会时我们还将尝试提供几个实例。但是,对功能的这种处理方法不应该混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功能模型描写,因为从现在起我们知道,任何功能清单并非不言明地从属于一个功能模型,而且后者的先决条件是诸功能之间有一个起码的程序编排,使功能得以连续转换。

由此可见功能分析的两大使命:只要该分析只考虑存在于功能和施动者之间的关系,其模型与品质模型便是相拟的,而且,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还是品质模型的下联模型;在功能分析涉及功能之间的关系时,它就能阐明这样一些模型,这些模型所描述的不再是语义微观域的存在方式,而是其转换方式。

## d) 语义学步骤与风格学步骤

关于前述诸描写程序的思考表明，每前进一步本质上都是选择一些意义成分，同时清除一些意义成分。从总体上看，描写步骤本身在于寻找内容的恒量，逐步遗弃内容的变量，亦即暂时不考虑内容的形式成分，借以实现内容的实体。

所以说，对任何一个语料集的描写是语义描写，只要该描写以出现项为依据，把出现项转换成清单，再把清单转换成类别，或许转换成类别的类，最终构建模型以阐明由语料集表达的语义微观域之存在方式。但是，这一上行的描写步骤可以而且往往必须由下行步骤来补充。该下行步骤的任务是从不变量模型出发，汇集每一阶段被遗弃的变量，并把它们组成系统的或词素的结构，亦即一些能阐明较高等级结构之运作方式和生成能力的子模型。我们把这个下行描写步骤称做风格学步骤。

风格学研究方式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方式与先前得到确认的复合缩简层面一致，属于下联（换喻）性质。第一次缩简时构成的义位和最终确立的同位意义集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一种风格学研究方式就旨在阐明对该差异做出定义的各类关系。此项研究可称为义位风格学（stylistique sémémique）。此风格学虽然位于一个更高的概括层次，但大体上相当于长期以来人们所研究的比喻和转义这类关系。第二种风格学描写方式需要收回简单缩简时被搁置一边的变量，因此需要研究分离（隐喻）性质的关系，并对能够构建成描写义位的出现项进行义素分析。

这种情况可称之为义素风格学(stylistique sémique)。从其任务看,它相当于一个有点受冷落的、但很快又会受到当下语言学思潮厚待的语言学门类——构词法。J. 杜布瓦为阐明他所说的微观系统(比较:voie ≃ chemin ≃ route,道 ≃ 径 ≃ 路;an ≃ année,岁 ≃ 年;matin ≃ matinée,早上 ≃ 上午;等等)而进行的描写可用作这类研究的模式。

说明:我们意识到这里所用术语的多义性。故此,我们说语义描写步骤是语义学的,是仅就其目的而言,因为该步骤要达及的模型是借助义素范畴来构建的,而义素范畴原则上属于内在语义层面。至于风格学步骤,它只是部分等同于结构性风格层级,而把基本层级和历史层级之间的关系问题搁在一边。与其制定一大套术语,倒不如致力于先满足建立一套术语所需要的条件。

语义学步骤和风格学步骤虽然只是同一个描写的两个阶段,但风格学步骤必须以语义学步骤为前提。若要谈论风格学分析,必须先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语义描写已告完成,二是内容的一个同位意义层之不变性得以确定,以使寻找其变量的工作有所依凭。否则,在语言之中,一切都有可能——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被看做是风格学的,而文学方法赞同者和语言学方法支持者之间的争论所隐含的误会只会趋于普遍化。

e) 结构化

结构化(structuration)一词用于指称缩简程序的补充描写

程序。该词看来很有用，因为它的字面意义是“组成结构”(mise en structure)，适用于缩简后得到的意义成分。

缩简和结构化这两个程序互为补充，确认这一点将使被视做程序的描写之历时性地位再次受到质疑。的确，如果说描写的结果——或者是我们现在对要采取的步骤所作的阐述——会让人觉得缩简和结构化这两项规定了两种不同操作所特有的前后接续阶段，那么描写本身就不能被认为是历时性的。一份出现项清单若要缩简为一个类并用一个义位来命名，就必须有另一份完全相反的清单同时被建成和命名。让我们来解释一下：把单独一份清单缩简为一个构成义位总是可能的，我们对“劳累”类中的对等项进行的缩简便是一例。但是，这样一种缩简如果不是在一个给定的语料集范围内进行，其目的不是为了同位意义描写，那就不一定适当，因为任何封闭的话语显现都属于一个为其特有的结构，而对等项清单则可以因语料集的不同而不同。这等于说，在此种情况下，缩简必须以需要描写的结构得到体现为前提，即便该体现是假设性的；反过来，结构化程序若要得以实施，前提是缩简必须先行完成。

我们知道，互逆预设是意义基本结构复合接合的特征。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说，被视为元语言的描写具有独特的结构，而且可以说描写的运作方式，亦即描写研究，意味着对构成描写的各个程序的同时把握。程序的组成项属于一个静态复合结构，而只要这些程序在该结构运作时被把握，那么这些程序就可以说是互补的，结构的共时地位也不会因此受到怀疑。故描写是一种元语言实践，在此实践过程中，所有程序的总合构成了描写

模型，它们同时出现，同时起作用。从这一角度看，诸描写程序仅仅是描写亦即结构的一些运作规则，就像语法规则能阐明语法的运作一样。

需要描写的语料集可以是简单的，它只需要一次结构化；它也可以是复杂的，需要几次结构化，而在此情况下，描写将分成一系列独立的、从等级上看互相交迭的部分描写。必须注意到，每一个部分描写只能把缩简后获得的义位内容组织成基本结构的接合形式。

f） 对应与生成

为了更好地理解缩简和结构化这两个步骤之间的互补性，这里我们愿意引入对应（homologation）这一概念。根据拉朗德的《哲学词汇》，在下面这类关系体系中，

| | | |
|---|---|---|
| A | vs | B |
| A′ | vs | B′ |

A 和 A′被看做与 B 和 B′"对应"。尤其"在数学领域，两个相似的或更多情况下是相关的图形之相应部分是对应的"。如果将这一概念的定义压缩一下，使之适应于我们的当下之需，我们说，

| | | | |
|---|---|---|---|
| S(s) | vs | 非 S | （非 s） |
| S′(s) | vs | 非 S′ | （非 s）， |

其意思是：如果义位 S 和 S′共有一个义素内容 s（即至少一个义素），而且这个被视为正项的义素同时以非 s 这一负项形式出现在义位非 S 和非 S′之中，那么义位 S 和 S′可说对应于义位非 S 和非 S′。换言之，把出现义位 S 和 S′缩简为仅一个描写义位，这样的缩简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是适当的：使缩简成为可能的同一义素内容同时以负范畴形式存在于平行的出现义位非 S 和非 S′清单中，而该清单也同时可以缩简为另一个描写义位，此描写义位与第一个描写义位对应。所以，照此理解的对应同时包含了缩简和结构化。

我们看到，简单缩简的特点在于力图识别一份给定的出现义位清单的义素内容 s，而且该识别程序要求：在人们力求识别义素范畴之正项时，其负项必须同时以“结构化”亦即分离方式出现。至于复合缩简，它要求所有的出现义位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后者一般为类义素；此外还必须出现其对等性只能靠下联关系来确定的义素内容。

至此我们一直把对应关系看做是二元的，但它也能扩大到接合为 6 项的基本结构。如果承认一个二元范畴可显现为 6 个出现义位并形成充分的意义差异，那就不能排除对应程序在以同样的方式接合的结构框架内实施缩简的可能性。

对应这一概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被我们确定在历史语料集交迭区域内的结构演变。雅各布森是最先对此感兴趣的人之一，他建议在结构成分受到多重限定这一框架内解释结构的变

化。故此，古法语词尾变化的消失当归因于话语成分横组合次序的先期形成：由于这两种现象重复存在，词尾构形成分便得以摆脱限制，趋于衰退。的确，此例仅说明构形成分如何被置换，因为施动者范畴"主体/客体"虽然在一个能指(signifiant)交迭区内也是被重复表达的，但它最终并没有被改变。

不过，我们倒可以在内容平面上设想此类多重限定。一个对应的二元结构，其作用如同一个恒定成分，重复产生与义位非S′、非S″、非S‴有分离关系的对应置换义位S′、S″、S‴……这样一个结构到一定时候就不再产生一些二元义位，而是产生一个三元的义位结构，亦即除了处于两极的义位外，还包括第三个连接复合项的义位。只要接合为3项的出现项持续生成，就会形成一个既包含二元结构又包含三元结构的交迭区域，之后只有三元结构得以存留。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248页)对这类结构变换做了描述，证明像下面这样的对应二元结构：

S(生)　vs　非S(死)

$S_1$(农业)　vs　非$S_1$(战争)①

能生成一个复合或中介第三项：

农业　vs　狩猎　vs　战争

① 原文：S　(vie)　vs non　$S_1$(mort)

$S_1$(agriculture)　vs　non　$S_1$(guerre)。——译注

（正项）（复合项）（负项）[①]

**说明**：事实上，像往常一样，问题要比初看上去时更为复杂，因为我们不清楚为何在出现项变化层面进行的置换在一定时候会影响结构本身。将变化归因于历史耗损这一解释看来不能令人满意。后面分析贝尔纳诺作品中的"生 / 死"结构时还会讲到这个问题。

与新结构项的生成相对立的，就是结构的退化，也就是结构因反向转换而趋于简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布隆达尔的见解。在他看来，人类智力的进步与倾向于使结构二分的简化同一，其实就是与结构的退化同一。当然，布隆达尔的这一强调与语言学问题无关，我们的术语只是把他的话颠倒了一下。

### g） 内容的建立与组织

对应关系概括了各种不同的缩简程序，使它们服从于关联结构组建上的要求。这样，从封闭的显现语料集出发，我们就语义微观域描写的一般性程序所做的列举和表述也就结束了。下面要提出的步骤可能已经关系到具体模型的组织方式。

因为，诸描写程序都带有普遍性，只要描写的内容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容，也就是在一个冗余的和封闭的显现话语内，由话语

---

① 原文：Agriculture vs Chasse vs Guerre
(positif) (complexe) (négatif)。——译注

的谓项评述建立的、故而是根据信息清单予以描写的内容。的确，对品质或功能谓项类的分析将分别或同时（借助其规则尚待阐明的分配程序）建立起语义施动者。我们对内容做了描写，刚才又对描写的程序做了研究，因此从原则上讲，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些对应的简单结构，其数量相当于施动者的数量。我们将要探讨的是一个新的描写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将对施动者进行新的结构化处理，确认施动者并构建经过描写的微观域。

不过，我们也可以使用另一个方法。谓项分析把功能信息清单转换成了少量对应的内容结构，所以它可以不赋予施动者以结构，而是相反，去关注功能类别之间的关系，并把对应的内容看做这些类别而不是施动者的组成部分。在确立功能时我们已经知道，若要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功能分析，诸功能项——在我们所处描写阶段将被赋予经分析的和对应的内容——就必须相互连贯，必须表现出一种历时性，一种逻辑上的“前”与“后”。因此，我们应该考虑这样一个描写阶段，这个描写阶段不同于施动者的构建，它把被赋予内容的诸功能项组织成一个转换序列。

这最后一个结构化阶段是对已经建立起来并被赋予施动者或功能的内容进行组织，所以描写应该到此结束。在预定的内容建立阶段，描写主要是分类的，是把意义组织成有等级之分、可自由处置的内容。我们应当力求从这一点出发去描写模型，这样的模型将使内容具体化，因为模型的存在方式就是经描写的微观域的存在方式。但是，模型同时又比具体的内容更具普遍性，而且看来是一些不变量，一些把意义组织成微观域的组织

形式,而被赋予微观域的内容只是些变量。

由此可见,我们处在一个需要揆情度理的领域,任何假设的提出都显得为时过早。所以我们将摸索着向前,后面三章是一些思考和部分分析实例,所探索的是一些具体领域。就部分分析做出的概括显然只具有一种假设作用。

# 关于施动者模型的思考

## 1° 两个描写层次

当一位神话学家，比如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打算描写一个神灵群体而逐一分析其代表人物时，他所采用的描写程序取了两条不同途径：

1. 任意选一个神，借助所有宗教的、神话的或民间传统的文本组成一个句子语料集，所选的神作为施动者(actant)归入此语料集。从功能信息清单出发，进行一系列缩简，继而建立对应关系，最终使神话学家得以构建可称之为神的活动范围的东西；

2. 构建一个类似的语料集，它包含此神的全部品质，这些品质可从外号、固定形容语、神的属性或含有神学评述的扩展词组中发现，而通过对该语料集的分析可确定此神的道德风貌。

由此可得出对同一个神的两种定义：第一种定义所依据的原则是通过神的行为认识神，但同时把神的活动看做是神话的，所以把神列为一个观念学领域的施动者之一；第二种定义把神

确定为一种集体价值观借以概念化的施动者之一。

人世间的事情也一样。例如，为描写拉辛的语义世界，罗兰·巴尔特选择了功能分析，他认为拉辛的悲剧不是心理分析的，结果只能是把那些赞同传统的品质解释的人给得罪了。

我们看到，在此分析层面，两种谓项分析，即功能分析和品质分析，彼此并不矛盾，相反，在某些条件下被看做是互补的，而且它们所取得的结果还可由一个模型转化为另一个模型：神可以按其自己的道德准则行事；他之被认为是典型的重复行为均可作为品质归属于他。诸描写程序的分离问题以后才会出现，也就是说要等到这样的施动者得以建立，亦即被赋予内容后，需要对施动者的存在或活动微观域进行描写时，才会提出描写程序的分离问题。这一新的描写处于更高的层次，因此，为了实施该描写，我们应至少拥有一定数量关于描写目标的假设，否则该描写就不可能进行。但是，为了建立这些假设，我们必须先尝试回答两个问题：a）一个微观域的各施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共同的存在方式是什么？b）我们赋予诸施动者之活动的一般意义是什么？该“活动”包括些什么，而且，如果该活动能引起变化，那么这些变化的结构框架又是什么？

我们先尝试回答第一个问题。

## 2° 语言学领域的施动者

泰尼埃的一个见解——可能只是出于教学上的考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基本的陈述方式比做一场戏。如果我们记得，根据传统句法，功能仅仅是语词所扮演的角色——主语(sujet)，是"行为的施行者"，宾语(objet)是"行为的承受者"，等等——，那么按照这样的观点，句子其实只是说话人(homo loquens)自己演给自己看的一出戏。但这出戏有个特别之处，即它的不变性：情节内容随时在变，演员在变，但演出之言语行为始终不变，而这种不变性是由诸角色的单一分配来保证的。

少量角色的分配所具有的不变性，在我们看来不可能是偶然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施动者的数量取决于意义感知的先验条件。关于被分配的角色之性质，我们觉得较难作出定论，但至少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不牢靠的三分表达式进行修正，代之以两个呈对立形式的施动者范畴：

主体(sujet) vs 客体(objet)

发出者(destinateur) vs 接收者(destinataire)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断：既然"自然"话语无法增加施动者的数量，也无法把对意义的句法感知扩大到句子之外，那么在任何微观域内，情况大概也一样；更确切地说是大不一样，因为语义微观域若能被定义为域(univers)，亦即一个意义总体，那它必须能像一场简单的演出，像一个施动者结构那样随时

出现在我们面前。

接下来我们在两个方面做了必要的实际调整，使这个借自句法的施动者模型符合它新获得的身份，符合微观域的新规模。调整之一，把诸句法施动项简化为它们所具有的语义身份（玛丽无论是收到信还是别人寄给她信，她总是“接收者”）；调整之二，把所有出现在一个语料集中的、且无论怎么分散都被归属于一个语义施动者的功能汇集起来，以便每个显现施动者都拥有其自己的语义投入（investissement），而且我们可以说，被确认的施动者，不管彼此是什么关系，总合起来便代表了整个语义显现。

这就是关于一个施动者模型的假设。语义世界过于庞大，无法予以整体感知，故应将其组织成一些可达及的微观域，我们所假设的这个施动者模型可视为这类可能的组织原则之一。现在，我们需要用一些具体的描写来证实上述语言学推断，同时帮助了解有关施动者范畴的意义和可能的接合方式。这些具体的描写所涉及的是一些限定的领域，至少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察结果，后者虽然不是以具体的分析为依据，却针对一些庞杂的表意集。

## 3° 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施动者

普洛普在《俄罗斯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中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第一个证据。该书的美国译本出版比较晚，法国人也是近期才读到这本书的。普洛普把民间故事定义为按时间线性展

开的 31 种功能，之后他提出了施动者亦即他所说的“剧中人物”(dramtis personae)问题。他之施动者观点属功能性质：依他之见，人物是由其“行动范围”来定义的，行动范围则由赋予人物的功能组成。如果对语料集中所有出现的故事进行对比，可以观察到人物(我们偏向于用“角色”称之)因故事而异，但赋予人物的诸活动范围却不变。这一情况可用下列简图来说明：

| | 信息 1 | | 信息 2 | | 信息 3 | |
|---|---|---|---|---|---|---|
| 故事 1 | $F_1$ | $a_1$ | $F_2$ | $a_1$ | $F_3$ | $a_1$ |
| 故事 2 | $F_1$ | $a_2$ | $F_2$ | $a_2$ | $F_3$ | $a_2$ |
| 故事 3 | $F_1$ | $a_3$ | $F_2$ | $a_3$ | $F_3$ | $a_3$ |

人们看到，如果把功能 $F_1$、$F_2$、$F_3$ 定义为施动者 A1 的活动范围，那么，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活动范围均没有改变，根据这一不变性，我们便能把角色 $a_1$，$a_2$，$a_3$ 看做由相同活动范围定义的同一个施动者之不同表现。

由此可知，如果诸角色能在语料集中出现的一个故事内得以建立，那么，作为一些角色类别的施动者只能从包含所有故事的语料集出发来建立；诸角色的接合构成一个具体的故事，而一个施动者结构则组成一个类型(genre)。因此，与角色相比，施动者具有元语言身份；而且要建立施动者，就必须先进行功能分析，也就是说，先要建成活动范围。

借助此双重程序，即通过功能描写建立角色和将诸角色类

别缩简成类属施动者，普洛普最终确立了一份施动者清单：

1° the villain 叛徒

2° the donor (provider)赠与者

3° the helper 帮助者

4° the sought – for person(and her father)
被寻找者(和她的父亲)

5° the dispatcher 委派者

6° the hero 主人公(英雄)

7° the false hero 假主人公(假英雄)

根据清单，普洛普从施动者角度把俄罗斯民间故事定义为含有7个人物的叙事。

## 4° 戏剧中的施动者

就在普洛普的分析中止之时，我们又获得了另一份颇为相似的清单，即E.苏里奥(Souriau)在其著作《20万个戏剧情景》中提出的戏剧"功能"一览表。苏里奥的思考虽说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也没有以任何具体分析为依据，但与普洛普的描写相去不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普洛普描写的延伸。苏里奥不可能知道普洛普的著作。这样的问题甚至不合情理。苏里奥思考之意义在于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对施动者的阐述可应用于另一类与民间故事大不一样的叙事——戏剧作品，而且取得了类似的结果。我们从中发现，苏里奥对叙述事件的故事(对他来说只是一连串"戏剧主题")和语义描写(依据可分解为施动者之

动作过程的“情景”)层次做了相同的区分——尽管措辞不同。我们还发现一份有限的施动者(他按照传统的句法术语称之为功能)清单。可惜的是,苏里奥在6个还是7个戏剧功能之间犹豫不定,最后决定把该数目限定为6。G. 米肖(Michaud)在其《作品技术》中对该数目提出异议,他有意恢复第7个功能——叛徒。这样的话,我们本可以得到关于民间故事和戏剧这两个不同“类型”(体裁)的相同定义,而这两个“类型”各自都会称自己是含有7个人物的叙事。

苏里奥的清单如下:

狮子座(Lion).........定向主题力量
太阳　(Soleil).........所追求的利益和定向价值的代表
地球　(Terre)....(狮子座所追求的)利益的潜在获得者
火星　(Mars)　........................反对者
天秤座(Balance)..........利益的仲裁者和分配者
月亮　(Lune)............援救和加强上述任一种力量

苏里奥的术语同时具有动能学和星象学特点,但我们不必因此而感到气馁,因为这些术语未能掩盖一种不乏严密性的思想。

## 5° 施动者范畴:“主体” / “客体”

普洛普和苏里奥的定义证实了我们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述:有限的几个施动者就足以阐明一个微观域结构。定义的不

足之处是过于形式化，又不够形式化，这是普洛普和苏里奥赋予它们的特征。仅用施动者的数目来定义一个类型，而把任何内容都弃之不顾，这是把定义置于一个过于形式化的层次；用一份简单的清单介绍所有的施动者，而不考虑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是过早地放弃了分析，把定义的第二部分(7 个人物)及其专属特征留在了一个不够形式化的层次。因此，施动者清单的范畴化实属必要。我们将试而为之，而作为逼近法的第一步，是比较我们拥有的 3 份清单：普洛普的清单和苏里奥的清单，第三份是我们在考察话语的句法运作方式时得到的，这份清单更为有限，因为它只包括两个施动者范畴。

通过初步考察，在普洛普和苏里奥的两个清单中，我们能找到和识别组成"主体"/"客体"这一范畴的两个句法施动者。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我们费了那么大气力也未能完全予以确定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却在这里出现了，即在两份清单中，此关系被赋予一个相同的语义——"愿望"(désir)，而这一点现在就应该记住。似乎可以这样设想：处在神话型显现维度上的及物性，即前面我们所说的"目的论关系"，经过这一义素组合，看来是一个体现"愿望"之意义效应的义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民间故事"类型和"戏剧情景"类型，由于是按"愿望"接合的第一个施动者范畴来定义的，所以能够产生一些具体的叙事，而在这些叙事中，"愿望"将以"寻找"(quête)的形式显现，该"寻找"既是实用型的，又是神话型的。

下面是该第一个范畴的对等成分表：

| 句　法 | 主　体　　/　　客　体 |
| --- | --- |
| 普洛普 | 主人公　　/　　被寻找者 |
| 苏里奥 | 定向主题力量　　/　　被追求的利益和定向价值的代表 |

### 6° 施动者范畴："发出者" / "接收者"

在普洛普和苏里奥的意图中寻找可能与这第二个施动者模型对应的东西会引起异议，因为诸施动者往往会混合显现，我们在句法层面已经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我们还常常看到，两个施动者可以合在一起，以一个角色的形式出现。

举例来说，一则叙事，讲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没有父母的干预，最后以结婚收场。在此叙事中，主体同时是接收者(destinataire)，而客体同时是爱情的发出者(destinateur)：

$$\frac{\text{他}}{\text{她}} \simeq \frac{\text{主体} \quad + \quad \text{接收者}}{\text{客体} \quad + \quad \text{发出者}}\text{。}$$

其中，4 个施动者反向对称，但混合成 2 个角色。

我们还看到，客体和发出者的分离极容易产生一个由 3 个施动者组成的模型。米歇尔·勒格朗(Michel Legrand)为影片《瑟堡的雨伞》写的歌词可以佐证。这段歌词概述了影片内容，

令人难忘：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一只苹果，一台戏。

相反，在《寻找圣杯》(la Quête du Saint – Graal)这类叙事中，4 个不同的施动者被接合为两个范畴：

$$\frac{\text{主体}}{\text{客体}} \simeq \frac{\text{主人公}}{\text{圣杯}},$$

$$\frac{\text{发出者}}{\text{接收者}} \simeq \frac{\text{上帝}}{\text{人类}}。$$

苏里奥的描写不会引起异议。在他的描写中，范畴

发出者 vs 接收者

得到明确标示，比如下面这组对立：

利益的仲裁和分配者/该利益的潜在获得者

但是，在普洛普的分析中，发出者看来被接合为两个角色，第一个角色被简单地混同于愿望的对象(客体)：

(被寻找者和)她的父亲，

而第二个角色像人们可能会预料的那样，以委派者(dispatcher)这一名称出现。的确，在具体故事中，委托主人公执行使命者时而是国王，时而是父亲——两者由或不由一个角色兼任。因此，我们不用做大的改动，也不用求助于心理分析，便能把被寻找者的父亲同委派者接合起来，而当他们(被寻找者及其父亲)分别呈现时，则把他们视为同一个施动者的两个角色。

至于接受者，在俄罗斯民间故事中，其活动范围看来与主人公-主体的活动范围完全融合。这里可能存在一个理论问题：能不能将这类融合视为划分标准，据以将一个类型分成若干子类？这个问题后面再表。

我们看到，至此，两个施动者范畴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完全以客体为轴的模型。该客体既是愿望的对象，又是交际的对象。

### 7° 施动者范畴："辅助者" / "反对者"

要确定其他施动者的范畴接合则更为困难，哪怕只是因为缺乏句法模型。不过，我们很容易就能辨认出两个活动范围，以及这两个活动范围的两类明显功能：

1. 一类功能在于提供帮助，或促成愿望的实现，或有利于交际；

2. 另一类功能则相反，它们制造障碍，或阻碍愿望的实现，或阻碍对象的交际。

这两个功能束可归于两个不同的施动者，称：

辅助者(adjuvent)　vs　反对者(opposant)

这一区分与苏里奥的表达相当一致，opposant(反对者)这个称呼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我们倾向于使用 G. 米肖引入的 adjuvent(辅助者)，而不用苏里奥的 rescousse(援救)。至于普洛普的表达方式，我们从中找到了“反对者”，即含贬义的 villain(叛徒)，而 adjuvent(辅助者)则涵盖了两个人物，即 helper(帮助者)和 donor(赠与者)。这一分析较具弹性，可能一下子不容易接受。

但不应该忘记，诸施动者是普洛普——且不说苏里奥——根据它们的活动范畴建立的，也就是说普洛普只是对功能做了缩简，而没有考虑到必不可少的对应关系。这当然不是批评普洛普，他所起的先驱者作用至关重要。我们只是记录下近 30 年来由于结构主义程序的推广而取得的进步。此外，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拥有两份可比清单的情况下进行操作，总比只有一份清单时来得容易。

人们会问，在我们要阐明其施动者结构的神话世界里，辅助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这种对立意味什么。初看上去，好像事情发展至此，在投射到价值论屏幕上的戏剧情景中，除了主要当事者，现在又出现了一些以图解方式象征世间善恶两股势力的施动者，中世纪宗教剧中的守护天神和魔鬼的化身。

还有一个惊人之处，那就是后两个施动者的次要性。玩弄一下文字，可以说——想到我们用以称呼这两个施动者的分词形式(forme participiale)——他们是两个境况“参与者”(participant)，而不是剧中的真正施动者。实际上，分词只是一些修饰名词的形容词，就同副词限定动词一样。

在实施规范化程序时，我们给了副词一个形式化地位，我们把它们称做“体”，使它们成为一个下联的功能子类。在法语中，在定义很不明确的副词类别里，有一份非常有限的性质副词清单，这些性质副词表现为两组对立项：

| | | | | |
|---|---|---|---|---|
| volontiers | (自愿) | vs | néanmoins | (仍愿)[①] |
| bien | (好) | vs | mal | (坏) |

它们正好可以被视为体范畴，但要从语义上进行解释看来不那么容易。第一个范畴表示在赋予功能的动作过程中的意志参与，而不管是否预见到会有阻力；第二个范畴则是主体(主语)对其自身动作过程(当主体与说话人同一时)的评价在功能上的投射。

大家已经看出我们的用意：在功能被视为施动者构成成分的情况下，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接受这样一事实：体范畴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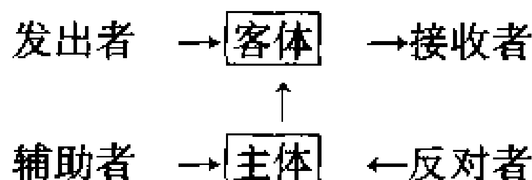
① néanmoins，副词，用作并列连词，意为“但是”、“还是”，用在后半句里，往往与“虽然、尽管”呼应，表示对立、转折。——译注

以构成境况施动者(circonstant),成为主体施动者的下联表达。在我们正在研究的神话型显现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辅助者和反对者只是主体本身的行动意志及其想象中的阻力的投射,而这些阻力是吉还是凶,则视主体的愿望而定。

这一理解值其所值。它试图说明为什么在上述两份清单中,除了名符其实的施动者,还出现了一些境况施动者,同时还阐明了它们的句法地位和语义身份。

## 8° 神话型施动者模型

从几份毕竟还不那么可靠的清单出发,同时考虑到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我们归纳并构建了这个模型。该模型比较简单,所以,仅就神话型显现而言,它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说其简单,是因为整个模型以主体所追求的愿望对象(客体)为轴;作为交际的内容(客体),愿望对象位于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而主体的愿望则投射于辅助者和反对者:




## 9° "主题"投入

前面说过,在我们看来,此模型具有应用价值。如果要探究此模型的应用可能性——作为旨在结构化的假设,那就应该先

做一个说明：我们把句法范畴比做普洛普和苏里奥的清单，这一做法迫使我们把主语（主体）和宾语（客体）之间的关系——此关系更具概括性，故我们先视其为目的论性质的关系，亦即一个“能做”（pouvoir faire）语式，而在功能显现层面，此语式将重新成为一个实用的或神话型的“做”（faire）——看做一种更加专门的关系，它包含“愿望”这一更为丰富的义素投入，并在显现功能层面上转化为“寻找”。这样，我们可以说，模型的各种可能的具体化应首先针对施动者“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并显现为一个由补充投入的义素组成的变量类。

因此，化繁为简，我们可以说，就古典主义时代的一个哲学家而言，愿望关系由于义素的投入而被具体确定为求知欲，求知剧中的施动者就可大致按下列方式分配：

| | | |
|---|---|---|
| 主体 | .................. | 哲学家； |
| 客体 | .................. | 世界； |
| 发出者 | .................. | 上帝； |
| 接收者 | .................. | 人类； |
| 反对者 | .................. | 物质； |
| 辅助者 | .................. | 精神。 |

同样，在活动分子层面上，按照帮助人这一愿望，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可做类似的分配：

| | | |
|---|---|---|
| 主体 | .................. | 人； |
| 客体 | .................. | 无阶级社会； |

发出者 .................. 历史；
接收者 .................. 人类；
反对者 .................. 资产阶级；
辅助者 .................. 工人阶级。

苏里奥提出了（同上，第258－259页）一份主要的"主题力量"清单，他要走的似乎也是这条路。他的这份清单，不管多么"经验化和不完整"（作者原话），却能让我们对需要考察的变化之广度有个大概的了解。

## 主要的主题力量

- 爱情（性爱或亲情、友谊，加上赞赏、道德责任、责任心）；
- 宗教或政治狂热；
- 贪婪、吝啬、财富欲、奢侈欲、享乐欲、对美好环境的追求、荣誉欲、权力欲、肉欲；
- 羡慕、嫉妒；
- 仇恨、报复欲；
- （对具体的、有关生命的或抽象的事物的）好奇；
- 爱国主义；
- 对某种工作的向往及志向（宗教、科学、艺术、游历、经商、从军、从政）；
- 需要休息、安宁、庇护、解脱、自由；
- 需要其它事物和其它地方；
- 需要激励、行动；

- 需要感受生活、自我实现、自我完善；
- 所有的罪恶或体验深渊带来的眩晕；
- 所有的惧怕：

害怕死亡、

罪孽、内疚

痛苦、贫穷

丑陋的环境

疾病

烦恼

失去爱情

担心亲人遭遇不幸、受苦、死亡、道德败坏、名誉扫地；

惧怕或企望冥间的事物(?)。

我们不能指责这一列举缺乏完整性或任何形式的分类，因为其作者没有做这方面的努力。不过也使我们能从中发现一个重要的区分，不然的话，这一区分大概会被我们忽视。该区分就是以愿望和需要为一方，以所有的"惧怕"为另一方的对立。由此可见，我们所提出的以"愿望"关系为轴心的施动者模型也会出现负的转换，而且：

顽念(obsession)　vs　惧怕(phobie)

这一范畴的组成项一旦被置换，从原则上讲，模型全部组成项的联结将受到严重影响。

刚才我们表达了这样一个假设：通过对模型之客体（对象）关系进行逐步的和可变的义素投人，我们有可能使模型具体化。但这一假设的主要缺陷在此暴露无遗：苏里奥所列举的各种可能的主题投人并不关涉真正意义上的模型，而是属于主体施动者或客体施动者的语义内容范围，而语义内容也可通过其它程序，特别是通过施动者模型构建之前进行的品质分析被赋予主体施动者或客体施动者。

## 10° 经济领域的投人

说到投人（investissment），我们不禁要举一个当代的神话型显现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企业投资（investissement）这个似乎只容许实用显现的领域，它展示了一个大体上与我们所提出的可操作模型相仿的施动者结构。相关的资料源自马尔戈－杜克洛兄弟（F. 与 J. Margot – Duclot）合写的文章《关于投资行为的一次临床调查》，文章收人一部集体著作，叫《经济与人文科学》。调查所采取的形式是非引导性访谈，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在一个由企业主向调查人员展示的施动者模型框架内进行，并不困难。企业主意在描述他自己的经济活动，而事实上是把该经济活动变成了一个有关道德化即神话式行为的语料集，从而揭示了一个暗含的施动者结构。

主人公－主体自然是投资者。投资者要描述一系列经济行为，需要阐明并强调他自己所起的作用。

投资的客体属观念学范围，它是拯救和保护企业：主人公有

时会运用风格学手段谈论企业，就像谈论一个需要保护其免受外部世界威胁的孩子。

反对者表现为威胁现有平衡的科技进步。

辅助者，当然首先是投资前的预备性研究，包括对市场、专利、盈利等方面的调查，以及经济计量学和运筹学研究。不过，所有这一切虽由主体大加发挥，但较之决定性时刻立马能用的嗅觉和直觉——能把总经理变成神话式英雄的神奇的回天之力——，实在算不了什么。

发出者是经济制度，根据一个不言明的契约，它委托主人公完成一个使命：通过大胆行使个人自由来拯救企业的前途。

接收者在俄罗斯民间故事里与主体合一，在这个例子中则不然，它是企业本身，一个混合型角色，兼任两个施动者——客体和接收者，因为主人公在此无私利可图，奖赏也不是托付给村子里大傻瓜伊万的公主，而是企业的效益。

在我们看来，这个例子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强调神话模型的存在，证明现代人可借助这类模型来解释其看似合理的活动——罗兰·巴尔特的研究已使我们习以为常——，而是为了说明话语显现的复杂性，即它既是正的又是负的，既是实用的又是神话的，这个因素是任何描写阶段都必须考虑到的。

## 11° 施动者与角色

客体(对象)关系的主题投人程序随时有可能混淆施动者模型描写和品质分析。仅仅因为这一点,该程序即使有效,也不足以阐明诸施动者模型的变化并促成它们分类。所以我们只好回到施动者本身,亦即施动者分配图式以及施动者和角色之间的风格学关系类型,看一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用做施动者模型个别化的类型学标准。

第一个这样的类型学标准可以是较常见的施动者混合说;有了这一标准,我们就可以根据混合的施动者的性质,把诸模型再分为几个类型。在民间故事中,我们已经看到,主体和接收者组成了一个超施动者(archi - actant);而在经济投资模型中,超施动者则是由客体(对象)和接受者混合而成,等等。从非价值观领域找来的例子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例如国际象棋里的"后",就是"象"和"车"合并而成的超施动者。

说到第二个标准,我们需要把混合说与分析型类分区别开来。分析型类分是把施动者解析为下义或下联角色,相当于角色功能的互补分配(distribution complémentaire)。普洛普就是这样尝试——我们觉得很不成功——把发出者定义为"被寻找者和她的父亲",其用意可能是要保全被当做被动客体的女性的人类尊严。列维 - 斯特劳斯的分析表明,为了在角色层次上阐明功能互补分配,神话往往偏爱那些适用于亲属关系结构的施动者称谓。神话里的施动者常常组合为成对的角色,例如:夫

与妻、父与子、祖与孙、孪生兄弟等等（附带还需要区分范畴对立和修辞分离，前者反映功能的互补分配，后者则是很快就会变得僵固的修辞手法）。说到这里，人们可以探究一下：精神分析法用来描写个体施动者结构的亲属关系模型究竟相当于什么？它们应该被确定在施动者的角色分配层面，还是经过初看上去显得过分的概括，代表了施动者范畴的隐喻式表达？

第三个类型学标准可能是一个或几个施动者缺席。从理论上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颇让人怀疑。苏里奥所列举的施动者缺席的例子均可理解为一种戏剧效果，而这种效果是由于等待某施动者显现所造成的。等待某个施动者显现与该施动者缺席不是一回事，确切地说，是与之相反：例如，答尔丢夫[1]在头两场戏中没有出场，或者在《蓝胡子》[2]故事集中对拯救者的等待，两者产生的效果只会使尚未显现的施动者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出现在整个施动者结构中。

不考虑施动者的具体角色分配，仅从操作上看，我们所提出的施动者模型可以被视为最适宜的描写，它不但可以缩简为一个更简单的超施动者结构，而且还可以延伸（延伸的范围一下子难以确定，但肯定不会很大），其原因在于施动者可以接合为一些简单的下联结构。

另一个问题是施动者的命名问题，而这个问题在较小程度上

①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所著同名喜剧中的主人公。——译注

② 法国作家夏尔·佩罗（1625－1703）所写的童话。——译注

属于功能分析范围。虽然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能阻止施动者模型把通过品质分析得到描写的内容联结起来,但我们还是按照普洛普的做法,尝试从功能分析出发构建施动者模型。施动者因此而呈现为角色,对它们的命名往往只能在分类学描写的框架内得到阐明:在此框架内,施动者以构成义位的形式出现,如同价值观网络内的一些固定点,而对这类义位的命名(在分析被我们武断地命名为"劳累"的义位时大家已经看到),如果不是偶然的,那就属于风格学层次,所以只有经过完整的品质分析才能得到证实。在谈到普洛普的分析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对民间故事世界的描写不可能是完整的,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这个世界赖以存在的文化价值网络。我们原则上同意这一看法,但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无知是妨碍描写的主要障碍,因为描写尽管不完整,但可以是适当的。例如下面几个借自不同出现童话的可比序列:

Un arbre montre le chemin…

(一棵树指出了路……)

Une grue fait don d'un coursier…

(一只鹤赠送一匹骏马……)

Un oiseau espionne…

(一只鸟监视着……)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的谓项缩简为一个共同的功能"帮助",并为3个角色公设一个集三者于一身的辅助者-施动者:因为没有价值观描写的帮助——在此情况下也不可能进行这种描写,我们无法重新找到这些角色各有其名的原因。

不过，仅根据功能分析来制定一门施动者风格学的基本概念，这或许还是可以做到的。

## 12° 施动者动能学

不应该忘记，施动者模型首先是由句法结构外推而来的。施动者不但是一个价值观内容的名称，而且还是一个类义素基，后者使其成为一个可能的动作过程（procès）：施动者的惰性来自它自身的语式地位，并使其与功能形成对立，功能则被定义为一种得到描写的动力。

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苏里奥为何要用行星和黄道星宿来命名施动者。星象学象征体系以其特有的方式阐述了施动者结构这一能够"影响"和支配"命运"的"力量"星座。从这一角度认识施动者结构，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阐述往往离不开动能和冲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该精神分析的概念化主要依赖于一个能阐明人类行为的施动者模型。一个算命女掌握了一个占星术模型，便能由此生出相当数量的算命天宫图；同样，普洛普不无道理地自问：经适当描写的类型模型是否会使同类新作品的机械写作成为可能。

施动者的这一特性使其在意义效应层次上形同惰力，可能成为某种施动者风格学的出发点。该风格学可阐明拟人、拟物、寓意、甚至某些类型的形象表达等手法。的确，令人不胜惊讶的是，那些最"抽象"的观念往往极容易回到几近形象的显现层次，例如：借助于对大写字母的浪漫主义爱好，Liberté（自由）、

Histoire(历史)和Eternel féminin(女性永恒的心理特征)这些著名的思想找到了具有类似风格学地位的其他扮演者,比如夏尔·德·奥尔良[①](Charles d'Orléans)笔下的Dangier[②](意志)、Bonne Nouvelle(好消息)和Merencolie(忧郁)。

我们还注意到,如果说主体-施动者迅速使其所承担的义位拟人化,产生下面这样的意义效应:

Le crayon écrit mal (铅笔不好写)…

Le journal se demande (报纸自问)…

那么客体-施动者因同时是"受动者"和"施动者角色"而赋予下联对象以所谓"象征"的意义效应,如:

la pomme d'Eve (夏娃的苹果),

le feu de Prométhée (普罗米修斯的火种)。

我们看到,诸施动者的能动性和它们各自特有的接合方式造成施动者混合,而施动者风格学的任务便是解释这类混合产生的意义效应。一种解释性命名理论虽部分地与词源学研究相切,但必须考虑到上述施动者固有的性能。这些施动者性能与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内容之分类体系结合,可形成一个变量清单,而根据这一清单,我们可以计算事件-名称的出现概率。

---

① 法国诗人(1394-1465)。——译注

② 与后面的merencolie同为古法语。——译注

## 13° 施动者模型与精神分析批评

在此阶段，我们不可能不谈到精神分析，因为施动者模型只要声称自己能涵盖任何神话式显现，那它必然要同精神分析学制定的模型做一比较，亦即与之发生冲突。这样，在普洛普和苏里奥那里都能找到的“愿望”就与弗洛伊德的“里必多”①(libido)很相似。因为里必多也建立起对象关系，该对象起初是散在的，投入语义后便使主体的象征世界具体化。其他角色的分配则显示出我们提出的可操作模式与精神分析所使用的模型之间的异同之处。

语言学家，也就是说一些门外汉，闯入了这个有些被神圣化的领域，这一做法恐怕只有一个解释，即精神分析学雄心勃勃，要把其模型用于语义描写，而且弗洛伊德也带头这样做了。我们的参与是有限的，只想稍微仔细地考察一下最近一次由莫隆(Ch. Mauron)所做的精神分析学诠释。莫隆替用于文学研究的精神分析学诠释选定了一个名字，叫精神分析批评(psychocritique)(《喜剧类型的精神分析批评》,1964)。

如果莫隆没有指出其原始资料的英国来源[尤其源自费尔拜因(Fairbain)]，人们还以为他总体上是在按照苏里奥的方法论步骤行事。很可能这只是一种巧合，但这种巧合证实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论态度。

---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用语，指由性欲产生的生命能量，在神经官能症病因学中起重要作用，有自恋里必多和对象里必多之分，前者指主体将自己的身体作为性爱对象，后者指主体将其里必多转移至外部对象。——译注

精神分析法包括3个基本可操作概念和3个不同的分析阶段。由于阶段之间的过渡不很明显，所以我们认为必须把这3个阶段集中在一起加以引述，尽管第一阶段可拿来同下一章的观念学分析进行有益的比较。

1. 描写的第一阶段在于证明，在同一位诗人的一定数量诗作中，有可能发现一些共同的、潜在的无意识网络。该阶段勾勒了两个程序，可以看出，此前我们已对这两个程序做了区分：一方面是把出现的功能简化为语义功能；另一方面是使这些功能连贯化——这个问题将放在后面讨论。因此，马拉美的两首十四行诗，《胜利躲逃……》和《长发如火焰飞扬……》，经上下迭放后，就可对功能进行缩简和组织，下面就有一例（《从强迫性隐喻到个人神话》，第39－40页）：

| 构成功能 | | 死亡 | 战斗 | 胜利 | 伟大 | 笑 |
|---|---|---|---|---|---|---|
| 出现功能 | 第一首十四行诗 | 自杀<br>坟墓<br>焦木 | 血<br>风暴<br>战盔 | 胜利地<br>光荣<br>金色<br>紫红<br>光辉<br>节日<br>珍宝<br>凯旋 | 国王的<br>神示的 | 笑 |
| | 第二首十四行诗 | 死<br>哀叹 | 红色<br>擦伤 | 荣耀<br>战功<br>闪闪发光<br>守护（神） | 王冠<br>头戴王冠 | 含笑的眼睛<br>欢乐的火把 |

在此，缩简所依据的描写步骤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这方面

的说明可能很有用，但我们没有找到，看来作者的兴趣不在于此。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首先确认这些网络的无意识特性，而后是它们的不变性、强迫性，以便设定“独立心理层”之存在，而这些“独立心理层”是非语言的，是它们构成了无意识。

2. 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并无直接联系，但使用了相同的方法，把从语料集中选择的序列叠加起来，以便在不同文本中显现的“神话形象”之间发现一些“隐秘的相似情感”。这些形象都是些人物，它们组成了一些“形象群”。这样，波德莱尔笔下的“被动形象”，诸如女人、喜剧演员、玻璃匠、丑八怪、小丑、侏儒，用我们的术语说，就是一些角色，可以缩简为仅一个施动者，莫隆称之为“幻想持有者”（同上，第134页）。这一把角色缩简成施动者的程序是先进行一种尚未成熟的功能分析，继而再把功能组合成“行动范围”，下面是该缩简程序的一个实例。依莫隆之见，这些“幻想持有者”具有下列共同特征：

> 1. 他们朝着一个目标走去，任人观赏，寻找接触。
> 2. 可他们行走艰难，他们自觉没了身价，接触并不存在，或只是不祥的（肮脏的、辱没人的、充满敌意的）接触。
>
> …………
>
> 总的感觉是在出卖自己。
>
> （同上，第132页）

这一描写如果更严密一些，或许还有价值。在此描写之外，莫隆还做了一些解释，这些解释借自精神分析（作者不无天真

地再三称其为"科学")："独立心理层"——对此我们无可置评，因为它本质上是无意识的(同上，第57页)——可以"被视为一种有人物出现的无意识梦"，换言之，就是一个变化万千的幻觉。

3. 第三阶段在于定义个人神话，而个人神话又被等同于人格结构。莫隆将这些方法论原则应用于法国一些大诗人的语义世界，发现任何"独立心理层"都包含多个"形象群"。如果说从一首诗到另一首诗，从一部散文作品到另一部散文作品，角色处于一个"变幻不停的戏剧情景"中，那么施动者则由于彼此间冲突关系之不变性而构成一个稳定的系统。正是这种"内在戏剧情景"，莫隆称其为个人神话(mythe personnel)。

## 14° 精神分析的施动者模型

初看上去，"强迫性戏剧结构"很像我们的施动者模型。但实际上，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两者大不相同。这个问题恰恰是把它们组建成结构的关系问题。对我们来说，施动者是由功能束出发构建的，施动者模型来自于施动者清单的纵替换关系结构化。相反，莫隆则是从"情景重叠"中看到了确立施动者间冲突关系的可能性。然而，情景是变幻不停的；正如苏里奥所强调，它们属于事件，亦即句子，而在句子中，功能被赋予句法施动者，而不是语义施动者，因为任何分析都无法同时处理两类可变量。精神分析批评也不太在意这类细节问题，因为它同时拥有精神分析传统为其提供的一组冲突情景和一组人格化模型："……弗洛伊德的研究表明，在梦中，梦者往往体现为两个或几

个不同的人物。我本人采纳了下列观点：梦中出现的所有人物或代表(1)梦者的部分人格，或代表(2)梦者的部分人格在心理上往往与之有自居[①](identification)关系的某个人"(R.费尔拜因：《人格的精神分析研究》，莫隆转引，同上，第217页)。因此，精神分析批评拥有弗洛伊德及其继承人制定的模型，它所实施的描写仅仅是汇集适当的材料，借以比较用现存施动者结构确认的角色和"情景"，而不是构建这类模型。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所能提出的批评直接涉及对精神分析的某种看法：莫隆错误地认为，精神分析是"科学地"建立起来的。

我们无意抨击精神分析之"存在"本身，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此就其使用的术语发表几点看法。行家们自己承认，比如庞塔里斯(Pontalis)：精神分析法所制定的工具概念体系非常混杂，它体现了对心理现实先后感知过程，以及这类感知的词化所借用的不同语言手段。

1. 首先是一种空间性概念化，人们借以把人格结构设想为几个相互联结的重叠层(超我、自我、本我)，它们与整个结构保持一种下联关系。莫隆所参照的正是这个模型，因为他断言"每个形象只能代表一个自我，或者代表超我或本我的某个方面"(同上，第120页)，而且他还说，"波德莱尔的有意识自我与该人物(即被称做'王子似的猫'的施动者)同一"(同上，第134页)。今天，用空间词汇表达概念的做法已成为——G.马托雷(Matore)看得很清楚——人文科学的一大弊病，或许还无法避

① 精神分析术语，指以理想中的某人自居的一种心理状态。——译注

免，当然我们也广泛使用这一方法，但没有因此而受其蒙蔽。对我们来说，语言的两个平面，或者说显现的两个维度，在定义层次上与空间毫无关系，它们仅表示一个复合结构的两个冗余项，也就是说，这两个冗余项是通过互为预设而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人格结构，我们真不敢妄加判断，但精神分析似乎有时候把这些人格层次看做非常一般的结构层次，有时候视它们为施动者结构的一些表现（它们行动、自检和宣泄），有时候还把它们看做意识层次——这让语言学家大感不便。不妨想象一下，如果要求语言学家根据“意识/无意识”这一范畴来描写法语的语法结构，他们会是多么为难，因为每出现单数，复数就要进入潜意识，而直陈式则要与无意识的虚拟式对立。自索绪尔及其表意结构观点发表以来（我们完全同意梅洛-庞蒂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意识与无意识对立这一二分范畴已经不适合于人文科学，所以我们自己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拉康所做的努力：他力图用自我接受（assomption）概念取代意识与无意识的二分范畴。（而且我们看到，当莫隆需要确定某个强迫性隐喻网络于某个诗人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时，他是多么为难。）

2. 此外，还有一个从亲属关系结构的描写术语中借来的施动者模型。该模型的接合方式仿照西方的小型家庭（父母与孩子），有时依据对“原始游牧部落”的描绘——这类描绘从人类学角度讲甚不可靠，但在弗洛伊德所处的时代非常流行。此模型有时会同上述第一个层叠式模型——只要它被用做施动者模型——发生竞争，甚至在分析过程中取而代之，莫隆对莫里哀的分析就是一例。对此我们可以从认识论角度提两点看法。一方面，“亲属关系结构”模型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相反它包含

了多个关系网络，而这些网络由于诸施动者的风格学“观相主义”(perspectivisme)被词化而趋于复杂：所以从方法论上讲，此模型使用起来可能难度不小。另一方面，它对人们思想的影响颇大，各门学科，包括语言学，受其左右达百年之久，都感受到它对方法论思考所起的抑制作用。

3. 最后还有一些神话学模型，比如俄底浦斯神话。弗洛伊德首先是以隐喻的方式用这些模型来描写某些情景而非情结-结构，然后再提取出这些模型的典型特征。

建立这类部分的、与“亲属结构”结成下联关系的模型，在方法论上是适当的，倒是它们的归纳特性使它们变得有点靠不住，此归纳特性表现为清点、列举临床病例和神话名称，而我们则愿意看到精神分析能超越这一归纳阶段，自成为一种施动和转换的分析模型理论。

既然是在谈论术语，我们就再补充一点：建立一个隐喻性程序来使一门自称是科学的学科概念化，这种做法只会严重影响该学科的发展。精神分析挡不住经常的而且是“无意识”的诱惑而将隐喻当做现实；这样一来它还把通往构建一种严密的和单义的方法论元语言的道路给封堵了，而用一种诗意的、暧昧的乃至常常会变暧昧为实在(hypostase)的语言来表达其确实无疑的发现。

这种做法也为其它学科所熟知，比如用音乐术语谈论绘画，或用绘画术语谈论音乐。但这种做法包含了不少其它风险。出

借隐喻性概念的领域自身也会发展，并以新的方式接合其概念和公设。人类学领域对神话的定义就是如此，而莫隆却力图利用原先关于神话的定义，借助精神分析来分析文学中的人格结构。经过一系列半因果、半类比，但始终是“动态的”同化（“动态的”一词放在“具体的”边上，如同一道屏障，恰好遮盖了我们的无知！），莫隆从幼年的神经刺激开始，达及反复出现的幻觉和个人神话，而这一发生的（génétique）、能动的和结构性的“整体”之统一性则由“独立心理层”来保证，至于这个“独立心理层”，人们无从知其一二。然而，经如此定义的个人神话，大体上相当于任何一则处于原始显现状态下的、故需要经过分析才能知其内在结构的神话叙事。由于一种并非只是术语上的悖论，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被大战所延误[①]，并在包含全部方法论问题的分析刚刚开始的地方停了下来。

① 精神分析批评方法由法国作家夏尔·莫隆（1899 – 1966）创立于1948年。——译注

# 转换模型探索

## 1° 缩简与结构化

### a) 功能的组织

普洛普著《俄罗斯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在今天已广为人知，俄罗斯民间故事与欧洲其它同类故事的相似之处也已不存疑问，所以我们不用预先复述其内容就可谈论这部著作了。我们知道，普洛普先对功能作了描写（功能描写在于把故事的横组合关系单位压缩为得到命名的语义单位，同时把这些以变量形式出现在诸具体故事中的语义单位确定为不变量），而后对民间故事这一叙事做了双重定义：

1. 根据经如此描写的功能和被赋予这些功能的施动者之间的关系，普洛普把诸功能分成若干活动范围，这些活动范围各自定义一个具体的施动者。这样，他就把故事理解为一个有 7 个人物的叙事；

2. 根据连续功能构成叙事这一事实，他得出了民间故事的第二个定义。依他之见，民间故事的特征是：

a） 具有一个相当有限的功能清单(31 个功能)；

b） 功能遵循一个必不可少的连续顺序。

在前一章里,我们尽力利用普洛普的第一个定义,探究定义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和解释一个更为概括的、可用于描写更多神话微观域的施动者模型。现在我们要做一次新的探索。我们已经看到,功能分析可用于描写施动者的内容,而后导致构建一个施动者模型;但同时它还能用作功能间关系描写的出发点。诸功能虽被组织为叙事,但至少在理论上具备下述两个特点:a） 由于任何话语显现都有冗余信息,所以诸功能在数量上应尽量缩减,以便被感知为简单结构;b） 诸功能由于连续出现在叙事中,故应同时提供一些评价成分,以阐明意义结构的转换模型之存在。

为了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这些理论上的预测,我们必须重新考察普洛普构建的清单,以便了解:a） 这份清单是否能大幅度缩简,缩简到可以将一组功能感知为一个简单结构;b） 诸功能的必然连续是何含义,这种必然连续在什么范围内可被视为结构的实际转换。

目标既定,现在就可以尝试简化普洛普的清单了,必要时还需进行新的缩简和建立有利于结构化的可能的对应关系。

**b） 功能清单**

普洛普的功能清单可大致转译如下:

1 . 缺席 (absence -*absence* );

2 . 禁止 (prohibition -*interdiction* );

3 . 违反 (violation -*violation* );

4 . 调查 (enquête -*reconnaissance* );

5 . 情报 (renseignement -*delivery* );

6 . 失望 (déception -*fraud* );

7 . 顺从 (soumission -*complicity* );

8 . 背叛 (traîtrise -*villainy* );

8a . 匮缺 (manque -*lack* );

9 . 指示 (mandement -*mediation , the connective moment* );

10 . 主人公的决定(décision du héros -*beginning counter action* );

11 . 出发 (départ -*departure* );

12 . 给予考验 (assignation d´une épreuve -*the first function of the donor* );

13 . 迎对考验 (affrontement d´une épreuve -*the hero ´s reaction* );

14 . 得到辅助者 (réception de l´adjuvant - the provision ,*receipt of magical agent )* ;

15 . 空间转移 (transfert spatial -*spatial translocation* );

16 . 战斗 (combat -*struggle* );

17 . 标记 (marque -*marking* );

18 . 胜利 (victoire -*victory* );

19 . 消除匮缺 (liquidation du manque -*the initial*

*misfortune or lack is liquidated* );

20 . 返回 (retour -*return* );

21 . 迫害 (persécution - *pursuit* , *chase* );

22 . 解救 (délivrance -*rescue* );

23 . 隐匿身份到达(arrivée incognito -*unrecognised arrival* );

24 . 见 8a;

25 . 给予任务 (assignation d´une tâche -*the difficult task* );

26 . 成功 (réussite -*solution* ;*a task is accomplished* );

27 . 辨认 (reconnaissance -*recognition* );

28 . 叛徒显形 (révélation du traître -*exposure* );

29 . 主人公显示本色 (révélation du héros - transfiguration;new appearence);

30 . 惩罚 (punition -*punishment* );

31 . 结婚 (mariage -*wedding* );

c) **功能配对**

这 31 个功能组成的清单过于庞大,难以把它建成结构。所以必须首先按照普洛普本人的建议,对它进行缩简。普洛普预感到功能有可能"配对",但是,在此阶段,配对只能凭经验,而且只需要符合两个要求:把叙事压缩成一些"情节"(épisode)单位,这些情节应具有二元特征,仅由两个功能组成。

经过这样的“缩简”,普洛普的清单按下列方式接合:

1 . 缺席
2 . 禁止 / 违反;
3 . 调查 / 顺从;
4 . 失望 / 顺从;
5 . 背叛 / 匮缺;
6 . 指示 / 主人公的决定;
7 . 出发;
8 . 给予考验 / 迎对考验;
9 . 得到辅助者;
10 . 空间转移;
11 . 战斗 / 胜利;
12 . 标记;
13 . 消除匮缺;
14 . 返回;
15 . 迫害 / 解救;
16 . 隐匿身份到达;
17 . 给予任务 /成功;
18 . 辨认;
19 . 叛徒显形 /主人公显示本色;
20 . 惩罚 /结婚;

人们看到,仅有一定数量的功能适合于配对。新的清单虽说有所缩简,但并不比第一个更容易操作。

d) 契约

人们会想，功能配对是否能从方法论上予以解释，使之变得可以操作。比如下面这对功能：

禁止 vs 违反，

在普洛普的横组合描写框架内，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解释为蕴涵关系（因为“违反”预设“禁止”）。相反，离开了任何横组合语境，这对功能就表现为一个义素范畴，其组成项既并合又分离，故可以表达为：

s vs 非 s。

功能配对，如果被定义为功能的范畴化，其结果便是分析能够摆脱，至少是部分地摆脱横组合连续顺序。这样，以并合相同项和分离对立项为特征的对比法便可用于清单上的全部功能。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在评论普洛普时（《结构与形式》）所指出的那样，“禁止”其实就是“命令”（injonction），即我们所说的“指示”的“负转换”。不过，“指示”也伴有一个与之相对的功能，即“主人公的决定”，而较为合适的说法是“接受”（acceptation）。有了这两组对立，4 个功能的总体结构就趋于明朗：

如果

$$\frac{\text{指示}}{\text{接受}} = \text{立约},$$

那么，

$$\frac{\text{禁止}}{\text{违反}} = \text{毁约}。$$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如果“禁止”是“指示”的否定形式，而“违反”是对“接受”的否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 4 个功能只是一个义素系统的显现，我们可以记录如下：

——或在上义层面上，它们显现为一个范畴：

$$A \quad vs \quad \bar{A};$$

——或在下义层面上，它们显现为一个系统，而每一组成项又显现一个范畴的分节：

$$\frac{a}{\text{非 } a} \quad vs \quad \frac{\bar{a}}{\overline{\text{非 } a}}。$$

基于这一理论上的对应，我们已把 A 设想为“立约”，现在我们同样能据以重新解释叙事的最后一个功能，即普洛普所说的“结婚”。的确，如果说整个叙事因毁约而起，那么在历尽波折后，正是“结婚”使被撕毁的契约得以修复。所以“结婚”并非

如普洛普让我们想到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的功能，而是在发出者和主体接收者之间缔结的一份契约，前者向接收者提供寻找的对象，而后者则接受了这个对象。因此，对“结婚”的表达应同于“指示/接受”的表达，只是有一点不同：这样缔结的契约因愿望对象的传递而得到“巩固”。

说明：以“结婚”功能的再处理为起点，我们将对普洛普的功能清单进行一系列修正。至于这类修正的理论条件，此前已经阐明；若要确保话语显现的同位意义，经压缩的功能的算式就只能根据所选定的概括程度来命名。

e） 考验

契约在必要时可以跟有表示结果的功能，并因此而能进入功能顺序，这一事实迫使我们将契约置于它所属的横组合图式之内。

举例来说，如果探讨一下主人公出发后马上经受的考验，我们就能发现普洛普的描写中还存在新的空白。例如，考验被解析为两个功能：

| 给予 | vs | 迎对 |
| --- | --- | --- |
| (the first function of the donor) | | (the hero's reaction) |

但这一解析尚嫌不够。因为，“给予考验”之后只能是“接受考验”，如同“指示”之后是“主人公的决定”一样。接下来的情

况也一样：继“接受”之后，应是“迎对”，后者以“成功”告终；最后，“考验”以一个结果功能即“得到辅助者”结束。

这样，我们可以说，任何考验（我们将用它指称刚才描述的、由5个功能组成的图式）依次包含下列功能和功能对：

| | | | |
|---|---|---|---|
| A = | 命令 | vs | 接受 |
| F = | 迎对 | vs | 成功 |
| 非 c = | 结果 | | |

如果将这一图式应用于叙事所包含的所有考验（有好几场），我们发现普洛普对这些考验的分析极不一样。我们只需制定一个对比表，对比一下故事中遇到的考验，就足以填补，而且几乎是机械地填补必然会出现的空白：

| 推荐图式 | 资格考验 | 主要考验 | 嘉许考验 |
|---|---|---|---|
| A 命令 | 赠与者的第一个功能 | 指示 | 给予任务 |
| A 接受 | 主人公的反应 | 主人公的决定 | —— |
| F 迎对 | —— | 战斗 | —— |
| F 成功 | —— | 胜利 | 成功 |
| 非 c = 结果 | 得到辅助者 | 消除匮缺 | 辨认 |

根据此表，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看法：

1. 此对比表揭示了故事所含的大量冗余信息：

a） 首先，被视为横组合图式的考验重复出现 3 次；它们的区别仅在于所获结果的内容不同；

b） 构成契约结构的功能对，在叙事开始时以否定形式 $\bar{A}$ 出现，而在叙事最后则重新以 A 的形式出现。此外，每次考验都以契约 $A_1$、$A_2$、$A_3$ 开始；

c） "迎对"/"成功"这对功能见诸每场考验，但我们看到，有一项在出现之前未见"契约"；

2. 考验图式表现为一种逻辑连贯——其性质稍后再作阐述，而不是一个横组合序列，因为：

a） A 和 F 这两对功能不一定邻接；主人公被派去执行使命，过了很久才有与叛徒的决战；

b） A 和 F 这两对功能可在考验图式之外重新单独出现；

c） 如果说 A 功能对能够被视做一个二元意义结构，那么 F 功能对则不然，其构成需要加以说明。

f) **主人公的缺席**

粗略看一下功能在叙事中的分布，我们便能知道叙事的高潮是主人公与叛徒的战斗。然而，这场战斗处在遭遇不幸的社会之外。叙事中，主人公从出发到"隐匿身份到达"这一长段序列中都没有出现。

如果稍加仔细地考察一下这段序列，我们又发现少了功能命名所必须遵循的同位意义标准。在普洛普的分析中，与主人公出发对应的是"返回"功能，但这一功能事实上并不表示主人公返回，而是他在战胜叛徒的那个地方逗留后的重新出发。所以，如果我们把"出发"(用 $\bar{p}$ 表示)理解为主人公开始缺席之时刻，那么与之直接对立的功能，作为与负义素对立的正义素，就不是普洛普所说的"返回"，而是"隐匿身分到达"(p)。

另一方面，与开始缺席的时间对应的是主人公到达战斗发生地之时($\overline{\text{非} p}$)；而与主人公到达战斗地点的时间对应的则是普洛普所说的"返回"(非 p)。这样我们就有了主人公的位移图式：

$$\frac{\bar{p}}{\overline{\text{非} p}} \simeq \frac{p}{\text{非} p} 。$$

还需要指出，位于 $\bar{p}$ 和 $\overline{\text{非} p}$ 这两个时间之间的还有"空间转移"，换句话说是快速位移(d)。该功能在战斗之前的叙事展

开中表现为一种特殊功能，而在战斗之后依然对称地出现，并与“迫害”/“解救”这两个功能混合。我们有理由认为，“迫害”/“解救”是一种功能混合，一方面它包含了 F 功能对（可分解为“迎对”/“成功”），另一方面又包含了快速位移。所以在“缺席”图式中，我们加进一个功能（d），即位移。该位移虽在相反方向上进行，但依然是冗余的：

$$\overline{p} + d + \overline{\text{非}p} \quad \text{vs} \quad \text{非}p + d + p。$$

关于这一图式，有两点需要说明：

1. 在叙事层面上出现的快速位移，应能说明施动者层面上愿望之强烈。按此理解，这种快速就不是一个功能，而是功能的体（aspect），而作为体，它与功能描写无关。我们关注这一问题只是为了分离混合功能内的一个冗余 F，因为在此分析层次记录下的混合现象值得注意；

2. 位移本身被视做范畴“去”/“来”，其价值仅在于指示主人公独来独往，并居住于一个与叙事的此处无关的他处。D. 保尔姆（Paulm）和 L. 塞巴格（Sebag）的论文（发表于《人》，第 3 卷）阐明了这一类型学分离的含义：主人公上天入地下水，居无定所；他的居住地有时在天国，有时在地狱。问题看来既复杂又简单，总之是过于复杂，以致无法在民间故事范畴内予以讨论，因为民间故事中投入的价值观内容还不够。所以我们暂时把主人公的缺席看做一个指示性表达范畴，该表达范畴还因主人公的中介功能而成为冗余，这一点稍后再予详述。

说明：长者（=发出者）的缺席也可做同样的分析。

### g) 异化与再整合

普洛普的读者一定发现，在他的描写中，前9个功能与其它功能有明显的不同。普洛普用希腊字母标示它们，认为它们构成了叙事本题的开场。我们已经知道前3个功能（缺席、禁止、违反）所起的作用，并在叙事中和叙事结尾找到了它们的对等项。所以现在只需研究一下构成这一“开场白”的另3对功能：

调查 vs 情报
失望 vs 顺从
背叛 vs 匮缺

首先我们发现，整整这一序列看来如同既定秩序受到破坏之后出现的一连串不幸，故它是一个负系列，按照前面的步骤中出现的对称原则，应有一个正系列与之对应。

第一对功能，即“调查”/“情报”，看来属于一般的交际范围，可更为简单地表达为“问”/“答”。与这样分解的语言交际相对应的，看来是分开出现在叙事下文中的两个功能：

标记 vs 辨认，

它们尽管用另一类能指来表达，但仍可理解为：

（一个符号的）发出　　vs　　（该符号的）接收；

这两个对称功能构成了正交际行为，而功能对

问　　vs　　答

看来构成了一种负交际。

如果考虑到神话型显现中常见的物化手法，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就是客体信息的发送，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对客体信息的索取。不过，我们观察到的对称性还需要由剩下两对功能的行为——我们假定它是对称的——来证实。

在叙事的最后部分，继主人公被认出之后，是叛徒被剥去伪装，原形显露。但是，叛徒之所以被剥去伪装，是因为他戴着面具。的确，尽管描写性词位"失望"并不明示这一点，但普洛普没有忘记强调：为了欺骗主人公，叛徒每次出场都少不了乔装改扮。这样，"失望"和"叛徒显形"之间的对立关系就明确了。

至于该功能对的第二个功能，即主人公的"顺从"，同样使主人公看起来——尽管不那么明显——像是戴着面具。因为，在此叙事阶段，主人公常常表现出像个天真汉，村子里的傻瓜，极易受骗上当，在紧急关头甚至酣然大睡，任叛徒为非作歹；总之，这完全是一个未显本色的主人公。与主人公的这种显而不露相对应的是他在叙事最后的大变样：主人公服饰华丽，英姿勃

发，显出英雄本色。至此，比较一下开头和结尾的功能，我们可以说，与叛徒和主人公的乔装改扮相对应的，是他们真实身份的公开。尽管对这些功能的词位表达比较困难，但假设得到了证实：开头的负功能与最后的正功能是平行展开的。

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这几对功能在演进过程中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先是负交际，亦即情报的索取，下来是欺骗行为，而欺骗行为之后是以偷盗或诱拐形式出现的背叛。但是，从结构地位看，这第三对功能更像第一对功能。因为这两个序列有一个共同点：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客体（对象）——信息或财物的象征表达——转手易主，从主人公（或从其亲朋好友）转移到叛徒手里。在中间那对功能中，即使有这种转移，也不太明显，而只有与主人公要经受的第一次考验作一比较，我们才能知道“失望”这一行为过程中转手易主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第一次考验的结果是主人公得到了辅助者，亦即使其取得英雄资格的魄力，故叛徒盗走的可说是主人公的英雄本质。

我们看到，叙事的初始和最后序列各自都表现出拥有 3 对冗余功能，它们的结构身分因此而趋于明确；这是一个共同的交际（亦即交换）结构，它包含了一个客体的转移，此客体是信息客体、魄力客体和财物客体；起始序列呈现为由主人公及其亲朋反复遭受的一系列匮缺，而与之对应的是最后序列中主人公的一系列收获。

然而，如果说“背叛”/“匮缺”构成了一对负交际功能，那么到了叙事的结尾，事情则变得有点复杂。与背叛对应的确是叛

徒受到的惩罚，但"匮缺"则以重复的方式得到消除：首先是战胜叛徒后财物回归集体，而后是结婚时主人公得到奖赏。

现在需要引入一套符号，对上述全部分析做一个概括。我们用一个大写的 C 表示刚才分析的 6 对功能：编号后，$C_1$、$C_2$、$C_3$ 通过 C 的重复来指示它们之交际身分的不变性，数字 1、2 和 3 则代表交际的可变客体。

另一方面，我们把初始功能系列看做结束系列的负转换，并用$\overline{C1}$、$\overline{C2}$、$\overline{C3}$ 表示这些初始功能。由于大写字母 C 始终表示一个能节分为义素 c/非 c 的范畴，故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平行和相反系列的符号表达式：

$$\overline{C1} = \frac{\overline{c1}}{\overline{非\ c1}} \qquad C1 = \frac{c1}{非\ c1}$$

$$\overline{C2} = \frac{\overline{c2}}{\overline{非\ c2}} \qquad C2 = \frac{c2}{非\ c2}$$

$$\overline{C3} = \frac{\overline{c3}}{\overline{非\ c3}} \qquad C3 = \frac{c3}{非\ c3}$$

接下来，我们便能按惯例把初始系列称做异化(aliénation)，而把最后系列称做再整合(réintégration)。

说明：引入了符号标记，我们就不用再为经过重新解释的功能另外赋名。

h) 考验及其结果

分析至此，我们已能对考验的结果做出解释了。考验共分

三次，每次都含两对功能 A 和 F，以及一个被视为每次考验之特定结果的单一功能。它们按叙事顺序表达如下：

得到辅助者
消除匮缺
辨认

除了这 3 个功能，所有的功能都成双搭对，所以这 3 个结果（conséquence）的单一身分可能让人不知所措。

幸亏有了对异化和再整合这两个序列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 3 个结果。就从主要考验的结果说起：“消除匮缺”看来是个正功能（非 $c_3$），它与自身的负转换即“匮缺”（$\overline{非\ c_3}$）对立。同样，“辨认”表现为“信息的接受”（非 $c_1$），与其正义素即“标记”（$c_1$），以及“情报”（信息传递）（$\overline{非\ c_1}$）对立。至于“得到辅助者”这个资格考验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与之对应的是缺乏英雄气魄，亦即“顺从”（非 $c_2$/$\overline{非\ c_2}$）。

把这些结果合人异化和再整合序列，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诸考验本身的含义。现有秩序遭到破坏造成异化，而考验的作用就在于消除异化所产生的有害影响。

i）**缩简的结果**

分析的第一部分，作为功能缩简的一种答案，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可用简图来表达叙事经缩简的最终功能清单。

秩序破坏　　　　　　　　再整合

与　　　　　　　　　　　与

异化　　　　　　　　　　秩序恢复

主要考验

$\overline{p}\,\overline{AC_1}\ \overline{C_2}\ \overline{C_3}pA_1\ \overline{p_1}(A_2 + F_2 + \text{非}\ c_2)d$

资格鉴定

$\overline{\text{非}\ p_1}(F_1 + c_1 + \text{非}\ c_3)$

寻找

$\text{非}\ p_1d\quad F_1P_1(A_3 + F_3 + \text{非}\ c_1)C_2C_3A(\text{非}\ c_3)$

要求

A　=　契约（指示　/　接受）;

F　=　斗争（迎对　/　胜利）;

C　=　交际（发出　/　接收）;

p　=　在场;

d　=　快速位移。

## 2°　解释与定义

### a)　叙事的非时间性与历时性成分

上面的图式代表了经缩简的功能清单。这一缩简只有在不完全顾及叙事定义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依普洛普之见,叙事必须遵循一个连续顺序。

相反,我们所做的这种缩简则要求对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纵替换的和非时间性的解释,因为有效的功能配对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蕴涵关系

$$非\ s \rightarrow s$$

因配对功能的义素内容中存在分离关系而能转化为

$$s \quad vs \quad 非\ s,$$

从而使我们能够把功能对感知为基本意义结构。

这一纵替换关系解释是从整体上把握叙事意义的条件。它允许我们撇开横组合连续顺序,找到更大的意义单位。这些意义单位的组成项是在被分别对待的功能中显现出来的义素范畴,它们的构成关系也是分离关系。尽管如此,为了标记两个结构层面之间的区别,我们用大写字母记录下这两个层面的组成项已经是义素范畴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又用叠加的负号记录下它的负项。

如果稍加注意,便可发现该程序不过是将功能缩简为一些功能范畴,之后作为第二步,再建立这些范畴的对应关系。该程序使我们能在绕过叙事的展开和不考虑功能重复的情况下,得出两个对应的功能结构:

$$\text{和}\quad \begin{array}{ccc} A & vs & \bar{A} \\ C & vs & \bar{C}, \end{array}$$

并考虑将叙事解释为一个非时间性简单结构的可能性。

**说明:**对交际结构 $C/\bar{C}$ 的分析并非像其表达式那么简单。它需要详尽的阐述,但在本章范围内不可能做到,我们将在另一个场合讨论。

因此,如果不存在历时性残余,整个叙事可以缩简为这一简单结构。这一历时性残余表现为功能对:

迎对 vs 成功,

我们用 F 把它记录下来,并称其为"斗争"(lutte),它不可能转换成一个基本的义素范畴。

b) **考验的历时性地位**

功能对 F 具有两个不同寻常的特点:它非但不能被解释为义素对立范畴,而且看来是惟一对称的单一功能序列,也就是说在叙事的任何时刻都不会以负的形式出现。

相反,F 这对功能却作为构成成分进入一个我们称做"考验"的历时性序列。该序列的构成是:

A + F + c。

因此，"考验"可以被视为一个不可缩简的核心，它能阐明叙事为何被定义为历时性进程。我们现在就能发表一些看法，详细讨论一下这一历时性地位：

1. A 和 F 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视为连续关系，而不是必然的蕴涵关系。因为 A 或 $\bar{A}$ 可以单独存在于叙事之中，且不一定导致 F 的出现，所以 A 并不以 F 为先决条件。另一方面，F 可以不在 A 之后出现在叙事之中，所以 F 并不预设 A。

这等于是说，"考验"序列虽是作为连续演变的叙事之特征，但并不强行规定该连续性，亦即该连续性并不像普洛普所希望的那样是必然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事情恰恰相反，"考验"显示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即使"考验"看似一个固定的序列，这也不是内在的因果关系所致，而应归因于冗余现象，后者把"考验"作为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它一种额外的神话内涵，也就是确认主人公的自由；

2. 虽然 A 和 F 之间的关系是连续关系，那它也不应该被视为依靠"邻接"这个能指来显现的关系。连续通常也容许分隔，而我们尤其看到：主要考验把它的两对功能 A 和 F 给隔开了，但这样反而使叙事更为紧凑。

3. 不过，A + F 这种自由连贯所获得的历时性结构地位，是该自由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结果确实是必然的；它预设 A + F

的存在，这种情况尤见于某些叙事的曲言概述：辅助者被赋予主人公，而对该转移之前的考验，叙事可以不予提及。可见考验所起的作用只是促成 A 和 F 的连续，结果非 c 的出现则是对这种连续性的确认。

尽管“考验”像这样具有一个特殊的历时性地位，但它仍与前面定义的施动者模型保持一种确定的平行关系。

因为被牵扯进考验的不但是 6 个施动者，而且那些使施动者模型的接合成为可能的范畴也都能在考验中找到自己的对应者。这样，与交际范畴对应的是契约的结构。F 这对功能就以斗争形式显示辅助者（为主人公所有）和反对者这两股势力之间的对立。至于考验的结果，我们看到它以不同的形式体现了主体所获得的愿望对象。

叙事包含 3 次考验：

资格考验、
主要考验、
嘉许考验，

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后两次考验所包含的功能与叙事的施动者逐个对应。第一次考验的结果是主人公获得参加决定性考验的资格，所以它通过 F 表现出来的是一次模拟的，也就是象征性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发出者扮演了反对者角色。

## c) 叙事的戏剧张力

如果说考验独自规定了叙事的历时性，那么叙事的时间展开还要依靠一定数量的手段，这些手段是叙事技能的组成部分。该叙事技能组成叙事的“二次转化”（被称为戏剧情节、悬念、动力和张力），可定义为功能分隔，也就是说，把属于同一意义结构的义素内容分散于叙事功能链中。

这样，与义素$\overline{\text{非}\ c_3}$（匮缺）对应的是义素 $c_3$（消除匮缺），但两者相隔 15 个功能。在此无需再对“匮缺”进行评述：苏里奥认为这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处境，它产生需要，促使行动。该负义素一旦设定，叙事就要致力于找到正义素，即“消除匮缺”。由$\overline{\text{非}\ c_3}$ 和非 $c_3$的分隔产生的张力可称做“寻找”（Quête）。

就在“寻找”这个张力放松之时，一个新义素 $c_1$被设定（标记），张力便倾向于相反义素非 $c_1$（辨认）的实现，尽管它由于所寻找的义素是正性的（非负性的，如同在“寻找”情况下一样）而显得比较小。该张力可称为“要求”（Requête），亦即要求辨认主人公。

至于第三个张力，即把$\overline{\text{非}\ c_2}$ 和非 $c_2$联结起来的“资格鉴定”（qualification），如果说它看起来比较弱，那只是因为对主人公的资格鉴定仅预示了他的胜利，而不是该胜利的最终取得。但它的结构与张力“寻找”的结构相同，两者构成了引导情节的冗余张力。

我们认为，如果功能分隔的尾义素同时构成考验结果，那么这样的功能分隔所产生的张力是主要张力，因为该张力被合入考验结构本身并成为其定义的补充部分。相反，那些被分隔的义素对立，若其首义素并不在考验结果之前，那么它们所构成的张力就被视为次要的、非相关的张力。

d) **叙事的两种解释**

考验定义了叙事的历时性，并构成叙事的纽结，但它远未穷尽叙事。因为，除了斗争(F)，考验的其它构成成分可以说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它们的语义投入，它们的意义，亦即考验的意义，只能来自于语境，也就是说来自于考验之前或之后的叙事序列。

苏里奥非常简单地定义了一个剧本的总体结构：开场情景近乎平静，与之对应的结尾情景几近平稳，两者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我们已经知道这发生在叙事中间的“一些事”是什么；但叙事本身的意义只能来自开头和结尾这两个稳定情景。

叙事开头和结尾这两个序列由两个义素范畴组成，它们的形式或是正的，或是负的：

| 起始序列： | 结尾序列： |
| --- | --- |
| $\bar{A} + \bar{C}$ | $C + A$ |

如果我们认为这两个序列包含了叙事的主要语义投入，那

么对这两个序列的解读就应该提供有关民间故事之意义的答案。然而,事情变得复杂了,因为,根据诸结构项之间的关系所属类型,会出现两种解读方法。第一种解读包括非时间性地感知以范畴形式出现的各组成项,并在两个范畴之间建立关联:

$$\frac{\bar{A}}{A} \simeq \frac{\bar{C}}{C},$$

这就意味着:契约(既定秩序)的存在与契约(秩序)的不存在对应,如同异化与对价值的充分享用对应。

第二种解读考虑到了各组成项的时间性布局,故能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看做蕴涵关系:

$$(\bar{A} > \bar{C}) \simeq (C > A),$$

对此我们大致可作这样的评论:在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里,各种价值被颠倒了;价值的重建使法制有可能恢复。

我们看到,这两个表达式虽有相同的组成项,但含义大不一样。

e) **叙事的非时间性意义**

第一个表达式表现为分属两个不同领域的两类事实之间的关联:

1. 社会领域:法律秩序、社会的契约组织秩序;

2. 个人或个人间领域:因人际交流而得以存在和拥有的个人价值。

因此,从纵替换关系上理解叙事,便能在两个领域之间,在个人命运和社会命运之间建立起关联。我们看到,照这样理解,叙事不过是显示了存在于集体价值观层面上的各种关系,不过是这些关系的可能的表现形式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讲,民间故事也只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体现了某些意义结构,而这些意义结构可以先于民间故事,而且在社会话语中,它们多半是重复的。

所以,借助关联,我们能把叙事理解为一种简单的意义结构。至于被视为关系的"关联"(corrélation)本身,它本质上是关系的显示;一旦形诸文字,用连词"comme"(如同)表达,便能在诸比例项之间建立起并合关系。

现在我们必须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诸关联项,看一看在缺少价值观语境的情况下,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深化对民间故事意义的理解。

首先来看一下比例式中涉及个人领域的第二部分。在缩简过程中,我们把每个 C 理解为一个交际程序,其特征是传递一个象征客体。之后,该交际按照所传递的客体被个性化,而每个变量客体均用不同数字 1,2,3 表示。这一用来阐述交际客体

(objet en communication)亦即价值观的神话模型,在人类学领域极为常见,故无须再予以强调;更有意义的做法是尝试把握该模型的性质。

1. 在 $C_1$ 情况下,交际客体是一个信息,是一种"冻结的"(gelé)、物化的、故能传递的言语。信息客体是"认识"和"辨认"的关键,故我们可以认为,它在神话显现层面上表达了语式"知"(savoir)。

2. 在 $C_2$ 情况下,事情涉及魄力的传递,该传递使人丧失或获得行动所必需的力量。从神话这一角度看,魄力客体可相当于语式"能"(pouvoir)。

3. 在 $C_3$ 情况下,交际是转移愿望的对象,故它相当于语式"愿"(vouloir)。

构成叙事赌注的各种价值和构成施动者模型的诸语式范畴之间的关联具有什么性质,暂且我们还不敢断定,但这一关联的存在却能证实两者都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由此可见,这些新的解释看来在一定程度上证实:我们在指称叙事序列 $\overline{CCC}$ 和 CCC 时所使用的价值异化和再整合这两个词是合理的。

概而言之,比例式的第二部分实际上确定了一种取舍,即在异化的人和充分享用各种价值的人之间做出抉择。

至于比例式的第一部分，它更为简单，也更为复杂。我们已将 A 定义为社会契约，但初看上去，它的身分同样具有交际形式，因为发出者命令接收者采取行动，接收者也接受了命令。所以这是一种自愿承担的责任。在 $\bar{A}$ 情况下，发出者禁止接收者采取行动，这显然是 a，是命令的负转换，而这个命令是“要求做”（而不是“要求不做”）。这时的契约是负性的，因为它使人失去了行动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与“接受”对应的是“违反”。“违反”虽是“接受”的否定形式，但它并不完全是否定的，因为它包含了行动的愿望，故与“禁止”对立，因为“禁止”是禁示行动。所以“违反”这个组成项是模棱两可的：

a） 就“接受”而言，“违反”是“接受”的否定：

$$\text{非 } a \quad vs \quad \overline{\text{非 } a} \;;$$

b） 就“禁止”而言，由于“禁止”是“命令”（命令行动）的否定，所以“违反”是否定之否定（对不准行动的命令的否定）；故：

$$\bar{a} \quad vs \quad -(\bar{a})。$$

换言之，否定之否定是一种肯定（比较：法语中用于否定答复否定问句的“si”）：

$$-(\bar{a}) = a。$$

这就是说,"违反"是一种"命令"。这样的演绎虽说初看起来是个悖论,但只要以功能转换为限,不考虑施动者,悖论就能得到解释:"违反"确是命令,该命令包含了对发出者的否定,并代之以接收者。的确,在命令功能中发出者和接收者归于同一,这似乎就是愿望,是有意识行为的定义。

这样我们就看到,如果

$$A \quad vs \quad \bar{A}$$

是社会契约的订立和撕毁之间的对立,那么毁约就具有另一种正性意义,即显示出个人的自由。因此,叙事所确定的取舍即是在个人自由(也就是无契约)和被接受的社会契约之间做一抉择。经过这一补充分析,民间故事的真正意义才得以显示:民间故事如同神话,是各种矛盾,是各种同样是不可能的和无法令人满意的选择之对峙,而这也是列维－斯特劳斯的预感和断言。

在俄罗斯民间故事这一语境中,该神话矛盾表述如下:个人自由必然导致异化;价值的再整合必然以秩序的建立,亦即以放弃个人自由为代价。

现在需要考察一下叙事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

### f) 转换模型

我们看到，对叙事的分析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定义。

第一种定义属历时性质。叙事被缩简为“考验”序列，后者在话语中显现为一个施动者模型，故在某种程度上使意义人格化，呈现为一连串人类（或拟人类）行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行为同时包含了一种时间上的连续（它既非邻接又非逻辑蕴涵）和一种连续自由，也就是说包含了人们习惯上据之定义历史的两个属性：不可逆性和选择性。我们还知道，这一不可逆选择（F 在 A 之后）必有一个结果，从而使参与历史进程的人始终负有责任。所以，顾名思义，叙事的基本历史性序列包含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全部属性，即不可逆转性、自由和责任。

这样解释“考验”就能使我们把“考验”视为形象模型，亦即一个有机的神话行为集，并借以阐明历史的、真正意义上的历时性变化；而且，按此方向继续对叙事进行分析，最终我们将明白，对转换模型的描写是可能的。从这一角度看，“考验”的作用就清楚了，即它承担了一个给定的内容结构：

$$\frac{\bar{a}}{\overline{非\ a}} \simeq \frac{\bar{c}}{\overline{非\ c}},$$

并通过神话操作，亦即重新考虑各组成项，将该结构转换成一个不同的内容结构：

$$\frac{a}{非\ a} \simeq \frac{c}{非\ c}。$$

转换之前和之后，哪怕是粗略比较一下这两个结构，我们便能发现，转换似乎就是去掉需转换的结构的负号，换言之，转换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最终显示肯定的元语言步骤。

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考察一下考验图式中尚未分析的成分了。我们看到，叙事所包含的3次考验每次都产生一个特殊的结果，即非 $c_1$、非 $c_2$和非 $c_3$，而且这些结果不但是考验的产物，还同时是义素范畴的正项，而义素范畴的负项则以前项(antécédent)的形式出现在“考验”要转换的结构中。因此，应能对转换本身做出阐明的正是“斗争”(F)(它是惟一不可能分析成非时间性结构的功能对，而紧随其后出现的正项属于我们力图转换的结构)。

斗争看来首先是辅助者和反对者的对抗，也可以说是复合意义结构中正负两项的显现，而这一显现同时是功能的、动态的和拟人的。紧随对抗的是功能“成功”，即辅助者战胜反对者，也就是说对抗之后是负项遭到破坏，惟正项获益。这样一解释，斗争就是以神话的方式表现了复合结构的分裂，也就是说它代表了否定负项而只留下基本结构之正项的元语言操作。关于这一涉及判断性质的问题，下一章里，在非形象层次上，我们还有机会予以讨论。但是，不管怎么样，斗争看来已经是元语言活动的表现，因为它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内容，而是依赖于“结果”的内容，而我们知道，“结果”是分开显现的，与斗争无关。

但是，“结果”不只是斗争的结果，它同样是斗争前立下的、

也是考验之构成成分的部分契约的结果，所以“结果”是对该契约的承认，是契约得到履行的证据，并意味着被撕毁的整个契约的部分修复。关于肯定判断的语言学解释，后面还会谈及，在此我们无意在这一问题上多做耽搁，而只想指出：考验被视为转换模型的形象表达，它引入了一个历时性维度，该维度使在其之前和之后的结构所获得的价值观内容形成对立，但同时又阐明了它们的转换。

### g） 作为调解者的叙事

功能分析旨在确定话语显现范围内功能间关系的性质。我们看到，经过功能分析，叙事（尤其是俄罗斯民间故事）可以有两种解释，显示了两种内在模型的存在：第一种解释阐明了一种构成模型，它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即看起来不能令人满意而又无法避免的价值观内容之约定组织形式；第二种解释则相反，它能阐明一种转换模型的存在，提供一个观念学解决办法，一种对投人内容进行转换的可能性。

叙事可以有两种解释，这种可能性只能说明叙事包含了大量的矛盾。叙事既显示了恒定性，又显示了变化的可能性，既显示了必然的秩序，又显示了破坏和重建该秩序的自由。不过，此类矛盾非肉眼可见；叙事给人的感觉是均衡，矛盾不显。从这一角度看，叙事本质上扮演了调解者角色。应该说，这种调解作用体现在众多方面：体现在结构和行为之间、恒定性和历史之间，也体现在社会和个人之间。

我们认为可以做一个概括——或许太过概括——,把这种叙事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接受现有秩序的叙事,另一类是拒绝现有秩序的叙事。在第一种情况下,出发点在于确认该秩序之存在理由和对其做出解释。该秩序存在着,非人力所能改变,因为它是一种社会的或自然的秩序(白昼与黑夜、夏天与冬天、男女老少、耕者与猎人的存在,等等);它在人这一层次得到解释,因为寻找、考验是建立了这种或那种秩序的人类行为。叙事的调解作用在于"使世界为人所认识",赋予世界以一个事件的和人的维度。这样,世界的存在就得到了人的解释,人也就融人了世界。

在第二种情况下,现存秩序被视为不完美,人被看做是异化的,处境被认为难以忍受。叙事图式就投射为一个调解范型,一个拯救者的许诺:人类、个人应该肩负起世界的命运,应该通过连续不断的斗争和考验来改变它。叙事所显示的模型就这样阐明了不同形式的得救之策,并就任何因匮缺造成的无法忍受的境遇提出了解决办法。

这样把历史引人分析,而不管该历史是解释的还是投射的,是循环的还是开放的,都给分析增加了一层意义,使我们想到,像俄罗斯民间故事描写所显示的这些模型究竟有何价值,有何意义。

## 3° 转换模型与心理剧

### a) 从集体到个体

叙事被视为话语显现,依凭诸功能间的连续关系来展示一

个内在的转换模型。不幸的是，叙事的定义仅仅建立在同一类叙事，即俄罗斯民间故事之上。因此该定义的价值就十分有限，除非我们能证明：在民间故事这一叙事中得到确认的模型同样存在于其它价值观领域，也同样适用于不同表现形式的叙事。甚至可以说，模型的新应用领域离其原产地越远，其意义应越具普遍性。

我们就便用来进行新试验的领域似乎符合这个要求。这里涉及的语料集是由一个患“强迫症”的孩子在接受心理剧治疗时所讲故事的概述组成的。这些概述，连同作者的评述，均摘自萨菲安所著《关于分析心理剧的思考》(载《心理学简报》，Bulletin de Psychologie，30 nov. 1963)。我们知道，要获得一些原始的、未经解释的精神分析材料以满足语义描写之需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萨菲安的概述确有其优点：一是简单，二是包括了由孩子表演的全部治疗过程。该语料集的价值显而易见：与民间故事这类集体作品相反，构成该语料集的叙事只属于一位个体说话人。另一方面，叙事的形象显现和意义结构之间的区别在此显得无可争辩：尽管语料集由一系列叙事(侦探故事、中国童话、间谍故事)组成，但所有这些叙事的话语显现是统一的，反映了一个单一的意义结构，此结构类似于甚至等同于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

从这一视角看，心理剧治疗是一种促使叙事转换模型逐步形成直至最终完成的技术，而医生的作用是注意诸部分叙事的连贯性，使它们通力实现预定的结构性模型。为了证明刚才所做的概括，我们将一步一步对萨菲安所描写的治疗过程加以阐述。

b) **起始补偿结构**

孩子是由母亲介绍给医生的，看得出来，这位母亲生性爱支配人，而跟随其后的父亲则显得谦让、宽厚。这是一个普通家庭的轮廓，为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背景材料。孩子被要求为心理剧游戏“编造”一些故事，所以他每星期都要讲些“侦探故事，这些故事看似各种各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一边是一个讹诈者，另一边是一个高尚的受害者，他义无返顾地任人勒索，因为他若说出秘密，一个必须不惜代价予以保护的人物就会遭殃，而这个人物常常是他自己的父亲”（同上，第 365 页）。

如果采用民间故事描写所使用的符号来标记心理剧故事分析，那么隐性显现于所有起始阶段叙事中的重复结构就可表达为：

$$\frac{\overline{c_2}(\text{失望})}{\text{非}\ \overline{c_2}(\text{顺从})} \approx \frac{c_2(\text{叛徒显形})}{\text{非}\ c_2(\text{主人公显示身分})},$$

也就是说，该表达式是一个简单的纵替换系统，它呈现为范畴对立，所表达的仅仅是个人价值，而且表达方式也大为简化：作为起始序列特征的生命力丧失，由于对自身英雄气概的认识而得到补偿。

不过，该叙事清单的结构完全是非时间的。它虽然如同列维－斯特劳斯所定义的“神话”，使孩子得以“体验”一种难以忍受的情景，但它并不汇入任何历时链。人们不难接受这样一个

看法，即未显现的起始情景仍不言明地存在于诸故事中，并可表达为 $\bar{A}$（父子契约解除）；个人价值始终不可能融人“社会秩序”，因为这种融人只能表达为：

$$\frac{\bar{C}}{C} \simeq \frac{\bar{A}}{x}$$

该表达式表示不存在可预见的新契约。孩子在其故事中再三表露的英雄气概也因少了发出者而没有得到确认。

人们会注意到，这第一份叙事清单以及整个语料集有一个特征：得以显现的只有 $C_2$，亦即生命力的丧失和赋予。在个人价值观体系中，与其它价值相比，宁可选择 $C_2$，因为它可能成为这类结构的一个定义成分。

说明：有必要指出，医生的治疗阻止了该起始结构的重复，该治疗包括对所有的故事所共有的语义结构进行解释。意识醒悟的作用似乎只限于该起始阶段，至少在这一治疗中是如此。

### c) 斗争的出现

继此治疗之后，出现了一类新的叙事。这些叙事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强中自有强中手”。“骗子骗过了探长，最后探长还是抓到了骗子；强盗违反了黑道规矩，想甩掉同伙，结果被聪明所误，反遭同伙算计，等等。”（同上，第 365 - 366 页）

叙事放弃了赋予它非时间特征的补偿成分 c2 和非 c2，显示一对新功能 F，以图产生一个历时链：

$$\overline{C_2}\quad(\frac{\text{失望}}{\text{顺从}})\quad>\quad F\quad(\frac{\text{战斗}}{\text{胜利}})。$$

考察一下这份新的叙事清单和新的结构性序列， 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看法：

1. 结构性序列虽然具有历时性，但它仍然模棱两可，其作用如同一个非时间性补偿结构。由于主人公（英雄）和叛徒的角色可以互换，所以叙事的作者有选择的权利，他可以按照自己愿望或当主人公，或当叛徒，当然他更愿意做主人公；

2. 角色可以互换，斗争（F）不能变成考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显然是叙事结构中缺少任何形式的契约（A），故也缺少发出者；发出者通过让辅助者承担使命，就能变辅助者为主体施动者。

**说明：**医生的治疗不再处于游戏之外，而是位于游戏之中，因为不愿继续受害的是由医生扮演的受害者，而不是医生。可见问题已经不是意识问题，而是角色的分配和承担问题。

### d） 考验的展开

孩子发誓报仇，一个星期后他带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中国故事。李松和雷涛是两个交恶的强盗，他们各自带着手下的人

马安营扎寨，两相对峙。商是李松的副手，他报告说抓到了中国惟一能治瘟疫的医生。李松下令将医生关押起来，并想出一条颇为复杂的破敌之计。他的女儿故意去雷涛营寨附近采花，让对方抓去当了人质，而后又说自己害上了瘟疫。雷涛自以为聪明，要对方拿出4箱金子赎回人质。李松则提出用落在他手里的医生来换女儿，医生能治瘟疫，所以还要对方赔上20箱金子。交换完毕，李松便向副手口述一封给对方的书信，信里说医生自己已染上瘟疫，雷涛肯定离死期不远了。

游戏进行到这里，医生干预了，他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信被送走，那么敌人就知道了祸因，也就有可能躲过一死；如果想摧毁敌人，那就不应该把信送走。孩子左右为难，无言以对，游戏便告中断。

该叙事虽说复杂，但仍可解析为模拟考验的展开。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考验的各个构成功能：

| 预期功能 | $\overline{\text{非 c3}}$<br>（匮缺） | F<br>（斗争） | A<br>（契约） | 非 c3<br>（匮缺消除） |
|---|---|---|---|---|
| ↓ | 假捕获 | 模拟斗争：索要赎金和反赎金 | 假契约：主人公和叛徒（而不是发出者）互换 | 女儿（而不是愿望的对象）回归 |
| 显现功能 | —（$\overline{\text{非 c3}}$） | —（F） | —（A） | —（非 c3） |

考验全部在“失望”层面，也就是说在模拟和欺骗层面上展开，且因此面被标记，亦即符号倒向，功能横组合顺序被颠倒。尽管如此，考验包含了除“标记”外的所有构成成分，因此它显示出整个语料集所隐含的结构在展开过程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进展。

阻碍这一具体叙事展开的困难主要在于施动者的分配。因为模拟契约虽从功能角度看是有效的，但是，如果研究一下缔结契约的施动者，它就不再有效了。主人公（英雄）只能和叛徒签约，因为他还兼任发出者这一角色，不可能同时又是接收者。而且，在消除匮缺时，主体和发出者这两个角色合一的情况尤为明显，因为出于同样的理由，愿望的客体（对象）又回到其发出者－父亲那里。但是，即便是发出者，也不能把用于资格鉴定的“活力”归于自己，故只能以“反活力”（anti－vigueur）的形式（疾病）把它送给叛徒。高明绝顶的计谋就此得逞，因为送给叛徒的反活力只是所谓的“非活力”（non－vigueur）；而叛徒却把它当成真正的非活力接受下来，并认为它能夺去自己的力量：资格考验就这样间接地得到了显现。

对叛徒的惩罚（$c_3$）也是如此：主人公（英雄）兼任发出者，负责惩罚叛徒，这一回给他送去了真正的反活力，即染上瘟疫的医生。但叛徒只有在主人公的身分已经公开的情况下才能受到惩罚。这样，发出者－主人公就掉进了自己设下的陷阱：作为发出者，他想发出信息客体（非 $c_1$），好让人认出他是主人公（英雄）。正是在这一点上，医生做出了干预。

说明:医生的干预在于阐明"主体 + 发出者"这一混合的不可能性,主人公不可能是自身的发出者。缺少一位独立的发出者,主人公就无法被确认为主人公。下面两则叙事就是用来寻找发出者和确认主人公的。

### e) 考验的完成

孩子讲述的新叙事最终以肯定的形式完成了考验。这是一个间谍故事;"反间谍局的一位谍报人员在开罗一家酒吧呷着威士忌。他退休了,不想再去冒险。他原来的局长找到了他,不期而至。他明白又有什么任务要他去完成,正想'溜走',却被局长拦住。任务是去另一座城市,一个不认识的同行将交给他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件,他的使命便是将信送到目的地。为此,这位谍报人员屡经风险,而具体的细节也含义深长。主要的一点是他受了伤。陌生人化装成卖花生的小贩,走上前来,'塞给'他一包花生。刚完事,一颗子弹要了陌生人的命。谍报人员怀疑陌生人的身分,但他在那包花生里找到了信件。"

叙事虽有漏洞,该说清楚的地方往往过于粗略,但分析起来并无困难:

| $\overline{\text{非}c_3}$ (匮缺) | $A_1$ (指示/接受) | $E_2$ (资格考验) | $F_1$ (斗争) | $c_1$ (标记) | 非$c_3$ (消除匮缺) |
|---|---|---|---|---|---|
| 等待信件 | 局长派前谍报人员执行使命 | 历险 | 枪击 | 伤口 | 信件转移(!) |

说明:人们注意到,叙事把起始序列的重复当做无益之举而弃之,具有异化作用的语境只留下匮缺情景。可见叙事和说话人的兴趣在别的地方。

仔细研究之下,叙事看来是被找到的、未被认出的、最后又失去的发出者的故事。因为,发出者－施动者在叙事中表现为两个施动者:一个是反间谍局局长,他是要寻找接收者的发出者,另一个是陌生人,他化装成卖花生小贩,将“信息”(信件)交给主人公,而我们很容易从这个陌生人身上认出精神分析医生本人,他是埃及人。发出者－精神分析医生的作用值得一提,它概括下列3个功能:

1. 这是一个未被接收者认出的发出者;

2. 其作用在于传递信息客体,亦即认识和辨认标记(伤口是该标记的部分重复);

3. 他在未被认出的情况下死于流弹,其作用便告结束。

故此,主人公尽管得到了“信息”(信件),却得不到奖赏,因为少了被谋杀的发出者。

说明:医生被杀,以身殉职,其参与也就到此结束。

### f) 辨认与奖赏问题

孩子讲述的最后一则叙事几乎照搬伏尔泰的《查第格》最后几章中一个题为“隐士”的故事。大家记得,查第格最

后返回巴比伦的时候遇到了隐士，隐士同意查第格与他同行。一连四个夜晚，两人在四个不同的人家借宿：前两夜是在一个爱虚荣者和一个吝啬鬼家里过的，后两夜是在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贞妇家里过的。为了表示谢意，隐士从爱虚荣者那里偷了两个金烛台，而后把它们送给吝啬鬼。作为对哲学家真诚好客的奖赏，隐士临走时放火烧了他的家；为了感谢贞妇，隐士杀了她的侄子。

我们看到，在这第一部分里，叙事说的是处罚叛徒（c3）和奖赏英雄（非 c3）的问题。这完全合乎常情，因为在上一则叙事里考验已告完成，价值再整合问题势必要提出来。但我们刚才概述的序列似乎赏罚不明。的确，这游戏又把我们送回起始序列，一切都发生在假象层面上；看来前两位主人的接待是负的，应受到惩罚，但实际上受惩罚的是其中一位；哲学家和贞妇的好客似乎是正的，值得奖赏，但事实恰恰相反。就像话语显现的开头一样，主人公（英雄）是一个“失望”的主人公。

不过叙事尚未结束。我们不要忘记，隐士是上帝的使者，他能向主人公（＝查第格＝孩子）发出信息。因为我们的主人公已经被标记（受伤），他完成了任务，消除了匮缺（得到了他受命取回的信息）。该信息就是主体的愿望对象；但我们没有忘记，获取信息还不够，还需要由发出者以冗余的方式把信息交给他，也就是说该信息既是奖赏，又是所立新契约的证明。而完成这最后一个功能的正是发出者——隐士，尽管他交付的信息表现为如何“辨认善恶”，但它又仍不失

为一种奖赏。

这一话语显现的整体意义包含在几个形象叙事清单之中，经过上述分析，现在已经明朗，而具体的转换模型（专家们若承认其价值，应将其定义为一个具体的叙事子类）可定义为：$\overline{\text{非}\ c_1}$借助考验转换成非 $c_1$，后者在考验中被作为非 $c_3$ 来对待。这意味着起始匮缺情景的特征实际是缺少信息客体，亦就是说缺少“知”，而这一特征致使叙事的“强迫性”起始结构变得游移不定，使主体同时成为“傻瓜”和“自为的英雄”，并使它成为一个复合结构项（$\overline{\text{非}\ c_2}$ + 非 $c_2$）。至于转换模型，它只有把匮缺的对象（在此是非 $c_1$）当做愿望的对象（非 $c_3$）时才能运作——这原本就是转换模型的定义。因此这个被具体化的愿望对象（非 $c_3$ = 非 $c_1$）将在主要考验中被获取（我们应该记得，这是要取回的信息），而后由发出者作为奖赏交付给主人公。因为隐士的解释——信息是把“知”设定为一个语式，该语式能把复合项（$\overline{\text{非}\ c_2}$ + 非 $c_2$）分解成一个分离范畴（$\overline{\text{非}\ c_2}$ / 非 $c_2$），将面具与脸，假象与“被揭示的事实”区分开来。因此，结束叙事的信息客体既是奖赏，也是用于辨认奖赏并将其同惩罚区分开来的“知”（savoir）。

### g) 模型的形象显现

一个整体结构的形象显现可借助相继出现的叙事来完成，而该显现本身也遵循一个内在的转换模型。下面这个一览表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显现的完成过程。

| 叙事名称 | $\bar{A}$ | $\bar{C}$ | | | E | | | | | C | | A |
|---|---|---|---|---|---|---|---|---|---|---|---|---|
| 讹诈者 | ($\bar{A}$) | | $\overline{c_2}$ / $\overline{非c_2}$ | | | | | | | $c_2$ / 非 $c_2$ | | |
| 强中自有强中手 | | | $\overline{c_2}$ / $\overline{非c_2}$ | | | | $F_1$ | | | | | |
| 中国故事 | | | | -(非$c_3$) | -($A_1$) | | -($F_1$) | -(非$c_3$) | | -(非$c_2$) | -($c_3$) | |
| 间谍故事 | | | | $\overline{非c_3}$ | $A_1$ | $E_2$ | $F_1$ | 非 $c_3$ | $c_1$ | | | |
| 隐士 | | $\overline{非c_1}$ | | | | | | | | | 非$c_3$ (=非$c_1$) | A |

h) **转换模型的意义**

到了这一思考阶段,我们并不想掩饰我们的困惑,因为我们对民间故事做了描写,并把由此得到的模型应用于心理分析,但获得的结果却出乎预料,而且也无法预料。可它们似乎并没有给精神分析带来什么不便。因此,如果说我们的步骤是正确的,那么,它就超越了民间故事和心理剧描写,提出了转换模型的概括程度问题:转换模型应能通过各种变量的接合来阐明意义结构的历时性的亦即历史的变化。因为,尽管民间故事在结构上同一,但“强迫性”心理剧结构有其固有的结构性特征:愿望的对象和心理剧寻找的对象是知-客体,而转换是在纵替换关系轴上用“知”代替“非知”。这一结构性特征无可争辩地使模型

个性化。

在这一方面,任何结论恐怕都为时过早。我们提出了转换模型的各种可能的基本接合方式,但这一转换模型只能作为一种假设用于对形象显现的描写。因为考验本身——我们已经注意到它在叙事展开过程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仅仅是一个形象转换模型,将其转译成语义学语言的工作远未结束。

# 一个描写样本

## 1° 总则

### a) 选例:贝尔纳诺的语义域

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思考(暂时)结束之际,介绍一个几近完整的描写样本恐怕不无益处。该描写将根据一个给定的语料集,对已使用过的各个程序加以阐明,直至得出一个语义微观域的最终组织模型。为此,我们选择了乔治·贝尔纳诺的语义域。这个例子几乎直接摆在我们面前,让人欲拒不能,因为我们有塔辛·于杰尔的研究《贝尔纳诺的想象世界》可以借鉴。该研究最近作为博士论文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院通过了答辩。

于杰尔的研究方法与语言学描写步骤并不矛盾。但是,选择一个已由他人做了前期工作的领域实是有利有弊。在有利的方面,首先应该注意到研究的规模:于杰尔的研究针对贝尔纳诺的全部著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研究的代表性。如果换上任何其它例子,那它都将因为我们给分析这一部分留的位置有限而更加失之片面。有了于杰尔研究所具有的代表性,加上他对语料集所做的前期分析,我们就不用回避任何描写所包含的困难,而且能增大我们所要做的练习的典范性。最让人为难的弊病是我们无法对描写的适当性提供个人担保——不管我们

怎样信任其研究成果为我们所用的作者。另一个困难来自于杰尔对其研究结果的表述。他的表述可称为文学性表述，而从文学批评角度看令人满意的东西也只是一种语义学前期分析。由此会导致材料评估的不确定性，因为有些缩简似乎已经完成，另一些则是部分完成，还有一些出现项还处在原始状态。据此，选用的实例将只能有保留地用于说明描写的最初几个程序。因此，对于这些程序，我们只勾勒其大体轮廓。

b) **提取法与文本组成**

为了组成文本，《想象世界》的作者似乎采用了提取法(extraction)。这个方法此前只是粗略介绍过，现在我们可以用该作者采用的步骤来具体说明它了。

提取法的出发点是：发现某些冗余词位，并假设它们代表了需要描写的同位意义集。这样的词位首先是：

vie （生） 与 mort （死）

它们被视作第一个经缩简的清单，描写的第一步便是提取所有包含这两个词位的语境(上下文)。从方法论上讲，这是把清单中的每个词位当做不变量，并为它们中的每个词位设定一个由提取出来的品质词组成的变量类。这样，在封闭的语料集内，每一类变量就定义了不变量词位。倘若再把每类变量缩简成数量有限的义位，我们就能获得数量相当的品质信息，如果分析至于此，得到的便是一个能阐明生与死之语义内容的简单模

型。

但这一描写是不完整的，因为描写所依据的仅仅是从语料集中提取出来的少量信息。看来不应该立即进行缩简，而应将其推迟，并把前面提取的所有变量品质词清单当做不变量清单，从而进行第二次提取。

这份新的清单有两个用途需要考虑：

1. 在第一次缩简后组成的品质类可以作为品质类来对待，它们可用于寻找已经定性的词位可能具有的对等词位。这样，利用被当做不变量的品质类就可以建立起由对等词位组成的施动者：

| | | | | |
|---|---|---|---|---|
| mort | （死） | vs | vie | （生） |
| eau | （水） | | feu | （火） |
| ennui | （烦恼） | | joie | （欢乐） |

由于在全体语境中，3 个词位由同一些变量来定义，所以我们应该做如下假设：如果品质类定义了生与死，并建立起既定语料集所特有的生和死的内容，那么这些品质类只能赋予对等词位以同样的内容，而这些对等词位可以互换，并能缩简为一个共同的义位－施动者。因此，即使以后我们继续分开地谈论“死”和“水”，“生”和“火”，那也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一个被命名为“生”或“死”的单一义位。

**说明**:不过,"欢乐"和"烦恼"的前途暂不作定论。

2. 品质清单还能用于提取新的词位,但这些新词汇不再由整个品质类,而是由各个单独的品质来限定。这个新的词位清单同第一个清单一样,也是二分的,用于组成清单的品质有些构成"死",另一些构成"生"。所以它包括两个子类:

a) cadavre(尸体) - vieux(老人) - maladie(疾病) - mensonge(谎言) - haine(恨);

b) vivant(生者) - enfant(孩子) - chair(肉) - sang(血) - vérité(真理) - amour(爱)…

这样就建立起了"死"和"生"两个系列,诸品质本身则与这个或那个系列保持下义关系。

因此,从整体上看,提取程序是一系列连续的提取操作,每个由提取出来的语境组成的清单能用于提取其它语境并把它们组建成清单,如此直到穷尽语料集,亦即直到用最后一份清单(n-1)进行的最后一次提取(n)不再获得新品质为止。这就是说,语料集中属于一开始就选定的"生"和"死"同位意义集的意义成分已完全用尽。甚至可以认为,提取出来的清单因逐渐扩大而提供了新的评估成分,故必要时我们应能据以对描写之初所做的假设进行修正。

c) 同位意义集的选择

使提取程序得以启动的策略选择不只是建立在观察到的生和死这两个词位的冗余性之上；该选择还预设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在贝尔纳诺的作品中，生和死意味什么？他赋予这两个"词语"以什么意义？在这一层次上，我们可以立即回答：不是"生这件事"，也不是"死这件事"，这两个意义均属于宇宙学（cosmologie）范畴，它们都不适用于描写；下列品质限定：

La mort est noire （死亡是黑色的），

La mort est froide （死亡是冰冷的），

显然不是在描述死亡的颜色和温度。描写所针对的显现属于精神学（noologie）维度，对被设想为二元范畴"生/死"的同位意义集的选择，与冗余现象同时属于开始时的简单假设。

另一方面，贝尔纳诺的作品只需读上 50 来页，就能知道"死"和"生"这两个概念一般并不被理解为两种功能，而是两种交错的指示性"存在"（être）：人可以虽死犹生，也可以虽生犹死。换言之，人类生存由生和死组成，它们是人类精神存在的两个项，它们互相矛盾又互相补充。

故此，于杰尔设定的同位意义集看来是一个基本结构的复合显现，可表达为：

$$E = (V+M)$$[1]

不过，结构的两个成分之间的平衡仍不甚稳定，结构有时倾向负项，有时倾向正项，从而使其中一个成分处于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如果人生表现为一个复合结构，那么它所追求的"生活理想"只能是取消负项，仅看重正项。这种情况同样见诸"下跌"，其语言学表达就是正项从结构中消失。因此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贝尔纳诺话语是处在同位意义集 E 层次上的神话型显现，该同位意义集则是显现之范围，并需要经受一系列连续的结构把握，亦即由互相矛盾的两个项之接合开始：

$$E = (V+M),$$

继而在正负两个项之间游移：

$$E_1 = (V+m), E_2 = (M+v),$$

再倾向于组成项的极化，亦即复合结构的分裂：

$$V \text{ vs } M。$$

**说明 I：**大写字母用于表示结构的支配成分，小写字母表示被支配成分。

**说明 II：我们几乎忘了在此引入本体感受范畴"舒适/不舒适"。该范畴涵盖整个显现，少了它就无法赋予根据已知语料集来描写的模型以价值观和观念学特性。**

---

① E = 存在，V = 生，M = 死。——译注

## 2° 作为“包含方式”的生存

### a) 显现的形式与分析的类型

我们已有机会强调过词位 milieu(包括方式)[①]的两可性，它既表示某物的中心，又指包围中心的这个事物。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指示性复合结构词汇化的典型例子。借用贾斯珀(Jaspers)的术语，该结构可表达为：

englobant(包含) vs englobé(被包含)。

而同于杰尔使用的对立“contenant(容纳)/contenu(被容纳)”相比，我们则倾向于前者。

被如此命名的范畴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虽出现在贝尔纳诺作品中，但并非为贝尔纳诺的语义域所专有。不过，作为精神空间的一个基本接合方式，它能起到桥梁的作用，使“抽象显现”几乎能在不知不觉中过渡到“形象显现”，把抽象概念转变为施动者。因此，被同时赋予词位“死”和“水”的品质类之同一性一旦被确认，我们很容易在“水”中看到一个形象义位，该义位因能包含另一个角色“尸体”而起到角色的作用。换言之，“包含/被包含”这一范畴初看上去只表达两个容积指示词

① 法语词 milieu 可表“中心”、“中间”，也可指“环境”、“介质”；据原文含义，勉强译为“包含方式”。——译注

(deixis)之间的拓扑学关系,却也能对该范畴中被视为施动者的成分进行新的限定,其成分可以被赋予品质谓项,也可被赋予功能谓项。

但我们发现,这样一种拓扑学表达因施动者比较简单而特别适合于品质分析——对"水"和"火"的描写能揭示一个非常丰富的义素接合网络——,但是,如果要用同一个范畴来解释有机体的而不再是空间和物理的形象显现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贝尔纳诺看来,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灵,确能解释为一个包含者,包含了死亡的一个下联角色,比如说癌症,其作用就是侵蚀和破坏该生灵。但是,与在第一类形象表现中出现的情况相反,这里的主体施动者已不再是包含者,亦即不再是复合结构的支配项,而是被包含者。再则,有时候死亡的支配性地位不再体现为主体施动者,而是客体施动者,如"老人"、"傻瓜",他们是死亡的对象,是其受动者;同时,他们也不再是被包含者,而是包含者,因为死亡在其内部起作用。最后,第三种情况是外部因素侵袭人类之外的生物,比如"鼠"、"蛇",它们也是死亡的下联角色。

由此可见,当贝尔纳诺的形象显现位于有机体层次时,"包含/被包含"这一范畴就不再与我们开始时所假设的"支配/被支配"这一生存结构接合方式互为补充了,也不能再用于把不同角色缩简为主体或客体施动者了。因此,死亡作为施动者,就以可变角色的形式出现,就上述两个范畴而言,其地位见诸下图:

| 施动者 | 角　色 | 支配方式 | 包含方式 |
|---|---|---|---|
| 死　亡 | 癌　症<br>老　人<br>鼠 | 支　配<br>被支配<br>支　配 | 被包含<br>包含<br>{非包含<br>非被包含 |

可见，角色的分配在有机形象显现时具有风格学性质，它不同于无机形象显现时的角色分配，后者极为简单。从方法论上讲，角色的多样性不允许我们一开始就把施动者设定为不变量，再在谓项内寻找变量，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将不得不求助于功能分析，后者或许能使我们通过功能的对应化分离出角色并对它们进行缩简。

相反，无机形象显现却非常适合于品质分析，而且可以认为施动者结构、包含结构和支配结构三者之间的关联已得到确认，因为：

$$\frac{\text{主体施动者}}{\text{客体施动者}} \simeq \frac{\text{包含}}{\text{被包含}} \simeq \frac{\text{支配}}{\text{被支配}},$$

而且主体施动者一旦被赋予内容“死”或“生”，复合结构的性质也随之被确定为“负”或“正”。

因此我们就从该品质描写说起。

b) **生与死**

我们根据于杰尔提供的材料，稍加改动后建立了品质模型。比较简单的做法是先以图表的形式描述该模型，之后再说一下有关该模型的主要内容。

| 生 | | | 死 | | |
|---|---|---|---|---|---|
| 符号 | 义　位 | 义　素 | 义　素 | 义　位 | 符号 |
| V1 | 变化 | 改变……<br>上升…… | ……同一<br>……下跌 | 静止 | 非 V1 |
| V2 | 光亮 | 明亮……<br>透明…… | ……阴暗<br>……昏暗 | 黑暗 | 非 V2 |
| V3 | 热量 | 热量…… | ……寒冷 | 寒冷 | 非 V3 |
| 非 M1 | 纯粹 | 纯一……<br>干净…… | ……夹杂<br>……肮脏 | 混杂 | M1 |
| 非 M2 | 气态 | 空气状……<br>轻盈…… | ……玻璃状<br>……沉重 | 液态 | M2 |
| 非 M3 | 有形 | 味道……<br>颜色……<br>节奏…… | ……乏味<br>……无色<br>……单调 | 无形 | M3 |

品质模型在此表现为一个分等级的结构，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简单假设层次上用词位“生存”(existence)予以命名的概念

之内在接合方式。它由3个不同的等级平台组成：

1. 施动者平台。我们已把“生存”设定为一个复合结构，该结构处在精神维度上，包含“生”与“死”两个项，而且从伴随于“舒适/不舒适”的分离关系中可明显看出其接合方式。另一方面，我们还明确指出，在任何语义投入之前，可以把“生”和“死”这两个结构项视为形象显现层次上的两个指示项。但同时，由于它们能被赋予某些品质，所以它们的句法地位是施动者地位。因此，“生”和“死”就是两个指示施动者，而使它们获得语义投入的诸品质同时构成两个不同精神空间的特征；

2. 义位平台。施动者的品质在模型中呈现为根据品质信息构成的义位，并以出乎意外的方式充当施动者和义素之间的中介；

3. 义素平台。义位是在义素分析的基础上构成的，义素分析使我们能把诸出现项(occurrence)组成对应的类别，这些类别因义素对立而保持分离关系。换言之，义素又回到开始时被设定的施动者结构并对其进行验证，而模型便是该义素描写的产物。诸义素范畴本身组成了整个模型隐含的分类学网络，而模型由于全部被本体感受范畴所涵盖，故表现为一个价值观模型。

至于作为中介的义位，它们的结构性地位还有待明确，因为它们似乎在被缩简之前就实现了对应化，这与常情不合。的确，如果“生”的义位因义素对立而与“死”的义位相关联，那么这两类义位只能组成两份清单，每一份清单包括6个义位，而它们内

部的接合方式并不明显。

说明：义素描写本身也有待改进，因为义素有时候看似一些组成成分，有时候像是一些可分解为更小单位的义素内容。较之细节的正确性，读者更应注重方法论步骤。

c) 火

在贝尔纳诺的“赘述”(radotage)中，“多变的生”和“静止的死”大量地重复出现，因此，初看上去，“动态”/“静态”这一义素对立是其价值观分析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施动者仅由功能来定义，死-施动者仅由品质来规定。“生”和“死”首先是两个指示项，然后才被分别规定为变动空间和静止空间。

不过，“生”之多变性可用作尚待系统化的清单内部义位接合的出发点。变化可解释为一种改变，也就是由一种状态或一种“性质”向另一种状态或“性质”的动态转变，因此它呈现出一种功能的特征，而从这一功能出发，我们可以尝试阐述一个功能信息。事实上，一般的词典都将“火”定义为“物体燃烧产生的热和光”，这一定义也与语词的常用定义一致。因此，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属于原因论性质的功能，它能够接纳两个施动者，即原因发出者和结果接收者。根据我们提出的解释，就能把“生”的义位清单中的3个义位($V_1$、$V_2$、$V_3$)汇合成一个信息：

$$V = F(\text{变化})\quad [A_3(\text{火});\quad A_4(\text{热量/光亮})]$$

借助这一公式，我们就能理解义位在价值观模型结构中的作用了。

1. 这个公式首先使我们看到“火”的两种看似矛盾的解释。由于受到同类品质的限定，可以说“火”与“生”对等。在我们刚刚提出的功能信息内，“火”仅仅是该信息的发出者－施动者，因此“火”是生命之源，同时也是生命本身。用语言学术语说，在显现层面上，“火”能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运作：从句法上讲，“火”是施动者；从语义学观点看，它是整个功能信息的下联代表，而作为该下联代表，它就等同于“生”的一部分义位品质。

2. 在风格学层面上的运作方式相同，这能阐明“光亮”和“热量”的双重身份，它们不仅仅是“生命运动”的结果，而且从下联关系上讲，它们等同于生命本身。

说明：此后，热量/光亮之间的对立可用于对精神存在进行二分：作为“明亮”和“透明”，“光亮”阐明了“精神魂”，而“热量”则与“肉体魂”相关，可惜在此我们无法详谈。

3. 下联施动者能帮助我们理解被赋予义位的中介作用：作为施动者，它们隶属于部分地定义了“生”这个指示施动者的功能信息结构；作为品质内容，正义位逐个地与对应的负义位亦即“死”之内容成分形成对立。

在此分析阶段，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属于方法论性质的暂时结论。如果我们把义位 $V_1$、$V_2$ 和 $V_3$ 视作“生”的正定义，那么，

将这些义位解析成义素，使义素范畴得到阐明，我们便能考虑向“死”的负定义过渡。“死”的负定义由负义位非 $V_1$、非 $V_2$ 和非 $V_3$ 组成，而这些负义位则蕴涵于“生”的正定义之中，比如：肯定作为“热量”的“生”，就意味着肯定作为“寒冷”的“死”。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作为“死”的负定义的义位清单就没有必要结构化了，因为这些义位的接合方式不过是反映“生”的正定义的组织方式而已。“生”的负定义也是如此：我们只需就“死”的正定义提出一个解释原则，“生”的负定义就能机械地推断而出。

d） 水

我们已经看到，与作为“变化”的“生”相对，“死”被定义为“静止”。因此，如果说我们把“变化”解释为一种状态（或性质）向另一种状态（或性质）的动态转变，那么“静止”就应该被定义为一种“静态”，也即同一性（identité）和相异性（altérité）的恒定状态（或至多是重复）。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逐一复述“死”的负定义，因为它们已从“生”的正定义推断而出。所以我们谈论这一问题只是为了强调它们所具有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即“非必然性”（non - necessité）。如果以法语中构成名词类特征的性范畴（阴、阳性）为例，从隐喻的角度看，可以说“生”的正定义具“名词”性质，是固定的，而“死”的负定义则具“形容词”性质，是可变的。“热”

与“火”组合，就像固定的性总是与名词结合一样，而“水”则容许有一个可变的纵替换关系类：水可以是冷的、温的或热的。这一区别也许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述：我们可以说“生”的正性内容是法国的，亦即社会的，而“死”的负性内容是贝尔纳诺的，亦即属个人性质的。不管怎样，对一个具体领域的分析会揭示某些有关“语义性”（sémanticité）的标准，值得进行更深人的研究。

不过，水也能具有正定义，我们建议在水的复合结构框架内予以解释。

“生”是一系列同一性和相异性，从修辞学上讲，属于反衬（antithèse）。与“生”相比，“死”是对同一性和相异性的同时感知，属于反语（antiphrase）。把“死”当做意义基本结构的特殊接合式来分析，它就相当于复合项：

$$\frac{\text{同一性}}{\text{（正项）}} \quad \text{vs} \quad \frac{\text{混杂}}{\text{（复合项）}} \quad \text{vs} \quad \frac{\text{相异性}}{\text{（负项）}} \quad 。$$

**说明**：在使用贝尔纳诺用语的义素分析中，应该做这样的修正：纯一＝同一性，夹杂＝（同一性＋相异性）。至于“干净”（netteté）和“肮脏”（saleté），它们只是该对立的重复，尤其是视觉上的重复。

我们之所以把“混杂”（mélange）作为“死”的第一个定义，主要是因为该“混合结构”或许能说明“促使”贝尔纳诺把“水”选作“死”之对等物的原因，而我们知道，该选择看来并不是必

然的。但这一对等关系一旦确立，其它的正定义便能整合，而成为能够显现结构之复合项的特殊接合。

这样，在浓稠度这一轴上，“水”就处在两个极项的中间：

$$\frac{\text{气态}}{(\text{正项})}\ \text{vs}\ \frac{\text{液态}}{(\text{复合项})}\ \text{vs}\ \frac{\text{固态}}{(\text{负项})}\text{。}$$

因为水既非固态，也非气态：它集两者于一身。火因其气体成分而被定义为负项，而我们看到，与之对立的不是其正项，而是复合项。这样水就含有义素范畴的两个项，故我们从被视为正定义的复合项出发，推断出作为“生”的负定义的简单项，而不是相反。

如果此前我们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通过分析义位“无形”(informité)的构成义素应能重新获得复合结构。这样，“无色”(incolorité)虽然初看起来是与“颜色”(couleur)对立的负项，但作为义素轴，它可分解为一个“黑/白”范畴，该范畴能生成复合项即“灰”，并包含“污浊”颜色的所有变化。同样，“单调”(monotonie)也只是重复“同一性 + 相异性”的连续，亦即被感知为恒定状态的变化。对于“乏味”(fadeur)，也可以进行同样的推理，而且不会太困难。可见构成死亡之精神空间的所有感觉类都含有复合结构，而义位“无形”看来是该复合结构的显现。

借助额外的语义投人，人们能相继把握复合结构的混合性、

其范围的“恒定”性以及其感觉空间的复式接合，因此所有关于“死”的正定义应被视作复合结构的冗余成分。而根据感觉空间的复式接合，我们便可推断出“生”的负定义（它们当然毫无“否定”之意），并把它们视为通过消除复合结构的负项来得到的正项。

**说明Ⅰ**：若想深化分析，可逐一考察所有的复合型义素接合，研究负项的消除条件。

**说明Ⅱ**：我们用“上升”/“下跌”这一义素接合来定义“变化”/“静止”这对义位，对此必须作一补充。实际上，这是个义素组合问题：运动（空间中的变化）受义素“轻盈”的限定，被赋予“上升”方向；而静止则与“沉重”组合，决定了“下跌”方向。

### e) 构成模型

义位的清单看似偶然，却建立了“生”和“死”这两个施动者。我们努力阐明这些义位的结构组织，最终揭示：所构建的模型有一个新的等级平台。该平台位于施动者层面和义位层面之间：决定“生”施动者内容的 6 个义位又细分为我们所说的“生”的正定义和“死”的负定义；反过来，组成“死”施动者内容的 6 个义位也分成两组，即“死”的正定义和“生”的负定义。如果不考虑被注入模型的真正意义上的内容，可以说该模型呈现为两个二分范畴的对应关系：

$$\frac{V}{\text{非}V} \simeq \frac{M}{\text{非}M},$$

而不是仅一个接合成复合结构的“生/死”(V/M)范畴。如果我们的起始假设因之而变得无效,那么新提出的模型则有它的长处,即它在接合形式上与民间故事的内在非时间性结构完全一样,也与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神话模型完全相符。

这样的结构相似性不可能是偶然的,故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在一些彼此相去甚远的领域里见到的非时间性内容组织模型应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由于它不受制于所投人的容——这些内容可以通过功能分析(民间故事)和品质分析(贝尔纳诺的语义域)获得——,所以我们不得不视其为元语言模型,后者在等级上高于我们为阐明义位和义素范畴层次上显现的内容而在诸归纳步骤中使用的品质模型或功能模型。为了巩固这一区分,我们或许可以将品质模型和功能模型视为构成模型(modèle constitutionnel),并把它们确定在义位层面上,从而使其与转换模型形成对照。

## 3° 作为赌注的生存

### a) 疾病

如果说在贝尔纳诺的形象显现中,被视为存在之外在化投射的精神空间混同于可二分为“火/水”的容积指示项,那么其内在化所选择的表现舞台则是人的肌体。对贝尔纳诺来说,一个活着的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鉴于这一表达的冗余性,于杰尔又用信息清单的第二部分来进行一次新的描写。的确,

健康的人常受疾病侵袭，而在贝尔纳诺的作品中，疾病各种各样，频频出现。

这些疾病被分为两类：

肉体疾病 vs 血液疾病，

这一划分看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起点。我们可以将它们表示为两列：

| 符　　号 | P′ | | N′ |
|---|---|---|---|
| 出现项 | 癌症<br>坏疽<br>溃疡<br>创口，等等 | vs | 贫血<br>出血<br>败血病<br>积水，等等 |
| 名　　称 | "癌症" | | "贫血" |

为叙述方便起见，我们用贝尔纳诺语义域中最常见的病名"癌症"来指称第一类疾病（P′），而用"贫血"来统称第二类疾病（N′）。

提取为这些疾病设定的谓项，经缩简后便能得到两个义位－功能（F）。然后，如果把疾病视作主体施动者（$A_1$），而把健康肌体视为客体施动者（$A_2$），我们便能给出疾病描写公式：

$$P' \simeq F(\text{吞噬})[A_1(\text{癌症})A_2(\text{肉体})],$$

$N' \simeq F$(吮吸)[$A_1$(贫血)$A_2$(血液)]。

b)　动物寓意录

贝尔纳诺的动物寓意录与疾病清单一样，内容繁多而又重复。其中有：

马、
驴、
狗、
猫、
鼠、
蛇、
昆虫，等等；

另一方面是：

裁判兽、
墨水兽、
道德兽、
统计兽、
民主兽、
极权兽、
实利兽，等等。

对该清单加以组织后，于杰尔先从中区分出两份清单。这两份清单表现为对立：

野兽 vs 家畜

**说明**：于杰尔对这些清单的描写用去了大量篇幅，但这一描写属于施动者风格学范围，故在我们看来，语义学模型的构建并非缺之不可。

剩下的动物，仍按于杰尔之见分成3类：

啮齿动物、
爬行动物、
昆虫。

提取包含这3个角色的功能信息并对它们进行缩简，可得出两个功能信息：

$$P'' \simeq F\ (\text{吞噬})\left[A_1\ \frac{(\text{啮齿动物})}{(\text{昆虫})}\ A_2\ (x)\right]$$

$$N'' \simeq F\ (\text{吮吸})\left[A_1\ \frac{(\text{爬行动物})}{(\text{昆虫})}\ A_2\ (x)\right]$$

**说明 I**："昆虫"项见诸两类信息，即"吞噬"的昆虫和"吮吸"的昆虫。可以视其为因"啮齿动物"/"爬行动物"的分离而已显现的结构之复合项的词化。因此可以认为此"昆虫"项与下一部分功能描写无关。显然，它将在对施动者的风格学分析中重新找到其位置。

说明 II：尽管可以说，啮齿动物吞噬肉体、爬行动物吮吸血液，但我们宁可用 x 表示这些信息的客体施动者，以便暂时摆脱一个外加的难题，该难题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癌症从内部吞噬灵魂，而啮齿动物从外部吞噬灵魂。

对缩简后获得的信息加以比较，结果表明从疾病和动物清单中获得的功能具有同一性。如果功能从本质上讲建立了施动者，那我们就能断言：由于经描写的功能在信息 P′和 P″、N′和 N″中同一，所以主体施动者"癌症"和"啮齿动物"就与"贫血"和"爬行动物"对等。疾病功能信息和动物功能信息之间的惟一差别仅见诸客体施动者的身分。

c) 谎言

谎言(mensonge)可能是贝尔纳诺话语中新的一组冗余词位。谎言清单可划分为：

次要谎言　vs　主要谎言

次要谎言例举如下：

诡计、
虚伪、
欺诈、
虚假的态度、
虚假的恭维、

虚假的高雅、

虚假的提问不当，等等。

**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次要谎言不过是主要谎言的下联形象。

至于主要谎言，它们按下列方式分类：

$T'''$ ： 失望；梦想；

$T''$ ： 骄傲、轻蔑；吝啬、自私、淫荡；

$T'$ ： 恨； 冷漠。

不难发现，在贝尔纳诺的语义域里，“谎言”是“疾病”的非形象对等者，换言之，从“疾病”到“谎言”，我们只是换了一个显现层次，但没有因此而更换同位意义集。用于限定并建立“谎言”和“疾病”的品质和功能之同一只是从客观上证明了这一对等关系。可以认为，下列两个关联式：

$$\frac{\text{死}}{\text{生}} \simeq \frac{\text{水}}{\text{火}} \quad \text{与} \quad \frac{\text{谎言}}{\text{真理}} \simeq \frac{\text{疾病}}{\text{健康（血与肉）}},$$

在相关范畴的内容不予考虑的情况下，仅仅体现了显现之两个层面，即非形象和形象层面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此阶段，描写遇到了两个问题：首先必须把显现之不同层面简化为一个非形象层面，并在此层面上对由此获得的词位进行命名； 但同时又必须考虑在属于“谎言”系列的词位和它们

在"真理"(vérité)系列中的对应者之间建立对应关系。这样又多了一个困难:因为"谎言"并不拥有一份独立的功能清单,故不可能按照我们在描写疾病和动物时采取的程序进行分析。

说明:缺少这样一个清单是描写者的疏忽所致,还是语料集的一个特点,这并不重要。描写原则上应备有数量充足的程序来应付这样的局面。

故此,我们应该把谎言和疾病之间观察到的部分对等当做出发点,而且要考虑到形象层面上存在着以动物为施动者的语义信息,尝试对主体施动者而不是功能进行缩简。该缩简可同时利用由谎言和真理之间可能存在的对应关系提供的各种可能性。

d) **及物谎言**

暂时把第一类(T‴)谎言搁在一边,按照于杰尔的划分,我们可以把剩下的两类谎言排成两列:

| 符号 | P‴ | N‴ |
|---|---|---|
| T′ | 恨 | 冷漠 |
| T″ | 骄傲<br>轻蔑 | 吝啬<br>自私<br>淫荡 |

作为假设,我们认为P‴类代表了以功能"吞噬"为特征的施

动者，而 N‴类则是受功能“吮吸”限定的施动者。

至于为什么把谎言横向划分为两个重叠层 T′和 T″，对这一问题的解释需要作一回顾：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我们据以分别列出疾病功能和动物功能公式的信息，在客体施动者层面上存在一个差异，此差异不允许将它们缩简为一个表达式。该差异是：疾病居于肌体之内，从内部侵袭肌体；啮齿动物和爬行动物则相反，它们是从外部侵袭生物和东西的。因此，与“吞噬”和“吮吸”功能相对应的客体施动者包含了义素分离“内客体/外客体”。

我们建议把这一分离解释为及物性（transitivité）范畴所固有的接合方式，它时而把功能引向一个外部客体（$A_1 \to A_2$），时而将其引向一个内部客体，即主体施动者（$A_1 \to A_1$）。而借助该及物性我们就能对谎言（及其各种形象表达）进行分类：及物性使疾病角色和动物角色形成范畴对立，因为前者按自反功能来定义，后者则按及物功能来定义，这样谎言就能按形象对等的原则得以归类。如此，我们便能在及物性谎言的非形象层面上缩简形象显现：

| 符　号 | P | N |
|---|---|---|
| T′（$A_1 \to A_1$） | {恨<br>癌　症 | {冷　漠<br>贫　血 |
| T″（$A_1 \to A_2$） | {骄　傲/轻　蔑<br>啮齿动物 | {吝啬/自私/淫荡<br>爬行动物 |

e) 经济缩简

上面的表格显示，虽然谎言的词位表达和疾病缩简产生的义位“癌症”和“贫血”之间逐项对应，但在动物类的缩简项和与它们相对照的谎言之间，这种逐项对应关系并不存在，因为非形象词位要多于经缩简的形象词位。部分分析是分头进行的，所以不能说明描写的进度相同。若要建立两者的对应关系，就必须设法对动物角色做一次新的分类，或者对谎言进行新的缩简。第一个办法不甚现实（或者因为于杰尔认为没有必要对动物类做这样的分析，或是因为贝尔纳诺的风格学仅表现结构与结构的对应，而不是项与项的对应），所以只能采取第二个办法。

1. 因此，由啮齿动物类显现的谎言 T″就接合为两个义位：

骄傲（orgueil） vs 轻蔑（mépris）。

这两个义位的缩简有两类依据：

a) 拿这两个词位与啮齿动物比较，可以发现“吞噬”（dévoration）功能与非形象施动者相容；

b) 借助对应化，可发现“真理”描写层面上有一个同时与“骄傲”和“轻蔑”形成对立的词位“谦卑”（humilité）。

根据《常用词典》给这 3 个词位下的定义，作一次粗略

的义素分析，结果表明它们共同的义素内容呈现为“评价”（estimation）功能，而且该功能接合为：a）评估范畴“高/低”（sur－/sous－）；b）及物性范畴，形成“评价自己”和“评价他人”之间的对立。这样，这3个词位可表达为功能信息：

$$\begin{cases}\text{轻蔑} \simeq F(\text{低估})[A_1 \rightarrow A_2] \\ \text{谦卑} \simeq F(\text{高估})[A_1 \rightarrow A_2]\end{cases}$$

$$\begin{cases}\text{骄傲} \simeq F(\text{高估})[A_1 \rightarrow A_1] \\ \text{谦卑} \simeq F(\text{低估})[A_1 \rightarrow A_1]\end{cases}$$

在贝尔纳诺的语义域中，“谦卑”既是“轻蔑”的反义词，又是“骄傲”的反义词，这样就在

高估他人 ≃ 低估自己

之间建立起了对等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设定下列内容也属对等，尽管该内容用“轻蔑”和“骄傲”两个词位来表达：

低估他人 ≃ 高估自己。

但是，由于T″类要求一个及物的功能表达式，所以我们选择“骄傲”的对等项，即“轻蔑”来命名“轻蔑/骄傲”的缩简结果。

2. 在贝尔纳诺的词汇里，“吝啬”（avarice）、“自私”

(égoïsme)和“淫荡”(luxure)很容易找到它们的对立项:“赠与”(don)、“共济”(solidarité)、“交换”(échange),但在形象显现层面上,对应的只有一个义位,即“爬行动物”(reptile)。迫于经济原则和对称原则,我们必须选择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即把两个系列的词位缩简为两个义位,哪怕需要重新描写那些在风格学描写层面上使它们分离开来的范畴。这样我们就只需强调清单中的已知义素成分。

a) 这3个“谎言”共有一个功能,我们不予命名,但它与“吮吸”(succion)功能相对应:它们所包含的行为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夺走他人之所有,把什么都引向自己,归为己有。

b) 这3个“谎言”都是及物的,它们潜在地代表了达及周围世界的活动,所以我们只消用其中一个“谎言”的名称——比如“吝啬”——来命名这3个出现项,就足以确定受两个相关范畴限定的义素内容,当然“爬行动物”这个角色也同时被缩简并包含在这个共同名称之中。

f) **不及物谎言**

现在需要考察一下最后两个还没有被描写的谎言:

失望(désespoir) vs 梦想(rêve)。

如果对谎言的分析从总体上看是正确的话,那么在此阶段,我们就能使用可支配的描写范畴对剩余各项进行近乎于机械的

整合。

因此，这两个词位的对立可解释为由它们命名的下联功能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

F(吞噬)[$A_1$(失望)]　vs　F(吮吸)[$A_1$(梦想)]。

同样，由于及物性范畴没有完全被利用，加之“不及物性”项可加支配，我们就能用它来定义这对功能，把它们看做是以零位客体施动者即 A2(ϕ)为特征的功能。图表因之而得以完整：

| 符号 | | P | N |
|---|---|---|---|
| T | T′ | 恨 | 冷漠 |
| | T″ | 轻蔑 | 吝啬 |
| | T‴ | 失望 | 梦想 |

可见对谎言的描写仅使用了两个范畴，它们的性质当予以说明。

说明：我们看到，这两个范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分析进度：及物性范畴是非形象的；而用于区分两类功能的范畴则停留在形象阶段。

## g) 真理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能组成真理清单的各个项，把它们接合起来，使它们的结构与谎言的结构彼此对称又互相矛盾，从而使真理和谎言对应化，构成一个单一模型。为此，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描写范畴，这些范畴使功能二元化，并使客体施动者以三种方式接合。真理已被视为主体施动者，所以我们只需利用既定的框架，使真理清单的组成项各就其位。

这一总表如下：

| | 符　号 | P | N |
|---|---|---|---|
| 真　理 | $T'''$ | 希　望 | 希　望 |
| | $T''$ | 谦　卑 | 贫　穷 |
| | $T'$ | 爱 | 爱 |
| 谎　言 | $T'$ | 恨 | 冷　漠 |
| | $T''$ | 轻　蔑 | 吝　啬 |
| | $T'''$ | 失　望 | 梦　想 |

此表需要我们做几点说明。

首先，在施动者形象显现层面，真理领域的接合看来非常薄弱。除了表达“健康”的“肉”和“血”，只有非形象施动者与谎

言领域中一大群不同角色相对应。事实上,正是由于诸真理项的这种接合缺陷,我们才不得不采取略嫌简单的结构化程序,对非形象施动者进行了描写。

第二点说明涉及非形象施动者本身的词位缺乏。"希望"(espérance)和"爱"(amour)出现在 P 和 N 两栏里。真理和谎言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可以得到克服,办法是消除"吞噬"/"吮吸"这一对立。不用太费周折,我们就能知道这样一种缩简的结果:

$$\frac{\text{真理}}{\text{谎言}} \simeq \overset{T'''}{\frac{\text{希望}}{\text{克制}}} \text{ vs } \overset{T''}{\frac{\text{交际}}{\text{孤独}}} \text{ vs } \overset{T'}{\frac{\text{爱}}{\text{厌恶}}}$$

不过,出于后面将要提到的原因,我们还是维持原来的功能对立,而暂时作这样的理解:与分离功能相对应的施动者的词汇同一性是结构复合项的词汇化结果。

## 4° 模型的比较与选择

### a) 同质性的缺乏

同时进行的两种分析,第一种是品质分析,第二种是功能分析,都基于一个得到默认的假设,即下列关系式中存在着一种关联性:

$$\frac{死}{生} \simeq \frac{谎言}{真理}。$$

两种分析导致两个模型的构成,而这两个模型虽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差别也相当大。

如果说其中某些差别缘于所采用的分析的性质(比如:用于对谎言和真理进行分类的及物性范畴是功能分析的特点,似乎很难应用于品质分析),那么其它一些更为明显的差别就来自于分析所达及的层面不同。因此,品质分析因义位而处于无机的形象显现层面;这些义位转过来又被解析成具有符号学性质的义素,而功能分析却独自代表了两个非同质的描写层面:主体施动者处于非形象层面;功能则相反,它们由两个"有机"形象,即"吞噬"和"吮吸"来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主体施动者因缺少有关真理的形象表达而不可能停留在形象层面,但我们并没有对功能的名称做任何改变,直到并列比较最终告诉我们应分别赋予各模型以何种位置和价值。

"吞噬"和"吮吸"这两个功能的特征虽说模糊,但其动物形象却非常明显。这使我们想起功能模型的一个本质特征,即它能使功能所含的动能转移至施动者,并使其以"行为能力"的形式在施动者身上显现。人们已经知道,我们认为这一现象不但解释了有生命角色的风格学表现,而且解释了概念施动者的"人格化",这类施动者在功能模型中,非常自然地呈现为一些"力量",从而说明功能模型能赋予人物或事物以神话特征。从这一角度看,真理和谎言的具体施动者,比如"爱"或"谦卑",

“恨”或“轻蔑”，都是一些作用力。所以，我们通过功能分析建立的模型完全是施动者的一种非形象接合。

施动者的行为方式是双重的，因为它借助“吞噬”和“吮吸”这两个义位形象来表达。作了这一说明，现在应该尝试对这些形象进行精简，在这两个义位内选择一个义素范畴：该义素范畴应足以阐明两个义位之间的对立，而且在它不再位于有机显现层而而是处在无机显现层面的情况下，还能允许我们对前后两次分析产生的模型进行比较。

为此我们可以使用义素范畴

扩展（expansion）　vs　收缩（contraction），

其接合方式能阐明模型中主体施动者之潜在活动的两个方面。我们认为，这两个义素若与“舒适”（euphorie）组合便能产生“真理”的两个功能，而当其与“不舒适”（dysphorie）组合时则生成“谎言”的两个功能。

功能由一种形象显现转换成另一种形象显现，这使我们更难知道实际投人这些功能的内容。功能接合成两类，但这一接合远非内容的投人，它看起来更像一种先定的语式。由此可见，功能模型尽管有一个个性化的施动者构形，但它仍然独立于投人的内容，后者的组织方式仅依赖于两个语式或类语式范畴，而就被投人内容的功能本身而言，这两个范畴属元语言性质。

b) **结果比较**

分头进行的品质分析和功能分析最终描写了两个模型。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对这两种分析的结果作一番比较。第一个模型阐明了施动者“生/死”的接合，第二个模型分析了施动者“真理 / 谎言”的接合。我们接受了一个凭直觉做出的假设：在这两对施动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但并不知道它究竟属何性质。通过比较这两对施动者的模型，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这一关联的性质。

通过两个模型的并列，我们能发现它们的异同点。而最明显的事实是他们的总体结构非常相似：

1. 两个模型都是二元的；

2. 它们各自拥有 12 个义位，分成施动者和品质两类；

3. 这 12 个义位对分后构成两个施动者；

4. 每个施动者的 6 个义位对分后构成若干组，每组 3 个义位，以致：

$$\frac{\text{正定义}}{\text{负定义}} \simeq \frac{\text{扩展功能}}{\text{收缩功能}}$$

凭借这一组可比形式特征，我们力图使每个模型的 12 个义位一一并列：

| | | 扩 展 ≃ 正定义 | | 收 缩 ≃ 负定义 | |
|---|---|---|---|---|---|
| | | 施动者 | 品质 | 品质 | 施动者 |
| 真理≃生 | $T'''$ | 希 望 | 变 化 | 有 形 | 希 望 |
| | $T''$ | 谦 卑 | 光 亮 | 气 态 | 贫 穷 |
| | $T'$ | 爱 | 热 量 | 纯 粹 | 爱 |
| 谎言≃死 | $T'$ | 恨 | 混 杂 | 寒 冷 | 冷 漠 |
| | $T''$ | 轻 蔑 | 液 态 | 黑 暗 | 吝 啬 |
| | $T'''$ | 失 望 | 无 形 | 静 止 | 梦 想 |

这样的并列配置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了刚才我们所列举的相似点。只是在每组 3 个义位按施动者和品质项分配完毕后，我们碰上了难题：我们必须给每个施动者配一个选自相应清单的品质义位，而可能的品质义位有 3 个。如果把这一分配的推理过程重复一遍，那就要花费太多的笔墨。概而言之，我们主要采用了一个相容性标准，即被转换成功能（通过增加义素“动态”）的品质与作为施动者特征的及物性范畴所具有的 3 种接合方式相容：比如“热量”分配给了“爱”，就可以是一个自反功能（L'amour réchauffe le coeur→爱温暖了心）；“光亮”被当做“谦卑”功能，便可以是一个及物功能；至于“变化”，按其义素接合被视为一种自由的和无理据的“改变”，尤其被视为“上升”，

故它可以是一个不及物功能,而任何其它分配方式都会引起困难,甚至不相容。上述相容性标准由于使用了对应化标准而变得更为可靠:某品质项若能被视为与某个施动者相容,那它的负项必须同时与该施动者的分离项相容。当然,这样一个程序颇具弹性,显然不能保证每个关联项都正确无误。但我们并不认为关联原则会因此而失去其价值。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这样一种比较的依据本身。必须承认,这些依据首先是归纳性的,因为品质分析和功能分析是分开进行的,还因为这两种分析最后出乎意料地给出了两个可以比较的模型,而且我们认为这一比较是可能的和有效的。当然,这类标准并不具强制性。

还可以提出一些结构性依据。两个模型的结构颇为奇特,令人不由得感到惊讶。第一个模型属施动者性质,提供的内容投入却表现为品质,亦即谓语性内容;第二个模型是功能性的,但它所具有的内容却表现为施动者。假如在两个模型的结构属性之间设置一个关联和调整系统,似乎就有可能在两个内容清单之间建立起对等关系。乍看起来,要确立这种对等关系,最简单的办法可能是规定一些能使品质变换成功能的规则。

### c) 模型与内容

我们认为,这一比较从另一个角度看颇具意义:施动者的内容投入和功能的内容投入之间的并列关系一经确立(其它方面的考虑均放在一边),我们便能对两种分析,即形象显现层面上

的分析和非形象显现层面上的分析所获得的结果加以比较。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结果互相补充和互相印证。如果说作为施动者,诸如"希望"、"谦卑"、"爱"这样的概念看起来属于基督教思想体系,并构成一组立即得到确认的社会化词位,那么,"冷漠"、"吝啬"和"梦想"就不同了,它们的组合为贝尔纳诺所特有,在对施动者进行结构化处理时被初次记录,现在它们得到了确认,因为这一组词位是"死"之负定义的关联项。

另一方面,并列比较还能使我们更适当地评估义素范畴的作用;由于对等关系的确立,义素范畴便成了两个模型的依据。有十来个这样的范畴,就足以描写贝尔纳诺的神话语义域,我们视之为内容投入(有时是品质,有时是功能)的义位不过是由义素组合体产生的显现单位。贝尔纳诺的语义域实际建立在这一分类学网络之上:施动者首先只是一些社会化的词位,而通过并列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借助属个人性质的话语显现来构建施动者的过程。我们看到,概念施动者——如"希望"或"爱",且不说"恨"或"梦想"——承载了个性化内容,而把个性化内容分配给它们的是转化为功能的义位。这一转化正是上述分类学的体现。

这一实例只是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语义域内,属于语言符号学层面的义素范畴具有促个性化作用。

这最后一个事实也使我们看到了属于语言之语义层面的另一类普遍现象,即类义素范畴应起的作用。接合为施动者和谓项的语义信息结构、用以区分功能与品质的范畴、把各种施动者

接合起来的范畴，以及后面还要谈到的语式，均独立于语义投入（在完成对语法的语义描写之后，大部分乃至全部语义投入均能在语法分析层面上得到确认），构成了用于建立模型的主要材料；它们使用同样的语义投入，能为模型的接合同时提供几种可能性。因此，在不同类型的模型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和这些模型能否互相改换（reconversion）这两个问题均应从总体上加以研究，着眼点是诸类义素组之间的对等性。结构不同的类义素组会显现出义素同一性，因此，只要这样的模型改换（而不是转换）研究建立在寻找该义素同一性之上，那它就具有某种确实的意义。

### d） 功能模型的语式特性

品质分析所描写的义位可以被视作能够整合进不同组织模型的内容，这一假设只有当我们能确定其中每个模型的特定地位和模型间的关联性质时才得以成立。

我们已经看到，品质分析最后产生 12 个义位，每个义位各自构成一个如下品质信息：

$$Q(\text{热量})[A_1(\text{生})]$$
$$Q(\text{混杂})[A_1(\text{死})]$$

品质义位被认为能够为我们接下来所描写的、但其功能无法被分析的功能模型提供内容；这类品质义位的整合与表面上看到的相反，它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增加义素“动态”把品质谓项

改换成功能谓项，因为从一种描写转入另一种描写，这不仅仅是要改换谓项，而且还要用新的施动者“真理”和“谎言”来取代施动者“生”和“死”。因此必须考虑到不同信息之间而不是谓项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

的确，从有待语义投入的功能信息中，我们认出了主体施动者，该主体施动者已经与受其“作用”的品质义位相关联。至于其功能，我们知道，它以及物性范畴为特征，所以功能的内容一旦投入，它就具有“施动”这一总体意义，从而获得某种功能。从法语句法中取一些例子便能说明此现象。比如下列句子：

L'enfant fait pousser la plante（孩子使植物长大）、

L'amour le rend pur（爱使他变得纯洁），

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信息：

| A | | B |
| --- | --- | --- |
| /孩子驱使（使得）/ | + | /植物长大/。 |
| /爱驱使（起作用以使）/ | + | /X 变得纯洁/。 |

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需要寻找的品质信息和功能信息间关系的性质：

1. 信息 B 可以被视为结构上等同于第一次描写得到的品质信息，如：

Q(光亮)[A1(生)];

2. 信息 A 则相当于所设定的第二次描写得到的功能信息;该功能信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施动者,这些施动者受到我们只知道其及物性或施动特征的功能的限定,如:

F(x;m:及物性)[A1(真理)]。

把上述两个信息结合起来,并"翻译"成法语,大意是:"La vérité fait que la vie est la lumière"(直译:真理使生命成为光)。

说明:我们所选择的例子借助两个不同的动词来显示两个功能。但是,两个功能混合于一个动词的现象也很常见:不说"爱使他变得纯洁",而可以说"爱净化了他",动词"净化"(purifier)由"纯洁"(pur)派生而来,其后缀足以表达第一个"功能"。在其它场合,仅词根就能包含功能和语式。

与我们开始时认为的相反,这里涉及的既不是一个谓项改换成另一个谓项,也不是一个信息改换成另一个信息,而是两个信息的重叠。其中第一个信息只是被描写的内容的公式。在对贝尔纳诺语义域的描写中,该公式是品质分析的结果,与该描写层次的定义并不相关:如果使用的是另一个语料集,或者是对有机显现的前期功能分析(读者可参照"吞噬"/"吮吸"这一对立),我们能获得表达为功能-义位,而不一定是品质-义位的内容描写。

这一内容描写应同该内容的组织区分开来，就被描写的内容而言，内容的组织处在一个元语言层面。两种不同类型的元语言模型就此变得清晰可见：第一种模型，我们已建议称其为构成模型，它承接义位形式下的经描写的内容，并将其组织成一个非时间的关联结构；第二种模型，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此前所说的功能模型，而是语式模型（modèle modal）。它承接所构成的内容，对它们进行重组，或者阐明它们的各种可能的转换。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艰难求取其结构属性的模型不是别的，就是在此以非形象形式出现的转换模型，而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研究了它的形象显现，亦即"考验"。

说明："扩展"/"收缩"这一范畴被放在了一边，它的语式特性很快就会得到阐明。

## 5° 辩证的生存观

### a) 语式

对转换模型的这种解释使我们觉得有可能将施动者"真理"和"谎言"定义为一个可变语式信息的主体。这样，具体的"真理"和"谎言"角色的显现就可以用及物性范畴和"扩展"/"收缩"范畴的纵替换变化来解释。现在我们可以增加一个新的限定：贝尔纳诺并没有把真理和谎言构思为简单信息，而是把它们设想为两个信息算式。因为在贝尔纳诺的词汇体系中，

Vérité（真理）= révolte（反抗）+ acceptation（接受）

Mensonge(谎言)=refus(拒绝)+résignation(屈从)

这两对词位的出现似乎用"舒适"/"不舒适"的对立来解释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只需暂时撇开这一对立,就能发现在贝尔纳诺的构思中,真理和谎言是一组二元对立:

否定(dénégation) vs 肯定(assertion),

也就是说,真理和谎言是被我们称为语式(modalité)的功能的子类所包含的一个基本范畴。

鉴于在此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语式范畴,我们会想好不容易才予以命名的义素范畴"扩展"/"收缩"是否就是"肯定"/"否定"的对立在形象显现层面上的表达,再说两者的定义也完全相符。因此,我们就"扩展"和"收缩"所发表的看法(提到了从语式角度解释这一范畴),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讲,也适用于当下涉及的范畴,因为任何内容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谈得上被否定或被肯定。

这一范畴涉及判断的性质,可惜我们不了解与此范畴相关的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研究,觉得在此领域过于冒险是危险的。不过我们可以尝试在意义基本结构层面诸关系的范围内解释这一范畴:否定属分离性质,它确认结构中存在负项;相反,肯定具并合性质,它肯定了纵替换类的存在。仅拿否定来说,否定似乎能阐明元语义(métasemantique)层面上纵聚合关系项的替换,这一替换有两种:一种是共时替换,可理解为否定显现项,以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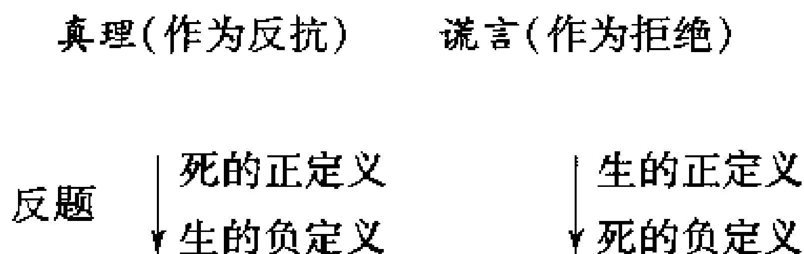
被同时感知的内含项(如:反语);另一种是历时替换,在此是各替换项保持连贯,第一项是显现的或只是预设的,它被否定,使第二项得到肯定(如:反衬)。

说明:一种完整的否定理论应考虑到二元结构6个接合项之间所有的可能替换。这里我们仅考察了否定的一个特殊情况,即否定作用于纵替换类:s/非s。

### b) 贝尔纳诺的否定

为了说明贝尔纳诺否定的运作方式,现在我们可以引入被定义为"历时替换"(substitution diachronique)的程序。如果这一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否定若要起作用,就须作用于一个替换类(或具有一定结构的替换类集),使正项被负项所取代。这样,有关的解释,即真理是谎言的否定,或谎言是真理的否定,看来就不那么充分了,因为否定是否定某个内容(在此是内容"生"或"死"),而不是语式替换类的运作方式。虽然施动者的非形象显现为我们提供了相反的例子("谦卑"是"轻蔑"的否定;"贫穷"是"吝啬"的否定,等等),但否定并不是发生在施动者层面,而是出现在功能层面。对它应做这样的理解:在否定谎言的情况下,是"生"的负定义取代"死"的正定义(例如:"混杂"→"纯粹");相反,在否定真理的情况下,则是用"死"的负定义替换"生"的正定义(例如:"光亮"→"黑暗")。换言之,它依次显现替换类的两个项,否定正项,确认负项;或者——其实这是一回事——把正内容预设为已知项,而只显现负项。我们看到,由否定实施的历时转换相当于被称做"正题"(thèse)和

“反题”(antithèse)的两个部分的连贯：




c) 贝尔纳诺的肯定

肯定之作用现在就更为清楚了。真理是对生的肯定，谎言是对死的肯定，这类笼统的看法虽说没有错，但能分解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因为“死”和“生”的负定义不用再加肯定，它们在否定时已经出现。因此，真理的肯定只肯定“死”的正定义，同时不言明地否定了“死”的负定义；反过来，谎言的肯定是肯定“死”的正定义和否定“生”的负定义。然而，这样一种关于肯定的看法仍然不完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否定和肯定这两个步骤实为同一，而我们所赋予它们的两个不同名称纯粹是供操作用的；而且，否定和肯定之间的区别仅仅取决于需要否定或肯定的内容是正的还是负的。

因此，肯定是另一回事：如果它要显示“真理”或“谎言”的正定义，那它必须同时起用它们的负定义，并在“生”或“死”的正负定义之间建立某种关系。故此，我们应该把肯定理解为这种关系的建立，更确切说是对关系的一种限制，一般人们把这种限制叫做预设(présupposition)。这样，我们无意中把关于肯定的语言学观点与康德对综合判断的定义作了对比，尽管在康德

的定义中，主体和谓项之间的联系(Verknupfung)看来相当于两个范畴化内容，即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如果回到上述分析提出的具体问题，我们或许能进一步明确该关系的性质，而就我们而临的情况而言，该关系就是负定义和正定义之间的关系。作为提醒，我们先回忆一下“生”之定义的义位内容：

| 负定义 | 正定义 |
|---|---|
| 有形 | 变化 |
| 气态 | 光亮 |
| 纯粹 | 热量 |

从左向右，这两列义位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思考之下，我们至多只能发现

如果(si)……那么(alors)，

这一关系也许能说明问题，因为我们可以说，如果由负定义的内容设定的条件得以实现(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正定义的内容就能显现。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生”的定义，而是“死”的定义，那么情况也一样：

| 负定义 | 正定义 |
|---|---|

| | |
|---|---|
| 静止 | 有形 |
| 黑暗 | 液态 |
| 寒冷 | 混杂 |

负定义内容的实现是正定义得以产生和显现的必要条件。

因此可以说,正定义的显现预设了负定义的显现。至于这是简单预设(=选择),还是互逆预设(=连带),那是另一个问题,稍后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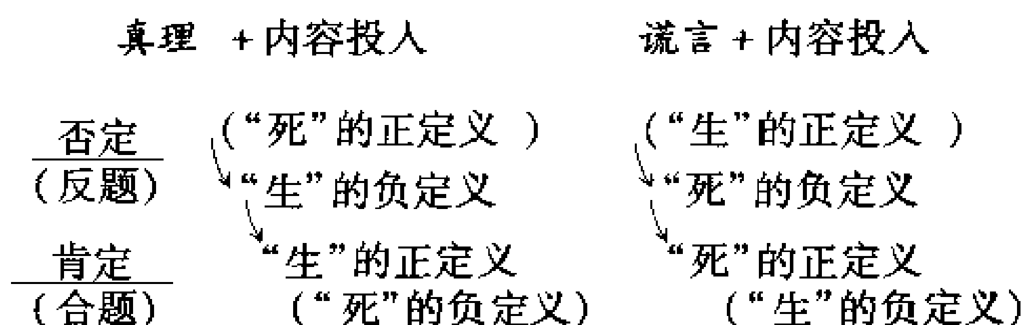
d) **辩证算式**

因此,否定和肯定看来是两个连续的程序,是既定内容之间两种关系——分离和并合——的显现。这些关系就它们所联系的语言项而言,属元语言性质,所以这一新的解释丝毫没有背离先前的提法,即可以把否定和肯定视为元语义信息的语式功能。不过,由于这里涉及的是两个连续的功能,所以不应把如此定义的历时性程序看做一个信息,而应视其为一个由两个信息构成的辩证算式。

**说明**:按照我们对"扩展"/"收缩"这一范畴的解释,扩展是"肯定"的形象显现,收缩则是"否定"的形象显现。这一解释在此得到了证实。

为适合操作,辩证算式要求:有 4 个结构项在场,而且需要转换的内容之两个项必须实际显现。因此,为了解释贝尔纳诺

对真理和谎言的看法，我们需要：




将不必要显现但已包含在话语中的定义置于括号内，我们便看到了两种关系，这两种关系的显现构成了辩证算式；我们还看到内容的两个结构项，它们在这些关系确立之后相继出现。因此，尽管术语常常混淆，但我们还是看出反题和合题是关系的名称，而不是结构项名称，因为结构项属于投人的内容。至多可以说，经辩证处理的内容应该以某种方式范畴化。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下与定义“肯定”的预设之性质相关的问题。可以说，贝尔纳诺同黑格尔一样，都认为肯定可定义为互逆预设：正定义不但预设了负定义的显现，而且它同时也被预设。换言之，要使正定义得到显现，仅负定义已经显现还不够；负定义的显现还要求正定义显现，这如同是一种逻辑的必然。

不过，贝尔纳诺的辩证法因缺乏历史意识而有异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贝尔纳诺那里，辩证算式的主体－施动者并不像黑格尔的主体施动者那样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根据内容布局，同一个算式可以承接“生存”的复合接合项，并把它们转换

成“生”或“死”，操作主体和算式本身在“生”的情况下被命名为“真理”，而在“死”的情况下则被称做“谎言”。在黑格尔那里，主体－施动者是一个，它是上帝，而单向的辩证算式被命名为历史。在贝尔纳诺看来，人类生存不仅仅是一个指示（deixis），它也是一出戏，戏中的两个施动者，而我们倾向于说辅助者和反对者，进行着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它们各有各的辩证法，胜负难以确定。

这一戏剧形象非常合宜，因为这两个施动者，即辅助者和反对者，在舞台上各自呈现为6个角色，故“真理”或“谎言”都只能取得部分的胜利：比如，否定“变化”就会导致对“希望”的拒绝，同时引起“死”的“静止”，后者沉溺于“梦想”；肯定则在“屈从”中将“静止”结合于“无形”（也就是“失望”的特征：乏味、灰暗和单调）。这就是否定一个角色所引起的舞台变故；由于舞台上有12个角色，我们不难想象，“生存”这出戏，如同贝尔纳诺所设想的那样，一定是曲折多变。

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贝尔纳诺在辩证的生存观中引入的不确定系数非常大，这要归因于角色的风格学变化，而这些角色又都被赋予了属于生、死价值观范围的专门功能；原因之二，操作辩证算式的是两个施动者，即真理和谎言。

### e）历史与恒定

这样看来，辩证算式是转换模型的可能表达式之一，而我们知道，转换模型一旦应用于某些内容结构，便能阐明这些结构的

转换。照此理解，辩证算式便是历史(histoire)对恒定状态(permanence)的入侵。

对意义结构的历时转换进行结构性定义无疑是语义学的任务之一，这不仅因为人和社会同时是恒定的又是历史的，任何透彻的描写都不应该忽视这两个方面；面且还因为在人类赖以解释世界或探索未来的各种个人或集体的观念体系中，想象领域的结构转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专门探讨转换模型的上一章里，我们已用类似的词语提出了非时间性结构和历时性结构的互相影响以及它们的双重解释问题。

要把辩证算式应用于某种内容结构，我们说过，需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该内容必须组织成两个相关联的二元范畴。因此，对于贝尔纳诺的语义域，如果再用已经用过的符号来标记：

V = “生”的正定义、
非 V = “死”的负定义、
M = “死”的正定义、
非 M = “生”的负定义，

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表示出非时间性关联结构，它不过是生存的复合结构的重复：

$$\frac{V}{非V} \simeq \frac{M}{非M}$$

从这一非时间结构出发进行辩证转换操作，在第一种情况下是：

1. 否定 V，肯定非 V；
2. 肯定 M，悬置非 M；
3. 确认非 V + M 之间的关系存在。

转换算式在此情况下应叫做“谎言”，而转换的结果，即新的非时间性结构（非 V + M），应称为“死”。

在第二种情况下，辩证运算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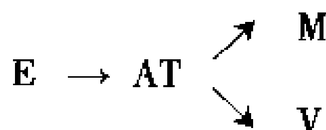
1. 否定 M，并肯定非 M；
2. 肯定 V，同时否定非 V；
3. 确认非 M + V 之间的关系存在。

转换算式可称做“真理”，其结果（非 M + V）表现为“生”的非时间性结构。

故可以认为，通过相继选择正项 V 和 M 并首先将它们否定，转换算式（AT）就能从先前被定义的非时间性结构出发，生成两个新的对立结构：

$$\left(\frac{V}{\text{非 } V} \simeq \frac{M}{\text{非 } M}\right) \rightarrow \text{AT} \rightarrow \left(\frac{\text{非 } V}{M}\right) \text{ vs } \left(\frac{\text{非 } M}{V}\right)。$$

由于原初的非时间性结构已被称做“生存”(E),所以转换生成的两个新的非时间性结构就分别是“死亡”(M)和“生命”(V):




历时性转换的观念学意义也就随之而出。该转换在于抓住在互相矛盾而又错综复杂的生死成分中显现的“生存”内容,通过该内容结构的分裂,或将其转换成“理想的生”,或将其转换为“彻底的死”,原先的含混因这一分离而得到消除。

但这样得到的“生”和“死”并没有变成简单项,而是成了新的合题,因为肯定在“生”(非 M + V)和“死”(非 V + M)的新构成项之间建立起了互逆预设,以致这些对立的概念再次成为复合结构的显现。

现在我们只需恢复贝尔纳诺的词位,以便最终地展现其语义域的主要接合方式。其中有些词位在描写过程中甚至还没有使用过。如果过早引入这些词位,就不可能将它们确定在我们刚刚建立的结构框架内。因此,在贝尔纳诺的作品中,生命和死亡的定义按下列方式词化:

V = 欢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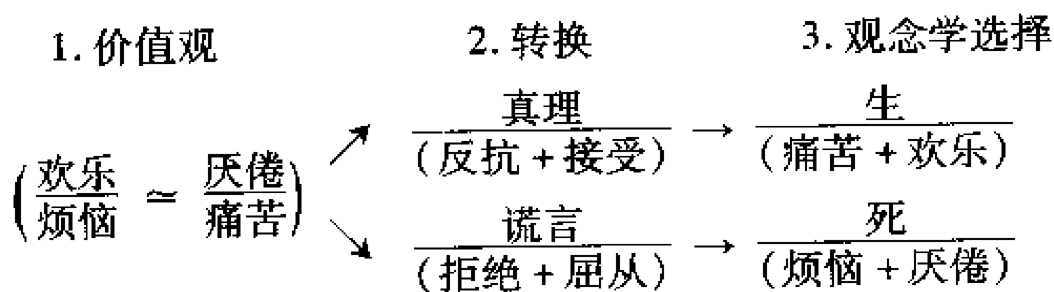
非 V = 烦恼、

M = 厌倦、

非 M　　=　　痛苦。

总图显示了时间上的一前一后，表达如下：

**贝尔纳诺语义域**



# BIBLIOGRAPHIE DES PUBLICATIONS DE A. J. GREIMAS[1]

1947 avec G. Matoré, « Notes lexicologiques », *Le français moderne*, 15, p. 129-142.

1948 *La mode en 1830. Essai de description du vocabulaire vestimentaire d'après les journaux de mode de l'époque*, thèse principale, doctorat d'État è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432 p. [Directeur de thèse : C. Bruneau.] Ici-même, p. 1-255.

*Quelques reflets de la vie sociale en 1830 dans le vocabulaire des journaux de mode de l'époque*, thèse secondaire, 148 p. [Directeur de thèse : R.-L. Wagner.] Ici-même, p. 257-370.

avec G. Matoré, « La méthode en lexicologie. A propos de quelques thèses récentes », *Romanische Forschungen*, 60, p. 411-419.

1949 « Notes lexicologiques », *Le français moderne*, 17, p. 281-306.

1950 avec G. Matoré, « La méthode en lexicologie, II », *Romanische Forschungen*, 62, p. 208-221.

1952 « Nouvelles datations », *Le français moderne*, 20, p. 298-308.

1955 « Nouvelles datations », *Le français moderne*, 23, p. 137-142.

1956 « L'actualité du saussurisme (à l'occasion du 40e anniversaire de la publication du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 *Le français moderne*, 24, p. 191-203. Ici-même, p. 371-382.

« Pour une sociologie du langage », *Arguments*, 1 (1956-1957), p. 16-19. [Compte rendu du livre de Marcel Cohen, Paris, Albin Michel, 1956.]

« Remarqu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mots », *Le français moderne* 24, p. 103-108.

1. Pour les textes antérieurs à 1985, on pourra consulter la bibliographie annotée (avec résumés de textes et citations) de J.-C. Coquet, « Eléments de biobibliographie », *Exigences et perspectives de la sémiotique. Recueil d'hommages pour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H. Parret et H. G. Ruprecht (dir.), Amsterdam, Benjamins, 1985, t. 1, p. LIII-LXXXV. Tout en élargissant le recensement bibliographique, le présent relevé ne prétend nullement être complet et définitif — il omet par exemple les références à de nombreux textes en lituanien qu'il devrait contenir, même si ces derniers relèvent parfois moins du projet scientifique de l'auteur que de l'actualité intellectuelle, esthétique et politique. Pour leurs contributions à la préparation de cette bibliographie, les remerciements de l'éditeur vont à Jacques Fontanille, Teresa Keane-Greimas, Louis Panier, Roland Posner, Eiji Sekine et Tomas Tolvaisas.

1957 avec G. Matoré, « La naissance du “génie” au XVIII^e^ siècle. Étude lexicologique », *Le français moderne*, 25, p. 256-272. [*NB.* : selon les auteurs, ce texte aurait été rédigé en 1955 ou avant.]

1958 « Histoire et linguistique », *Annales*, 1, p. 110-114. [Compte rendu de B. Quemada,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vocabulaire médical 1600-1710*, Besançon, Faculté des lettres, 1955.]

1959 « Les problèmes de la description mécanographique », *Cahiers de lexicologie*, 1, p. 47-75.

Contributions à *Matériaux pour l'histoire du vocabulaire français. Datations nouvelles et documents lexicographiques*, B. Quemada et P. J. Wexler (dir.), séries 1 et 2, 1959-1971.

1960 « Idiotismes, proverbes, dictons », *Cahiers de lexicologie*, 2, p. 41-61. [In *Du sens*, 1970, Les proverbes et les dictons, p. 135-155, sans la discussion des idiotismes.]

« Remarques sur la description mécanographique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 *Bulletin du laboratoire d'analyse lexicographique* (Besançon), 2, p. 1-25. [Repris in *Linguistics*, 22 (1966), p. 34-59, sous le titre « Esquisse d'une morphologie du français en vue de sa description mécanographique ».]

1962 « La linguistique statistique et la linguistique structurale », *Le français moderne*, 30, p. 241-252. [Première partie du compte rendu du livre de P. Guiraud, Paris, PUF, et Dordrecht, Reidel, 1960 ; cf. la suite en 1963.]

« Observations sur la méthode audiovisuelle de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vivantes », *Études de linguistique appliquée*, 1, p. 137-155.

1963 « Analyse du contenu. Comment définir les indéfinis ? (Essai de description sémantique) », *Études de linguistique appliquée*, 2, p. 110-125. [Repris in *Actes sémiotiques. Documents du Groupe de recherches en sémio-linguistique (GRS-l)*, 8.72 (1986), p. 19-34.] Ici-même, p. 383-400.

« La description de la signification et la mythologie comparée », *L'homme*, 3.3, p. 51-63. [In *Du sens*, 1970, p. 117-134.]

« La linguistique statistique et la linguistique structurale », *Le français moderne*, 31, p. 55-68. [Suite et fin de la première partie parue l'année précédente.]

1964 *Cours de sémantique*, Paris, ronéotypé de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Saint-Cloud. [Cours assuré 1963-1964 au Centre de linguistique quantitative de l'Institut Henri-Poincaré, remanié et élargi pour devenir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1966.]

« Dramatis Personæ », *Arena* (Londres), 19. [In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1966, p. 172-191.]

« La signification et sa manifestation dans le discours », *Cahiers de lexicologie*, 5.2, p. 17-27. [In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1966, p. 30-41.]

« La structure élémentaire de la signification en linguistique », *L'homme*, 4.3, p. 5-17. [In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1966, p. 18-29, sans la section préliminaire p. 5-6, y compris sa précision sur les cinq présuppositions principales de la définition de la structure.]

« Les topologiques. Identification et analyse d'une classe de lexèmes », *Cahiers de lexicologie*, 4, p. 17-28.

1965 « Le conte populaire russe (analyse fonctionnelle)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lavic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9, p. 152-175. [In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1966, p. 192-221.]

« *L'Illusion comique* de P. Corneille. Essai de statistique lexicale », *Cahiers de lexicologie*, 6, p. 120-122. [Compte rendu du livre de C. Muller, Paris, Klincksieck, 1964.]

1966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Recherche de méthode*. Paris, Larousse, 262 p. Nouv. éd. Paris, PUF, 1986. [Traductions italienne (1969), espagnole (1971 ; 3e réimpr., 1987), allemande (1971), portugaise (1973), danoise (1974), finlandaise (1980), américaine (1983) et japonaise (1988) ; pour le lituanien, voir 1989.]

« 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e l'interprétation du récit mythique », *Communications*, 8, p. 28-59. [In *Du sens*, 1970, p. 185-230.]

Préface à L. Hjelmslev, *Le langage. Une introduction*, trad. franç. de M. Olsen, Paris, Minuit, p. 7-21.

« Structure et histoire », *Les temps modernes*, 246, p. 815-827. [In *Du sens*, 1970, p. 103-115.]

avec J. Dubois, Introduction à *Langages*, 3, numéro consacré à *Linguistique française. Le verbe et la phrase*, A. J. Greimas et J. Dubois (dir.), p. 3-7.

1967 *Modelli semiologici*, trad. P. Fabbri et G. Paioni, Urbino, Argalla. [Réunit cinq articles des années soixante, qui paraîtront in *Du sens*, 1970.]

« Approche générative de l'analyse des actants », *Word*, 23.1/2/3, p. 221-238. [In *Du sens*, 1970, p. 249-270.]

« L'écriture cruciverbiste », in *To Honor Roman Jakobson : Essay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2 vol., La Haye, Mouton, Janua linguarum series maior 32, p. 799-815. [In *Du sens*, 1970, p. 285-307.]

« Le problème des ad'dâd et les niveaux de signification », in *L'ambivalence dans la culture arabe*, J.-P. Charnay et J. Berque (dir.), Paris, Anthropos, p. 283-290.

« Les relations entre la linguistique structurale et la poétique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sociales /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Unesco), 19, p. 8-17. [In *Du sens*, 1970, La linguistique structurale et la poétique, p. 271-283.]

1968 *Dictionnaire de l'ancien français jusqu'au milieu du XIVe siècle*, Paris, Larousse, XV-676 p., nouv. éd., 1976.

« Conditions d'une sémiotique du monde naturel », *Langages*, 10, numéro consacré à *Pratiques et langages gestuels*, A. J. Greimas (dir.), p. 3-35. [In *Du sens*, 1970, p. 49-91.]

« Per une sociologia del senso comune », *Rassegna italiana di sociologia*, 2, p. 199-209. [In *Du sens*, 1970, Pour une sociologie du sens commun, p. 93-102 ; repris aussi in *Revue romane*, 4.2 (1969).]

« Semiotica o Metafisica ? », *Strumenti critici*, 2.1, p. 71-79. [Resté inédit en fr.]

avec F. Rastier, « The Interaction of Semiotic Constraints », *Yale French Studies*, 41, p. 86-105. [In *Du sens*, 1970, Les jeux des contraintes sémiotiques, p. 135-155.]

1969 « Des modèles théoriques en sociolinguistique (pour une grammaire sociosémiotique) », in *Giornate internazionali di sociolinguistica / International Days of Sociolinguistics*, Actes du Second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Sciences sociales, organisé par l'Istituto Luigi Sturzo à Rome, p. 95-109. [In *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1976, p. 61-76.]

« Éléments d'une grammaire narrative », *L'homme*, 9.3, p. 71-92. [In *Du sens*, p. 157-183.]
« La structure sémantique », communication présentée au Symposium organisé par Wenner-Gren Foundation sur Cognitive Studi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à Chicago, mars 1969. [In *Du sens*, 1970, p. 39-48.]
1970 *Du sens. Essais sémiotiques*, Paris, Le Seuil, 318 p. [Traductions espagnole (1973), italienne (1974 ; 2e éd., 1984 ; nouv. éd., 1996), portugaise et roumaine (1975), allemande (1985) et japonaise (1992) ; pour le lituanien, voir 1989 ; pour l'américain, voir 1987 et 1990.]
« La littérature ethnique », intervention clôturant l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Littérature ethnique, tenu à Palermo en avril. [In *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1976, p. 189-216.]
« La quête de la peur. Réflexions sur un groupe de contes populaires », in *Échanges et communications. Mélanges offerts à Claude Lévi-Strauss à l'occasion de son 60e anniversaire*, J. Pouillon et P. Maranda (dir.), 2 vol., La Haye, Mouton, p. 1207-1222. [In *Du sens*, 1970, p. 231-247.]
« Sémantique, sémiotique et sémiologie », in *Sign, Language, Culture*, A. J. Greimas *et al.* (dir.), La Haye, Mouton, p. 13-27. [In *Du sens*, 1970, Considérations sur le langage, p. 19-38 ; la plupart des contributions réunies dans le livre représentent des communications présentées aux deux premiers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e Sémiotique, surtout celui tenu à Kazimierz, Pologne, en 1966.]
« Sémiotique et communications sociales », *Annuario* de l'Istituto Agostino Gemelli à Milan. [In *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1976, p. 45-60.]
1971 « Narrative Grammar : Units and Levels », trad. P. Bodrock, *Modern Language Notes*, 86, p. 793-807. [Resté inédit en fr.]
« Transmission et communication », in *L'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S. Doubrovsky et T. Todorov (dir.), Paris, Plon, p. 71-102.
avec E. Landowski *et al.*, « Analyse sémiotique d'un discours juridique », *Documents de travail* du *Centro internazionale di semiotica e di linguistica* (Urbino), série C, n° 7. [In *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1976, p. 79-128.]
Préface à R. D. Collis, *Pour une sémiologie esquimaude*, Paris, Dunod, p. 1-2.
1972 « Pour une théorie du discours poétique », introduction à *Essais de sémiotique poétique*, A. J. Greimas (dir.), Paris, Larousse, 240 p., p. 5-24. [Livre traduit en portugais (1976) et en espagnol (1978)]
1973 « Les actants, les acteurs et les figures », in *Sémiotique narrative et textuelle*, C. Chabrol [et F. Rastier] (dir.), Paris, Larousse, p. 161-176. [In *Du sens II*, 1983, p. 49-66.]
« Description et narrativité dans *La ficelle* de Guy de Maupassant », *Revue canadienne de linguistique romane* (Ontario), 1.1. [In *Du sens II*, 1983, p. 135-155 ; repris aussi in *Actes sémiotiques. Documents du GRS-L*, 13 (1980) et in *Cahiers roumains d'études littéraires*, 2 (1981).]
« Un problème de sémiotique narrative. Les objets de valeur », *Langages*, 31, numéro consacré à *Sémiotiques textuelles*, M. Arrivé et J.-C. Coquet (dir.), p. 13-35. [In *Du sens II*, 1983, p. 19-48.]
« Réflexions sur les objets ethno-sémiotiques », in *Actes du Ier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thnologie européenne*, tenu en août 1971 à Paris, Moulin-les-Metz, Maisonneuve et Larose. [In *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1976, p. 175-185.]

« Sur 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 et l'histoire fondamentale », in *Geschichte. Ereignis und Erzählung*, R. Kosellek (dir.), Munich, Fink, p. 138-153. [In *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1976, p. 161-174.]

1974 « L'énonciation. Une posture épistémologique », in *Homenagem a A. J. Greimas, Significação. Revista brasileira do semiótica*, 1, p. 9-25. [A l'origine, une intervention orale lors d'un séminaire à l'Universidade de Ribeirão Preto au Brésil en 1973.]

« A. J. Greimas », in *Discussing Language*, H. Parret (dir.), La Haye, Mouton, p. 55-79. [Propos recueillis par H. Parret.]

« Pour une sémiotique topologique », in *Sémiotique de l'espace*, Actes du Colloque de l'Institut de l'Environnement, tenu en mai 1972 à Paris, Groupe 107 (dir.), Paris, Recherches DGRST. [In *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1976, p. 129-157.]

« Entretien avec A. J. Greimas. Une tradition de rigueur », *Le Monde* du 7 juin, p. 28. [Propos recueillis par R. P. Droit.]

1975 « Des accidents dans les sciences dites humaines », *Versus. Quaderni di studi semiotici*, 12, p. 1-31. [In *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1976, p. 28-60.]

1976 *Maupassant. La sémiotique du texte. Exercices pratiques*, Paris, Le Seuil, 286 p. [Traductions espagnole (1983 ; nouv. éd., 1993), américaine (1988), portugaise (Brésil, 1993) et italienne, avec une postface de P. Ricœur (1995).]

*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Le Seuil, 220 p. [Traductions espagnole (1980), portugaise (Brésil, 1981) et italienne (1991) ; pour l'américain, voir 1987 et 1990.]

*Semiótica do discurso científico : Da modalidade*, trad. C. T. Pais, São Paulo, Difel, XV-86 p. [Trad. port. de « Des accidents dans les sciences dites humaines », 1975, et de « Pour une théorie des modalités », 1976.]

« Les acquis et les projets », préface à J. Courtés, *Sémiotique narrative et discursive*, Paris, Hachette, p. 5-25.

« Le contrat de véridiction », *Langage* (Tokyo), 5.2. [In *Du sens II*, 1983, p. 103-113 ; repris aussi dans les Actes du Colloque où il fut prononcé, *Le vraisemblable et la fiction*,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1980, p. 1-11, et de même in *Dilbilim* (Istanbul), 2 (1977), in *Acta semiotica et linguistica*, 1 (1978) et in *Man and World*, 13.3-4 (1980).]

« Pour une théorie des modalités », *Langages*, 43, numéro consacré à *Les modalités*, I. Darrault (dir.), p. 90-108. [In *Du sens II*, 1983, p. 67-91.]

« Entretien », *Dilbilim* (Istanbul), 1, p. 25-33. [Propos recueillis par B. Vardar.]

« Entretien. Sémiotique narrative et textuelle », *Pratiques* (Metz), 11/12, p. 5-12. [Interview du comité de rédaction de la revue : J.-M. Adam, M. Charolles, F. Doumazane, M. Michel, B. Petitjean et F. Vanoye.]

« Entretien sur 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signification », in *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signification*, F. Nef (dir.), Bruxelles, Complexe, p. 18-26. [Propos recueillis par F. Nef.]

Préface à C. Legaré, *La structure sémantique. Le lexème « cœur » dans l'œuvre de Jean Eudes*, Montréal,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Québec, p. VII-VIII.

« Sémiotique », in *La grande encyclopédie*, Paris, Larousse, vol. 18. [Repris in *La linguistique*, Paris, Larousse, 1977.]

avec J. Courtés, «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Narrative Discourse », trad. M. Rengstorf, *New Literary History*, 7, p. 433-447. [Resté inédit en français.]

1977 Postface à Groupe d'Entrevernes, *Signes et paraboles. Sémiotique et texte évangélique*, Paris, Le Seuil, p. 227-237.

avec J. Courtés, « Pour un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sémiotique », *Versus. Quaderni di studi semiotici*, 17, p. 65-81. [Extraits de *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1979.]

avec F. Nef, « Essai sur la vie sentimentale des hippopotames », in *Grammars and Descriptions. Studies in Text Theory and Text Analysis*, J. Petöfi et T. van Dijk (dir.), Berlin, De Gruyter, p. 85-104. [Repris in *Sémiotique et Bible* (Lyon), 22 (juin 1981), p. 1-23.]

1978 « Pour une sémiotique des passions. Hypothèses de recherche pour 1978-1979 », *Actes sémiotiques. Bulletin du GRS-L*, 6, p. 1-6.

« Semiotiko žvilgsnis kalbą. Pasikalbėjimas su prof. Algirdu Greimu », *Problemos* (Vilnius), 21, p. 102-107. « Le langage vu par un sémioticien. Une conversation avec le prof. Algirdas Greimas. » [Propos recueillis par R. Pavilionis.]

avec J. Courtés, « Cendrillon va au bal... Les rôles et les figures dans la littérature orale française », in *Systèmes de signes. Textes réunis en hommage à Germaine Dieterlen*, Paris, Hermann, p. 243-257.

1979 *Apie dievus ir žmones. Lietuvių mitologijos studijos*, Chicago, AM & M, 360 p. [Études de mythologie lituanienne. Trad. franç., 1985 : *Des dieux et des hommes. Études de mythologie lithuanienne*, trad. E. Rechner, révisé par A. Hénault, Paris, PUF, 234 p., sans un texte, « Vulcanus Jagaubis, dieu du feu », paru à part, voir 1984 ; trad. amér., 1992 (intégrale), et roumaine, 1997.]

avec J. Courtés, *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 Paris, Hachette, VII-424 p. [Traductions espagnole (1982 ; nouv. éd., 1990), américaine (1982), portugaise (Brésil, 1983) et italienne (1986).]

« De la modalisation de l'être », *Actes sémiotiques. Bulletin du GRS-L*, 9, p. 9-19. [In *Du sens II*, 1983, p. 93-102.]

« Pour une sémiotique didactique », *Actes sémiotiques. Bulletin du GRS-L*, 7, p. 3-8.

Rapport d'activités du Groupe sémio-linguistique, *Actes sémiotiques. Bulletin du GRS-L*, 12, 6-34.

« La soupe au pistou. Construction d'un objet de valeur », *Actes sémiotiques. Documents du GRS-L*, 5, p. 4-16. [In *Du sens II*, 1983, p. 157-169.]

avec E. Landowski, « Les parcours du savoir », in *Introduction à l'analyse du discours en sciences sociales*, A. J. Greimas et E. Landowski (dir.), Paris, Hachette, p. 5-28.

Avant-propos à A. Hénault, *Les enjeux de la sémiotique*, vol. 1, Paris, PUF, p. 5-6, nouv. éd., coll. « Formes sémiotiques », 1993.

Avant-propos à F. Bastide, *Le foie lavé. Approche sémiotique d'un texte de sciences expérimentales*, *Actes sémiotiques. Documents du GRS-L*, 7, p. 3-4.

Avant-propos à J. Courtés, *La « lettre » dans le conte populaire merveilleux français, I*, *Actes sémiotiques. Documents du GRS-L*, 9, p. 3-7.

1980 « A propos du jeu », *Actes sémiotiques. Documents du GRS-L*, 13, p. 29-34.

« Ašara ir poezija. Vienos Marcelijaus Martinaičio poemos analizė », *Metme-*

*nys* (Chicago), 40, p. 44-73. « Larme et poésie. Analyse d'un poème de Marcelijus Martinaitis ».

« Notes sur le métalangage », *Actes sémiotiques. Bulletin du GRS-L*, 13, p. 48-54.

« La provocation par défi », in *Figures de la manipulation*, A. J. Greimas et I. Darrault (dir.), Paris, Autres. [In *Du sens II*, 1983, p. 213-223 ; repris aussi sous le titre « Le défi », in *Actes sémiotiques. Bulletin du GRS-L*, 23, p. 39-48.]

« Roland Barthes. Une biographie à construire », *Actes sémiotiques. Bulletin du GRS-L*, 13, p. 3-7.

« Deuxième entretien avec A. J. Greimas », *Dilbilim* (Istanbul), 6, p. 185-190. [Propos recueillis par B. Vardar.]

1981 « Contre-note aux études sur le carré sémiotique », *Actes sémiotiques. Bulletin du GRS-L*, 17, p. 42-46.

« De la colère. Étude de sémantique lexicale », *Actes sémiotiques. Documents du GRS-L*, 27, p. 9-27. [In *Du sens II*, 1983, p. 225-246.]

1983 *Du sens II. Essais sémiotiques*, Paris, Le Seuil, 254 p. [Traduction espagnole (1990) et italienne (1985) ; pour l'américain, voir 1987 et 1990 ; pour le lituanien, voir 1989.]

« De la figurativité », *Actes sémiotiques. Bulletin du GRS-L*, 26, p. 48-51.

« Dievai Viešpačiai », *Metmenys* (Chicago), 46, p. 38-58. « Dieux seigneurs ».

« Observations épistémologiques », *Actes sémiotiques. Documents du GRS-L*, 50, numéro consacré à *Pragmatique et sémiotique*, p. 5-8.

« Sakm® apie šov v®liÖ vedl », *Metmenys* (Chicago), 45, p. 3-26. « Un conte à propos de Šovis, meneur d'âmes ».

« Le savoir et le croire. Un seul univers cognitif », in *On Believing / De la croyance : Epistemological and Semiotic Approaches / Approches épistémologiques et sémiotiques*, H. Parret (dir.), Amsterdam, Benjamins, p. 130-145. [In *Du sens II*, 1983, p. 115-133.]

« La traduction et la Bible », *Sémiotique et Bible*, 32 (décembre), p. 1-11. [Conférence donnée au Colloque CNRS de Nancy, octobre 1977.]

Interview : « Zur aktuellen Lage der semiotischen Forschung », *Zeitschrift für Semiotik*, 5, p. 265-278. [Propos recueillis par P. Stockinger.]

Préface à A. Gueuret, *L'engendrement d'un récit. L'évangile de l'enfance selon saint Luc*, Paris, Cerf, p. 7-8.

1984 « A. J. Greimas. Entretien », *Langue française*, 61, numéro consacré à *Sémiotique et 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p. 121-128. [Propos recueillis par J. Fontanille.]

« Ouvertures métasémiotiques. Entretien avec A. J. Greimas », *Recherches sémiotiques / Semiotic Inquiry*, 4.1, p. 1-23. [Propos recueillis par H.-G. Ruprecht.]

« Sémiotique figurative et sémiotique plastique », *Actes sémiotiques. Documents du GRS-L*, 60.

« Vulcanus Jagaubis, dieu du feu », *Lalies*, Actes des sessions de linguistique et de littérature, 6 (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Nouvelle).

« Avis au lecteur », *Actes sémiotiques. Documents du GRS-L*, 51, p. 3-5. [Préface à I. Calvino, *Comment j'ai écrit un de mes livres*.]

1985 « La pensée au carré », *Conséquences*, 5, p. 4-9. [Propos recueillis par J.-C. Raillon.]

Avant-propos à C. Zilberberg, « Retour à Saussure ? », *Actes sémiotiques. Documents du GRS-L*, 63, p. 3-4.

1986 « De la nostalgie. Étude de sémantique lexicale », *Actes sémiotiques. Bulletin du GRS-L*, II.39, p. 5-11.

« Conversation avec A. J. Greimas », *Versus. Quaderni di studi semiotici*, 43, p. 41-57. [Propos recueillis par A. Zinna.]

avec J. Courtés *et al.*, *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 II, (Compléments, débats, propositions)*, Paris, Hachette, 270 p. [Traduction espagnole (1991).]

1987 *De l'imperfection*, Périgueux, Fanlac, 102 p. [Traduction italienne (1988), espagnole (Mexique, 1990), polonaise (1993) et turque (1995) ; projets de traductions portugaise (Brésil) et américaine en cours.]

*On Meaning. Selected Writings in Semiotic Theory*, trad. P. Perron and F. Colli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XLV-238 p. [Traduction américaine d'articles de *Du sens*, 1970, de *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1976, et de *Du sens II*, 1983.]

« Postulats, méthodes et enjeux. Algirdas J. Greimas mis à la question », in *Sémiotique en jeu. A partir et autour de l'œuvre d'A. J. Greimas*, Actes de la Décade de Cerisy, Cerisy-la-Salle, 4-14 août 1983, M. Arrivé et J.-C. Coquet (dir.), Amsterdam, Benjamins et Paris, Hadès, p. 299-330.

« Hacia una tercera revolución semiótica », *Morphé* (Puebla), 3-4 (juin-décembre 1987). [Propos recueillis par P. Aage Brandt.]

« Les paraboles au regard de la sémiotique. Entretien avec A. J. Greimas », in *Parole, figure, parabole. Recherches autour du discours parabolique*, J. Delorme (dir.), Ly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p. 385-392.

avec P. Ricœur, « Pour une sémiotique du récit : rencontre entre A. J. Greimas et Paul Ricœur », in *Sémiotique en jeu : à partir et autour de l'œuvre d'A. J. Greimas*, Actes de la Décade de Cerisy, Cerisy-la-Salle, 4-14 août 1983, M. Arrivé et J.-C. Coquet (dir.), Amsterdam, Benjamins et Paris, Hadès, p. 291-298. [Résumé de leur discussion, rédigé par M. Coquet.]

1988 Préface, *La lettre. Approches sémiotiques*. Les Actes du VI[e] Colloque interdisciplinaire, en collaboration avec l'Association suisse de sémiotique, Fribourg,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Fribourg, p. 5-7.

1989 *Semiotika. Darb± rinktin∫*, trad. R. Pavilionis, Vilnius, Mintis, 396 p. [« Sémiotique. Recueil de textes ». Traduction lituanienne de textes tirés de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1966, de *Du sens*, 1970, et de *Du sens II*, 1983.]

« On Meaning », trad. et adapté P. Perron et F. Collins, *New Literary History*, 20.3 (printemps), numéro consacré à *Greimassian Semiotics*, p. 539-550. [Communication présentée à l'Université de Toronto, le 22 novembre 1985, restée inédite en français.]

« En guise de préface », *Nouveaux Actes sémiotiques*, 1, p. I-II.

avec P. Ricœur, « On Narrativity », trad. et adapté P. Perron et F. Collins, *New Literary History*, 20.3 (printemps), numéro consacré à *Greimassian Semiotics*, p. 551-562. [Discussion en guise de conclusion du Colloque sur les Universaux de la Narrativité, tenu à Victoria Colle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17 juin 1984, au cours du V[e] International Summer Institute for Semiotic and Structural Studies.]

1990 *The Social Sciences : A Semiotic View*, trad. P. Perron et F. Colli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XII-198 p., publié en Grande-Bretagne : *Narrative Semiotics and Cognitive Discourses*, London, Pinter [Traduction amé-

ricaine d'articles tirés de *Du sens*, 1970, de *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1976, et de *Du sens II*, 1983.]

avec T. Keane, « Pour ferrer la cigale », in *Espaces du texte. Recueil d'hommages pour Jacques Geninasca*, Neuchâtel, La Baconnière, p. 57-61.

1991 avec J. Fontanille, *La sémiotique des passions. Des états de choses aux états d'âme*, Paris, Le Seuil, 334 p. [Traductions américaine (1992), portugaise (1993), espagnole (Mexique, 1994), italienne (1996) et roumaine (1997).]

*Iš arti ir iš toli. Literatūra, Kultūra, Grožis*, S. Žukas (dir.), Vilnius, Vaga, 526 p. [« De près et de loin. Littérature, Culture, Beauté ». Sélection de contributions aux périodiques lituaniens, comprenant des articles scientifiques, mais aussi des discussions de l'actualité, des idées, des tendances esthétiques.]

avec T. Keane, « L'éloge du mot. Considérations méthodologiques à propos d'un nouveau dictionnaire », *Cahiers de lexicologie*, 58.1, p. 93-100. [La préface de *Dictionnaire du moyen français*, 1992.]

«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La France est gagnée par l' "insignifiance" », *Le Monde* du 22 octobre 1991, p. 44. [Propos recueillis par M. Kajman et C. Lesnes.]

« Vieillir en création », *Art et thérapie*, 38-39 (juin), p. 14-15.

1992 avec T. Keane, *Dictionnaire du moyen français. La Renaissance*, Paris, Larousse, XLV-668 p.

Interview in *Mi pare un secolo. Ritratti e parole di centosei protagonisti del Novecento*, Torino, Einaudi. [Propos recueillis et traduits par P. Agosti et G. Borgese.]

« La sémiotique, c'est le monde du sens commun », *Sciences humaines*, 22 (novembre), p. 13-15. [Propos recueillis par F. Dosse.]

1993 avec T. M. Keane, *Cranach. La beauté de la femme, Eutopías*, 26, 2e série, Documents de travail, Centro de Semiótica y Teoría del espectáculo, Universitat de València & Asociación Vasca de Semiótica (Valencia, Episteme), 20 p. [Projet de traduction anglaise en cours.]

« Le beau geste », *Recherches sémiotiques / Semiotic Inquiry*, 13.1-2, numéro consacré à *Les formes de vie*, J. Fontanille (dir.), p. 21-36.

« Autobiographie. Paris et nulle part ailleurs. Le Moyen Age fantastique de Jurgis Baltrusaitis », *Lettres actuelles*, 1-2, p. 20-24.

« La parabole. Une forme de vie », in *Le temps de la lecture. Exégèse biblique et sémiotique. Mélanges offerts à Jean Delorme*, L. Panier (dir.), Paris, Cerf, p. 381-387.

avec S. Žukas, *La Lithuanie. Un des Pays baltes*, Vilnius, Baltos Lankos, 120 p.

1994 « Notas manuscritas de A. J. Greimas », in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Testemunhos*, A. C. de Oliveira (dir.), São Paulo, Escola de Comunicação : Editora da Pontifícia Universidade Católica de São Paulo, p. 16-35. [Reproduction en fac-similé de quelques pages tirées de notes manuscrites pour une monographie sur les passions (*ca.* 1980), accompagnées de la transcription tapée.]

avec P. Ricœur, « Débat sur la sémiotique des passions, tenu le 23 mai 1989, au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à Paris », *in* A. Hénault, *Le pouvoir comme passion*, Paris, PUF, p. 195-212.

1998 « Gedimino Sapnas (lietuviÖ mitas apie miesto kurimą : analiz®s bandymas) », *Kultūros Barai* (Vilnius), 8-9. [Texte en lituanien, traduit par Kęstutis Nastopka du manuscrit français inédit intitulé *Le songe de Gediminas. Essai d'analyse d'un mythe lituanien de la fondation de la cité*.]